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革命历史 文件汇集

(广东区党委文件)

1946·1—1947·7

中 央 档 案 馆
广 东 省 档 案 馆

1989年10月

编辑说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编入甲种本第56册的是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所保存的广东区党委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 〕”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看不清的人名、地名以“△”代之；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某些文件，如“区委报告第一号”，则直接改为“广东区党委报告第一号”，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同志指正。

目 录

- 林平致中央并转北平叶参谋长电
——林平和方方的联络请叶设法
(1946年1月31日) (1)
-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重庆周恩来电
——可否争取恩来等先来华南
(1946年2月5日) (1)
- 尹林平曾生致中央并转北平叶剑英电
——关于张发奎拖延与方方会谈的情况
(1946年2月9日) (2)
- 中共广东区委会发言人发表重要谈话
——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逻辑与内战罪行
(1946年2月15日) (3)
- 华侨与祖国
(1946年2月) (8)
- 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发言人谈广东省内的中共部队
(1946年2月19日) (10)
- 急防再来一次大饥荒
(1946年2月) (13)
- 扩大惩治附敌分子的工作
(1946年2月) (15)
- 死硬分子力图挣扎
(1946年2月) (17)

尹林平曾生致中央并转重庆周恩来北平叶剑英电	
——我无法会马张周	
(1946年2月25日)	(19)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重庆周恩来北平叶剑英电	
——我以粤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	
(1946年2月25日)	(20)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重庆周恩来北平叶剑英电	
——林平是否赴渝	
(1946年2月27日)	(21)
挽救乡邦人人有责	
(1946年2月)	(21)
梁广致中央组织部电	
——港海员工会成立	
(1946年2月27日)	(23)
尹林平致中央电	
——高干拟公开	
(1946年2月31日)	(24)
广东区党委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1946年2月)	(25)
立刻取消特务组织	
(1946年3月)	(30)
欢迎三人委员会来粤	
(1946年3月)	(32)
妇女们参加到民主运动中来	
(1946年3月)	(34)
广东区党委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补充指示	
(1946年3月8日)	(36)

- 尹林平致梁连饶电
 ——林平、廖承志不日回粤
 (1946年3月9日) (43)
- 尹林平致梁广电
 ——选择部分干部调往华北训练
 (1946年3月10日) (44)
- 广东区党委致中央并转重庆周恩来尹林平电
 ——广东区整军决定
 (1946年3月11日) (45)
- 连贯蒲特致重庆尹林平电
 ——要火速交沪一千万
 (1946年3月12日) (46)
- 梁广致重庆尹林平电
 ——周楠等四人留港
 (1946年3月15日) (46)
- 尹林平致梁广连贯电
 ——转致海南岛工作问题
 (1946年3月16日) (47)
- 尹林平致广东区党委电
 ——对整军问题之意见
 (1946年3月17日) (48)
- △△致重庆尹林平电
 ——广州行营诬我为匪帮
 (1946年3月20日) (49)
- 尹林平关于广东军队和党组织情况报告
 (1946年3月20日) (49)

梁广致中央并重庆周恩来电

——琼崖情况报告

(1946年3月29日) (54)

梁广曾生致中央并重庆周恩来尹林平电

——最近东江情况

(1946年3月29日) (55)

△△致中央并转尹林平电

——《国民日报》载张的谈话

(1946年3月) (56)

尹林平致中央转粤北王杨电

——东纵问题获协议

(1946年4月3日) (57)

梁广致中央书记处转询上海刘晓电

——吴有恒抵港

(1946年4月5日) (57)

国内时局的症结

(1946年4月) (58)

裁军与复员

(1946年4月) (60)

杜致中机李科长电

——粤省译电人员处理问题

(1946年4月10日) (62)

梁广致李碧山电

——给碧山三项指示

(1946年4月10日) (63)

唯民主才能挽救经济崩溃

(1946年4月) (64)

梁广致中央组织部电	
——原十二集团军工作之我党员	
(1946年4月12日)	(66)
谈广东的肃奸工作	
(1946年4月)	(67)
方方致任弼时转张鼎丞电	
——调二罗、王回闽粤	
(1946年4月20日)	(69)
梁广致中央组织部转重庆周恩来董必武电	
——七大代表四人抵港	
(1946年4月24日)	(69)
梁广尹林平关于琼崖独立纵队情况报告	
(1946年4—5月)	(70)
广东区党委致中央并重庆周恩来电	
——国党派出三特务小组	
(1946年5月3日)	(72)
广东区党委致各地紧急指示信	
(1946年5月6日)	(73)
方方致李碧山林美南电	
——目前斗争的方法	
(1946年5月10日)	(74)
梁广致康生电	
——希派负责情工干部	
(1946年5月13日)	(76)
杜致中机电	
——粤机应缩小范围	
(1946年5月20日)	(76)

尹林平致周恩来董必武电

——请答复几项疑问

(1946年5月26日) (77)

林致质忠电

——杨智明调来我处工作

(1946年5月29日) (78)

方方致周恩来董必武电

——请促美船速至半岛

(1946年6月14日) (78)

尹林平致中央转南京局电

——港计划设三个电台

(1946年6月16日) (79)

梁广致中机转碧山曼平电

——请碧山来港

(1946年6月20日) (79)

尹林平复中机已铤电

(1946年6月22日) (80)

尹林平致中央转南京局电

——关于港工委意见

(1946年6月23日) (81)

方方曾生致中央电

——我北撤部队准备好待登船

(1946年6月24日) (83)

梁广致中央刘少奇电

——请中央抽调干部

(1946年6月24日) (84)

梁广致中央并刘少奇电

——请准我回延

(1946年6月24日)…………… (85)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宁周恩来电

——东纵人员已于已陷北撤

(1946年7月2日)…………… (86)

梁广致中机并转碧山电

——碧山台可能已暴露

(1946年7月2日)…………… (86)

方方致中央转叶剑英周恩来电

——方工作报告

(1946年7月3日)…………… (87)

尹林平致中央并南京局电

——东纵已北上

(1946年7月3日)…………… (88)

曾生致中央电

——东纵安抵烟台

(1946年7月5日)…………… (88)

方方致周恩来电

——海南问题如何解决

(1946年7月6日)…………… (89)

杜致中机李科长电

——粤机改组经过

(1946年7月7日)…………… (89)

方方尹林平复周恩来电

——关于梁广工作问题

(1946年7月13日)…………… (90)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山东曾生电

——给曾生、杨康华等提供意见

(1946年7月13日) (91)

方方致周恩来电

——王邱可返京

(1946年7月20日) (92)

方方致周恩来并转叶剑英电

——广州行营强迫我复员武装人员集训

(1946年7月20日) (92)

尹林平复京周恩来电

——关于停止活动问题

(1946年7月21日) (93)

曾生致中机转尹林平电

——将数年战绩告我

(1946年8月1日) (93)

方方致叶剑英电

——请示任务

(1946年8月1日) (94)

方方尹林平致刘少奇并转周恩来电

——海南问题目前已不能谈判

(1946年8月11日) (94)

孟琛：灾难重重的一年

——胜利后的广东

(1946年8月) (95)

梁鼎：劫后的广州文化现状

(1946年8月) (99)

尹林平致周恩来电

——庄田为琼问题将赴宁

(1946年8月11日)…………… (100)

方方致周恩来电

——三亿五千万元的分配情形

(1946年8月17日)…………… (101)

连贯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广东建集中营

(1946年8月24日)…………… (102)

尹林平致中央并南京局电

——希供给时局问题

(1946年9月1日)…………… (102)

方方尹林平致周恩来电

——连贯等已定飞沪转宁

(1946年9月7日)…………… (103)

方方尹林平致山东曾生暨全体指战员贺电

(1946年9月13日)…………… (103)

方方尹林平致周恩来电

——派何俊赴琼工作

(1946年9月19日)…………… (104)

广东省行政会议的必然结果

(1946年10月1日《正报》社论)…………… (105)

方方尹林平致周恩来电

——港台是否需与琼联络

(1946年10月3日)…………… (107)

杨致两广纵队曾雷电	
——关于干部问题·····	(108)
江子诚：目前广东工运中的几个问题	
——为建设民主的工会而奋斗	
(1946年10月)·····	(109)
香港各界国庆纪念叙餐会上前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演词	
(1946年10月10日)·····	(117)
尹林平致中央电	
——琼崖报告已收到	
(1946年10月15日)·····	(121)
方方关于领导问题的漫谈提纲	
(1946年10月20日)·····	(121)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何俊可参加琼崖工作	
(1946年10月24日)·····	(123)
尹林平致中央电	
——留粤各地之武装报告	
(1946年10月25日)·····	(124)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关于闽西南工作报告	
(1946年10月25日)·····	(120)
广东区党委关于农村系统工作的概略意见	
——长期方针、群众组织与武装斗争问题	
(1946年10月)·····	(128)
方方致军委请即转苏北电	
——请即派人与吴联络	
(1946年11月1日)·····	(146)

评“广东省参议会”

(1946年11月2日《正报》社论)…………… (147)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广西情况报告

(1946年11月7日)…………… (149)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接受传达之指示

(1946年11月7日)…………… (151)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处理战斗问题原则

(1946年11月9日)……… (151)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组织划分问题

(1946年11月10日)…………… (153)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向琼提意见之根据

(1946年11月19日)…………… (154)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周恩来电

——对粤游战之布置有何指示

(1946年11月30日)…………… (156)

恶毒谣言不能等闲视之

(1946年11月30日《正报》社论)…………… (156)

秘密条例

(1946年11月通过)…………… (158)

尹林平致曾生电

——电谢东纵慰款

(1946年12月6日)…………… (160)

方方致中央并周恩来电	
——经济开支情况	
(1946年12月9日)	(161)
方方致曾生电	
——请告款项如何开支	
(1946年12月10)	(162)
尹林平致曾生电	
——雷波之组织关系	
(1946年12月13日)	(162)
论广州大恐怖	
(1946年12月21日《正报》社论)	(163)
燕致黄电	
——十一师调粤补充	
(1946年12月29日)	(164)
星星(方方)：在复杂的形势中作胜利的奋斗	
——公开合法与秘密非法配合起来	
(1946年)	(165)
林平：东江纵队北撤与广东新形势	
(1946年)	(173)
广东区党委关于游击区武装问题处理办法	
(1946年)	(178)
广东临委与扩大军政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武装斗争、根据地工作情况和当前任务	
(1946年底)	(179)
关于群众工作问题	
(1946年底)	(185)

一个负责同志对临委领导时的意见

——关于领导作风、时局估计、武装撤退等问题

(1946年底)..... (188)

对目前形势几个特点应有认识

(1946年)..... (196)

林同志对广东临委会的报告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

(1946年)..... (200)

向广州学生致敬

(1947年1月18日《正报》社论)..... (204)

梦坚：广州学生怒吼了

(1947年1月7日)..... (206)

李维之：内外夹攻下的广东工商业

——“广东一年间”之二

(1947年1月25日)..... (213)

商杰致尧并笼董电

——拥护建立香港分局

(1947年1月31日)..... (227)

闻挺：继续发展与深入的南方民主运动

(1947年2月)..... (228)

张发奎的“治安”谈

(1947年2月15日《正报》社论)..... (231)

俞同：血腥统治的动摇

——一年来广东革命当局的“绥靖”

(1947年2月)..... (233)

梁嘉黄松坚等致林平转区党委函	
——对一年多来广东斗争和区党委领导的意见	
(1947年2月16日)	(248)
反特斗争报告提纲	
(1947年2月18日)	(254)
关于关系转移的通知	
(1947年2月20日)	(256)
方方尹林平致华中局并转东纵电	
——同意对东纵之措理	
(1947年2月24日)	(257)
虞岫：风雨过了天未晴（广州通讯）	
(1947年2月)	(258)
桐庐：还我血汗钱	
——四大家族如何侵吞广东侨汇（“广东的一年”之三）	
(1947年2月)	(260)
关于武装斗争及北撤问题	
(1947年2月28日)	(268)
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人民一定要胜利	
(1947年初)	(277)
对南路工作的指示	
(1947年初)	(282)
关于广东武装工作意见	
(1947年)	(286)
家长同志对江南工作报告的记录及口头指示	
(1947年初)	(297)

广东区党委会议对形势武装斗争及东纵北撤问题检查记录 (1947年春)	(299)
广东区党委扩大会议对广东党过去工作的检查记录 (1947年2月)	(322)
对广东区党委一年来领导工作的检查记录 (1947年春)	(331)
所长对广东临时省委以来广东党领导工作的意见书 (1947年3月8日)	(340)
加强主观努力，迎接群众斗争上涨的形势 (1947年3月15日《正报》社论)	(349)
力耕：抢尽民间最后一粒谷 ——一年来的广东田赋征实（“广东的一年间”之五） (1947年3月)	(353)
√ 李超：人民不能征服 ——一九四六年的广东政治（“广东的一年间”之六） (1947年3月)	(360)
思健、龙达：征兵在广州 (1947年4月)	(374)
关于蒋管区游击战争一些问题研究大纲 (1947年4月10日)	(379)
崔嵬：广州的工潮 (1947年4月)	(387)
叶罗致周恩来并中央电 ——对香港工委在工作部署上的意见 (1947年4月24日)	(393)

关于形势和工作问题报告	(1947年4月).....	(394)	
许涤新：广东工业的危机	(1947年5月).....	(396)	
广东各地我武装人数武器统计	(1947年5月).....	(401)	
广东各区敌我部队实力概况	(1947年5月).....	(404)	
曾杨致中央并广东方方林平电	——南返干部名单	(1947年5月).....	(417)
王仲英：我们的心不死（广州通讯）	(1947年6月3日).....	(418)	
广东时事情报	——广东统治集团派系斗争的动态和各派系主要人物情况	(1947年6月15日).....	(422)
桐庐：二十年仅见的广东大水灾	(1947年6月).....	(426)	
广东区党委致林温吴欧函	——关于巩固与扩大游击根据地工作问题	(1947年6月25日).....	(432)
互助自救	(1947年6月28日《正报》社论).....	(435)	
军政委员会关于广东斗争四个问题检讨意见	(1947年6月).....	(437)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北平叶参谋长电

——林平和方方的联络请叶设法

(1946年1月31日)

中央并转北平叶参谋长：

一、执行小组方方等有日到广州，唯关防严密特务包围，我们曾用各方面关系，均无法联络，希转知，设法派人到港《华商报》馆找张枫生。

二、粤当局于执行小组来临时，大为恐慌，因截至昨日仍在打内战，它当即召集军长以上会议，均感束手，电蒋请示，复电谓照原定计划进行，于是，行营于俭日，发言谓广东并无共军，只有“土匪”。我已于有公开驳斥之。

三、曾任美军情报住〔驻〕我区工作过之戴维斯，在港与我秘密办事处有联络，现拟经他转我情况给执行小组，又可否由你们向美方提出，由此人负责接办我方公开人员到广州接洽，如戴维斯接得此种任务，对工作有不少帮助。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重庆周恩来电

——可否争取恩来等先来华南

(1946年2月5日)

中央并转重庆恩来：

一、我们建议，可否争取马歇尔、恩来等先到华南来？因我与

华北、华中形势不同，处于不利地位，国党公开否认有中共军队，且继续进攻（如最近又有三师兵力攻琼崖纵队司令部驻地之白沙，此间与琼崖断联系已月余），并诸般阻难执行小组工作，如恩来同志愈能先来，则对此间争取我之地位愈有利。

二、据香港政府称：在香港设立新华分社事，只要经英大使馆允许，通知港府，便可执行，请向英使馆交涉之，盼告知结果。

三、在广州办报实属重要，现已筹备中，唯开办费至少需一千至一千五百万元国币，此间经济已告竭，香港已欠债港币七（？）万元，故盼能于最近汇款接济（最好能汇三千万元来）。

林 平

丑微（2月5日）

尹林平曾生致中央并转北平叶剑英电

——关于张发奎拖延与方方会谈的情况

（1946年2月9日）

中央并转北平叶：

一、我们经过许多转折，将一切证件送交方方转张发奎，他已无法否认，但采取拖延不与方方会谈。现我正布置安全路线，先派代表去广州取联络。

二、顽军一五三师一团于江日进攻大鹏半岛，为我击退，顽死伤二十余，内营、连长各一名，于鱼日进攻沙头角，现情况未明，曾生已于微日被迫离该（？）地来香港。

林平、曾生在港

（丑佳）（2月9日）

中共广东区委会发言人发表重要谈话

——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无理诬蔑

与内战罪行

(1946年2月15日)

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广东七十多个县份内活动，抗战期间给敌伪很大打击，希望各界速组考察团，实地调查真相，督促国民党当局停止进攻解放区，实现全面和平。

(新中社) 据新华南社东江讯，本月十五日，中共广东区委员会针对国民党广东军事当局的无理诬蔑与内战罪行，提出严重抗议，本社记者昨特走访广东区党委发言人，提出有关目前广东时局的问题，并逐一答复，特记录如下：

问：第八执行小组飞广州，它的任务与近况如何？

答：抗战胜利，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为达此目的，蒋主席与毛主席在重庆进行四十四天的重要会议，获得了双十协议的良好结果。可是这个协议，不断遭受国民党中好战分子所破坏，国内形势依然非〔常〕紧张，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斗争考验之后，是比以前更加觉醒了，他们知道，只有和平，只有民主，才能真正获得幸福的生活，中国人民为此而坚决奋斗，其结果是全国停战命令的颁布，北平调处执行部及重庆三人小组委员会的成立，政协会议获得重大的成功，实现了国内的和平，开辟了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北平调处执行部派了第八小组到广州，就是为了贯彻人民的意志，切实执行全国停战命令。不幸，广州小组到达之次日，广东军事当局，就发表了一个谈话，说广东没有中共的军队，只有“土匪”。这意思就是说：广东区要“剿匪”，不能和平。这种说话，

完全荒谬，也十足暴露了广东的一些好战分子正在用〔各〕种方法，进行推翻政协会议，破坏国内和平，有意违反人民的意志，违背蒋主席的命令。

问：现在很多人都想知道，广东有没有中共军队，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答：广东有没有中共的军队，只要拿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一些战斗事实来答复就可明白了：

（一）救济各界侨胞安全回到内地，在广九铁路广设粥站，每天都有一万几千人得到了救济。文化、电影、教育各界的名流学者，抢救出来的有三、四百人，如邹韬奋、茅盾、宋之的、于玲、胡风、戈宝权、胡绳等，我们还抢救了许多政府要员及其眷属，包括余汉谋将军的夫人在内，就是陈策将军脱险的路线，也是中共游击队所布置的，当时由廖承志同志通知陈策将军及香港政府。

（二）对敌斗争方面，暂拿东江纵队去年的成绩做一个例：

1. 大小战斗五百五十八次。

2. 击毙敌伪一千四百零八人，击伤敌伪一千五百八十五人，俘虏敌伪一千二百一十八人。

3. 投诚一千二百二十七人（内日人一百五十一人）。

4. 缴获武器：重炮一，迫击炮五，航空机枪十四，重机枪十八，高射炮五，轻机枪七十一，步枪二千四百九十六，短枪二百二十一，机枪九，炮弹一百八十，掷弹筒弹四，手榴弹五百五十五，土炮七，东洋剑二十四，炸药四百六十斤，刺刀六十七，子弹九万七千零十二。

（三）和同盟国在抗日战斗中的合作。东江纵队是有极好的国际声誉的：东江纵队与英军服务团的合作，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曾从香港的集中营救出了国外人士百余人，其中有英国的赖特上校、谭臣警司，汇丰银行司理摩利逊和范城克，及祐德尊少校等；和美国也有过很好的合作；第十四航空队的工作人员，在东江纵队的协助下工作了一年多，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结束。陈纳德将对他们的工作誉之

为“最经济最有价值”，除供给情报外，还营救了美国飞行人员八人：克尔中尉、依根少尉、克里汗少尉等，陈纳德将军曾不止一次打电报致曾生将军表示谢意，英军服务团方面，以转交过盟军东南亚总司令部给东江纵队的药品，及精神上的鼓励，盛赞东江纵队对盟军所作的贡献。而东江纵队的港九大队，对港九新界对敌斗争，保卫人民利益的事迹，更为盟帮盛赞。这队现已退出，由英军接防。

（四）国民党当局对东江纵队，一方面是假装谈判，一方面进行剿灭的政策，黎樾庭、骆凤翔、刘景诸先生，都曾经充当谈判的代表，据他自己说是革命而来的。所谓谈判，就是引诱、威胁，想迫使东江纵队无条件投降，这是谈判屡告失败的原因。至于剿共的会议也开过好几次，“分区进剿，勤剿穷追”的命令也下过好几次。抗战胜利后，两广绥靖会议，就决定了三个月的清剿计划，今天内战，就是为了贯彻这个计划。

（五）如果我们检阅在日寇统治时期香港出版的《香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广州出版的《广东迅报》和《中山日报》等，对于日寇在东江、琼崖、珠江的“剿共”战争，曾作了许多“赫赫战果”的宣传，这也可以看出，到处威胁日寇统治的，都是共军，一切“清乡”、“扫荡”的计划，都是对负〔付〕共军，同时于惠州的《民国日报》上，也时时看出内战的血腥记载。

（六）抗战胜利后，在香港的中西文报，都登载过东江纵队的战绩及一般活动的情形，港九新界地区的民众和长州的渔民，对东江纵队维持治安的良好成绩，都曾在报章上登过鸣谢启事。美联社也发出过许多次报道，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报道说：“国民党方面称：广东配备良好之共军约有一万一千人，其中六千人都散布在东江区域，尤以惠州附近为众，在中山县内约有二千，而在东莞县则有三千，在情势需要时，渠等皆能集中或分散，……”据息，新一军已清除所有在广九铁路之共党及其他散兵，……”载十二月二十七日《新生日报》。

广东有没有中共军队，上述这些事实，就是最好的回答，而且

也就证明了广东当局的发言人，是自己打嘴巴的。中共领导的军队，其活动范围，计有七十几个县，不过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的新闻封锁下，大家不容易清楚和了解实情，这是需要作一个简单的报道。

问：那么，广东军事当局的谈话，有什么用意呢？目前内战是否存在？

答：这是很露骨的事情，广东的好战分子，坚持独裁，反对民主，企图用这方法来破[坏]广东的和平民主事业，违抗蒋主席的命令，推翻政协会议的决议，至少，他们也企图消灭异己力量，拖延民主实现的期[时]间。广东军事当局自日本投降后，曾使用来打内战的兵力，据我们所知有余汉谋将军指挥的六个师（现在因余汉谋赴浙调走三个师），新一军的三个师，五十四军的二个师，邓龙光将军指挥下的三个师，琼崖的广西军三个师，都直接参加过内战。至于地方杂牌军、保安团、挺进队等，还有不少数目，使用伪军也是公开的秘密，在去年十二月间，单单在港九路西，东、宝、惠县属的小小地区内，即使用四个师以上的兵力。在内战中，国民党军队对付解放区军队及人民的凶残、暴虐，日本侵略者也望尘莫及。国民党的军队，不论何时，军风纪都是败坏不堪，他们绝大部分官兵是不愿打内战的，但国民党的指挥官，一方面枪毙在内战中怠工的下级官员，一方面则竟然以怂恿士兵抢劫来鼓励打内战。这是广东军事当局称中共军队为“土匪”，称民主的解放区为“匪区”的又一原因。

他们又以[极]残忍的手段来对付解放区的军民，例如：枪毙以后，再割头、挖眼睛，把伤病的非武装人员杀得一个不留，把女人剥了衣服奸淫之后，继以屠杀，把老少抗属均拘押、杀害。这种违反人道的做法，都是令人不忍看和不忍闻的。目前为止，被捉去关在惠州、东莞、石龙、广州、曲江、阳山、乳源、翁源、茂名、潮安各地监狱中的有二千余人，而从惠、东、宝、海陆丰逃亡到香港去的难民，已达数万之众。这些血腥事实，是任何谎言巧语所不能

掩盖的。

在这空前残酷的武装进攻与暴行煎迫之下，我各地军队为了减轻人民苦难，照顾和平大局，坚决执行停战命令，退出许多据点圩镇，转移到山地乡村。但为了人民长久福利，力争和平民主的实现，仍坚持奋斗不懈。国民党广东当局又会说：“以前是有中共部队的，现在已经没有了”或一口咬定，那些只是“土匪”。我们都很希望广东执行小组或各界公正人士，组织考察团，亲到那些地方去考察一下真相，就明白了。但是，在国民党方面，否认、造谣、说谎、封锁消息、蒙蔽视听，一面大军强力进攻，企图彻底消灭我军的情况下，我们更希望广东执行小组及各界公正人士能迅速行动，才于事有济。

目前的这一切事实，说明广东当局今天仍处在战火弥漫的内战中，解放区人民的处境是极端悲惨和极端严重的，这种局面如不改变，对于全国和平和国际平均有巨大的影响，这不只是一个广东或一个中共军队的事情。

问：在这严重的内战形势下，应如何去争取广东和平的实现呢？

答：广东应迅速实现和平，首先承认，就是各地中共领导的军队，承认国民党军队确在进攻解放区，并在一切军事冲突的地区停止内战。我们广东人民，今天的紧急任务是：全体同胞，不分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老少，各党、各界〔阶〕层、各界领袖、社会贤达、华侨先进，应该一致起来，从各方面，用各种方式，尽一切力量，以自己可能做到的行动，来争取广东全面和平的到来。我们也急切盼望国际友人出来，维持正义。我们欢迎各界人士组织考察团，到来实现调查，监督停火，也希望催促当局迅速谈判和平，下令停战，不要阻挠停战小组的工作。如果和平能够实现，死亡、灾祸就早日离开我们的家乡田园，实现民主，建设新中国也才有可能。我们相信，在大家压力督促之下，广东当局是要改变他的做法，和平是一定会到来的，世界已经和平，中国已经和平，华

北、华中都已实现和平，华南广东也一定要走上和平。但是，在各种反动势力的阻挠之下，和平既不是随手可得的，也不是坐待其来的，要靠我们努力，今天多出一分力，和平便早一天降临。

广东共产党人谨向社会人士、各界同胞提出保证；我们一定要执行停战命令，拥护政协会一切的决议，并为过去一贯的精神与盟国合作，在国共及各党派长期合作、和平建设的方针下，与全省同胞一起，共同实现民主政治，建设新广东。

华 侨 与 祖 国

(1946年2月)

加强侨胞与祖国的政治联系，海外广大侨胞更积极地关心参与祖国的民主运动，在今天，的确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如所周知，华侨是支助中国近百年来民主运动的柱石，是推动支撑八年伟大抗战的光荣之子。我们的祖国能够取得抗战胜利，胜利以后又赢得和平，其得力于侨胞之积极参与是非常之大的。而今天，当此国内和平虽然实现，但还要我们努力巩固；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已到来，但还只是一个开端，今后仍会碰到许多困难与曲折；在此种情形下，祖国的政治需要侨胞更热心的关怀，祖国的民主运动需要侨胞更积极的参与，那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八百万海外侨胞的生活都直接间接的受到战争的巨大影响，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千百万人的事业家园在炮火中毁灭，而在侨汇不通与遭受人为的剥夺的情况下，侨眷的生活更是凄苦万分。抗战胜利以后，内战接踵而来，由此而起的，一方面是我们的国际地位低落，各地排华事件愈益严重，侨胞的处境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千百万侨眷与国内人民一样蒙受着新的战

争苦难。实际生活证明了这一真理：祖国的民主运动期待着侨胞的援助，而参与祖国的民主运动，也就是救侨胞自身于困厄，与提高华侨地位的唯一途径。这就是：加强侨胞与祖国的政治联系，在推动抗战与抗战期间，固有着它的巨大意义，而在争取和平民主完全实现的今天，更有着它底巨大意义的。

然而，虽则这是一个如日月经天的明明白白的真理，但也不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就以目前的香港为例罢，有一些人不是对促进国内和平民主不感兴趣，但对转移侨胞视线对外甚至鼓动反苏则万分狂热么？他们本来不是不懂得只有和平民主才可使祖国强盛的道理的，但是为了达到其谋取少数人私利的企图，却撇开了这些不谈，反而制造挑拨国际团结的言论，来蒙蔽我们的侨胞，戕害我们的祖国。虽然他们常常摆出似乎只有他们才是爱国者的样子。因此，要加强侨胞与祖国的政治联系，立刻制止这有害而危险的做法是必须的；因为这不仅使侨胞注视祖国民主实现的视线移向外去，取消侨胞对祖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而且煽动反苏分裂同盟国间的团结，将置国家民族于极其危险的地位。

加强侨胞与祖国的政治联系的另一要着，是各地侨胞起来督促广东当局立即停止内战行为。现在国内各地大致上都停止冲突了，惟有广东当局，还一再硬指中央部队为“奸匪”，仍继续在进行内战。广东是我们绝大部分侨胞的故乡，我们断不能容许少数顽固分子蹂躏我们的田园庐墓，残杀我们的父母妻儿。制止内战是华侨的神圣责任，也是与我华侨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

百年来，侨胞与祖国的民主运动是血肉相连的。今天正当国内民主革命已获巨大胜利之际，我们提出加强侨胞与祖国的政治联系，用侨胞的巨大力量促进国内和平民主的完全实现，相信将不是泛泛的呼吁，而将会完全成为事实！

（原载《正报》第41期，1946年2月19日）

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发言人谈 广东省内的中共部队

(1946年2月19日)

一、东江纵队

它是由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与东莞壮丁模范团合并之后发展起来的。他们都曾经取得政府的正式委任，并且都因对日作战有功受过奖励，它的成员：华侨子弟、海员工人、知识分子、学生与农民，都是些优秀的青年。

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坪山事变，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向人民游击队发动武装进攻，他们两个队伍，分别东移到海丰，他们就在海丰的山地会合。淡水第二次沦陷，这支游击队又秘密回到东江敌后。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为司令员，王作尧为副司令员，政治委员林平，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就在那一天，他们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地民众都热烈地召开庆祝大会。

东江纵队的活动地区，包括惠阳、东莞、宝安、海丰、陆丰、博罗、增城、龙门，它的武装工作队是经常出入于港九市中心区，及广州近郊打击敌伪，还控制了大鹏湾、大亚湾和珠江口，经常在上海上截击敌人的运输。

前年日寇侵湘粤桂，粤北、西江均告沦陷，东江纵队即派队挺进北江，展开了游击战争。其后，又由副司令员王作尧及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率一支强大队伍挺进粤北与珠江纵队司令林锵云、政治部主任刘向东挺进珠江北上之部队会合，创立了粤北支队、西北支队与西江支队，活动于从化、佛冈、新丰、四会、广宁、清远、英

德、翁源、曲江、仁化、始兴、南雄以至湘赣边各地。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东江纵队的一部分队伍被迫向东江的后方转移，这就是紫金、河源、五华各地及和平的九连山为什么会有中共部队活动的理由。

东江纵队司令部下辖四个指挥部：江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海陆惠边指挥部和粤北指挥部。有十一个支队，有四个民主的县政权。

东江纵队除了给敌伪以重大打击之外，他们又把治安维持得很好，肃清土匪，使大家安居乐业，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生产救济，广大人民免于饥饿之后，打日本的热情也就提高了。地主虽减少了收入，却免除了盗匪的威胁。人民都以普选的不记名投票，选举自己的乡长、区长、县参议员及县长等。民主政权又常常领导民兵常备队及后备队对敌伪单独作战。

二、琼崖独立纵队

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副司令庄田，政治部主任李明，参谋长李振亚。它是琼崖红军游击队，在抗战初期经过谈判改编的，当时政府委出的名义是：“广东琼崖民众抗日自卫独立总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正式改编，后因国内政治逆转，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爆发了美合事变，国民党军队包围独立总队，想一鼓歼灭之，没有成功，从此琼崖内战便一直发展下去。一九四四年秋，扩编为纵队，成立司令部，下辖五个正规支队，五千余人，全琼各县都有民主政权，但有些县份是联合的县政权，另有琼北行政专员公署。

三、珠江纵队及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

广州沦陷前由政府委给名义的一支游击队称为：“广州市郊游击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吴勤，一九四三年为国民党特务所暗杀，一九四四年元旦，中山人民抗日义勇队成立，这一年二支队与义勇

队都打了许多大胜仗。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统一指挥成立了珠江纵队，辖三个支队，司令员林锵云，副司令员谢斌，政治委员梁嘉，政治部主任刘向东，宣言接受中共的领导。

珠江纵队的活动地区为中山、顺德、番禺、南海、三水，广州市区及珠江口的内海。

一九四四年夏，日寇大举进攻西江南岸及中区一带，国民党政权纷纷瓦解，伪组织纷纷成立，为了挽救这个危局，中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便也纷纷组织抗日游击队。

为了发展中区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及加强其领导，中山人民抗日义勇队乃派遣一支精锐的队伍，挺进中区，为了统一指挥，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鹤山的宅梧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梁鸿钧为司令，陈明光为参谋长，罗范群为政治委员，刘田夫为政治部主任，辖六个团。

解放军的活动范围包括新会、鹤山、高明、开平、台山、赤溪、新兴、阳春、阳江。

四、南路人民解放军

这一支队伍是诞生于一九四三年雷州半岛沦陷之后，初期只在雷州敌后坚持抗战，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敌陷桂柳南宁，整个南路变成敌后，国民党的军队走得无影无踪，十九路军名将张炎将军，为号召南路子弟，组织抗日武装，并与解放军取得密切合作，在这几个月中间，人民踊跃参加解放军，解放军乃由二百余人的队伍扩大成为五个团，计四千人，司令员洪年，政治委员洪飏。他们的活动范围，包括高雷、钦、廉（即下四府）各州县，抗战胜利后，内战迫他们的主力转移到十万大山。

五、韩江纵队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潮汕的青年学生与小学教师，也组织了抗日的游击队，中心地区是南山，由于对敌斗争的热情与勇敢，获得

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不数月，队伍发展到二千余人，组织成了三个支队，活动地区为普宁、揭阳、潮安、饶平、潮阳、澄海、惠来等县。一九四五年六月，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成立了韩江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林美南，在普宁建立了民主的区政权，民主乡政权则在各地有相当普遍的发展。

上述人民武装，都是中共领导的军队，由于斗争历史的长短不同，反映出来的就有政治上的成熟与组织健全的程度上的若干差别，至于各队详细的斗争历史及各解放区的施政情形，当另找机会向大家报道。

广东有中共领导的军队，直到此时，这些军队依然坚持在上述各地，这种铁的事实，是任何谎言巧语所不能抹煞的。

急防再来一次大饥荒

(1946年2月)

本月十五日的广州米价，又起到二万元一担了，而且涨风仍未歇止。广东各地米价，也普遍上涨，最平的地方，也超过万四五千元一担。三年前饿殍载途，饥民食猪糠草根树叶甚至食死尸的悲惨景象，又将重演于今日。稍一留心人民生活者，不能不戚然戒惧，急谋预防。

谈到今年米贵的原因，一般人都指出：首先由于战时敌伪的极度掠夺，致使农村凋敝，元气至今难复；再则由于征实征购，滥抽壮丁，租息奇重，农村生产力大大萎缩；加上通货膨胀，囤积居奇，刺激米价上涨。这些指出都不错，但指出得不够。因为抗战胜利了，照理说来，沦陷区的民众，正可重整家园，恢复生产；政府又已明令停征田赋一年，进行二五减租，倘能兑现，农民即可略得苏息；通货膨胀和囤积居奇现象虽还存在，但也不足够说明何以今天米价特别飞涨的主要原因。

今天米贵得反常，以及因此形成的严重局面，要寻求其症结所在，我们就不能不明确指出：这是抗战胜利之后没有迅速赢得和平，政治不能迅速实现民主，内战的炮火阻止了恢复农村生产而且继续摧毁农村生产的恶劣结果。

这几年来，在我广东大后方各农村，由于普遍遭受内战摧残，其程度亦与沦陷区遭受敌伪摧残同样惨烈，西江的新兴高明，珠江口的中山东莞禺南等地，原是产米之区，但经内战军在该地进行“征剿”，小则全村搜掠，耕具谷种扫数搬清，大则烧村烧山，壮丁或被捕杀，或迫而散走四方，田园荒芜，人烟断绝，农民从事耕种势所不能，即谷熟在田，亦无人敢去收割。试想这对于农村生产，是何等严重的打击！抗战胜利以后，广东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和平，内战益形剧烈，其范围竟达七十余县之多，致使要回去重整家园的回去不得；本来安耕陇亩间的，也被迫抛弃田园到处流亡（惠东宝因内战逃难来港的农民，即为数过万！）；田赋虽已明令停征，但内战大军云集，到处强行摊派粮草，地方官吏又藉公粮积谷等名义，继续抽剥人民，“二五减租”只当做宣传资料，救济物品则中饱私囊，船车等交通工具不是用来运粮，却拿去运兵内战。官僚资本依旧操纵居奇，大量囤积，有此种种，广东米价又怎能不狂跃猛涨？所以广东今天米贵的严重现象，是在农村生产极度破坏而且继续被内战破坏着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样就不是寻常米贵，可以用平抑价格禁止囤积之类单纯治标的办法就能奏效。

现在离青黄不接之时还有五十多天，要是米贵的险象不及早防止，大饥荒即将接踵而来。要急速克服危机，只有马上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实行和平建国纲领的规定，展开救济工作，严禁变相征发；实行二五减租；扩大农贷，供给肥料种籽，扶助农民恢复生产；实行土地法，保护佃权；同时并严禁官僚资本，囤积居奇；停止军运，调剂民食，缩编军队，遣送日俘，节约粮食消耗。切实做了这些，大饥荒的危机才可以克服过来。

（原载《正报》第42期，1946年2月21日）

扩大惩治附敌分子的工作

(1946年2月)

本月十九日香港军政府最高法庭起诉附敌分子后，已决定将第一批六名在二十七日开始公审。这对于所有的香港人民，实在是一件不能漠不关心的大事。

在香港沦陷期间，我们侨胞所受敌寇和这些帮凶的屠杀，抢掠，敲诈，勒索，实在是一概俱全，罄竹难书的。今天，这些虎伥，终于要在法律面前自食其应得之恶果了！我们要求香港当局必须以毫不姑息的态度，严厉惩治这些罪犯。我们号召全港同胞及盟国人士，记起敌寇和这些帮凶所加于我们身上的惨痛毒害，一致起来检举他们，协助香港当局严惩他们！

香港光复已经半年，现在才第三区审判附敌罪犯，不能不是令人遗憾的事。由于时日的迁延，就使得许多“落水”的败类漏网（目前被拘获得附敌罪犯只有五十余人），而且方便地取得了“保护”的色彩。正如菲士廷将军说：“外间市民屡有批评，指某些从广州湾、广州、上海等地来的战犯、嫌疑犯、罪犯，现仍在通衢大道大摇大摆”。象那些过去曾为“大东亚新秩序”努力吹嘘的落水狗，刚从水里爬出来，水湿未干，又挂上了新的招牌，仍在挑拨同盟国间的关系，散布法西斯的毒素，大登其色情文字，吹吹打打，光怪陆离，尾巴毕露，实在使人哭笑不得。这种客观上对日寇帮凶纵容，显然是违反盟国宪章中严惩战犯及其帮凶的规定的。

为了使人民要求惩治附敌分子的意志能够真正执行，为了使那些行凶作恶的汉奸不会漏网，我们认为香港政府的战罪调查团，必须更有效的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分别组成各种的战罪调查组，奖励各界检举其本业的罪犯，调查一切敌伪所加于人民的损害；我们各界

侨胞应该积极地向调查团，和通过报纸杂志等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地方，尽量揭发与检举附敌分子的姓名与罪行；让这些罪犯在大庭广众中受到正义的制裁。只有将惩治战犯汉奸的工作成为群众性的运动，才能使这一工作做得彻底，和收到完满的效果。

一切附敌分子必须迅速严惩，这是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意愿。我们希望香港政府除了起诉第一批罪犯外，所有的附敌分子以及日寇的战犯，都必须从速审讯，从速判决；固然可以按照各个罪犯的罪恶轻重，分别惩办，但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通敌罪名成立的分子，必须立即处决死刑；决不能象山下奉文和本间一样，在美国法庭之下，一审再审，判决后又决定暂缓执行，致使这些死有余辜的家伙，得以苟延狗命企图幸免。更不能象中国收复区那种情形：汉奸可以托人说情“赎身”，或者侈言“地下工作”，藉以洗脱罪名。

一切附敌罪犯的财产，大都是从香港民众的脂膏括剥得来的，今天审判这些败类，必须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发还给那些被剥削的民众，救济那些在战争中被难的家属，帮助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

严惩一切附敌分子，没收其财产以救济受灾的民众，这是香港人民的起码权利。如果不能彻底惩处这些法西斯的帮凶，世界就无法维系持久和平；如果不能清除这些狠毒的虎伥，人类就不能保证永远的幸福！

（原载《正报》第43期，1946年2月23日）

死硬分子力图挣扎

(1946年2月)

继重庆较场口特务分子大捣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被特务闯入办公处骚动叫嚣之后，陪都《新华日报》又被暴徒捣毁，工作人员惨遭毒打了。特务、暴徒、凶手的丑恶行动愈演愈凶，愈演愈频繁，充满了报纸篇幅，惊动了全世界。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人，都不免要问：为甚么划时代的政治协商会议获得成功之后，那些死硬分子还要制造这一类痛心的丑恶的事件呢？独立自主自由民主强盛新中国的美丽图案就这样被那些暴徒撕掉么？花那么多力量争来的政协会决议就此成为废纸？

我们愿以冷静审慎的态度试论一下这些问题。

死硬派在政协会成功后更疯狂而露骨地进攻民主力量的原因：第一，是因为他们非常憎恨政协会的成功。因为争取民主是一个斗争过程，有了民主的巨大成功，跟着反民主势力当然会对获得胜利的民主势力来一次反攻。双十协议后的大规模内战与今天政协会成功后的暴徒横行，都是死硬分子在强大民主潮流压力下的奋力挣扎。这些事件一方面固然显示出死硬分子无法无天，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力穷势蹙垂死挣扎的表现。第二，是因为他们正积极利用、扩大今天的国际反苏阴谋，转移人民的视线向外，以便拖延、绞杀政协会决议的执行。他们向来都很懂得利用时机，机智而狡猾地由反苏来扩大破坏民主的活动，又由破坏民主来扩大反苏阴谋的，在今天，他们正企图煽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挽救其日益缩少的独裁权力。因为这一作法如获得成功，则政协会的决议就无须反对也要成为一张废纸了。

然而，煽动、挑拨、叫嚣、捣乱，其结果只会更露骨地在中国

人民面前揭露出这些阴谋制造者的丑恶嘴脸。从重庆，北到北平，又南及广州，他们打了一些人，又杀了一些人，但人民回答他的，民主力量回答他的，竟不是服从，而是更大的愤怒与反抗，他们是具有一切有利条件的：石子、铁条、手枪、飞机以至惯于造谣污蔑的宣传机关和装聋作哑的宪兵警察，都一应俱全，但却欠缺一样最紧要的东西：形势。时代不同了！一九二七年的黄金美景一逝不返了。要国人进行内战而国人却要停止内战，要煽动新的国际战争而国际却要团结和平。虽然顽固到底的“信念”还想要坚定下去，但形势却嘲弄人似的愈来愈不象样了。

明乎此，就可以确信独立自由民主强盛新中国的美丽图案决非少数死硬分子所能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是中国人民为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方针，但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力量的结晶。它是在中国人民已拥有巨大力量的条件下产生，有着广大已经觉醒并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做它的后盾的，写在人民心坎里的决议是非少数死硬分子所能撕毁的。我们确信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一切破坏和平民主的坏势力必将遭受严重打击，到头来证明死硬分子的力图挣扎，终是徒然。虽然路正长，曲折崎岖也正多，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许多艰难的任务。在一时期里，血肉横飞狐鬼满地的场面，恐怕还是要继续展开着。

（原载《正报》第44期，1946年2月25日）

尹林平曾生致中央
并转重庆周恩来北平叶剑英电

——我无法会马张周

(1946年2月25日)

中央并渝周平叶：

广东当局至今仍否认我军存在，执行小组受阻挠，已返广州，军警特务严加防范。现我们实无法在短促时日内，安全抵达广州会马、张、周（现仍设法乘飞机到广州先与方方取得联系，但不一定在数日内可实现），可否周到广州时，派机来港接我们（可由任以沛同来即可找到），或者由我们乘杭到渝再交涉，由当局派机送我们到广州，是否可行？务请考虑即复。

林平 曾生在港
丑有 （2月25日）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 重庆周恩来北平叶剑英电

——我以粤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

(1946年2月25日)

中央并渝周平叶：

一、我即用广东党发言人名义，公开发表关于制止内战、实现和平之谈话，驳斥粤当局否认有中共部队之声言，并指出今后奋斗一般任务，又于今日发表一抗议书，致张发奎，以具体事实揭发顽军背信攻我之情况。

二、在港各界人士对于制止内战，已有行动表现。香港基督教会督何明华（英人）致电蒋、张云：“请立即停止进攻东江区的爱国的中共军队”，其他名流民盟文化界，亦均陆续发表文电。

林 平

丑径（2月25日）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 重庆周恩来北平叶剑英电

——林平是否赴渝

(1946年2月27日)

中央并渝周平叶：

一、方方返广州后，先要求会见我派去之代表，但因粤当局不承认东纵，故小组工作已失对象，要遣我代表回来，似此情形我前电谓：由港乘杭到广州与方方取联络，即行不通，是否赴渝或你们派机来港接，抑有其他更好办法？请示知。

二、目前情形下曾生拟回，全力指导部队坚持斗争，是否须留港待命？请即示复。

林 平

丑感 (2月27日)

挽救乡邦人人有责

(1946年2月)

本港劳工界发起，在下月三日举行庆祝政协会成功大会，这个会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每一个旅港侨胞，都应热烈参加。

我们侨居香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广东同胞，虽说身在

海外，但是和祖国桑梓相隔，不过一衣带水。遥望华北华中，都已赢得和平，走向民主。解放区则更迅速恢复交通，加紧生产建设，那里的同胞们已出水火而登衽席，得享太平日子。然四顾省内，却仍旧兵连祸结，黑漆一团，不但民主自由丝毫未有，且炮火连天，喘息亦所不能。两相比对之下，我们真有悲愤无极之感！

日来报章传来，广州米价狂涨，每担将达四万元，每天倒毙途中的，数凡三十。饥荒袭击着全广东，我们留在家乡的父母妻儿，正陷在啼饥号寒的惨境里。时机的紧迫，已到了不能再事拖延，坐视不理。何况省港两地，密切相关。省内糟糕若此，影响所及，本港工商各业，直接间接，均会加不少困难。

广东局面何以弄成如此呢？追源探本，这是由于国民党内的死硬派要把广东作为据守不退的尾闾，他们想拖得一时得一时，企望配合全国规模的破坏和平民主的大反攻，把抬起头来的人民，打回十八层地狱里去，好继续维持其黑暗独裁的统治。而死硬派这种黑暗独裁的统治，现在已经发展到最腐败的田地，不但他们自己做不出好事来，就是好好的事情交由他们去做，也要弄得使人啼笑皆非的了。如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所以目前挽救乡邦唯一办法，就是要用广大人民的力量，监督广东军事当局立即执行停战命令，停止向中共军队开火，首先把和平恢复，同时要督促广东政治当局迅速执行蒋主席四大自由的诺言与政协的一切决议，要根据和平建国纲领，把广东的各种政治机构，作民主的大革新，以便迅速展开复员救济生产建设的工作。

孙院长说得好：民主不是进口货，要靠人民自下而上去努力争取。和平也是一样。我们为了挽救家乡，为了切身的利害关系，每个人都有责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办法，以从事和平民主的争取。广州学生为此而有过两次示威巡行，广州文化界又正为言论出版自由而抗争着，本港的惠东宝侨胞，部分舆论界以至国际友人何明华会督，都已为此而呼吁停战救灾实现和平民主了。他们已经英勇地揭橥前导，我们所有爱护乡邦的侨胞，就应该及时参加到这一伟大的

运动里去，把这一运动的力量加强，向反对和平民主的最后堡垒冲击！

正当死硬派极力破坏政协会的伟大成果之时，我们侨港同胞来庆祝政协会的成功，就要保护这个伟大成果，并使政协会的一切决议在广东实行起来，以挽救乡邦人民倒悬之苦。因此即将举行的这个大会，就要成为全港侨胞总动员去争取广东和平民主局面迅速到来的开始！

（原载《正报》第45期，1946年2月27日）

梁广致中央组织部电

——港海员工会成立

（1946年2月27日）

中组部：

一、香港海员工会于一月六日正式成立，会员登记已达三千，执委十五人，内党员六人，常委七人，我占四人，正主席李发，副主席吴理广（即吴先，党员）。但干部能力弱，不能独立处理问题，海员党的组织在恢复领导中，但同样很弱，望能在刘建潮、邱剑一、陈桂、曾寿龙等留延海员干部中，提前送回二三人来加强工作。

二、一九四四年九龙海员大破坏，捕去党员五人，主要领导人符镜洲及市上党员陈金叛变，现已全部出狱。

三、七大代表何时可回？曾抵沪之代表至今无消息来。

梁 广

丑感 （2月27日）

尹林平致中央电

——高干拟公开

(1946年2月31日)

中央：

1. 现在局面开展形势需要高级干部有公开之必要，兹拟以直接负责部队首长各同志及城市文化工作之连贯应公开外，其他仍保留秘密抑或全部公开均请明示。现拟为区党委各委员列名公开发表对时局宣言，并办一公开党机关报，由公开干部撰述文章。

2. 同时，并拟培养一批全省性的公开干部，其名单拟定再电，以上妥否盼示。①

林平 丑世

①中央在复电中指出：

“目前除部队主要首长外，只能以少数最必要的干部（如连贯等）公开活动，多数干部及党的组织仍应严保秘密”。

广东区党委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1946年2月)^①

(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与宪草原则，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党军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县(市)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树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便开始了国家民主化，中国人民即将获得基本的自由，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向合法化，并大大提高我党的威信与地位，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仅此，中国即走进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人民一百年来所奋斗的目标以及我党诞生以来所奋斗的目标，虽然未能全部达到，但已经获得巨大的胜利。

(二)这一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证明了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前仆后继为国家的独立与民主底斗争方向是正确的；证明了我党诞生以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是正确的；解放区的一切设施也证明是正确的和适合人民的。任何封建独裁的势力，不管它有如何强大的基础，在人民力量冲激之下，都不能维持其统治，相反朝着民主的历史道路前进，不管有如何强大的阻力它都能获得胜利。

(三)必须指出政协会议本身虽然经过激烈的斗争之后才获得结果，但从根本上说来，它是整个民主革命斗争进程中的产物，也就是武装斗争中的产物，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仍表现出武装的自卫斗争仍是主要斗争的方式，政协会议之后斗争便进入了一个

^①年、月和作者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新的阶段，政治斗争将代替了武装斗争，但由于中国历史环境的复杂，短期内局部的小冲突是不免要发生，不过这些艰难曲折的道路，实不应动摇我们对双十协定及政协会议决议的信心，全国范围内说来，目前的这些冲突是武装斗争的尾声，今后武装斗争不会存在也不应该存在。

（四）有了好的决议这只是事情的开始。目前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是到来了，但它只是一个开端，国家民主化的开端不要把这个开端认为是基本上粉碎了一党专政的统治。要知道不但国外还有强大的反动势力，国内的封建基础也还是很坚固的，事实上国民政府虽将改组，但在国府委员中及政府机构中仍然是国民党占绝对优势地位。在国大代表中国国民党虽然放弃其全部中央委员为当然代表的决定，但抗战前所选的代表仍然有效，这一点仍使国民党在国民大会占绝对优势，因此，从今天起直至国民大会后六个月即举行普选之前，国民党仍会占统治的地位。在这期间，民主政治的进程将表现在一方面是民主力量与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一方面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破产与没落，今后国内形势是必须这样发展的。因此只要我们能把握住斗争的本质，我们就无须考虑国民党目前的优势，人民的觉醒与民主力量的进军，是可以改变这个形势的。

（五）今天蒋介石国民党放弃一党独裁开始实行国家民主化是被迫而做的，应当了解主要的压力是我党的强大存在与四个月来的坚决自卫斗争；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和国民党内部的困难，由于这个压力的存在，又才引起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及国际上对中国问题的关心。因此，一切决议的实行，必须经过不断的斗争，逐步争取其实现。因此，又必须指出不但一切决议尚待实行，即使实行离开全国彻底民主化还是很远。这只要把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提出的具体纲领与今天和平建国纲领对比起来就会明白。但毛主席在同书中曾说到：在新民主主义大阶段中还有若干个小阶段，显然和平建国纲领只是一个小阶段中所实施的纲领，为了争取全国和平的实现，我党作了若干重大的让步，这是必要的

让步，因为这个让步是适合人民利益的，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和平的生活与民主的进军。

（六）广东也一定要走和平民主的道路，这是全国形势的发展所决定的。但由于广东革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国民党占优势，我党占劣势，民主同盟也缺乏群众的基础，民主的群众力量还没有被广泛发动与组织起来。因此，蒋介石国民党为了企图更好的稳定其在华南独裁统治的基础，仍继续进行内战，公开宣布广东无中共军，只有“土匪”。用特务包围执行小组，麻痹其工作，用拖延的手段企图争取时间消灭我军及压迫民主势力的抬头。

虽然如此，争取实现广东和平与民主的条件是存在的，而各种有利于民主斗争的条件亦在生长中。首先政协会所通过的决议与和平建国纲领等是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的。其次，停战执行小组已到广州，只要与我方代表接上即可开始工作。第三，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一月三十日广州学生的示威游行已首次打破了广州的沉闷局面，最后几个月来国民党贪污黑暗的统治，已弄得天怒人怨。刘候武、陈济棠以至张发奎自己都不能掩饰，也不敢掩饰。

（七）因此广东党及广东人民当前的紧急任务便是迅速打破国民党所造成的内战危机，争取和平的到来。抓住这个中心环节，应集中力量首先冲破国民党在广州的封建法西斯堡垒。为此，必须作下列的紧急动员：

1. 由广东党发言人公开发表谈话，驳斥广东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的行为；用各种具体事实来答复广东当局对我党我军的诬蔑；指斥国民党军的内战暴行，号召广东人民起来为实现和平而斗争。要求广东当局立即停火实行政协会的决议，实现蒋主席的诺言，保障人民的自由，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取消新闻封锁，制裁汉奸，复员救济，解决失业，关心华侨的疾苦与提高华侨的地位等。

2. 猛烈开展各大城市的宣传文化工作，鼓励大量的进步文化人及民主分子到广州去进行出版、发行、文艺、戏剧、歌咏、电影种种活动，公开大胆的做，用自己的努力改造广州的局面。清除畏缩

不前消极等待的心理，对国民党的歪曲宣传与反民主行为必须严厉批评。但要有具体事实讲得入情入理，态度温和诚恳，充满善意，不采谩骂讥讽的态度而影响中间群众的同情，免使被批评者难于接受。

3. 猛烈开展各种群众运动，团结广大的中间阶层，照顾落后分子，不要在左翼群众的小圈子中打转。目前必须迅速建立起广州的学生与香港的工人中的坚强阵地，以此为核心，扩大各阶层的群众运动。

4. 广泛的举行庆祝政协会的胜利大会。必须使广大群众清楚的認識政协会的各项内容，除报告解释之外，还要组织各种专门的研究与讨论，使群众能明瞭各项内容中的中心的政治意义及其实施的办法。各群众团体应通电响应政协会的成功，并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要求立即实现广东的和平，并监督政府实行政协会的决议。

5. 扩大统一战线活动，在公开合法的斗争中是更主要了。目前广泛性与灵活性是必须把握的两个重要原则。过去我们的活动是局限一隅，很少接触广大阶层，今天就要能结交各方面的朋友，我们的干部社会活动的经验少，老一套的公式，呆板单调，不容易接近人，不善应付环境的变化，今天就要能够克服这些弱点，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和我们紧紧地靠在一起推进和平民主的事业。

6. 必须使华侨的民主运动与祖国的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号召华侨。团结努力促进祖国的和平民主事业，必须打破国民党在目前企图隔离华侨与祖国的政治联系转移视线对外的企图，以及阻止国民党在侨领中的分化、收买以及各个击破的阴谋，揭破国民党结合外国法西斯反动力量摧残华侨民主势力的恶劣行为，呼吁各地华侨督促广东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行为。

7. 解放区必须坚决实行自卫斗争，坚持阵地，保存力量。地方的武工队可埋藏的便埋藏起来，不是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去谈判整编，我们争取停火愈快愈好。我们应向内战军发动不断的政治攻势配合坚决自卫斗争，不应有任何主动袭击对方的行动以引起人家有

所藉口，但当他们违抗命令向我继续进攻时，我们应坚决自卫。在十三日以后被夺去的地区为了有利于自卫斗争时不受条文所拘束的，另外在进行和平谈判时，也应提高十二万分的警觉性，防备暗算。广泛发动庆祝政协会的活动，在政治上打破民众对国民党的害怕心理，告诉他们，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都是正确的，目前的形势，光明的前途，加强他们的信心与斗争的意志，详细调查国民党的内战暴行与人民的损害，向执行小组及新闻界提出控诉，要求赔偿损失，请求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掩藏国民党的暴行及恐惧其报复，只有助长封建气焰。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按照政协会的决议暂维现状，将来仍照地方自治的原则解决，因此，民主政权，必须坚持，农民的减租反吊耕与扩大生产运动必须贯彻，认真的做，我们要把和平建国纲领作为标准去检查过去所做的工作是否符合，有无成绩，今后更按此标准创造模范的地区，过去关于自新问题及建立两重性的政权的决定，应即取消。

8. 既然是以政治斗争为主要的斗争方式，则这个斗争的原则是和平的、合法的和公开的，但又必然是复杂的、多样的和困难的，它又是群众性的议会的斗争，由于这个转变，我们是存在许多弱点的：如胸怀狭窄、过左、不熟悉等，亟须克服。最要紧的是要把握住斗争的中心环节，庆祝政协会的胜利及其灵活运用，同时必须注意到城市与农村，上层与下层，海外与国内，个别的斗争与统一的目标，经济的要求与政治的目的，善于把这些斗争结合起来。

9. 干部问题，也是当前的重要问题，省县干部必须准备好一批人迎接公开的斗争局面，这些干部，省级的由中央审查批准，县级的则由区党委审查批准，一切准备公开的干部必须在群众中提高自己的威信与地位，并须集中一个短时期进行研究与训练；对立场态度、活动方式与私生活等问题，都应有明确的了解，在公开斗争的环境中无立场的迁就和骄傲的态度都须立即克服，目前须注意过左倾向，但经过相当时期的公开斗争之后，则须及时注意干部的腐化倾向与官僚主义，应十分重视干部的政治修养与做人的态度以及旧

社会中的道德问题。

10. 党的领导上：（1）区党委设一办事处集中一些上中级的干部，专门研究当前各种具体问题，如广东党八年来的斗争成绩，政策实施情形，各种运动的经验，对广东省宪及施政纲领的意见等；（2）严密组织审查干部，随时注意干部的不良倾向的发生与发展。在群众中斗争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扩大党的基础。加强党在群众中领导作用与领导地位；（3）党员职业化重新规定党费的征收标准，以解决党的经费问题是很重要的，和平实现后，减轻税率，减轻民负，收入减少支出浩大这种困难是必须有预见的。

这一指示是有关于各地党工作作风的转变，干部人员的重新配备，工作的重新布置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因此，各领导干部必须详细讨论，坚决执行。

附注：区党委准备发出对时局宣言，发表公开干部名单，出版党的刊物以及召开区党委执委会议，现在正向中央呈报。

立刻取消特务组织

（1946年3月）

中国决定要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国民政府即将改组，在此期间，无数迫切的事情急须去做，取消特务组织就是刻不容缓之举。

特务是法西斯暴力政权的特产，决不能拿民主国家的情报员和侦探去相与比拟。它是置国家的正常法律于不顾，为了巩固独裁黑暗的统治而专门破坏社会秩序，制造混乱不安，以便其营私舞弊残害忠良的暴力组织，这种暴力组织和受法西斯教育而被武装起来的军队，同样是独裁专政者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而特务的所以更加令人深恶痛绝的地方，就是由于它采取了秘密组织的形式，更便于进行血腥的恐怖的反人民活动。

特务组织的基本队伍是那些不事生产，专以巧取豪夺谋活的流氓，也有不少是被迫被骗加入而不能自拔的。法西斯统治者训练他们充作鹰犬，纵容他们去残杀异己迫害人民，养成其天良泯灭的奴才性格。而特务分子也就藉着法西斯统治者的荫庇，无所顾忌地去进行剥削榨取，食人而肥，以过其穷奢极侈，荒淫无度的堕落生活。法西斯统治者与特务分子就是这样相依为命狼狈为奸，以君临于老百姓头上的。所以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绝对不能容许特务组织的存在。

由于政治的极度不民主，中国的特务组织广泛地遍布于行政系统，军队系统，党务系统，教育系统以至渗透到所有生活部门及任何一个社会角落。它象无数狠毒鬼祟的眼睛，到处监视着每一个人民。据说中国特务分子的数目，起码庞大到一二百万以上，这就是说，平均每二百人左右就有这么一个吸血鬼在监视和暗害着了。

国民党十八年来的统治，正确说来，实际上是特务统治。在抗战期间，这些没有灵魂的盗匪，因为有“曲线救国”论做他们的护符，还派了不少“同志”和日寇汉奸深相结合，凭着“特工”这一面牌子，他们供给敌伪情报，帮助敌伪屠杀“异党分子和爱国青年”，此外为走私资敌剥削人民。凡是出卖祖国出卖人民以利其私欲者无不乐于为之。等到抗战胜利，他们又摇身一变，以“地下军”姿态出现，到处继续其祸国残民的勾当了！

政协会的成功，具体地决定了中国民主化的途径，不啻宣布了中国特务组织的死期。经过全国人民和国际正义人士的指责，政府当局也说要解散特务组织了！然而，事实上有了组织的特务，不仅“合法”地继续其罪恶的勾当，而且更加变本加厉地在破坏政协会的决议，疯狂地向民主力量反攻。政协开会时，他们已经屡次捣乱政协代表的演说会场，接着又制造了较场口事件，最近则发动各地的反苏反共“示威游行”，叫嚣着要破坏国际国内的和平团结，并且正在积极作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如南京方面组织“抗战军人联合会”及重庆“大东亚急进青年协会”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中国人民是决不能容忍这种吸血的鹰犬继续恣肆下去了！当此改组政府，进行政治民主化的一切步骤之时，政府必须首先用事实表现给全国人民：看立即取消一切特务组织！

（原载《正报》第47期，1946年3月3日）

欢迎三人委员会来粤

（1946年3月）

执行停止中国内战的三人委员会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三将军，在飞北平、济南、徐州、延安等地视察后，将于日内来粤。广东人民迫切地渴望和平，听了这个消息，实在无限感奋，而寄以重大的期望。

三人委员会的成立与停战命令的颁发到现在已快将两月，调执部第八小组抵粤亦已整整四十天；然而广东的内战至今尚未被遏止，三千万人民依然得不到和平。广东当局初则一口否认中共部队的存在，诸般阻挠执行小组到战区去监督停火；后来由于中共方面的一再抗议，东江二千余侨港群众代表的通电控诉，国内外人士如何明华会督等的正义指责，以及三人委员会来电确认东江纵队的地位，广东当局才承认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但又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共游击队划出停战命令之外，不惜公然违反停战命令，违反北平调执部关于广东停战对象的训示，企图任意剿灭中共部队和所有人民武装。因此，在全国许多地方大都实现和平的时候，灾难深重的广东人民还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广大贫苦的农民正在内战的烽火下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

这种现象的存在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重大忧虑。“和平必须全面，广东例外不得！”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为此大声疾呼，吁请广东

当局立即把和平还给人民，而三人委员会和北平调执部的一切工作，也没有把广东看作例外；蒋主席在军事复员会议闭幕词中，亦曾郑重指出：“务必要了解政府和平统一的政策，切实遵守停止冲突命令，以谋国家的真正统一。”所以广东当局的做法，显然是阻挠三人委员会的庄严工作，违背蒋主席的训示，和破坏军令政令的统一，是不能容许继续下去的。

现在，张、周、马将军是要亲自到广东来了！无疑这将带给广东人民以和平的福音。三人委员会对于中国和平的贡献，特别是马歇尔将军之辛勤奔走，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广东人民信任三人委员会的公正，迫切地要求三人委员会立即采取有效的方法，制止广东当局毁法乱纪的行为。我们希望从今以后，广东人民再不要听到内战的枪声，全国人民再不要从报上痛苦地读到内战的消息了！

自然，和平民主的到来，主要是依靠全体人民去努力争取，因此，当三人委员会来粤的时候，广东人民特别是香港广州的一切民主团体，社会贤达，必须坚决地表达要求和平民主的决心，通过一切可能，向三人委员会呼吁，从各方面帮助他们了解实际情况，以及在三人委员会回去后继续协助执行小组监督停战的工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求广东当局立即回心转意，放弃一意专横不讲事理的态度，为了国法的尊严，为了桑梓的幸福，立即下令所有部队停止任何军事行动，静候三人委员会解决，使广东人民不再受荼毒，使春耕不致受到破坏，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致继续低落，和辜负盟帮的好意。

和平民主一定要在广东实现，这是整个客观形势发展规定的；尽管今后广东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还必然要走一些迂迴曲折的道路，但我们却具有着充分胜利的信心和条件。我们竭诚地欢迎三人委员会的到来，并决心为广东的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

（原载《正报》第48期，1946年3月5日）

妇女们参加到民主运动中来

(1946年3月)

明天就是妇女节了！这是我们中国妇女在抗战已经胜利，国家开始进入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第一个妇女节，因此值得全国姊妹们的热烈庆祝！

和平建国纲领里，明文确定：“保证妇女在政治上社会上教育上经济上地位之平等。”这是中国妇女争取民主解放事业中的一次伟大胜利，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妇女和全国同胞争取民主，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成果。这证明了妇女解放和民族民主斗争是分不开的。只有把妇女本身求解放的斗争和民族民主的运动结合起来，在努力争取民族解放民主实现当中，才能获得本身的自由解放。

但是必须清楚认识：条文的规定，并不就等于事实的存在。因为民主政治未能彻底实现起来，妇女们终还是家庭的奴隶，男子的玩具，为社会所歧视排挤，屈辱地生活在痛苦琐碎麻木的小小圈子里的。

解放区的几千万妇女，生活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中，她们已经早就获得了政治上、社会上的平等地位，大批妇女被选举到政府机关中去，和男子一样管理政事，她们保证有受教育的权利，而积极参加生产建设的结果，经济上的独立，又保证了一切权利的充分实现。几千年的封建束缚一扫而清，她们已经快乐地过着平等自由的幸福生活了。她们的努力方向，就是全国姊妹们的努力方向。

在大后方，政协会所通过的一切民主的决议，到今天仍待全国人民监督其实现，在国民党内法西斯派疯狂反动之下，中国人民所获得的和平民主的成果正在遭受其阴谋破坏，一万万以上的姊妹们的痛苦生活和卑屈的地位，不独没有丝毫改善，而且由于经济危机

的深刻化，特别是我们广东，内战还没有停止，农村里妇女们正在惨遭蹂躏流离死亡。都市里，女工们以低贱的价钱出卖劳力，娼妓还是充斥街头，许多机关不用女职员，用了也被当作花瓶，诸多歧视和侮辱。

封建的法西斯的残余势力，是仇视妇女压迫妇女的。因此我们在纪念这届妇女节当中，我们广东的妇女，特别是生活在省港的姊妹们，就应该迅速把沦陷期间沉寂了几年的妇运恢复起来，检讨过去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来制止广东的内战，争取和平到来，配合全国的民主高潮，把新的阶段里的新的妇女工作展开。

为此，我们愿向省港的妇女工作者提供几点意见：第一必须加强本身的学习，加深对时局对工作的认识，因为只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运动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第二，一切妇女工作者首先要团结起来，建立起推动妇女的民主运动的核心，而且必须从各方面去加强妇女本身的组织，从知识妇女的圈子走出来，深入到广大的劳动妇女与家庭妇女中去，奠立强大有力的妇运基础。第三，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基本条件，因此必须抛弃在经济上依赖丈夫轻视从事职业劳动的不正确心理，勇敢地到社会上去到职业部门中去。

和平民主新中国的大船，已经桅樯在望，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妇女们以强大的力量参加到民主运动中来，妇女的真正的自由解放将会更快获得的。

（原载《正报》第49期，1946年3月7日）

广东区党委关于 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补充指示

(1946年3月8日)

二月□日区党委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问题还不够深入，不够具体，个别名词也有可能引起干部的误会，某些决定也有不妥（如第七项第七点末段说关于自新问题及建立两重政权的决定，应即取消，在目前情况下是过早的）。整个精神上，对广东目前的艰苦斗争估计得不够，因此，区党委认为有再发出这一补充指示的必要。

一、政协会的成就与目前形势

政协开会成功，全国进入和平的新时期，其成功的因素：（1）三国外长会议的决定，对中国实行干涉（以马歇尔为代表）；（2）我们党的强大存在与四个月来的坚决自卫斗争的胜利；（3）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反对一党独裁（以高树勳将军起义与大后方学生反内战运动为代表）；（4）国民党内部的困难，这是很清楚的：中国存在着两大力量，任何一方，要在内战中迅速取胜，都不容易，国民党正面临极大的困难和内部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民主力量正在向上发展，这种情况，就迫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开始放弃一党独裁，实行国家民主化的决议，虽然这些决议，尚待实行，即使实行，离开全国彻底民主化还是很远。但是，只要各党派在全国合法化，人民有了初步的政治自由，民主运动即可能逐步发展，成为不可拒抗的力量，破坏封建专制主义，推动国家走上民主化，因为苏、美、英三国的支援，有国内三个主

要政党（国、共及民主同盟）的合作，及三个主要阶层（劳动人民、中等阶级及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内中有强大的苏联、中共与觉悟的劳动人民，保证中国继续走上民主化的前途。

二、克服困难，粉碎反动阴谋

应当指出，国际国内的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领导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化，如同他们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消极性与被迫性，法西斯反动派正在制造各种机会，使用一切阴谋进行疯狂的反苏反共活动，为了企图保存自己，他们重新组织其力量，把中统军统的大小特务，转化到行政、交通、警察各部门去，使秘密警察合法化，职业化，更直接的统治人民，他们煽动反苏、反共，挑拨内战与国际战争，企图推翻政协会的决议，修改其原则，或拖延其实行，变中国为反苏的基地及反民主的堡垒，国内反动派的这种做法是取得国际反动派的支持与响应的。因此，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我党与人民面前的困难还是很大，反动派仍有其优势的力量与地位。我党与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惕反动派的阴谋，但是，这一切困难在激烈的斗争中是能够逐步克服与必须逐步克服的。

三、广东的形势分析

中国虽有两大力量，但并不是平衡的，在广东国民党是优势，我党是劣势，蒋介石对我广东党领导的武装是志在消灭，在全国的革命战略意义上来说，目前中心是在华北与东北，我党必须取得在那些地区的领导地位。因此，今天广东斗争的必须坚持，主要的是在于能运用这一政治力量，有助于我党在基本阵地的巩固，有助于我党在全国政治地位的提高，并准备我广东党在新的形势中进一步的开展。因此，我党领导的一切军队，必须在自卫斗争的原则下，坚持自己的阵地，使用灵活的战术，一方面要保存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要给反动派以坚决的打击，在完成全国性的战略基地的任务上，我军应负起在完成全面战略上掩护性的任务。为此，我们不能

偃旗息鼓，而应积极工作。

广东的国民党也在激烈的斗争与分化中，以余汉谋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已经瓦解（余调衢州），广东国民党的各派系均在政府中有其地位，但都不能左右政局，中央特务比前更横行无忌，广东中央化的程度更加强化，但两广的民主派在孙科、李济琛等的影响与领导下，将形成有组织的团结与合作。十九路军系靠近民主阵线，张发奎虽屡申反动言论，但仍须把他与死硬派区别开来；他要做官要投机，当政治环境表现得顺利时，是还有条件争取的。

广东人民在国民党极端残酷的进攻中，烧杀抢掠，贪污剥削，无所不为。去年晚造失收，今春物价高涨，人民在水深火热中，饥饿死亡，流离失所，为状极惨，他们要求和平、民主，职业都不可得，他们对国民党是极度痛恨的，他们已经敢于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对国民党暴政的斗争。反之，他们对我党是十分同情，只是疑虑我党力量不足，与恐惧国民党的残酷屠杀。无论如何，人民的力量及民众运动的发展是向上的，好的领导必能使工作推向前进。

香港政府对我的态度，从最近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的事实看来，是有了变化的。过去，我们是利用英美矛盾，K英矛盾，治安混乱和我港九队的政治威信与力量而取得它的合作的。最近的事实证明，它对我们是完全不友好的，显然企图将我们的武装消灭，这固然说明我们平日外交工作的被动与无能；但英属各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使英国惧怕人民力量的强大，他的内外政策都已日趋保守。因此，我们不应强调别人的矛盾以安慰自己，应提高警惕，严密组织，争取主动，发扬正义；另一方面，英政府仍将使用其两面政策，即在宣传上及某些群众运动上会给予相当的自由，以表示英政府的民主风度，实际上，这个“民主”也还是有限度的，有其长远的打算的，如果我们近视，就会危害自己，危害革命。

四、广东党目前主要的弱点与严重现象

在这一时期，我党的工作，虽有许多成绩，特别是宣传文化工

作与群众运动上有成绩，但弱点还很多，特别是领导上的弱点，以及各级干部的不良倾向，是从各方面暴露出来了。主要的表现在：

（一）对广东革命力量的不平衡及长期与残酷的斗争局面认识不足，对和平的争取估计得太顺利，对反动力量消灭我之坚决性估计过低，对如何使用自己力量坚持斗争，进行思想上的动员与物质上的准备做得极不够。因此，在反动派的强大进攻下，许多干部都表现仓惶失措、害怕、动摇消极、没信心、看不见前途，这在干部的思想上与实际行动上，是一个相当普遍而严重的问题。几个月来，在江南闹“香港病”，在江北闹“江南病”，在粤北闹“东江病”，要求回家，要求调动工作，是很普遍的现象。个别高级干部对“双十协定”迷失方向，主张解散部队，立即复员。这一时期，各地部队，都面对着经济物质的困难、粮食药物的缺乏，战斗情绪因而低落，干部之间便产生了互相推诿责任，内部闹意见的现象，个别高级干部不顾政策，生活腐化，引起下级普遍不满与同级间的不合作；城市中的某些干部则讲享受，讲平等、讲地位，不从工作责任上来估量自己，而用收入与地位来评衡自己，缺乏互助精神，组织观念薄弱，自由自在，昏头昏脑；有些干部则埋怨上级无领导或对工作岗位不满，对工作一冷一热，缺乏正视困难的精神。这一切表现资本主义的环境正向我党作思想上的渗入，旧的思想意识，正在我党内部进行腐蚀。

（二）怀疑和平的实现，不相信国民党会改变政策，不懂得国民党内进步分子一天天多起来和中间分子也倾向民主，国民党内部正在激烈斗争与分化中，不会抓住这些矛盾的斗争，鼓励与争取其进步中间力量，集中火力打击反动的法西斯力量，不会把活动的圈子扩大，争取更多的同情者与中间群众，只一般的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不论在宣传工作上与群众运动中，在比较顺利的条件下，就一套党八股，把中间群众吓跑；一套宗派主义，把广大群众关在门外，但一碰到困难，便畏缩不前，逃避困难，在圈子内打转，工作开展毫无办法。

(三) 广东党正面对着危机，这就是普遍的暴露。这两年来，因为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几乎所有地下组织都浮了头，不是短时期内能重新埋藏起来。因此，有全面遭受打击的危险。

(四) 由于组织几年来停止活动的结果，数量自然减少，质量也很差，许多党员是落后了与腐化了。因此，在面临着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组织上所发挥的力量是很薄弱的。

(五) 由于几年来的重点在农村及抗日武装斗争中，因此，大城市的工作便转削弱，就现有的基础上说，工人成份也不大，这就决定了目前城市党缺乏强韧的斗争性。

(六) 领导上不科学，不具体，不深入，缺乏全盘的周密计划，特别是在这一组织工作转变过程中，干部的调动大，各部门的组织工作很乱，许多领导干部对环境不熟悉，或打不出事务主义的圈子，因而又影响到各级干部的自动性与积极性以及不安心工作的现象。

五、新的斗争方式与当前的任务

整个工作都必须适应时期而转变，新时期是以非武装的议会的群众斗争为今后的主要斗争方式，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为原则。而斗争则必然是逐步改进的，不可希望得太顺利，中国法西斯反动派要阻止我们的工作，而一般的国民党官员们亦大都会采消极拖延的态度。

广东是中国一部分，必须和平，但第八小组到广州只是作为双方的调解人，因此，如何冲破阻力进入和平，全靠自己去争取，这是目前工作任务最重要的。

(一) 如何冲破阻力进入和平呢？

1. 坚持自卫的武装斗争，斗争的方针是保存力量与干部。国民党反动派虽好战，但兵力不强，最近的事实证明：K 我战斗的死伤，平均是十与一之比，国民党本身有许多困难，人民又普遍反对它，目前他们虽有优势的兵力与武器，并使用填充格战术，但无论

如何，兵力还是不够分配，还是有空格，使他们顾此失彼。因此，在目前广东当局仍不承认我们的地位，不愿和我们谈判，未停止军事进攻的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应采取积极的主动的方针，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在有胜利的条件下应该主动的袭击其最弱的一环，又要善于分散活动，各地区的部队应作战略上的配合，互相呼应，以牵制其力量，依靠自己的坚决斗争给好战者以严重打击，只有这样，才能迫使他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地位取得和平，应认识，他们首先破坏了军令政令，输了道理，不能长期打下去的。

由于数月来的残酷斗争，我们的武装力量已相当减弱，为着争取和平民主的更快实现，为着争取我们在今后政治上的地位，各地区适当的补充保持原有战斗力，并发展各种民众武装的组织。

2. 坚持武装斗争的另一面：就是配合谈判工作，展开猛烈的宣传攻势，向群众普遍解释：我们为了避免冲突扩大，避免自相残杀，避免人民过分的摧残，我们忍痛退让，一心一意争取和平到来与实行民主改革，我们猛烈展开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群众运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列举确切的事实，进行群众性的控诉，要求各地公正绅士出面主持正义，主持公道，弄清是非，说明真相。

3. 更广泛的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包括多与国外朋友的来往），以便奠定自己的政治基础，打开局面，团结国民党的民主派，推动中国人士与地方势力，争取退伍军人与政客，在地方自治的口号下，鼓励他们与争取他们到民主阵营中来。

4. 继续扩大民主政权，在老地区进行恢复与巩固的工作，并使这种政权能适应于新的环境，派遣武工队或工作队开展新地区的工作，转出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的包围圈，必要时在新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或政治攻势，以威胁和牵制国民党对老地区的摧残。

5. 停火的谈判，也可以在各地方局部进行，争取中间势力，订立秘密的休战协定，极力避免暴露他们，但也不因此而麻痹自己。

（二）为了迎接将来的新形势，今天就要赶紧建立起群众基

础。首先着重于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开展各种细胞组织，目前暂不提出高级统一组织的口号，一般的经验，必须领导群众进行改善生活的斗争，才能树立起在群众中的威信。因此，必须切实地灵活地领导反贪污、反征购、反苛杂的斗争，贯彻实行二五减租（已经是国民党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反对迫租迫息，促进地方自治，建立改造区乡政权，发展人民的生产救济事业，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强大的群众基础。

（三）必须支持民主同盟的工作，用民盟去号召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民盟的公开活动，扩大民主政治的活动圈子及其政治影响，把进步的士绅及有社会地位的各界人士、我党的同情分子，大量组织到民盟中去，通过民盟去团结广大的中间群众。目前客观上具备民盟发展的良好条件，我们必须从主观上加强它与支持它。

（四）华侨工作对于将来议会斗争与群众斗争均极重要，只要交通一经恢复，华侨对国内政局的推动与影响是很大的，在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华侨经济与祖国建设的结合当能发挥极大的作用。华侨的绝大部分是闽粤籍，他们对家乡的事情更表关切。因此，广东党对于华侨工作应负起最大的责任。

（六）各地干部，必须尽量运用自己的历史与技术，转入行政、经济、交通、生产、救济、教育、文化各部门中去，争取较高的地位，是必要的，但要估计自己能力是否胜任，因此我们首先要脚踏实地，做好事情，打好基础。目前，争取经济生产部门的岗位是应当重视的，如果我们对这方面懂得太少，也应该及早学习。干部尽量职业化，以减轻党的负担，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七）纠正党员干部的不正确思想，诸如悲观失望，动摇消极，失却自信，逃避斗争的右倾观点；在大城市及群众运动中，则应防止左倾关门主义与宗派成见，改变这些恶劣的作风，提高社会化与民主化的作风。

（八）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检查反省自己的错误缺点，并随时督促下面多做事。目前的领导机构须迅速调整求得健全，各部门的

组织应认真整理。

（九）为了适应新形势，广东党的组织方针应当大大发展，而这一发展的中心应当是大城市的工人、学生与知识分子。各地方的县城及中小市镇、乡村和重要据点、交通要道中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均应注意精干发展，但在大发展中，又必须打开警惕的眼光，反对拉夫与防止奸细的混入。

各级、各单位接得这一指示后，即进行检查讨论的工作，并把实际情形报告。

尹林平致梁连饶电

——林平、廖承志不日回粤

（1946年3月9日）

梁连饶：

我已安抵渝。我们现在正与张尚华交涉广东的问题，不日可能解决。获得解决后，我即同廖承志同志等回粤，准备以下：

（一）以前几件事所需要的材料及必要参加工作的干部三五人。

（二）曾生目前不可在港公开。

（三）通知各地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为保存力量和他们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以便指导他们。

（四）准备电台及机要人员，英文通报（该机即原香港台）。

林平

尹林平致梁广电

——选择部分干部调往华北训练

(1946年3月10日)

梁广：

1. 我们前次要各地党选择有造就干部，准备一部分调到华北去训练，望各地切实准备，以便调动。

2. 最近重庆有一些下层干部去港，到《华商报》找张铁生，如称介绍人是庄菲的，是同志。

3. 问家长，以前有一个名叫刘逸民，夫妇二个是否同志？是否他答应他们离开的，望即告。

林 平
灰(10日)

广东区党委致中央 并转重庆周恩来尹林平电

——广东区整军决定

(1946年3月11日)

中央并转渝周林平：

敬电关于整军指示奉悉，经讨论后决定如下：

(一) 估计反动派虽承认我广东武装合法地位，但不放弃消灭企图，以便其独占华南，因此我们计划将在广东现有约一万三千人武装中之一半出编，另一半设法掩蔽保存。

(二) 掩蔽方法：(1) 有计划逐步复员，参加合法生产，埋藏在群众中；(2) 利用有地位的地方干部作地方性潜藏势力；(3) 采取各种形式，集体分股在统治薄弱地区，如十万大山、闽粤赣边、五指山、沿海岸等地非法形式活动，俟适当时期，始行解决。

(三) 出编部队是否能编成不完全的师二个或三个，以便加强广东党及干部政治地位，并争取将来编为地方保安队，或调华北整编，如编三个师，则东纵编一个师，琼崖一个师，(珠纵、南路、中路)合编一个师。如编二个师时，则东纵、珠纵、中路合编一个师，琼崖及南路合编成一个师。以上各项是否可行，希复，以便准备团级以上军政干部名单。

广东区党委
寅真(3月11日)

连贯蒲特致重庆尹林平电

——要火速交沪一千万

(1946年3月12日)

渝林平：

1. 原沪款交一千万，请火速交到，文日起，每日须纳息六万元，已转收款人与夏衔接洽，并盼再交以三百万元，即复。

2. 中央丑敬关于整军指示，经曾生、梁广、蒲特、周楠等阅后，照令烧毁。

连贯、蒲特

寅文

梁广致重庆尹林平电

——周楠等四人留港

(1946年3月15日)

渝林平：

为了准备你回来时谈判及帮助曾生了解情况，现特留下周楠、刘田夫、林会兰、阿朱（北江来的）四人在此，你是否同意，请即复。

梁广

寅删

尹林平致梁广连贯电

——转致海南岛工作问题

(1946年3月16日)

中机转林平致梁、连、饶、曾，请作如下的准备工作，待我回来以便迅速处理：一、队伍准备调走三团人（铁路以东）。二、琼岛一团、路西、中区、南路、北江，以抽一些能造就的党、政、军的中下级干部，不是一般的战士，而是能造就变成干部的，须要各地准备一大部分的干部，是要调走，应提拔新的干部，不暴露的干部来负责，组织系统要保持单线的领导，以后继续坚持加强城市的学生、工人工作，将来领导机构是会改变。

二、《华商报》要改组，要伪装面目，要完全商业性、群众性，赞成与商业、民主的立场。

四、不可能有多的经费给我们的，我们自筹经费，伪装机关，减少支出。我大约二十号左左回去。

五、希望告华南，他们的问题，这几日可会解决，请通知琼岛，派二个了解全盘工作的干部，来港候我。另电亭致梁广，以后有人到港去，找《华商报》张枫生、韬色、庄岖的，是属一般性的干部，如有人去到启源找林兆仰的，是凌先生，是属秘密的干部，请注意。

尹林平致广东区党委电

——对整军问题之意见

(1946年3月17日)

林平寅篠致区党委：

关于你们整军问题意见：

一、广东目前仍坚持不承认政策，对我是以消灭为主。必须估计顽军进攻的可能，军事斗争还严重，有些困难将极其多，如以为在广东可集中部队为三个或两个师，正给敌人打击目标，更易受到重大损失。

二、目前广东局面仍是拖的情况，因而避免损失，分散干部，可能隐蔽的武装部队，尽可能隐蔽下去。现在我们的策略，仍是分散活动，以保存力量与干部，保持与各地之密切联络人员，找到机会撤退。

三、将来方针，在粤汉路东及江南须撤退二千人，中区、西江、南路只撤退一部干部，所以公开与带队伍的干部，将来能深造的干部，大部都要撤走，因此，应提拔与群众有密切联络的新干部来负责。现在一般不作大活动，准备有更坏的情况到来。

四、香港必须提高警惕，公开与秘密工作必须严格分开，组织上应更好严密，特别是各地来城市的党员干部，须保证与港原有的秘密系统分开，切忌相混在一起，以影响香港的组织，并使之了解，不宜在港久留。

五、小潘已到。

六、我待广东问题弄妥即回。

△△致重庆尹林平电

——广州行营诬我为匪帮

(1946年3月20日)

渝林平：

寒日《华商报》载（广州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昨发表消息称：

一、出没于宝安县属葵涌及沙鱼涌一带匪帮内杂有日本人甚多，据悉：在□种土匪与日匪，即始去年十二月下旬由佩带手枪之土匪数十名，由九龙至沙头角至盐田宿一宵，翌日转走沙鱼涌，即有徒手日军三十余名加入所谓（东江纵队）匪帮。

二、东莞县第四区七峰、青塘一带突集中土匪约千余人，内有日军百余人，自称为（东江纵队）第二支队（飞马队），由共首卢伟如及蔡子培二人率领，企图发动大规模之抢劫。

尹林平关于广东军队和党组织情况报告

(1946年3月20日)

一、军队现况

1. 东纵江南区（东莞、宝安、惠阳、海丰、陆丰）现有武装队伍二千人左右，因顽军的进攻现在都退入山地及乡村坚持工作，其中党员占四分之一强“四百余人”，指挥员卢体如，政委黄宇，

下属第一、第二支队。

2. 东纵江北区（增城、博罗、龙门、从化、花县、佛冈）现有六百武装队伍，今年一月有党员三百八十人，现在是非常流动，经济也非常困难，指挥员周占明、政委陈达明，下面有第四、第五支队。

3. 东纵惠、陆、海、紫、五边区现有一千四百余人，党员占四分之一弱，这一个区是敌人投降后才开展的，指挥员卢体良、政委张持平，下属六支、七支。以上三个区域是曾生指挥。

4. 东纵及珠纵合并的粤北区，下面又分九连山区（和平、连平、江西的三南）是东纵的第三支队，支队长彭沃，政委曾源，兵力共有约五百人，党员一百三十多；又粤赣湘边区粤北支队，支队长刘培，政委黄业，有五百五十至六百人，又有英、翁、始、连新边区，是北江支队，支队长邬强，政委李东民，也是五百多人，党员共约四百人，也是敌人投降前后才去开展，以上地区是杨康华、林锵云、王作尧等同志指挥。

5. 珠纵的粤桂边（广宁、清远、四会、怀集）江西支队兵力不足五百人，党员九十八人，军事负责者，珠纵副司令谢斌即谢海农，政委也是珠纵政委，敌人投降前三月才开展的，基础最好是广宁，别留落在南、番、中、顺、三等县的武工队二百余，党员约八十人。

6. 中区解放军，只存三百五十至四百人，主要散在二阳新兴之间的惠务山，党员占一百三十多人，负责指导的完全是原来中区解放军司令部的人。

7. 南路解放军，主要力量在十万大山（粤桂、越边），约千人，同越共胡志明有联络，还散在雷州、高州约五百，其中党员，他没有另外报告，算在地方中间。

8. 琼崖独立纵队共六个支队，兵力五千余，敌人投降后有些开展，其中党占三分之一弱，十月二十号以后详情未明，但有人在香港同我们联络。

9. 韩江纵队因敌人投降后受顽军进攻，遭受损失极大，据我

们派去的干部回来说，他们已经解散，但我们仍未接到报告。

二、军队最多的时期

东纵在去年八月尾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人，珠纵有一千六百多，合共有一万三千人，现仅存六千三百人，减员的主要原因是，敌人投降前后，北上是新地区，而后顽军对两个队进攻兵力共用十一师，在这进攻中打散被俘逃去，我们有计划疏散二千人，被俘也有千余，其中大部非战斗人员，伤亡也有三五百人。韩江最多时也就有一千二三百人，因连打几个败仗就仅存三百余人，后因各种困难又常遭顽军进攻，逃亡风气盛极一时，队伍又新，政治教育又差，干部又没经验等所合成。中区解放军最多时也有千余人，因他们政策过左，到处树敌，自己孤立自己，到处受敌人进攻和打击，仅有两个月是在开展的情况，以后就一天一天的减少下去了。南路解放军最多时将近四千人，因估计不足，情报不实，他们都集中在广州湾的外围，企图攻下占领，正在这时间中顽方有三个军企图反攻广州湾，接应盟方登陆，因此，他们就住在三面顽军、一面海的作战情况，一次就给顽军打的几乎全散，以后才慢慢的收这一千多人，这主要是散掉的。又要说明他们的队伍新的战斗经验少，干部也没有作战与指挥队伍的经验，也就易于冲动，一遇事变把握不住，琼崖情况不甚详细。

三、目前军队的主要困难

1. 顽军还未停止进攻。2. 经济无法维持，我所存谷子物资都被顽军抢去。3. 粮食物资接济困难，就是有钱也买不到。4. 干部存在严重的害怕动摇逃跑，另一少部分又是过左不满政策，敌动一动×。战士新的是害怕动摇逃跑，老战士是属左的一面，不相信有和平到来。

广东组织状况

一、党的组织发展情况

除了东江的惠东、东宝，珠江南番、中顺部队活动区域及南路琼崖没有停止工作外，其他地区都是在一九四二年年尾才着手恢复工作，直至敌人投降前才算是全部恢复组织上的活动。

1. 惠东宝区，党员共有一千四百人左右，分布东莞五百多，惠阳六百多，宝安二百多人，负责是黄宇、卢体如、王高阳，下面有两个委员，有路东、路西、惠东三个县委。

2. 惠海陆紫五边区由四县委党员共有四百多，分布海丰共有二百余人，“原有五百余人”，陆丰约一百十，惠紫五边百余，负责人方宝、王炳、王魁等人。

3. 江北区，党员共六百四十多人，分布博罗百二十多，增城约二百余人，从化佛清边委约二百人，负责人陈达明、谢学筹、周伯明，下有四个委员。

4. 东江的后特委属和平、连平、新丰、河源、龙川、五华、紫金等县党员共约六百人，分布不详，负责者梁威林、郑××、钟×忠，还有两个委员。

5. 粤北区属曲仁始南、翁英连、连阳乳清等县共有党员八百多人，下分北江河西英清区，河东区、小北区、粤北区，负责者是区党三个委员。

6. 西江区共有党员三百二十人，负责者梁嘉、欧×、刘向东，还有两个委员。

7. 中区是八邑二阳共有党员六百六十多人，负责人罗范群、刘田夫、谢创，还有四个委员。

8. 南路区统属下四府党员共有二千人，下分三区，即高州、雷州半岛、钦廉等，负责者未变，还是周、张等。

9. 城市部直属广州百多人，属市委领导外县百多人，港九及海员百一十多人，新界区二百多，澳门中山共二百多人，合共约七百人，最近队伍疏散去的还未算在内，保持原来关系还未拨交市

委，及连贯的系统另外约有四百人，但这都还算在各地及队伍中党。

10. 琼崖遍及整个琼崖，有六个县委另有三个联合县委，总共有党员六千余，将近七千部队在内。

11. 潮汕现恢复七百多人，闽粤赣边及闽西南都不清楚。

二、现存在一般现象

由于停止工作二年多，整个党（部队在外）各地都在数量质量下降，有许多无法找到及不能恢复，又由于队伍活动的关系（战士干部不認識革命的长期性）绝大部分地区党组织都暴露，其次是干部也绝大部分暴露，不是某级的问题而是各级都同样，支部另外。

三、我们提议广东党组织应有如下的调整

1. 组织上应有新的改变，农村中党今天应保持单线联络不作积极活动，以便渡过目前不好环境。但在大小城市特别大城市应积极展开学生工作、工人贫民的运动以及推广各阶层与华侨的民主运动。

2. 领导机构应有改变，原来的干部应分批调中央受训，把领机分成秘密和公开活动和领导广东一切工作，区党委改为省委。

3. 为了适应今后斗争，干部应要办实业、商业，参加生产，希望中央给广东一批款子，一次过由中央决定。

报告人 林平 三月廿日

若是广东我军不能在目前得到解决的话，我想去延安一次，不知妥否，请示知。

梁广致中央并重庆周恩来电

——琼崖情况报告

(1946年3月29日)

中央并渝周：

1. 前与黄会斋同赴琼之叶某已返此。据云，李振亚与陈平可于一个月內到此。

2. 据叶报告琼崖情况如下：

①顽军分布情况：韩练成部三个师：一七五师（主力师）分布于琼西公路干线，师部驻儋县诺（那）大市；一八八师分布于海口，经琼文公路与万宁之干线，师部驻嘉积；新一九师驻榆林，（三）亚港及陵水、琼县各地，师部在榆林。此外，尚有保安第六团，守备第三团，以上十一个团，共约一万人；各县地方游击队及伪军改编为守备队，共四五千入。

②顽我战斗情形：韩部公开任务为受降，实际工作为剿共。第一步为扫荡沿海我平原地区，摧毁民主政权，建立五家联保（今年一月前完成）；第二步，集中主力进攻独立队的基地（二月前完成）。我于元寒接到停战命令后，即遵照执行。顽于灰（日）前后，向我儋县之新州、旧州、南辰、黄五等市镇之第四支队进攻，我退出，该四镇为顽占领，元寒顽又占我琼山及南坤市，丑寒由一七五师长甘成城率该师二个团、一八八师一个团及保六团分四路由南丰至白沙公路五指岭之红毛洞、石碌山、定安之岭门向我司令部驻地白沙深入合击，我忍痛退出。顽于占领白沙后，烧杀淫掠，数万人民遭受饥寒惨祸至极。我军战绩，则于元月至月初在感恩、北黎至石碌山铁路及白马井、琼山、文昌等地，均有获胜，共计缴获

美式迫击炮一门、轻机四挺、手提机六挺、长短枪约二百支，俘虏近百人，其中曾击溃地方游击队一个大队，俘其大队长。

③我军现状：自退出白沙后，即分散活动，没有固定基地。第一支队在琼山、文昌，第二支队在澄迈二区及琼山、屯昌、南坤并澄、定交界地区，第三支队在陵水、琼县交界地区及迈宁区，第四支队在儋县、临高交界及儋县、昌江交界地区，挺进支队在澄迈一区及三区之澄、临交界。顽知我分散，乃增强配备组二旅，追逐打击。我军如遇有利，则以支队为单位袭击之；如无利，则在广阔地区上与之周旋。一般民众大部分仍同情我，有一部分受顽压力，对我有离心及观望，恐怕变天。共同愿望为派人来琼调解内战、救灾。我军下级干部，一度情绪不高，经传达新任务及战斗胜利后，现均信心甚强，但仍有个别于被捕后叛变者。

梁 广 寅 艳

梁广曾生致中央 并重庆周恩来尹林平电

——最近东江情况

(1946年3月29日)

中央并渝周林：

最近东江情况如下：

一、顽三六师在莞城，一五三师在惠州，一八六师在海丰，一五二师在河源，并分兵九连山，扫荡我龙岗、坪山，又大鹏半岛发现有五四军，独立团、保十团梁柱在博罗，保十二团在惠莞边，保

二团（内有陆仪均大队）在惠海边，顽军进攻主力，仍以东江为主。

二、三月上旬，顽在江南之着重击退我主力后，因为再度分散，乃经常出动，在政治上着重加紧五家联保，清查户口，中心地区如坪山一带，尚进行打手指模自新运动。

三、顽对民众勒缴各效国军粮，每村每保要交一千至一千八百斤，民众愤恨日深，反抗或消极缴交军米，现已进行罢市（自发的），民众对我虽害怕，但比前更为亲切，仍是支持我们，认为顽军坏过日本人，说他们要求条条都是锁链。

四、顽军不准民众叫我为“红军”，只准叫“土匪”，并要说：三个月以前国军已到此。并称：仅有“土匪”与伪军合作。

五、土匪活动在东江到处行动，团部所在地之龙岗，也常有掠劫。

梁广、曾生

寅艳

△△致中央并转尹林平电

——《国民日报》载张的谈话

（1946年3月）

元日港《国民日报》载：（本报重庆三月七日航讯）

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于昨语本报记者称：

“内战专家”之帽子满天飞，余子屋顶亦飞到一个，但戴不上去。制造“内战专家”帽子者，才是“内战专家”。并谓：广东确有共产党，但无共产党部队，按此系根据中共呈于政府之事实报告而言，非余所能抹煞也云云。

（请转林平）

尹林平致中央转粤北王杨电

——东纵问题获协议

(1946年 4 月 3 日)

中央转粤北王杨：

1. 我与承志冬从渝经穗至港，明早与金兄等再往穗进行谈判，东纵问题，已获停战协议，并决在江南集中赴山东。

2. 我抵穗后，即派停战小组到粤北下列各地找寻仁化北部之长江、百顺、丰顺县属之潭头坑，始兴属之未它地，及马眼、南雄、白云圩，并希依时与我台联络。

林平

卯江

梁广致中央书记处转询上海刘晓电

——吴有恒抵港

(1946年 4 月 5 日)

中央书记处转询上海刘晓同志：

前七大广东代表吴有恒已于寅世抵港，据称：在沪住二个月，动程船行七日，唯无介绍信，且时间相隔甚久，只他一人到来，此事是否属实？盼即复，以便分配工作。

梁广

卯微

国内时局的症结

(1946年4月)

近几天来的国内时局，由于改组政府问题，政府与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未获协议，东北方面，又因国民党军队大量涌入，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以致内战火焰，日益蔓延，使关心和平民主团结前途的人，心上又笼上一层暗影。

到底目前国内时局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

关于政府改组问题所产生的困难，国民党发言人吴国桢氏说是因为“中央迄今拒绝提出参加国府委员会的名单”。但是正如中共代表团对此问题的声明所说，“政府四项诺言迄今未切实履行，国民党二中全会造成违反政协之混乱情势尚未澄清，宪草修改原则之争端未解，国大代表名额总数政府又提修改协议，而中共应有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之名额，政府亦未作最后的肯定，在中共目前实无提出国府名单之可能”。民盟发言人亦认为“在目前各种障碍未除前，政府改组即不可能开始”。一向独揽政权的国民党当局，何以此刻反要急急于催促各民主党派提出参加政府人员的名单呢？中全会以来，国民党内的反动派一连串推翻政协决议，破坏停火协定与整军方案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始终打算把假民主的表面文章作敷衍，实际上则是想一党专制的法西斯专政丝毫不变。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参加改组政府的目的是结束一党专政，开始实现民主，倘若在上述各项争论未获合理解决之前，贸然应允国民党当局的要求，结果必与实现民主的本意相违，反中了反民主势力的诡计，而大大违背人民的要求与国际友人的期望的。

至于东北问题，在苏军保证月底撤完后，已使那些藉反苏以反

共反民主的阴谋全部破产，东北问题纯是内政问题，益加无可否认。而且军调部四个执行小组又已抵达沈阳，三委员亦将亲自飞往调解，倘若国民党当局真肯循政治途径合理解决，则东北漫天烽火，立可止熄。无如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扩大东北内战以破坏全国和平团结局面，消灭东北民主势力，强行输入一党专政的阴谋，有加无已。所以初则滞留执行小组的起行，加紧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摧毁地方民主政权，及至执行小组抵达沈阳，大量国民党军队，在美舰运送之下，则又不断涌入东北，大规模地引起冲突，使执行小组的工作，无从进行，所以东北严重局面的造成，全不是什么“恢复主权”的外交问题，而只是国民党当局不肯执行停火协定，政协决议与整军方案。不肯在东北实现民主政治，反要强迫东北人民接受其不民主的一党统治的内政问题。

因此两个问题的实质，正是民主与反民主之争，真民主与假民主之争，是人民民主力量与以国民党内的反动派为首的反民主力量之争。

一切反民主力量正企图把问题的实际加以模糊，企图在掩饰欺骗之下达其阴谋目的。而有些在民主与反民主斗争中犹豫瞻顾的部分人士，慑于反动派的狂嚣，竟敢认不清问题的实质，客观上纵容助长了反民主势力。甚至亲自主持政协，又声明过“十分尊重”“照案实行”政协决议的蒋主席，也竟公然对修改宪草表示“惊奇”，一再把东北问题作为“外交问题”，否认东北民主力量的合法地位，这就使问题的解决更陷困难。而目前时局的症结，也就在这里。

（原载《正报》第63期，1946年4月5日）

裁军与复员

(1946年4月)

据合众社电，美国特使马歇尔现正急于返华；这位和平民主新中国的伟大友人，对近月来中国局势的逆转，显然已感到了不安。当他看到国共冲突仍然继续，军队整编迟迟未有实行，巨大的军费几乎没有减少等现象后，最近就曾经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警告，认为中国如果不立即裁减她的军队，中国就会陷入破产，这里，我们愿仅就裁军复员问题，加以论述。

中国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地方受到战争摧残，有待重新建设；人民经过巨大损失，亦有待休养苏息；和平时期的国家财力，只应集中于救济复员，实在不能象战时那样以百分之七十的国家预算耗用在军费方面。因此，无论从促进和平建设与减轻人民负担来说，裁军复员都是万万必要和刻不容缓的。

本来，在整军方案中，早已规定国共双方裁军的数目与步骤，而国民党的整军复员会议也早已开过了；如果按照计划进行，一年之内将有二三百萬官兵退役复员，然而两个多月来，我们除了看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已组成了各级复员委员会，颁布了复员工作条例，三月中旬已有八万五千名中共士兵被遣返原籍外(英联社六日电)，国民党军队不仅未有切实复员的准备，而且还在被动员调遣去从事内战。二中全会上军政部次长报告的整军数字，竟较整军方案所规定的多出一百六十七万，而且要將应该复员转业的一百四十二万改编为工兵建设总队(即后备军)，企图使国民党军队一个也不裁减。非常明白：二十年来迷信于武力维持统治的中国法西斯独裁者们，是不愿自己裁减自己的军队的；于是，整军方案就变成了只整别人不整自己的方案了。

必须指出：如果让法西斯派保持庞大军队支用巨额军费从事内争（据俞鸿钧报告本年度军费为一万零九十五万万元，占全国预算百分之四十三），其结果必将加深中国经济破产的危机，使中国永远陷于贫弱饥馑之境。所以，马歇尔的警告实在应该引起国人注意，而督促政府当局切实执行整军方案，立即大大地裁减人民血汗所供养的军队！

固然，如何安置偌大的退役官兵，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浴血搏斗，现在河山光复，他们功成引退，政府当然有责任给予妥当的安置，务使各尽所能各安其业。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建设兼程并进的前程下，政府对于那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中上级军官，应该根据他们的技能，分别安置到各个建设部门中去；对于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或官佐，必须安全资送他们返乡重理旧业，进行生产，我们看到解放区复员回乡的军人，一律受到欢迎鼓励和表扬，生活有困难的，区乡政府都尽量设法或动员群众代谋房屋，食粮、田地，耕具或其他生产所需的物资。这种经验是值得重视的。只有依靠各地政府的负责照顾和发动群众的友爱互助，才能使退伍军人保证有事做有饭吃，并有适当的发展机会，和不致于增加都市失业和农村破产的严重情势。至于在复员过程中，是一定会遇到种种困难的，但只要政府认真做起来，困难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原载《正报》第65期，1946年4月9日）

杜致中机李科长电

——粤省译电人员处理问题

(1946年4月10日)

中机李科长：

广东问题已得部分解决，东纵于一个月内撤退，二千四百人北上，又据梁广同志说，将来，因环境与经济限制，全省只设三至五个电台，译电员只需五六人即够，据此：

1. 粤机工作人员，除留下足够应付工作之人员外，其余是否可随队北上受训，条件如何，否则如何安置（改行或遣散）？

2. 我拟请求北上，你是否同意，继任人待决定后再电告。

3. 北上时需要带些什么东西？

以上三点均请速示，以便准备执行，又电台人员是否同样处理？

杜

卯灰

梁广致李碧山电

——给碧山三项指示

(1946年4月10日)

请转李碧山：

甲、由于广东国共问题，现已获得初步解决，国方只承认东江纵队为中共武装工作人员(承认共军名义)，并：

1. 只承认二千四百人(包括家属)。

2. 时间限期一个月，撤离广东时，我由调查小组出发开始工作日起。

3. 集中地点于宝安、大鹏半岛，由美方负担船运，北上山东。

乙、琼崖纵队，在谈判中估计可能获得解决的，但南路解放军、中区解放军、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国方是不承认的，以上各地区顽军仍在积极向我进攻中。

丙、目前我方撤退计划，由于时间和数量限制，你处只能抽调若干已暴露的过红的，可以深造的，及有不良偏向对工作有坏影响的干部，集结准备北上，先将人数电告我们。至于武装部队，在广东问题未全部解决前，仍可用韩江纵队名义，坚持自卫待命再改，但已经或可以掩蔽者，则应尽一切方法，以多样方式保全，可保可散，避免损失，广东已有二三年艰苦局面，非达到真正和平民主决不轻易放弃武装斗争(以上三项请转林美南)。

丁、陈明已于佳日起程回去，详情由他传达，我已向他取用八百万元，仍盼再派人带来一千七百万，以足二千五百万元之数。

梁广

卯灰

唯民主才能挽救经济崩溃

(1946年4月)

中国经济崩溃的危机现在差不多成为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得到的事实了；这不仅表现在各地灾荒饥饿罢工的苦痛而普遍的叫喊中，而且表现在一向讳莫如深故作乐观的政府当局现下的呻吟中。宋院长去月在中全会上揭露了经济危机的严重性，财政部长俞鸿钧更在三月二十五的参政会上报告法币发行已达十万万万元，本年预算在二万五千万万以上，而国库岁入大约等于预算的一半，不敷之数往那里挪取呢？重要的当然是饮酖止渴的发银纸，通货更可怕的膨胀下去。从重庆到上海以至北平，印币厂现在整天整夜的开工，据说，每天的生产量是八吨至九吨。结果当然是俞陷愈深愈难自拔了。

要挽救目前国家经济于崩溃的主张，重要的有两种：一是完全倚赖美国的借款，全副精神望着马歇尔回华府所提及过的五万万六千万美元，一是迅速实现民主倚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同时尽量利用美国的借款，但要以前者为依归，主张前者的，最明显的表现在政府发言人吴国祯氏在四月五日招待记者的讲话上，他说“中共要使美国贷款延期，因为我们经济上情形恶劣，但是假使美国的帮助来了，中共就会赶紧加入政府。”主张后者的是各民主党派与全中国人民。

自然，我们是唯民主能挽救中国经济崩溃的主张者，我们同意向美国借款来解救当前的经济危机，帮助建国大业。但必须以民主政府的建立为前提。上述吴国祯氏的谈话，我们知道是针对中共代表周恩来之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力图推翻政协决议维持一党专政的；但其精神毋宁是在于对美国说：“不要等民主政府组织成功才

借款吧，最要紧还是先借款，借了款，民主政府就会出现了。”这是欺骗友邦的有计划的阴谋，其目的在于既骗取美国的借款，又取消扩大政府基础结束一党专政的实现，同时想使人民相信中国经济情形的恶劣是因为民主党派使美国贷款延期。

诚然，目前中国经济危机是严重的，否认这一危机是欺世的扯谎，其动机是很不好的，然而，若果进一步追问经济危机的根源与解救危机的根本办法，中国人民就懂得，其关键在于中国究竟要和平民主，还是要内战独裁。这是中国要生存还是要死灭的最重大问题。有了内战与独裁，才产生国家预算岁入不敷，通货无限膨胀，官僚资本横行，贪污强夺满天飞这一切陷国家经济于绝境的现象，有了内战独裁才使一切良策美意一切解救方案都无从实施。因此，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和平不实现，民主政府不能组成，内战独裁仍然继续，在这时期里如果国民党取得了美国巨额借款，其结果将不是经济危机的获得解救，而是内战与独裁的扩大，如果说，在国外民主压力这么大，经济危机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国民党党内法西斯派还尽一切力量破坏和平民主绝不愿结束一党专政，那么在美国肯于民主政府成立前予以借款，经济危机稍为和缓的情况下，这些反动派将加倍扩大内战与独裁，这是谁都可以想像得到的。反之，实行了民主，结束了内战与独裁，倚靠中国人民自身的努力，加上友邦的善意援助，才能挽救当前的经济危机。

（原载《正报》第66期，1946年4月11日）

梁广致中央组织部电

——原十二集团军工作之我党员

(1946年4月12日)

中央组织部：〈绝密〉

下列诸人原在十二集团军工作之党员，粤北事件后，仍留部队，现已随余汉谋调赴衢州，请转知该地党委，必要时可以接头：

1. 张易生在一八七师、四〇七团，任团指导员，(说毕之江海，叫我来找你)，以下三人均张联系者，此外，还有姓名不详的可问张即知。

2. 陈宗远、黎将藩、彭同均系四〇七团连指导员。

3. 周振国，一八七师，政治部主任(张与他联系)。

4. 叶松在一六〇师(说唐时敏介绍)。①

梁 广

卯文

①中央4月16日复电：“粤委：我党在六十军及九十三军的关系，请务必令管理这些关系的同志随军到东北，以便与东北我军接头。因东北国共两军现正进行大战。”

谈广东的肃奸工作

(1946年4月)

广东的肃奸工作做得怎样呢？省参议员赵超讲明了真相：“广州沦陷七年，要真正肃奸平均每日杀百个也杀不了，现在复员半载有奇，见诸报载者不到六名，平均每月仅杀一名”。

当然，肃奸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和泄愤，而是为了彻底剷除敌伪法西斯的残余势力，使其永远不能死灰复燃，以致遗祸国家民族。所以杀多杀少并不是肃奸工作考绩的唯一标准。但是应杀的汉奸很多，而已杀的却特别少，就不能不追问一下：原因何在？

赵参议员又引证民间传说的一句话：“大汉奸免死，小汉奸无事，中汉奸而有孽钱者方传讯。”大汉奸可以免死，证诸矶谷廉介的“嘱托”罗集谊之被释升官，李朗鸡、招桂章、郭卫民、许廷杰四逆之“解京审讯”，××信而有征”，至于中小汉奸，则只要为肃奸人员所知，无论孽钱多少，一定一榨再榨，直至点滴无存，才赌他们的命运，或死或释，都说不上，为了搪塞，可能杀一两个报销，为了养着肥鹅生金蛋，则留下汉奸狗命的时候会更多一点。例凡汉奸案件，拘押起来，迟迟不予公开审讯者，其中奥秘，即在于此。

至于李招郭许四逆一案，则完全暴露了国民党特务分子和汉奸虎狼合流的合作大秘密。招逆的公×，军统局事前极力反对，招逆也明白供出国民党特务如何与他勾结一起。最近李招郭许四逆终于由何应钦电令行营解京审讯，这就是国民党特务正面向正义人士挑战，悍然甘冒天下的大不韪，要把他们的老拍挡出死起生，因为李招郭许四逆，在沦陷期间，和国民党特务合力诛锄异己（如李逆和国民党特务合谋、刺杀广州市郊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吴勤，及经常配合进攻珠江人民抗日武装部队等），协同榨取人民，走私贩毒

(如国民党反动派和各逆公开合股在沙坪、市桥、广州等地开设商行，销售重庆运到广东来的烟土等)，早已结成利害与共的团体，现在巨奸在人民一致要求下被捕了，国民党特务当然挺身而出，或则以“地下英雄”作开脱藉口，再不行，就“解京审讯”，远离广东，避开人民耳目，徐图释放之计。

我们知道，广东负肃奸专责者，都是国民党的“军统”人物，他们在光复初期“择×而啞”，敲诈勒索，早就×囊丰满而放过了不少大小群奸。在今天，虽在人民监督注视之下，仍然违法乱纪，强横包庇，不稍顾忌。因为他们知道在特务统治一切的情况下，他们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见这次行营最后也不能不对他们让步吗？

但是虽然如此，民意民力，到底是不可轻侮的，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进行蛇鼠行径的勾当，总有不容易与不便当的地方，因此为了限制人民公开告发，肃奸会的手续就定得特别麻烦，使人民不敢轻于检举；为了避免当着人民面前来公审，暴露国民党特务和汉奸勾结的事实，就把汉奸诬称为军事犯，一定要秘密审讯，看穿了这一点，要想肃奸工作做得好，永除后患，广东人民就必须坚决反对李招郭许四逆“解京审讯”，并且大胆起来揭发打击国民党特务庇纵巨奸的阴谋，用人民的力量来惩罚法西斯的卖国罪犯。

(原载《正报》第68期，1946年4月15日)

方方致任弼时转张鼎丞电

——调二罗、王回闽粤

(1946年4月20日)

任弼时转张鼎丞：

即派罗天、罗平、王维及在延后来调去干部，回闽粤边工作。

方 方

卯巧

梁广致中央组织部转重庆

周恩来董必武电

——七大代表四人抵港

(1946年4月24日)

中组部转重庆周董同志：

七大代表钟明、何潮、唐×及潮梅之王维同志共四人，已安抵港，要回广东工作的干部请速送港。速请转知华中局及张鼎丞同志，何溶、邱振辉已抵港，苏惠(方方妻)闻已抵广州，何、邱二同志的任务如何，请复。

梁 广

卯敬

梁广尹林平关于 琼崖独立纵队情况报告

(1946年4—5月)

中央并转渝周：

琼崖独立纵队副司令庄田同志已抵港，据他报告情况如下：

甲、我军现况：

一、编制：司令部下辖五个支队(同团编制)，另直属警卫大队、军医院、军械厂等；每支队辖三大队及一警卫中队；每大队辖三中队及一手枪队；每中队九班；每班九人至十四人。全军人数：小队级以上干部为一千〇二十人，战斗员八千四百五十人，杂务人员四千六百二十人，共计一万四千〇九十人。

二、火器配备：轻重机枪五十八挺，各种炮十一门，手枪、冲锋机、自动步枪及各种手枪一千四百四十支，各式步枪四千七百六十三支。

三、军事作战方针：是分散出击，集中作战，方式采取游击战、麻雀战。

四、政权：有十一个县，二十七区，一千九百二十七乡(村)(注：部队分布地区同前寅艳电报告)。

五、党的组织方针，是彻底精简，加强下级领导，建立东南西三区临委，组织武工队，发展城市工作，布置两面斗争。

六、干部偏向，自双十协议到停战命令，这一时期由于国方一手签协定，一手发内战命令，部分干部认为和平绝望，长期内战不可避免，遂提出“以战争消灭战争”的口号与顽作战，但停战命令

后，又产生过分乐观，坐待和平的偏向，遂有逃避艰苦斗争，怕死苟安的现象，下级干部及队员，看见顽军强大，对作战失去信心，另有一部分则误解复员为部队不要他了，因而灰心。

乙、顽军情况：

与前寅艳报告相同，唯顽我战斗情况兹再补充如下：

一、顽军企图消灭我军的三个步骤：第一，初期因四六军主力未到，藉口受降，声明并无剿共任务，表面进行受降，上层与我勾搭，实际上占据市、镇，控制交通要道，形成对我的包围封锁。第二，主力师一七五师已到琼，即开始对我防区进攻，企图把我由平原压入山地，突然集力消灭，但遭我不断出击，其计划不能实现，乃于丑佳集中四团以上兵力，五路围攻白沙，但我已先分散出去，顽于扑空后，又以两团兵力，一千人的机动部队，追击我司令部，在澄迈一二区展开大扫荡，结果仍无收获（唯民主政权造成相当破坏），自丑梗以后，战斗渐缓和了。第三，前进指挥所指挥官邓龙光，亲自赴琼，于卯月则在海口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据悉，剿共计划如下：（1）以集中对集中（找我主力消灭），以分散对分散（加强地方武装出动，袭我小部队及工作人员）。（2）政治上不承认独立队是中共部队，称之为匪，欺骗群众说，来剿琼崖纵队，是得到毛泽东许可的。（3）彻底清剿，号召我乡级以下人员自新，对乡以上的干部一律杀，规定由排长以上长官执行，以保秘密及确实。（4）积极摧毁我政权，强制编保甲。

二、日寇投降时，全琼大部地区都为我军收复，大市镇为我包围，后来又为顽军进攻，几乎全部被其迫退夺去，我先后牺牲四十余人，伤一百二十余人，被俘十余人，女同志被奸致死者二人。

梁 广
卯艳（4月29日）

周董：

我看了琼崖独立纵队副司令员庄田同志(现在港)报告后，所得情况如下：

一、他们全体人数一万四千，连、排级以上干部约一千一百人，战士八千四百余人，余者为非战斗员，轻重机枪五十八挺，短枪一千六百余，步枪四千七百余支，炮十一门，经济无法维持。

二、敌投降后，顽未及赶到，除一些大据点是敌驻外，绝大部分为我军进驻，但现被迫全部乡、镇退出，总共损失百余人。这是三月前情形，而干部思想多麻木乐观，可能发展悲观。

三、顽军在该岛，除地方团队外，就是四十六军，共三个师，即十九、一七五和一八八师及教道团，共十个团。

四、据目前情况来看，要赶快解决为妥，琼在人数上应提三千五百以上，连家属。

林平

辰俭(5月28日)

广东区党委致中央并重庆周恩来电

——国民党派出三特务小组

(1946年5月3日)

中央并渝周：

1. 国民党派出特务三小组，于卯佳出发粤北、东江北岸及南岸三地，预备在执行小组出发之前，到达各该地方，担负下列任务：①调查我军北上之干部姓名、籍贯、职务。②调查复员疏散之人员姓名、籍贯、职务及复员后之工作和生活地点，俟我军开走

后，进行打击，以至逮捕，防止我方人员潜伏乡村，掌握乡村政权。③限制民众，不许与我军接近，特别是开欢送会送礼物等行为，绝对禁止。④停止我军召开群众大会、贴标语及向群众宣传的一切行动。⑤监视我军结集之移动路线，如有逾越即行干涉。

2. 本月十一日广州行营发出通令，着各地顽军，在执行小组出发工作之前，尽速采取坚决行动，最后消灭我军。

3. 何应钦卯删电令广州行营谓：“广东清剿准备限至五月底截止”，故即在执行小组出发进行调处期间，仍可能采取突袭等手段，进攻我军，要把我军加以最后之消灭。

粤 委

广东区党委致各地紧急指示

(1946年5月6日)

请转李碧山、林美南及各部队首长：

紧急指示：

1. 近来东北内战扩大，华北、华中战事复起，全国内战形势紧急，东江协议后，国民党停战命令迄今未下，且纷纷调动军事向我进攻(据息最近又调五个保安团来东江)，企图在协议烟幕下，从政治上麻木我们，以达其包围消灭我队之目的，足证国方毫无诚意，且系一种恶毒阴谋。

2. 协议以来，由于个别部队干部，对国民党幻想，和平观念，甚至动摇信心，不作自卫斗争准备，或集中过早，致遭受若干损失，但能分散坚持自卫斗争的地区，便能粉碎反动派进攻，保存力量，收获战果。

3. 因此，各地部队首长必须对目前时局严重危机作新的估

计，在政治上提高警觉，不应对蒋及国民党存有幻想，不应重视纸上协议，坚持分散的自卫斗争，坚决主动打击反动派，粉碎其一切阴谋，才能保存力量，才能在局势转好时实现协议，只有积极斗争，各地互相配合战胜反动派，才能转变时局，在全国范围内，我们是有力量取得胜利的，你们要提高信心。

4. 各地拟疏散来港之一切人员，仍留下坚持，暂缓来港。

5. 林、曾在广州，对外消息隔绝，不明实情。

此紧急指示由区党委发出交你们执行。

粤 委

辰鱼(5月6日)

方方致李碧山林美南电

——目前斗争的方法

(1946年5月10日)

碧山、林美南：

目前斗争方法的研究请参考讨论。

一、反清乡的斗争，是一种群众性的斗争。部队必要时的行动，是配合而已。

二、在敌人的优势兵力进攻下，必须利用地方士绅乡长，以两面派的手段去求情，甚至小一点打，以缓和敌人的烧抢屠杀，即是我们军事上能打退敌人的进攻，也不可随便使用，因我迟早会离开，群众怕受残杀，便不敢接近我们，甚至恨我。

三、敌人派来捣鬼的暗探，如不能争取，必须以群众力量，消灭其活动，可以抓他的为非作恶的弱点，如：强奸妇女，贪污公

款，霸占土地等等，以封建性、群众性方法或土匪绑票方法杀灭之，绝对避免暴露政治面目，以免群众受摧残，这些方法可向群众学习他们丰富经验。

四、队伍大部采取荫〔隐〕蔽整训，小部挺到据点外筹款，以最好干部领导之，并以一小部与群众有关系的埋在群众中作领导群众斗争骨干。

五、对于远而又力量小的地方政权，或实力派，甚至恶霸，只要有利于我，可用各种方法，去和他谈判，及交朋友，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只要他站在保存自己，而能叫我缓和敌人进攻，并代买弹药粮食，采购上不瞒下手段，即可合作，但必须预防其叛变暗算我。

六、交通站可调灰色干部开茶店饭店，打探消息，山地据点周围也可用灰色干部开小店筹办给养，但不可给下面知道，以防被捕时泄漏破坏。

七、新发展地区可先派人去，和肩挑算命卜卦结交朋友，调查反动分子，再以不负责手段消灭之，过一时期没有事变，队伍即转移去荫〔隐〕蔽休息。

八、抽收商家货物保护费，可利用挑脚或社会力量带去接洽，一经给保护费后，即应保护（阅后记住要点焚毁之，如区级由口头交谈）。

方 方

辰灰(5月10日)

梁广致康生电

——希派负责情工干部

(1946年5月13日)

康生：(绝密)

我在广州军政机关有若干情报关系，可取得材料，现由市委暂时联系，无专人负责，作用不大，且牵连不清。希能派专人来负责，以求统一之功。

梁广

辰元

杜致中机电

——粤机应缩小范围

(1946年5月20日)

中机：

一、奉林平渝，今后区党委只许一台，粤机应缩小范围，与各地机组切断关系，保持纯粹秘密系统，着我立即清理交代手续，完毕离开。

二、我已于今日将全部工作职务及所有密本、乱[密]码、密书等移交刘玄同志负责，并留下尹文同志协助，以后一切业务事宜请直接电刘。

三、刘于一九四二年入党，在东纵任中队指导员，一九四〇年在机要科第一届训练毕业，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粤北支队北上，十月任粤北区机小组长，现为二等译电员，已由粤北返港接任，为人忠实朴直，有耐心，工作表现负责、谨慎、能力强，可以胜任。尹系女性中学生，一九四五年四月入队，参加第二届机要训练班毕业，在粤北工作，十一月调回东江区机要组，今年三月入党，为人沉静寡言，细心谨慎，工作积极，有条理，对党忠实服从，极堪培植重用。

四、除尹留粤机及另调二人给林带走(外)，其余遵示一律北上。

杜

辰号

尹林平致周恩来董必武电

——请答复几项疑问

(1946年5月26日)

周董：

贺电示经与连、饶商讨，其中仍有下列数项不明：

一、我不跟部队北撤，留港粤工委会工作，是否工委会完全公开？如不公开应用何名义。

二、五个工委，是否全数公开，或几个公开，或只用个人名义公开？原有区党委，是否即行取消？

三、工委会下属各部门，除工委各同志及在未有人兼负之部门、籍名同干事是否亦公开？

四、来示所指朱德联络报，是否要工委办，一公开报纸，抑是译电员弄错以上各点，望即复示，以便再研讨提出意见。

林平

辰宥

林致质忠电

——杨智明调来我处工作

(1946年5月29日)

质忠：

东江杨智明来我处工作，李棣最近亦拟调来，准备派往海外工作，你对该员有何意见，请告。

林
辰艳

方方致周恩来董必武电

——请促美船速至半岛

(1946年6月14日)

周董：

我昨安抵港，明日进大鹏，恐时局大变，望速促美船本月有日(25日)日出前抵达此间，使能安全北撤。估计粤北届时可到，否则可先撤大部分。

方方
已寒

尹林平致中央转南京局电

——港计划设三个电台

(1946年6月16日)

中央转南京局：

一、冬电奉悉，关于工委工作方针及人选等，现正讨论中，决定后另电告。

二、关于联系问题现拟在港设三个电台，一为专管事务、情报及对海外联系，现由连贯负责；一为秘密系统电台，专收发有关组织上秘密电报，现由梁广负责(以上二台已建立)；一为新增设的专管工委半公开事宜，由我负责(我? 电台过多，有碍机密，且梁广对党台管理数月来甚感棘手，拟不另设。仅将梁广台归工委，由我负责是否可以，抑或分开为宜，均请示复，以便调整人员开始工作)，盼速复。因人员北上在即，时间迫切。

林平

已铤

梁广致中机转碧山曼平电

——请碧山来港

(1946年6月20日)

中机转碧山曼平二同志：

请即来港，并准备干部组织情况报告，何进在港等候你们不再

回去，一切工作暂时交代人负责，碧山可与妻先来，但她的工作要交梁斌(机要员)负责，你们到港后先住旅店，再到湾仔皇后大道东二十五号地下天保堂药店留信转陈光华收。请将上述情形通知曼平。

梁广

已号

尹林平复中机已铣电

(1946年6月22日)

林平养复中机已铣电：

所问之报系在港，除现有林清台（连贯管）及区党委台（梁广管）之外，拟增设一工委台（我管），但因人员与电台过多，有碍机密，不易管理，且经济困难，故拟将区党委台拨归工委使用，是否可以？盼速复。①

①关于增设港台事，周恩来在给方方尹林平速电中指出：①香港台不宜过多。②区党委台归梁广或方方。③区党委与林平划清关系，林平只管工委电台。④新闻台由连贯负责（现在梁广与连贯——林清台均秘密的）。

尹林平致中央转南京局电

——关于港工委意见

(1946年6月23日)

中央转南京局：

已冬^①电悉，兹将讨论意见报告请示。

甲、广东为国顽绝不放松之地，并有英美矛盾，故斗争上有相当复杂性，在革命力量对比上又是敌强我弱，由于八年秘密武装斗争，今天许多据点与地区及较多的干部均已暴露，几乎全部都撤退，以前在工作布置与执行时未能抓紧时机和转变，以致造成弱点，其他民主势力已无实力，停留在国民党高压下情绪不高。目前国民党在进行清剿乡村，特务则破坏城市民主力量与运动，故东纵北撤后广东时局必有相当严重的黑暗时期，并非短时期内可能好转。

乙、因此总的方针应是长期打算的。目前任务是迅速从乡村转入城市，深入各阶层及国民党各部门中，站稳脚跟多交朋友，且不求事功，而是埋头苦干保存力量待机发展，至于乡村中的组织方针，则为保持与巩固现有阵地，改变组织方式，领机须能实际联系，党员用不过于密切的单线的方式联系，不发文件，以新干部代替已暴露的旧干部，对于群众性的自发斗争及各级武装斗争决不公开领导，致暴露力量应从中推动提出正确口号，而由第三者出面。

^①南京局6月2日在对港粤工作指示中指出：“为开展港粤统战文化与上层侨运工作，我们认为香港应成立工作委员会，以林平、连贯、廖沫沙、左洪涛、蒲特五人组成之，林平兼书记，工委工作应与区党委工作完全分开。”区党委书记仍由林平兼。

丙、党员应从事生产商业发展经济，一切工作人员职业化，个别党员的任务为：

(1) 在各方面站稳脚跟，建立社会关系多交朋友提高自己社会地位。

(2) 调查研究周围情况，学习社会知识经验。

(3) 改善与提高家庭经济生活。

(4) 时机成熟时发展据点。

至于已复员之队员或党员除上述任务外在两三年内应完全停止活动。

丁、琼崖问题目前想由谈判解决是没有希望的，故方针应为依靠自己坚持武装斗争打开谈判局面，其工作任务为：

(1) 将现有的部队精简分散在可靠的据点活动保存力量。

(2) 人员须有保障的复员、疏散或转移到别处，并输送大批干部到南洋工作。

(3) 布置将来撤退后的工作，严格分开撤退与地下两种干部与部队。

(4) 组织方针依乙项布置唯须即将已暴露的与秘密的党员组织严格分开。

戊、工委主要工作为：

(1) 团结一切民主力量推动广东和平民主运动配合全国。

(2) 开展广东以至海外及国际的民主文化宣教工作。

(3) 开展侨运。

(4) 发展经济与工商业。

(5) 推动海工以进行救济事业。

己、工委同意由电示五人负责其分工：

(1) 党派组由左洪涛（负总责）、谭夏声、李嘉仁负责。

(2) 文化宣教工作委员会由饶蒲特（饶蒲特负总责，兼任宣教其国际宣传仍以东纵办事处为基础）、廖沫沙（专负报纸）、章泯（专负歌剧电影艺术）、司马文森（专负文艺）、黄文侠（专负杂

志刊物)组成之。

(3)侨运委员会暂由连贯(负总责)、侨伍(专管秘密系统)、谢创(曾经侨美由美赴苏留学,现任中区特委书记调出专管华侨公开关系)组成之。

(4)妇女组苏蕙(青年职工暂缺)。

(5)经济组由李霖、黄国明、何启明负责。

(6)情报组连贯兼。

(7)组织组由林平兼,设组织干事王鲁文(原为区党委组织干事)。

(8)秘书陈嘉(即原来机要科长杜襟南)。

另为处理南路琼崖转入越南干部与武装特派周楠与越共联系专管此事。

庚、区党委秘密系统由梁广(任副书记)、黄松坚、林美南三人负责,如梁北上则由松坚(任副书记)、美南、张贤德三人负责。

辛、现我托词养病不北上,如引起国方藉口是否由你们宣布公开名义,我在留待琼崖问题解决,究应以何种方式托词为妙?请示。

林平

已梗

方方曾生致中央电

——我北撤部队备好待登船

(1946年6月24日)

中央:

东纵已冲破了顽军的军事跟追、经济限制、造谣诬蔑,安全的

集中三千一百七十四人于大鹏半岛，即各方认为必须延期到达，要通过顽军许多封锁线的粤北支队也已经行军提早到达，现在已准〔备〕好一切登船手续（如打防疫针、粮食），只要美船俭日（28日）一到，即可依协议北撤烟台，二千八百人主要为干部，其余则进行复员工作。此次北撤（斗）争经过及其经验教训另由方方作成报告续呈，在未登船前我们将干部及家属安置于九龙边界，一有情况即登九龙，而战斗部队严加作战准备，以防顽军背约进攻，得以突围。

方方 曾生

已敬

梁广致中央刘少奇电

——请中央抽调干部

（1946年6月24日）

中央刘少奇同志：

广东党因部队活动影响干部几乎全部暴露，现除北撤或往南洋各地外，留下工作的多已暴露，且现甚少，今后除培养补充外，因无法大批培养，恳请中央抽调下列广东干部送回补充（根据吴有恒、何濬两同志介绍）郑为之，遂溪人，曾任山东旅政治部副主任，师除奸部长；韩文潮，遂溪人，中组部干事，边区吴堡县县委副宣传部长；罗响（方华），和平人；李托夫，梅县人，延安华侨联合会主席，在海外工作委员会工作数年；何英，澄迈人，在延任海委委员，海训班主任；肖林，防城人，在延任海委委员；温士奇（如），梅县人，任总政宣传干事，印工合作社主任；欧多楚，合浦人，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员；蓬荆，东莞人，曾在华中任县委委员，团政

治处主任；邓启，台山人，曾在延任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组员；冯向立，中山人，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柯华，潮州人，西北局宣传部秘书；黄植，龙川人，绥德地委秘书长，统战部长。

梁 广

已敬

梁广致中央并刘少奇电

——请准我回延

(1946年6月24日)

中央并少奇同志：

方方与区党委因我在粤八、九年，早已暴露，故要我回延学习，由黄松坚同志补上，已由方方向中央请示，我请求能批准并示复。

(请于今晚即复，因东纵俭日乘船北撤——译)

梁 广

已敬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宁周恩来电

——东纵人员已于已陷北撤

(1946年7月2日)

中央并转宁周：

东纵人员已于已陷上午八时乘美舰三艘北撤。方方同志于一日返港，请即告烟台方面候接问好。

林 平

午冬

梁广致中机并转碧山电

——碧山台可能已暴露

(1946年7月2日)

中机并转碧山：

(一) 据方方同志指示：碧山台之密码可能已暴露，现决定：碧山台立即停止使用，此台改为新闻台，今后只得作收新华社电讯之用。

(二) 越请碧山同志速来港。

梁 广

午冬

方方致中央转叶剑英周恩来电

——方工作报告

(1946年7月3日)

中央转剑英及周、董、廖：

一、东纵于已艳晚安全登船，陪晨开船，因对美方拉得好，故溢额二百名人以上也北撤。

二、方方回港后，即藉口周叶已准假三月，代表由陈华代理，脱身留港工作。

三、现港仍存有重伤兵约四十人，复员需津贴及家属有百余人，各地执行梁广指示留下干部不少，照顾现扫荡形势应一二百人撤港，现粤文化人民盟分子都被迫逃港，张发奎亲至北江、东江、潮、梅布置绥靖。这一复员抢救工作刻不容缓，为我当前与林、梁之主要工作，同时海南、南路等地武装之撤退及复员为加紧进行，决派周楠赴越联络。

四、在广州行营共借来现款一亿五千万，米粮副食共约合六千万，详数由陈华与之结算后电北平拨还他，惟望再拨汇五千万来港。给我与林解决撤干及复员问题。

五、我在港目前工作暂为：

1. 整理谈判材料总结经教。
2. 协助林撤干善后安插。
3. 了解情况，调查闽粤边及南洋组织机构及配备干部。
4. 在不碍秘密条件下助林梁采用小型方式训练干部，暂时不公开。

六、中央南局对我工作有关指示及政治主张望注意由林梁告我

以免脱节，我电台暂保存。

方方
午江

尹林平致中央并南京局电

——东纵已北上

(1946年7月3日)

中央并宁局：

东纵曾王杨林翎云等人员，已于艳晨乘舰起程，特告。

林平
午江

曾生致中央电

——东纵安抵烟台

(1946年7月5日)

中央：

我们全体同志于午微晨安抵烟台，并受潭副司令及烟台数万市民热烈欢迎。

曾生
午微

方方致周恩来电

—海南问题如何解决

(1946年7月6日)

周董廖并转叶：

(一)海南问题一贯保留发言权，小组已陷电平尚说请示三八会议，对海南问题如何解决，除海南外，广东的停止武斗，我是说我主观上不领导武斗，亦保留了群众自发武斗，非我们所能限制并发言权。

(二)关于南方组织调整干部配备下逐日与梁广、美南、碧山、何濬等谈话，了解情况后再林平协商，取得一致后，再具体将意见告你批准。

方方

午鱼

杜致中机李科长电

—粤机改组经过

(1946年7月7日)

中机李科长：

一、粤机改组经过简报如下：一月删日区党委会机在内战中被迫撤离解放区，杜随林平到港即留港机至三月间粤机正式迁港，将

原属城市部之港机合并撤消，林平赴渝由梁广负责管理，五月号日杜准备北上，职务移交刘玄（由粤北机要组长调任前已电告），范围只限区党委会机不领导各地。

二、派出各地机要组情况：南路中区根本无建立电台译员，已于今年一月调回韩江区李棣随林美南来港，梁斌调碧山处，粤北区陈英负责已随南下，东江区杨智明调给林青处，由李汗负责，现各组均已集中撤消。

杜
午虞

方方尹林平复周恩来电

——关于梁广工作问题

（1946年7月13日）

方方林平午元复周廖：

1. 我们将剧五队及港在港之剧团，已经改组调整出发，南洋已就绪，惟尚缺款及入口手续，办妥即可启程。

2. 梁广将来仍以北上，现暂留港负责城市工作。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山东曾生电

——给曾生、杨康华等提供意见

(1946年7月13日)

中央并转山东曾、杨、林、王、罗、刘诸同志：

欣悉你们安抵烟台，无限快慰，衷心盼望你们领导全体干部同志进行学习总结数年斗争经验，提高到理论，作为充实自己从事革命的武器，我们亦以坚持南方工作与你们配合提供几点意见为你们参考：（一）以你们六人为主并其他干部数人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以协助中央审查我北上之干部，因其中成份复杂，包括党员与非党员及脱党叛徒等必须分别慎重秘密进行之，并依各人不同的能力适当决定学习发展方向，分配岗位。（二）检讨广东党斗争过程中（着重临委至区党委这一时期并联系到以前时期）在掌握政策方面，领导方法方面，干部思想方面的成就与缺点，总结经验教训（特别希望能将我个人在这几方面的检讨）。（三）此次北撤过程中（从四月开始准备撤退到达烟台止）各种布置与不良偏向现象等等做总结检讨。最后希望你们多提些意见给我们，俾南方工作得以做得更好。

林 平

午元

方方致周恩来电

——王邛可返京

(1946年7月20日)

周廖：

小组如回邱松、王永华可返京，但美方又派一中校来代替米勒工作，似有谈的局面。

方

午灰

方方致周恩来并转叶剑英电

——广州行营强迫我复员武装人员集训

(1946年7月20日)

周廖并转叶陈：

广州行营除在各地绥靖外，并强迫我复员武装人员集训，用意可能为号召自首，鼓吹反共破坏组织，我决定用区党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其集中营阴谋是破坏八小组对复员安全保证之协议，应负其不良后果之责，并由我致备忘录，向张发奎抗议，同时转电平请求制止这一行动。

方方

智

尹林平复京周恩来电

——关于停止活动问题

(1946年7月21日)

复京周、董、廖：

我们所决定之两三年内应完全停止活动是指复员队员及党员，并不整个党的工作。

林 平

马

曾生致中机转尹林平电

——将数年战绩告我

(1946年8月1日)

中机转粤机林平：

1. 电悉指示，即行日间报告，并希经常电示一切。

2. 我等来时许多材料未带来，希将数年来战绩告我，材料可在蒲兄处或《前进报》找到（《正报》社全套《前进报》）。

曾、杨、罗

未东

方方致叶剑英电

——请示任务

(1946年8月1日)

叶剑英：

八小组除王、邱调南京工作外尚存三人没有工作，不安心，坚持海南问题既不能解决，如无特别任务即撤回，否则请告我以留下作用以便安定他们。

方 方

未东

方方尹林平致刘少奇并转周恩来电

——海南问题目前已不能谈判

(1946年8月11日)

刘少奇并转周董廖：

海南问题目前已不能谈判，即谈判对我撤退也很危险，我与琼特在港代表庄林罗谈话以后，认为要长期坚持必须在有利条件下给顽军作几次痛击，然后争取时机，按实际情况将队伍缩编成短小精干武工队，每队约四、五十人，共约十队分散各县作保卫群众利益反特务斗争，而将长枪重武器埋藏，人员复员，并自动撤退多余干部约

五百人。中央及南京局如果同意三原则，请即复示，以便派人前往布置。至复员费、撤退费以及撤退到南洋的方法，望中央能斟酌助款项（他们要求五亿万）及指示，使在目前顽军撤退一部中迅速布置。庄田同志待船到沪转宁向南京报告，我先拨二千？万元送琼济急。

方方 林平
（港机未真转）

灾难重重的一年

——胜利后的广东

（1946年8月）

孟琛

八年艰苦抗战一旦胜利，给予广东人民带来了刹那的振奋、鼓舞欢欣，也带来了失望、痛苦与灾难。自胜利以迄今天，一年了。一年来广东人民朝夕翘企的和平建设依然缥缈无踪，但笼罩在三千万人民头上的饥饿死亡的威胁与特务统治的恐怖乌云却不断扩展。

试回顾一年来的大事罢。

最先与胜利俱来的，是劫掠与敲诈。

戴笠率领下的特务武装——别动军，由于他们有了和敌伪勾结的有利条件，最先开入广州和其他重要城市，他们与卖国汉奸李逆辅群郭逆卫民联成一气，公开施行掠劫。等待接收的公物，和敌人财富，以至市民的财物家具莫不成为他们的劫掠对象，使人民受了严重的损失。而当时民众为胜利所陶醉，还充满希望的想：只要中

央人员到来情况就会好起来的。

然而中央接收大员们来了，“繡衣直指”，象一群蝗虫似的飞来了。同时接收的争夺战也开始了。接收的与接收的打，接收的与被接收的打，已接收的与再接收的打。于是，多少被接收者，私的被视为公的而接收了过去；多少接收者，公的当作私的而接收了过来。而总的结果是：不论公的私的，都变做黄金或美钞，躺在接收人员的腰包里。

“接收”，不等于收档，“肃奸”又开台了。真正为虎作伥的汉奸，只要出钱投靠在有利的派系包庇保护之下，以“地下英雄”做幌子，便可以抵挡一切舆论的检举和人民正义的抨击，李逆辅群、招逆桂章，许逆廷杰等巨奸，至今未曾判罪，他们至今还口口声声说如何和军统联络，如何对得住蒋介石“老人家”，连行营军法处的法官也认为“言之成理”、“情有可原”的了。相反的，许多收复区里的有钱人，却不能不大量使“黑钱”以免灾祸的突降。肃奸工作就成为肃奸人员与特务敲诈的门径。

“官发胜利财，民遭胜利灾”。在合法的和非合法的劫掠、敲诈底下，人民的血汗枯干了，人民的眼睛也亮了，人民已开始明瞭。国民党反动派（所谓中央）不能寄托以任何希望！“抗战八年容易过，胜利半月真难捱”，这就是广东人民在绝望中的悲怆的低泣和微弱的呼喊。

正当城市里的劫掠闹到天昏地黑的时候，广大农村却浴在内战的血海里。

举世周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敌人南侵，国民党军队弃甲曳兵而走的时候，他们武装来保卫自己的家乡，从敌人手中解放了大块土地，建立了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和琼崖纵队三支人民的子弟兵（珠江纵队后来挺进粤北与东江纵队的粤北支队合并，琼崖纵队的前身是十年内战时期的红军游击队）。建立了属于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这些人民的军队有功于国家民族，他们配合盟帮反对共同敌人，获得了世界声誉。可是，他们所得国民政府的

酬报，竟是屠杀与进攻！因此他们在打败敌人之后，还不得不坚持自卫的武装！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其规模之大和用谋之狠，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久经锻炼的解放区人民及其军队决不会被吓怕！当全国停战令下之后，广东人民殷切期望和平。可是执行部第八小组到广东调处的时候，广东行营当局竟以“广东并无中共军队”，只有一些土匪为辞，坚拒调处工作，并发动更为残酷的内战。由于中共军队的坚决自卫，粉碎了他们的“围歼”计划；由于广东正义人士的呼吁，终于在重庆决定了东江纵队北撤的原则，三人小组代表了广州，使广东行营当局再不能掩饰他所谓“打土匪”的醜事了，他们被迫成立了“中共武装人员”北撤协议。这协议并不包括琼崖部分，也不能获致广东全面和平；何况协议成立之后，又由于广州行营当局不肯具体的作安全保证而拖延实施，内战还在打下去！

中共为了顾全全国和平大局，为了使广东人民稍获喘息，能让步的都让了，能容忍的都忍了，终于实现了东江纵队的北撤。而当东江纵队北撤之后，广东当局立即布置“绥靖”工作，把重心放在原日解放区，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的“绥靖”主要的是对原日解放区的复员人员和民主分子。这个怀疑终于从广东行营发表所谓奉令举办中共复员人员“集训”，公开设立集中营一事，找到了证明。另一方面，他们又以清剿土匪为名，企图抹煞琼崖纵队的存在，在琼崖加紧内战。

过去的一年，广东没有和平，今后也还得不到和平。因现在为清剿人民的绥靖工作正在全省范围里开展，而琼崖的内战炮火从未停止过。由于内战的摧残，由于军粮急如星火，加上天灾，便造成了广东的严重饥馑，饥民遍野，饿殍载途。最严重时期，广州街头路毙达百人以上，这个时候，赈济工作如果做得好一点，当事者还有一点天良，也许惨况稍为减低。可是贪污成风，自上而下，而只顾打内战的好战分子，甚至连逼侨赈米也用诸军粮，随军运到东北去了！贪污、重税、走私、美货倾销又弄成一个工商业凋零破产的可悲景象！

在城市中，和平民主运动，民主文化运动，也曾有过蓬勃的向

前发展的时候。今年岁首，反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热潮，就急速上升，爆发了“一·三〇”学生青年的反内战运动，他们在广东的内战与反动的窒息气氛中高举起和平民主的旗帜，使魔鬼惶惶，狐鼠却步，为华南民主运动放射出辉煌的异彩。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当国民党二中全会开过了，反动逆流再度掀起来的时候，民主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广东的民主运动显现了它不得不是一个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

五月四日，有所谓“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巡行”，这是特务分子导演双包案摧残学生运动得意手法，其最大“成功”是不仅打击了学联，而且捣毁了“华商”《正报》分馆和其它书店。六月五日，搜掠了全市书刊，并压迫三十余杂志停刊，密谋迫害文化界进步人士。反动一步紧于一步，延到六月底广州十三家文化机关被钉封了。“华商”分馆等商人的出版印刷企业通通被“一网打尽”。文化界进步人士也遭受进一步的威胁与迫害。

在广州以及其他大城市，成了特务横行的世界。特务可以任意抢掠与捕人，市民身体的自由与安全毫无保障。而一切所谓民众警察化，联保连坐办法，莫不是与民为敌的。

一年来广东人民呻吟在内战、饥饿与特务统治的恐怖下，而且此种恐怖到今天仍有加无已，这就是广东目前局势的主要点。

一年过去了，但胜利带给广东人民的灾难却不曾过去。八年抗战中牺牲了的军民的孤儿寡妇在啼泣，在内战中毁伤于炮火的村庄居民在啼泣，辗转在饥饿线上的人们在啼泣；而在这淤积的血泪上头，有着内战与征剿的刀光剑影，有着发胜利财者的豪饮狂嫖，有着特务权贵的欢乐歌舞！

胜利的一年，是灾难的一年，也是无耻的一年。然而，宇宙间决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历史的行进，也没有力量可以阻止人民终将取得胜利，在斗争中受过考验的广东人民将愈奋勇而向前，虽百折而不倦！

（原载《正报》旬刊新三号，1946年8月11日）

劫后的广州文化现状

(1946年8月)

梁 鼎

经过特务魔爪接二连三摧残过的广州文化界，“六·二九”暴行发生后，象飓风刮过的花园，满目荒凉冷落，再找不到民主的鲜花和自由的绿叶，没有了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广州变成瘠哑无声了。

书店摆残书，报摊卖淫报

劫后子遗，较象个样的书店，全市总共不过九家，可是商营或半商营的还不够半数。这些被威胁和恐吓贴近着身边的书店只靠了旧书、课本，广州官版和少数沪版的书本，点缀着可怜的门面。过去那种兴旺热闹的营业状况，徒然成为老板们不胜感叹的旧梦，如果不是各地升学来穗的学生偶一到来逡巡一下，真个是冷静得“门堪罗雀”了。

民主报刊拥有广大读者曾使报摊报贩很易赚钱，记得“五·四”暴行演出后，牛字旁家伙到处殴打贩卖民主书刊的报贩。一天，一个中年的报贩刚被打穿了头，但裹伤布巾血渍未干，他又待在《华商报》、《正报》分社的门口，等候批发新到的报刊了。现在呢？民主报刊被严密封锁不准入口，于是他们只好搜集些报名下印有“省党部特准入口字样”、彩色斑斓的海淫小报，供给小市民们带上茶楼和厕所去消遣消遣。然而他们的生意，却比书店还好。

豺狼满道途，报刊清一色

国民党广州当局一举封闭了四十多家民主报刊杂志，现在是清

一色的天下了。报纸有“大光”、“越华”等十七种，刊物也不算少，总共十九种；有了“文坛”，也可以“纵横”、严明的“权威刊物”也真个变成唯一的“权威”了。在这三十六种报刊当中，受特别津贴的占十一家，其余的也必须接受党部介绍来的“人材”。党部以此作标准，把它们归纳为两类：“党同志所办的”和“党指导的”。法西斯文化“建立”起来了，那就是反共的叫嚣加上色情的诱惑。

反动派对付民主文化，曾采用文武班双管齐下的办法。武班特务演出了几出“捣抢”、打、封的“名剧”后，文班特务也领了大笔津贴一口气出版了十三种反共方型小报，据说这是“以量胜质”的“妙计”。可是最近狗窝里打起架来，上月二十五日这些方型小报统统给国民党当局自己命令停了刊。直接的原因，传是“原子能”的总编辑因敲诈本港附敌报老板不遂，搅起CC和军统的内哄。而另外更主要原因则是他们当初原想以揭发一点官场黑幕来蒙骗读者，结果自己内部缠夹不清，被认为“害多利少”，所以这次索性把它们一律停刊，以便经过调整，在统一指挥下作更无耻更恶毒的反共反人民宣传，所以现在他们又积极准备复刊了。

（原载《正报》旬刊新三号，1946年8月11日）

尹林平致周恩来电

——庄田为琼问题将赴宁

（1946年8月11日）

宁周董廖：

1. 前请示连贯赴宁一次，报告工委工作，并请示一切。博古

的弟弟的工作妥否，望即复。

2. 琼崖三纵队副司令庄田同志在港月余，而琼岛问题又不能
在短时期解决，我同方方同志意见决在十天内送宁。

林 平

未真

方方致周恩来电

——三亿五千万元的分配情形

(1946年8月17日)

周董廖：

八小组共收现款三亿五千万元，交东纵一亿六千万元。东纵服
装、西药、面巾、鞋，各支组及联络小组工作费，共约一千五百万
元，一千五百万交林平，采办船上副食及复员七千万元，琼崖二千
万元准备撤退，闽粤赣干部一千万元，共付二亿七千五百万元，尚
存七千五百万元。此外《华商报》借款叶福龙赎屋及一些救济费、
旅费、房租伙食尚未结算，详情后告。

方方（篠港巧转）

①方方、尹林平9月29日就东纵存港之款事给周恩来复电：

“复周、董、廖：

东纵北撤费共收三亿五千万元，共付出二亿七千五百万元，其
中包括北撤复员服装救济及海南二千万元，闽粤一千万元，尚余七
千五百万元，前已概告今再补报。”

连贯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广东建集中营

(1946年8月24日)

中央并转宁周董廖：

据悉：国防部密令广东行营对东纵复员人员及左倾分子、民盟人员均逮捕入集中营，并令行营速建几个集中营，现此项工程已在广州郊外动工。

确息：广东预备建立十至十四个保安团，现改为三十个总队，每总队统率数个大队，每大队三个中队以上，并保证每县驻防三大队以上，在原数量上增加二三倍。

连 贯

未敬

尹林平致中央并南京局电

——希供给时局问题

(1946年9月1日)

中央并南京局：

我们每周或两周与此间各党派人士举行时事座谈会，交换对时局意见，希能经常供给我们每周或两周的时局问题提示，以利进

行。又，琼崖纵队副司令庄田已于未感乘船赶赴上海。

林平

申东

方方尹林平致周恩来电

——连贯等已定飞沪转宁

(1946年9月7日)

周、廖：

连贯与杨琳定三日或十一日飞沪转宁，望通知张明及家康。

港方、林

方方尹林平致山东曾生暨

全体指战员贺电

(1946年9月13日)

山东曾生、王、林、罗、杨暨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你们为和平执行党的政策，涉海北撤，安抵烟台，胶东军民万人热烈欢迎你们，这是广东党历史上的伟大事件，捷音传来，广东同胞的痛苦心情现成无限希望，时局险恶，留粤复员同志正在自卫战线上坚决的保卫抗属利益，解决抗属困难，保持我党与人民密切结

合的传统与背信弃义的反动派斗争的传统，同胞时刻惦念你们，日夜盼望你们的消息，我们在《烟台日报》上汇集材料已在《正报》出版专刊，销路空前，群情兴奋。希望你们不要挂念家庭，专心学习，加紧锻炼，俾对党对人民负更大责任，我们也不应丝毫松懈自己的工作与学习，谨祝你们健康。

方、林、连、蒲

申元

曾生转李汉暨十五位战友：

接到来电无限快慰，我们的身虽在南方，我们的心却向北方怀念着你们每一个人，希望能抓紧这难得的大好机会，在新的环境中把在南方学到的一套本领继续深造，坚持党的机要工作奋斗到底，我们也努力前进，和你们配合一致，以期将来有再会握手狂欢之日，并盼在可能范围内给我们通讯，谨祝大家个个都变成英雄。

（金、木、水、火四份乱码收到）

杜襟南暨留下南方的伙计

申元

方方尹林平致周恩来电

——派何俊赴琼工作

（1946年9月19日）

周、董（申皓复）

琼崖这几天有人到港来，我已决定何俊（他是延安回来的）派

回琼崖参加工作。

港方、林

广东省行政会议的必然结果

(1946年10月1日《正报》社论)

广东省府主席罗卓英，在全省行政会议的第三日向大会提示，强调此次会议，须指出民众之痛苦与民众之需要，以求解决与满足。这个提示，多么堂哉皇也，谁敢说国民党的统治者不是“爱民若赤”呢？他们不是把握着“一以民众的利益为依归”的原则吗？

在大会的第六日，罗氏又向大会提示，把治安、粮食和交通三大问题作为当前施政的中心。特别是治安问题，最为详尽，除了检讨过去本省各地绥靖剿匪经过外，并提出了一大堆所谓“积极方法”。

根据罗氏的两次提示，我应当老老实实告诉他：第一，他并没有懂得或不愿意真正懂得民众的痛苦，当然无从解决民众的需要；第二，因此，他就不能提得出为人民利益出发的施政中心，这两者是相互连结的。

不能否认，治安、粮食和交通三项都是当前施政中的重要问题，但如果问题的提出，是根据民众的痛苦与需要为原则，那就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如实施地方自治和肃清贪官污吏的问题。

国民党的上上下下人物，都在拼命宣传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硬说十一月将不理一切反对，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制宪”、“颁宪”。谁都明白，只有在普遍实施地方自治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宪政，地方自治就是“还政于民”最起码的工作。

而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的自由，又是地方自治的先决条件。可是，省行政会议根本不敢接触到这个问题。如果这个会议真正以人民利益为依归，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个会议是为了巩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自然就不必谈这个问题了。

对于广东政治的贪污腐败，连民政厅长李扬敬也十分不满意。他在行政会议第七日，痛论县政腐败的情形，他说：“县政人员的贪污舞弊，为构成县政日趋腐败之主要原因。”“查光复后一年之广东县政，莫不乌烟瘴气，差强人意者，实又凤毛麟角。”“贪污舞弊的事件，触目皆是。”另一方面，控告县长的案件，过去已积压了很多，开会期间，便更显得热闹。试问：不首先肃清贪污，澄清吏治，把治安、粮食和交通问题都交由贪污手上去处理，将会有什么结果呢？其结果，必然是广东人民的极度悲惨！

就罗氏对于三大施政中心的提示来说，也都实质上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请看他对于治安问题的积极方法吧：（一）今后县市局长必须直接负起治安责任，剷除依赖正规军及保安团队的心理。（二）阐发蒋主席训词“用兵不如用民”之意义。（三）强迫好人当保甲长，切实执行民枪登记。（四）设法恢复水陆交通。（五）实行“连剿连保连坐”。在罗氏的提示中，特别强调海南岛的“土匪”问题，非首先肃清这些“土匪”不可。确切点说，所谓“治安”问题，实际上就是“剿共”战争问题，照罗氏的说法，目前，依赖正规军和保安队显然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必须由县市局长，亲自组织与领导地方的反动武装，来协助“剿匪”工作。那些好人，不愿出来“反共”，必须强迫他出来，一切有利于“剿匪”的水陆交通，必须设法于迅速恢复，实行杀无赦的连诛连坐法。所谓三大施政中心，实际上只有这个中心，其他两项是“粮食要增产”以便利征实征购，充实军粮；“交通要改善”还须大举征工，以便内战动员。两者都为了完成“反共”、“内战”的顺利条件。

因此，罗卓英从庐山飞回来亲自主持的全省行政会议，是完全

为了配合全国内战局面，具体布置广东全省的反共工作的会议，经过此会议之后，广东的恐怖统治，将更前进一步；法西斯气焰的高涨，将会达到更高峰的阶段。

末了，我们不能不向罗主席致意：你那必须“指出民众的痛苦与民众的需要”的宝贵提示，请好好地收起来，放进保险箱里，下次会议时再原封不动的取出来应用吧！

（原载《正报》旬刊新八号，1946年10月1日）

方方尹林平致周恩来电

——港台是否需与琼联络

（1946年10月3日）

周、董、廖：

以后琼崖由周、董、廖直接指导较好，如须由我们指导，港台是否需要与琼台直接联络，请示复。

方、林

西江

杨致两广纵队曾雷电

——关于干部问题

发两广纵队曾雷：

1. 回家人选经中央审定，蔡林莫何谭邓吴朱廖邹梁十一人，在军大训练三个月后，启程。

2. 在军大军事队阮高奇连等十二人、参谋队李南等四人、政治队叶锋俊佳子培等二十三人，范群入高级队、作尧任副部长、何城夏虹等及女同志共十五人在校工作。

3. 王宁杨甫宏璋已改入马列学院、继元廖行卢成如旧四人，只往投考，涂夫松鹤入北大，乔青曾适入英文班，莫兴珠明玉珍等十人入党校。

4. 党校一部有唐健徐云等五人、二部有家富纪菲等七人、方定俩巾雄在石门工作、赵学敏玲要求会后由中组部分配学习或工作，赵当返渤一行，传达会议精神。

5. 我腹胸背痛迄未停、工校医院及米大夫断为神经炎、慢性肠炎、身体衰弱、慢性阑尾不能即割，药物无法根治，要从作息饮食着手，短期不能返队，现与蔡林等一同学习，注意休养，罗迈曾两次告我，量力做事，转学城工，请予考虑。

杨

十月三日①

①年份疑是1947年

目前广东工运中的几个问题

——为建设民主的工会而奋斗

(1946年10月)

江子诚

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结束，沦陷了的城市都光复过来。因战争的影响而分散了的工人，又重新从各个不同的农村向城市集中起来了。

目前的职工运动是处于一个新的和平的城市的环境，既不同于战时，也不同于战前。战后一方面固然是民主的人民力量抬头了、壮大了，而且基本上可以说是占了上风；但另一方面也还存在着强大的非民主的反动力量。所以民主与非民主之争，仍在世界各国内广泛地进行，在中国则表现得特别激烈。在广东（包括港澳），由于拥有大量的华侨，由于国际间的来往和接触的密切，同时又和中国国内形势有直接的关系，在环境上也就更复杂和变化曲折，而某些地区又有着一些特殊情况。

由于这样政治的、经济的原因，在广东工运中也必不免的产生了一些问题。对这些加以分析并从而获得正确的方针，相信对于广东工运的发展是会有帮助的。

那么，目前广东（包括港澳）工运中有些甚么问题呢？这就是：一、改善生活问题；二、工会工作问题；三、民主化问题；四、作风问题。

下面，就将这四个问题分别提出来研究研究，聊作引玉之砖，以期引起各方面的深入讨论和指正。

改善生活

第一，改善生活问题。

改善生活问题是今天职工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战后内战的爆发，复员的障碍，物价的增涨，经济劳工政策的错误，因而工人生活比战前不但没有提高，却是相反地减低了。譬如香港，战后生活指数比战前一般是增加十倍，而工人生活待遇的增加最多只及战前的三、四倍，有些只有一、二倍。

工人切身生活的困苦，加上战后工人斗争性与组织性的提高，这便引起了广大工人群众改善生活的经济要求。

这个要求的在目前当然不在于取消工人的剥削，而是减轻对工人的剥削，这是工人群众合理的要求。达到这些要求的正确途径，今天是需要经过合理的调整劳资关系，合理的改善工人生活。其办法应该是双方谈判、民主协商、取得协议、合理解决。但是，由于个别资方或厂方不顾大局，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工人们为了满足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要求，才迫不得已采取了罢工手段，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因此要解决今天起伏的工潮，就要求各方面去认识他们的基本态度：

首先在工人方面合理地改善生活的要求是正当的，并不过分的。工人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工会，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做法这是合法的，应该坚决而慎重，主动而灵活。另一方面也要采取忍耐态度，争取资方或厂方谅解，经过谈判协商求得解决，有时亦作适当的让步，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采取罢工手段，但必须反对顽固拖延的工贼破坏手段。这里必须指出如果暴躁急性，动不动就实行罢工，轻易拒绝谈判，提出过高口号，坚持罢工到底，甚至随意的把工人大众的经济要求牵入政治纠纷中去，以致问题复杂起来，使得工人大众的要求有遭到失败的危险，这是浪费和亏损工人力量的做法，枝节的而不是保存和发挥工人力量的做法，是和工人大众的共

同利益背道而驰，不相符合的。工人们应当了解这一个意义：改善生活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成的事业。工人们应当掌握这一个原则：只能胜利，不许失败，大胜利争取不来时，即使是小小的胜利也好。

其次，在厂主和资方方面也要明大义、顾全局，不要为一己的单方利益打算；也必须了解工人生活的痛苦，照顾到工人方面的利益。资方固属需要获取合理的利润，工人同样也需要得到生活的温饱。

在这里，资方同时必须认识到：工人生活获得改善以后，劳资情感自然增加，工作效率自然提高，原料消耗自然减少，而这些对于资方却是完全有利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例如采用法西斯敌伪恐怖压迫的统治方式强迫劳动、劳役人民的政策，则必须根本消灭。

最后，在政府当局方面，我们希望放大眼光，了解到改善工人生活，是安定社会秩序、恢复都市繁荣、发展生产事业所必需的，必须站在同情和帮助工人方面，作公平合理的调处，决不能迷恋于旧的统治制度，而怂恿资方压制工人罢工，加深对工人的剥削，这是愚蠢的罪行，必然产生恶劣的后果。

工会工作

第二，工会工作问题。

工人组织工会是战后工人应该享有的合法的自由权利，而工人在为争取本身的共同利益当中，亦深感到必须有组织以团结工人力量，代表工人利益的自己的工会的必要。这样，工会工作在实际上就是今天工运中的最中心的工作，必须了解为建设工人自己的民主的工会，这是今天职工运动的中心方向。

今天工会的新方向，就是产业工会的建立。这不单是因为产业工人彼此间的利害一致，而且他们过的是集体生活，在共同劳动的锻炼和教育当中，集中性、纪律性和组织性特别强。因此，产业工会是最近代化，最有力量的工会，它是广大职工战斗堡垒和教育堡垒。

产业工会是一个或多个同性质的产业部门的工人组织，它的成

份应以全厂熟练工人、青年工人、女工为骨干，争取工头、职员和学徒的参加和拥护，不分帮派，不分里籍、不分行业、不分地域地团结起来。

产业工会掌握着城市的命脉在其发展上将向集中与统一可能。但目前条件未成熟时，过高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应加强产业工会间的无形的、有形的联系。

但是产业工会虽然是最重要的工会，它并不包括一切工人的组织，在产业工会领导下或在不分裂产业工会的情形下，分散的组织与某些外围团体是必须帮助其发展的。至于产业工会和一些较大的职业工会的关系，则必须作适当的调整才可以避免争夺会员、行动不一致的等等毛病的现象。工会今天仍然有其发展的条件，但因为职业工会同时可以包括几个产业工会，例如机器工人的组织是个职业工会，而它却可以包括火车、轮船、汽车等各种产业工会，所以职业工会应该照顾产业工会的利益，而产业工会对职业工会也应加以支持；例如机器工人的加薪决不能只限于机器的十三科，而应考虑与联合全厂工人的要求，这样才可以取得广大工人的支持和有着强大的力量。否则，如果职业工会把产业工会强加控制，不照顾他们的利益，就一定得不到产业工会的支持，职业工会势必成为分散无力，容易孤立与陷自己于失败。

至对于一些为少数人所操纵，一、二工头所御用，这种没落性的行会，则广大下层群众必须进行改造与争取工作，使之成为工人自己的工会。

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工会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事事要为工人大众的利益打算，代表全体工人的利益，实现工人的共同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说得上真正的工会；否则，它便是为少数人垄断欺骗的假的工会。工会的组织，必须依据民主原则进行普遍的选举，工会的领导必须由有真正的威信、能为群众争取利益、排难解纷而为众望所归的。

在这个原则下面，工会除了必需在适当时机领导工人进行生活

改善外，目前应该注意下面几件实际的工作：

（一）加强对工人的教育——今天对工人的教育，除了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做人处事，为工人大众利益而共同奋斗的道路上外，今天必须特别着重工人的业务教育。就是说：工会应该成为工人们研究技术、交换经验的场所，以提高工人技术，精通业务。

（二）健全工会会务——这包括着建立工会的工作制度和会议制度，进行科学的分工而又加强各部门的互相联系，财政的预算、决算和公开会费的征收，各个地区、各个单位工友间的联络办法，工作日常事务处理的手续：各种册籍的系统整理等等。

（三）举办工人的福利事业——这包括着解决工人子弟的教育问题，疾病、死亡和失业的有效救济，工人儿女出生的资助，此外如工人各种娱乐、体育的组织等。

民主化

第三，民主化问题。

战争改变了一切。人民力量兴起了，抬头的了，民主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总方向，世界如此，中国如此，广东也是如此。但是世界上还有强大的反动势力存在，在中国就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集团。这法西斯的反动集团坚持一党独裁，挑动内战，出卖国家主权。在工运上来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破坏政协关于劳工的决议，压制工人罢工的自由，随便逮捕工人领袖，非法压迫全国劳协，引起各社团抗议，利诱威迫工团向国民党党部登记，党化工会。收买工贼破坏工团的改善生活斗争，阻挠工人争民主要求，滥用工会名义，不经工会通过滥发通电，非法改组工人自己的工会。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今天的工运是正处在这样的对内争民主、争和平的激烈斗争当中。

毫无疑问，工人是需要民主的，因此非民主的做法是和工人的

利益完全对立的。因此，职工运动应该走民主化的道路，职工运动应该成为中国人民整个民主运动中有力的一环。民主并不是空洞的，它应该有具体的内容，职工运动的民主首先要争取几个最起码的条件：这就是工人应享有的自由权利，工人生活的改善，以及工会公开合法的活动和受到法律的保护，工人罢工有自由以至实现政协会议关于劳工的一切决议。

在广东某些特殊地区的特殊环境下——例如香港工人是或多或少地具备了较民主的条件的，这就便利工人们争取进一步的民主化。因此，在职工运动中也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民主的工会与非民主的工会并存的情况，民主的工会联合起来反对非民主的工会的情况。这种情况是自然发展，也是广大工人群众的要求，就让民主的工团更广泛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树立更多的民主旗帜吧！在民主斗争中去改造与反对非民主的工会！

但是，对于民主化了或正在走上民主化的工会，应该了解这特殊环境不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民主与非民主之争必仍存在，但警惕每一环境的可能变化，警惕每一阴谋的可能袭击，这将在民主斗争过程中最重大的一个任务。必须认识环境，从过去事变中揭破与对付民主敌人的一切阴谋和手法，一切工作都必须注意长期利益，决不能冲动冒险、好大喜功、只顾眼前而贻日后之祸。

对于非民主的工会，也要指出：这并不是参加这个会的工人不要民主，而是工会被几个非民主分子把持利用。因此，工人们应该发挥自己的力量，利用特殊环境争取民主化，通过民主的选举或下层群众一致的要求，把少数坏分子赶出工会去！在争取工会民主化的过程中是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办法的，要了解这一争取过程是复杂曲折。在争取到工会民主化以后，同样要警惕非民主力量的复活和反攻。

至于缺乏这些任务的地区，即是说在争取民主受到迫害的环境下，是不是就不要争取民主化了呢？不是的，不过要更灵活、巧妙、隐蔽的进行，抓紧一切可资利用的机会和条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争取工会的民主化，这是今天职工运

动的一个重要任务。

最后应该着重指出：职工运动中的民主化问题，是和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分不开的。工人们应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而奋斗！

工作作风

第四，工作作风问题。

由于八年抗战，广大工人群众不管在前线、后方、敌后或是在盟邦里都受到了战争的教育，工人觉悟性发展，民族意识提高，组织性加强，斗争经验增长。但是由于战争结束了，工人群众还没有认识争民主斗争与对敌斗争的不同，也还没有认识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的区别和结合。特别处在今天民主与非民主之争的激烈形势中，因而在现在的工运中便产生了两种错误的作风。

关门主义的作风——在工会组织中提高口号，过分强调集中，英雄主义、心满意足、命令群众、不够民主、干部中间闹宗派意气、划分界限、小圈子主义；或则在改善生活斗争中过火冒险、条件过高、轻易罢工、冲动急性、能攻不能守，知进不知退；或则在争民主的斗争中不区别对象、不打击少数，骄傲自恃、眼睛向上、不耐心争取中间，不团结广泛进步力量，甚至政治化、抽象化，不照顾广大工人群众的要求和觉悟；或则在个人作风上好出风头，不求实际、容易命令、不善指挥、个人英雄等等。

机会主义的作风——工团主义思想，放弃民主要求，脱离祖国政治，以为国家兴亡自己可以不理；或则是麻木乐观，毫无警觉，以为胜利以后便永远都是胜利，一个坏分子垮台了便永远不会复活，天真憨直、目光如豆；或则是悲观失望、退却害怕、不敢与坏分子斗争，做了反动分子的尾巴；或则是蛰伏不动、饱蛇烂鳞，个人打算独善其身等等。

这两种坏作风虽然是表现不同，却有互相关系，同样是对环境的认识不足，其结果同样是损害工人利益的。因此，改变工运中的

坏作风最少有三个要求：

首先是認識环境——目前的环境是一方面工会活动是公开合法的，在某些特殊区域，又存在着有可资利用的条件的；另一方面工会活动又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在形势恶劣时，可能遭到更大的压力。最重要的認識是目前环境是在剧烈的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时今日环境或比较好些，公开合法的条件比较广泛些，但是另一个时候却会走到相反；同样某时某地的复杂矛盾形势它的重心是这个，而在另时另地又会是那个。所以，了解环境最重要的还是慎重密切注意搜集各方面的材料，加以调查，加以研究，掌握环境的每一个转化和特点。

其次，职工工作是件长期的事业，须要许多新干部的补充和支持，否则无法延续，无法发展下去，有中断和停顿的危险。经过了这一场战争以后，工运的老干部或者是死亡了，或者是衰退了，或者是转移了地区，能够坚持原来岗位的实在不多。所以发掘新干部，培养新干部，提拔新干部，提高新干部工作能力，就成为今天改变工运作风的第二个要求。

新干部有朝气、有热力，但经验不足；老干部虽有经验、有能力、有威信，但由于年龄、历史等影响，往往不免产生某些弱点。但是新干部必须尊重老干部，学取他们的经验、能力与坚决，不过特别重要的，老干部对新干部应该爱护培植，放手他们，信任他们，及时指导，如果倚老卖老，对新干部采取轻视和排斥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

最后，实现广泛的民主作风，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把工人大众的利益和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要用广泛民主方法来建立有威信的领导，要争取工人暂时的利益，也要照顾工人长远的利益；要善于运用和发挥工人的力量，也要善于积蓄和充实工人的力量；要大胆发动，也要慎重从事；要抓紧时机前进，也要看清风向后退。总之工运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工人应该艰苦不挠地去学习领导的艺术和斗争的策略，这是一门实际的科学。

認識环境，提拔干部和广泛的民主作风，这就是今天改变工运

中的坏作风的三个起码要求。

(原载《正报》旬刊新9号, 1946年10月11日)

香港各界国庆纪念叙餐会上 前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演词

(1946年10月10日)

双十节日香港各界名流举行国庆纪念叙餐会, 席间中共代表前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发表演说, 宣示时局意见。林氏演辞报纸记载略有错漏之处, 兹特觅得当时演讲全文摘要刊录于后, 以昭翔实, 并飡读者。 (编者誌)

诸位先生:

今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纪念日, 我们一面感觉到欢喜, 一面感觉到忧惧。欢喜的是我们中国诞生到现在, 已经三十多年了, 照人生来说, 正是壮年时期, 也是大有作为的时候; 而且今天的国庆, 又是我们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之后, 踏上了世界上所谓四强之一的地位, 这怎么不值得我们高兴呢? 然而, 我们若要纵眼向外一望, 则我们又不能不表示无限的忧惧。我们抗战胜利已经一年多了, 本来在这一年多中, 我们应该得到和平安居, 实行国家的经济建设, 改善人民生活。可是事实不然, 在这一年多中间, 在国民党统治区里面, 上则依旧贪污腐化, 下则民不聊生, 造成农村破产, 工业倒闭, 经济危机, 日益严重, 而政府却加紧抽征盘剥, 人民饥饿死亡, 这种现象比诸抗战期间更加利害。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人民民主力量, 坚持内战方针, 始终不肯实行和平, 并为了内战之故, 更不惜把国家的主权如海关、领空、内河航行及外人驻兵等

都拱手让诸于人。最近外面还传说，国民党政府正在和外人谈判，准备连采矿权和铁路权也要出让了。今天国内各地已几乎无处不充满着美国的货品，空中飞行的飞机，士兵所使用的枪弹，凡用诸于内战的，都无一不是美国制造的东西。国民党政府出卖了国家的主权，换来了杀人的利器，企图靠着美国的支持，来维持它的独裁统治，怪不得最近许多人都说中华民国快要变成“中华美国”了。这是十分值得我们忧虑的，如果我们还要让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如此地干下去，我们中国真快要完全成为美国的殖民地了。

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为掩饰它的内战阴谋，硬说我们破坏协议，发动内战，没有和平诚意；又说我们是“奸党”，是苏联的尾巴，不爱祖国。然而事实到底是怎样呢？我们只要随便举出几件事实就可证明。先拿停战协定来说，自从今年一月停战命令颁布以后，国民党调了它全部军队的百分之八十五到解放区去，用以进攻解放区的中共部队和人民武装，并且攻占了解放区的许多地方，战争都在解放区发生，这究竟是谁在进攻谁呢？这还不够明白吗？又如政府改组问题，根据政协协议，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四十名委员中，国民党要占二十名，其余二十名则由各党各派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担任。中共、民主同盟共只要求十四名，恰好是三分之一强，这已是到了让无可让的最低限度。因为按照政协协议，凡有涉及变更和平建国纲领者，须有三分之一的席数才可加以否决，如果民主党派不足此数的话，国民党就可以完全操纵国府委员会，它爱怎样做就怎样做，甚至推翻和平建国纲领，民主党派也莫奈伊何。这样，民主党派仍去参加政府就等于去拥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等于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去消灭自己，也即是消灭人民民主力量。这不是与原来的初衷完全相反了吗？其实，即使民主党派占了十四名的席数，而国民党还是占着绝对多数的，为什么国民党不肯减少一名，而偏偏要民主党派限于十三名，而把他的否决权也剥夺掉呢？这样说来，到底是谁没有诚意？谁要斤斤计较呢？这还需要解释吗？再其次要说到国民党诬称共产党为“奸党”及污蔑民主党派为中共尾巴的问题，究

竟谁忠谁奸，应该以对国家民族所尽的责任来做标志，谁对得起国家民族，谁背弃国家民族的利益，自有事实来做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从没有和外国人缔订过任何的条约，从没有出卖过任何的国家主权，这是尽人皆知的。然而国民党的卖国罪行，就最近一年来的事实，大家都已清楚，毋须再赘。单拿“九·一八”以后的几年间来说，它就和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了甚么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等一大堆的卖国条约；就在抗战期中，投敌卖国的也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高级要员及重要将领，而今天这些卖国分子又都摇尾一变而成为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的要人了。究竟谁忠谁奸，岂非不辩自明吗？

国民党又喜欢说，因为我们有了一支人民军队，所以它不能实行和平，不能给人民以民主自由。这是真的么？民主同盟总算没有军队了，但最近李公朴和闻一多两先生都遭受杀害。在座的诸位先生也是没有军队的，大家有的只是一干笔和一张咀巴，然而大家也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立足而被迫逃亡到这里来。这还不是证明国民党只拿所谓军队问题来做骗人的藉口又是甚么？无疑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然而却一定要在民主的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在抗战结束之后，在军队问题上，我们曾作了不少的让步，首先就是我们遵守去年的双十协定，把长江以南的部队全数北撤，以减少双方的冲突。可是国民党却不让我们这样做，完全背弃了它自己的诺言，我们数万人的广东部队，只要求撤退几千人，然而国民党的反动派却不答应，直至最近琼崖问题还没有解决。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断调派大军到琼崖去加紧进攻和企图歼灭琼崖的独立纵队，他们嘴里说的是民主和平、政治解决，但实际做的却破坏和平，武力统一，他们一心一意要消灭人民民主力量，消灭人民的军队。然而必须指出，国民党的反动派这个幻想是不能实现的，解放区的军民坚持和平，反对内战，对于反动派的内战进攻一定能予以坚决的抵抗和严厉的打击。最近三个月来，在内战前线上，由于解放区军民的坚决自卫斗争，国民党军队损失了二十多万人，其中被俘的几

达十万人，包括了将级以上的军官四十八名；又缴获的大炮共七百多门，占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所缴获的日本大炮的半数。由此，我们可以预想得到，如果国民党继续打下去，它的损失必将更大，它送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枪炮必将更多。但虽然如此，我们却是始终是要求和平的，我们要求大家遵守三大协议，以建设民主自由的独立国家。我们认为内战对于大家都没有好处，徒然苦了人民。最近这一年来，由于国民党的死心打内战，所以在各地实行种种抽征的结果，已经引起了无数人民的饥饿死亡。这种情形国民党的内战英雄们总该不会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以为有了美国做靠山，就可以长期打下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今天美国的人民已经起来反对美国政府破坏中、美两大民族情感的反动政策了。当人民的力量继续强大起来时，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将不能不要被迫放弃。同时，中国人民也不能永远如此地忍受下去的，现在苏、浙、皖、川、鄂、湘等省的人民起义已经陆续出现了，当人民的反抗力量普遍起来之时，你就不好再维持统治下去了；现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已不愿残杀自己的同胞，普遍放下武器，要求和平，实行民主，这种情形终使你会有一天不能指挥如意吧。因此，还是民主和平才是正确的出路。我们的作战完全是被迫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我们不能不抵抗自卫以求生存。但当国民党反动派一旦停止进攻，并愿意实行协议时，我们将随时停止战斗行动，以免致国内的和平。但如果国民党反动派始终不觉悟，一定要继续打下去的话，我们也只得让它打下去，我们将结合全国人民，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坚决的自卫抵抗，和它周旋到底，一直打到和平民主真正实现，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政协决议、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完全实行才宣告停止。

现在解放区的军民已经全体动员起来，为保障人民的既得利益，为求取国内的民主和平而坚决奋斗了，希望我们的民主人士结合着全国的广大人民，更加团结一致，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到底。这样，明年的双十节，我们希望它已出现了真正和平民主的新局

面。

(原载《正报》旬刊新10号, 1946年10月19日)

尹林平致中央电

——琼崖报告已收到

(1946年10月15日)

中央:

1. 琼崖叶茂带来之总结, 内容空洞, 无可报告者。

2. 琼崖以后是否由你们直接领导, 我们现需要和他电台取联络否。

另: 按转南京局前电询民盟中央全会, 是否开会, 此间中委须出席否, 盼急复。

林平

酉删

方方关于领导问题的漫谈提纲

(1946年10月20日)

一、四个基本问题: 出主意用干部但主要在于思想改造。原则与具体、思想与政策、战略与策略。

1. 向被领导者学习——情况、经验。

2. 以胜利为原则——帮助，解决困难。

3.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一致性。

4. 随时修正错误。

二、过去领导方式的检讨：

1. 命令式的；

2. 灌注式的；

3. 狭隘短视；

4. 空洞教条。

形成了家长制度，盲目服从，主观主义，迷失方向，一句话——缺乏思想领导。

三、思想领导必须解决的六个问题：

第一个，预见问题：

1. 医治迷失方向特效剂——事物发展规律，东纵工作为例。

2. 大的、基本的——策略服从战略。

3. 肃清主观主义才有预见。

4. 理论与实践。

第二个，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详文章）

第三个，突破一点，推动全局。

1. 从各个地区来说；

2. 从各种部门来说；

3. 从各个任务来说。

意义在：（1）抓住中心一环，转运下节。（2）取得经验，作为具体领导。

第四个，中心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1. 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负责非空谈、大胆）；

2. 挑选干部适当配备各局所长；

3. 防止嫉忌、离群正确办法；

4. 集中地来坚持下去。

第五个，大胆放手与适时收缩、一元化问题。

1. 肯定分水岭——以目前农斗为例；
2. 矫枉必须过正意义——何时何种偏向是主要的；
3. 明确果断；
4. 淋〔泼〕冷水问题。

第六个，功过分明。

1. 功归人——提高一步；
2. 过归己——弄通思想；
3. 赏罚分明及适当。

四、领导方式问题：

漫谈；

成见——印象不佳，

耐心——急躁，

轻听易言——来说是是非者。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何俊可参加琼崖工作

(1946年10月24日)

中央并转周董：

接受中央电琼崖指示，已着重和他提出群众路线，对内团结执行意见，何俊同志可参加琼崖工作。罗定可数日内到琼崖传达，庄田同志如你们同意则派到越南训练南路撤退越南之部队。请复。

方、林

酉敬

尹林平致中央电

——留粤各地之武装报告

(1946年10月25日)

中央：

留粤各地之武装队兹分别报告如下：

全部人员约一千五百人，机枪六十余（现已接收者实得不足五十挺）、掷筒五支，步枪二千五百支（实得一千五百支）、短枪约六百（实得不足五百支），未接收得之武器可能已损失，全部武装分布地点如下：

一、西江（原属珠江纵队）现有人员约二百五十（本地人半数以上），轻机十九，掷筒二，短枪约六十，步枪约一百四十，活动于广宁（占全部三分之二）及四会、高要、怀集、阳山等县边境及清远一部分，活动方式为集中领导分散活动，全部分十五单位，主力队不超过三十人，均用私人名义正义面目出现，但目标仍暴露，民众仍以红军视之。

二、南路（原南路解放军）人数约六百（本地人占大多数），轻机八，轻枪约一百六十，步枪约一千支，主要集结在合浦、灵山山地约三百人，廉江等地活动于平原、丘陵间，取消原来名义后，别无新名义、民众与顽方仍以解放军视之。

三、中区（原中区解放军）人数一百二十，轻枪十二，短枪约九十，步枪一百五十，特务队活动于赤溪至阳江等地，陆大队活动于沉香沉阳及阳江，高（明），鹤（山）边等地方，军队以土匪面目出现，以队伍较隐蔽。

四、潮山（原韩纵队）人约十八，短枪十八支，另隐蔽机枪八、炮三、步枪约八十、手枪五挺，活动于揭阳、普宁边境，在老

地区群众还看红军，现日渐隐蔽减少注意。

五、从化北区（原属东纵，以下均同）现有十余人（本地人），轻二、步三十余，短枪十余，活动于吕田一带地区，无军事干部，故已分散，但认为可集中。

六、增城、龙门地区约十八人（本地人），轻三、短三十余，步三十，活动于派潭或孤立，东江一带无名义民众以东纵视之。

七、博罗，现有二十人（外地人），机二、步枪十余，短十余，活动于东江北岸象头山一带，参加当地洪门会，以土匪方式活动，均直接生产分散活动。

八、英德佛（岗）区十余人（多外地人），轻一，步枪六十五，短五支，活动于鱼仔湾一带地方，以正义面目出现，尚未联系到。

九、曲江约一百八十人（多外地人），轻三、短二十，步五十至六十支，炮七，活动于湘粤赣边分区，另一股确在南雄无名义，现未联系到。

十、海丰九人，短九支，限于该县大部山地，无名义亦未联系到。

十一、新丰区十二人（外地人），另不脱离生产者二十余，机枪一，步枪五十七，短十一，活动于马头墟一带，无名义，现未联系到。

十二、惠阳区三个单位，现只有三个队十四个人，均用短枪，在平山一带，以秘密自卫队名义活动。

十三、中山（原属珠江区）三百人，为顽军打散，可能收回，百二十人，武装不详，面目渐露。

十四、河源（原属于东纵）十余人（当地人），在该县东境活动，为当地党领导。

十五、连平、和平（原属东纵）约六十人，不详。

十六、始兴、翁源约四十人不详，另说明。

以上之人或系有意留下坚持者，或系不能复员者，人数均不多，只有南路系在顽军进攻后才扩大的，均是简单的材料。

林平

酉有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关于闽西南工作报告

(1946年10月25日)

中央并转周董：

李碧山、朱曼平报告闽西南，梅埔等地工作经一个多月研究讨论后，朱曼平回去宣达，李碧山及妻子三人到越南工作，现摘要报告于下：

一、日寇投降前闽西、闽南、梅埔蕉三个单位共发展武装七百至八百人，普遍进行领导群众，破政府谷仓分仓减租减息，与保安团队打过三四次仗都有缴获，活动地区闽西南包括：上杭、永定、龙岩、平武、连城、南靖、和平、漳平、宁洋等县，广东则为梅县、大埔、蕉岭、丰顺等县都半公开活动，七百至八百党员，可算为地下党工作只有梅县，漳州有一百党员。

二、日寇投降后梅、埔、蕉一带即改为武工队作分散行动，闽西南则除一部分武工队外还集中行动，现在闽西南仍有四百多部队布置连宁边、岩永杭、永和靖边。梅埔八十余，武工队布置于梅蕉边，饶埔边，梅丰边。

三、顽固军闽西南有四个保安团，梅埔有一保安大队，二省边县在张发奎出巡布置下协同动作向我进攻，梅埔、平饶等县已用两面政策缓和下去，闽西南斗争仍很激烈，近来永西负责人马发贤同志及武工队十八人被包围牺牲，顽曾悬红一千六百多万元，企图捕杀我军事领袖刘永生同志。

四、全部工作主要优点在于坚持群众利益斗争，保护群众，平均土地，主要缺点在于强打大仗，作风暴露，忘记长期地下工作，

肃反杀人太多，部队给养困难，筹款不注意统线。

五、我们除将中央方针路线用漫谈方式，详细反复与之共同研究，并将闽粤边历史总结，以自我反省启发他们打开脑筋，配合当前形势指出闽粤边工作长期艰苦方针外，并具体提供他们如下意见：

甲、强调群众斗争，必须根据基点多样分散，以取得胜利而不受摧残为原则，武工队不能脱离群众斗争，非万不得已不要随便使用武装，不要受一区一地胜利冲昏头脑，离开长期积力方针。

乙、现在武装在安全条件下大部复员，只留精千百数十人自卫分开活动与各地群众配合两面政策，保卫复员者安全。

丙、向闽赣边发展山地点线，逐渐达到联系曾镜冰地点工作坚持粤边有群众基础老据点。

丁、在安全地区轮流训练干部，整风总结反顽群斗经验，提高到原则上，作为领导指针。

戊、审查灰色干部，在大乡镇城市建立秘密组织，并利用南洋关系发展经营商业。

己、成立闽粤边工委，以魏金水、刘永生、王维为主要负责吸收各县党领导人至七人组成党委会，下分闽西、闽南、梅埔三个地委（韩江两岸与下游潮汕工作割断），粤委及建立的秘密工作由王维单线联络，朱曼平调到港另分配工作。

庚、在安全条件下魏、刘等干部调到港，轮流总结工作，给予休息学习。

六、李、朱两人审查历史的结论俱政治面目清楚。

方、林

酉有

广东区党委关于 农村系统工作的概略意见

——长期方针、群众组织与武装斗争问题

(1946年10月)

一、关于长期方针

长期坚持，准备力量，等待时机，这是中央给广东党的总方针。

这方针不仅从中国革命基本特点来了解，还要据今天的国内外形势及广东形势来了解，特别握紧双方力量对比来了解。

第一，德、意、日垮台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力量与统治地区已空前强大和扩大，它对国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力量已开始占优势，但还未是决定性的优势，离着决定性的最后胜利时期还相当远。

另一方面，已成为国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力量的代表者、领导者、决定者的美国，由于二次大战中，牺牲较少，所获最丰富，今天它保有高度生产力与生产机构、丰富资源以及强大兵力与全球性的军事基地、军事指导机关，它力量很强大，也很疯狂，成为世界和平民主的主要威胁者。它要消灭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力量，只主观幻想，绝不可能，但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力量要消灭它，也非短期间之事，必经长期的、复杂而激烈的斗争过程，才能迫它力量逐渐下降、急剧下降以至根本崩溃。

战后国际斗争依然是长期性和持久性，必然影响中国革命的长

期性，成为规定中国革命长期性的重要因素。

第二，中国革命长期性的基本形势，抗战中和战后至今天已相当改变，但还未是基本的改变。中国人民的力量虽已强大，地位、威信已有全国范围和世界性的提高，已掌握着决定胜利的锁匙，但还未达到决定胜利的阶段。而且还离得相当远。

另一方面，中国反动阶级力量抗战期间大减弱，战后至今天已近根本危险境地，但因帝国主义的支援，使它复趋相当强大，这就是它还挣扎有力，敢于发动全面内战的标志。

这并不是说K有生力量增大，相反，它有生力量正日益削弱，其统治日陷动摇与孤立，因而决定它更依赖美国，出卖整个中国而不惜。美国为称霸世界，变中国完全殖民地化，成为反苏基地，也必然不断加强对K之支援，因而中国内战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扩大，因而中国和平民主真正实现，必须不断地粉碎中、美反动派的联合进攻的长期斗争过程。

第三，今天国际国内斗争形势还是长期的，那么，广东革命斗争当无例外，而且广东当前形势也有其长期性的具体特点。

首先，是力量对比，仍是K强我弱，K优我劣。K正规军几尽北调，但还留下两个军，还有十余个基本保安团，正在扩大三十个团以上（每县至少有一保安大队驻防——K计划），以及普遍扩充警察（每县原有一中队扩大成大队，原有一大队扩充成二、三个大队。但为经费支绌，有许多县做不到）、联防队、护沙队……并收编土匪，实现“武力地方化”。政权上已渐复稳定，不仅全省性的中间力量被打垮，就是县性、区性的中间力量亦多被分化拉拢，各个击破，着着实现“地方政权中央化”（县长、警察局长、所长、田赋处长极大多数是军统，CC新派来的）。省内存在的落后基础及部分落后群众，还受K的利用和欺骗，群众中的正统观念还相当严重的存在。因而，它的独裁统治、力量，基本上还能控制全省。

另一方面，刚抬头的民主运动便遭了打击，民主中坚分子与重要阵地，均被驱逐与破坏，个别存在也被迫不能动或不敢动。我党力

量，日寇投降后的受打击，主力北撤与复员，存下的实行分散坚持。地方党力量由于过去长期停止工作的损失，与长期武装斗争的影响，暴露受摧残，以及新近在民主运动中的受打击与撤退、疏散……形成相当混乱与减弱，而在暴露危机依然严重存在，较诸广东K现存力量，其强弱优劣，已有显著之区别。

其次，K以广东为华南中心省份，不但能控制广东更控制华南，还藉此联络海外，控制华侨，密切英、美关系。故K、英、美均重视广东，共同阻抑华南、广东民主运动及我党力量发展是必然的。今天全面内战已爆发，全国分裂危机已迫眉睫，广东K清剿政策必不断加强，不断得到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加强它的反动统治。

当然，广东K之弱点，基本上和全国一样，士气低落，民心离异，经济财政危机，政治腐败，威信扫地，日陷孤立，政权基础日益动摇，他们间矛盾亦多，中英、英美间也有新矛盾……。但要加深他们的矛盾、弱点与困难，以至根本削弱其力量，短期间决不能办到。

就我方来说，从整理到巩固、扩展、壮大以及广泛组织民众及民主中间力量成为极有力之战斗基础与胜利条件，改变主观弱劣形势，也还须相当长期的努力与持久斗争。

从上述诸方面，已说明长期方针是华南广东党唯一正确的方针，今后的问题，在如何确实地贯彻实行这方针，主要是将现有力量基础（包括武装地方党及民主力量、群众力量……），积极整理，达到稳步、隐蔽和巩固，同时在巩固原则下，力求新力量的点滴积蓄，特别是群众工作做得好。抓紧前者，才能避免新的破坏，新的危机，并便利新的积蓄，补充后者，才能予以前者补充新的血液与新的掩护，使前者更形巩固，同时又造成将来大开展之准备条件。

在执行过程中，必须严密防止近视、心急与过左、突出、暴露的作风，同样防止冷热病、消极悲观失望的产生，两者同样错误，

同样没有前途，同样违反长期保存力量、巩固力量、准备力量、等待时机的基本精神！

二、群众组织与斗争

(一) 目前群众中存在两方面情形

一方面因长期武装斗争，主力北撤，留下分散坚持，新生的解放区一切群众组织与政权基础，以及K统治区有无色彩的工农群众组织，多遭K之破坏、摧残与压迫威胁，形成散乱、停顿或解体形态。

知识分子群众组织（包括城乡教员、学生、青年团体）亦在民主运动受打击下新遭压制摧残，迫使大部分有形无形瓦解，存下的也不能动弹。

在这情况下，群众害怕，徬徨苦闷，情绪低落，悲观失望暂时相当普遍。

另一方面，由于广东K为配合全面内战，实行全面绥靖政策，实行屠杀，压迫与层层剥削，以及物价飞涨，土匪多，农村经济完全破产，饥荒遍地，引起农民群众空前愤恨，特别是对征兵征粮的愤恨。有的已自发反抗（多数消极性的，如要求减征、缓征、免征或避征之类），有的正在要求组织反抗中。

知识分子对时局极不满，对K政策甚仇恨，对和平民主之要求迫切，特别要求解决职业、生活与做事自由、学术自由、生存权利，对K失望，对我好感及倾向（也还有不了解与疑忌害怕），看见前途，时想起来组织斗争（主要还是改善生活、保存、生存斗争），这从他们各方面可以看出。

因此，目前群众工作方针：

一面要积极而隐蔽的整理与巩固原有群众基础，耐心教育说服群众，克服其苦闷、悲观与害怕心理，这是主要的。同时，要争取有利条件与时机，运用各种隐蔽方法去开展新的群众工作，特别是农民工作与知识分子工作，新旧配合，逐步开展新的群众运动，这

完全可能的，必要的。

（二）群众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

（1）均以公开合法为主，但在不能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秘密非法的。当全面内战爆发，迫近全面分裂之情况下，K对一切群众组织与斗争必更进一步的破坏和阻止，因而非法和秘密的方式将随时局而逐渐加强运用。

（2）无论公开合法与非法秘密，均必须采取多种多样和分散的形式，不同地区、部门、情况采取不同形式，不要千篇一律，呆板不变，务要避免高级的统一形式。在公开合法方面，完全采取灰色的、隐蔽的、社会性和群众性的形式。有时并无形式，但却有组织性也可以采用。

1. 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

农村——如救灾会、生活互助会、生产互助社、乡村合作社、識字班、夜校（K明令规定，但也引起K注意），结拜兄弟、结拜姊妹、族会、打猎会、乡村学校之恳亲会……

知識分子——班级会、自治会、研究社、同学会、同乡会、球队、游泳队、教职员联谊会……

2. 秘密非法组织形式

农村——抗征会、避征会（抗征兵、征粮）、上山队（也为准备抗征准备上山而组织的）、义勇会（打抱不平、救人救己），有的也可以用反内战同盟、和平民主同志会……

知識分子——民主革命同志会，新民主主义同志会，民主青年同盟、反内战同盟。

上述组织形式上不过是例子，主要根据当地及对象需要情形而具体决定。

3. 群众斗争内容和步骤

内容——目前以经济（改善生活待遇、公众福利，反贪污、反敲榨勒索，要求减少负担……）斗争为中心，政治斗争少做，但在有利条件及胜利把握，如上层关系、社会关系好，特别群众本身力

量好，相互配合……的条件，适当进行斗争是必要的，尤其是抗征等反征斗争及自卫斗争必须强调与大胆领导。但以不暴露、不受损失为原则。在K区减租减息斗争，粤北有一经验：即直接向个别地主、债主入手到其他。

步骤——由低级到高级，由经济斗争的不断胜利与新条件配合时，才逐渐联系到或开始转到政治斗争；由要求减征、缓征、免征的斗争到避征、抗征的非法斗争；由要求借谷到抢谷，但方式要适当，如连阳所用然……

群众教育——必须先从他们实际痛苦、实际生活、身家利害关系与困难着手，然后逐渐联系到这些痛苦、困难之来源（政治问题），而且必须强调前者。

4. 在全面内战、全面绥靖政策之下，今天深入农村，组织领导农民工作必须强调，但仍以贫农、中农为中心，对地主、富农可采取两面政策（因地主、富农也受K压榨的），对他们的子弟着重去争取。中心斗争对象是对K。

5. 群众秘密团体，如不用会、盟、社之类，而用小组形式去组织，从经验上说，许多青年是不大愿加入的，因觉这种小组织力量太渺小，做不得大事。但不以会、盟、社名称去组织，又恐随便扩大与成立统一组织单位，这易暴露，易受摧残。以此必须以秘工纪律（不许发生横关系）及规定以小组为单位（每小组三、四人，其中党同志只许一人参加——以群众面目参加——）去限制，并通过党去统一联系，因为参加的党员已是该小组的组织者，多数成为领导者了（这类组织形式粤北沦陷后运用，如抗日青年同盟，抗日青年同志会等，收效相当大）。日寇投降后改用民主革命同志会、青年民主同盟，但成份要较精干，要将来可能成为自己同志为主要对象，并准备逐渐走上合法公开方向发展。政协会议后，这种形式的运用他们又渐加强了。在粤北，在两个不同时期，运用几乎两年了，自己同志及会员反映都认为很好，是一个新创造的形式，深受进步和倾向进步的、也有抗战民主而对我尚有成见的知識青年分子

的欢迎。粤北各县差不多都采用了，连地方武装也采用了，而且成绩很好。两年经过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以为别的某些地区也可以分别采用。但必须确实适应当地具体情况及民主要求来决定。

三、上层工作问题

(一) 原则方针

1. 积极组织上层中间力量，拉拢次坏，孤立、打击最坏者，争取地方，孤立打击中央，特别是特务头子。

2. 对中间向坏者采取两面政策，中间向好者多联合，少斗争。

3. 一面要加强造成地方系中间民主分子的势力，一面要注意使之不受打击。

4. 对象——除一般者外，着重注意：

(1) 粤南张系、西江蔡系、北江莫、沈系及少壮派——还有十二集系、东江张系、蒋系及其他失意官僚军人，有地位之华侨分子，潮汕翁照恒、陈卓凡、洪之政、林先立等。但我们的上层工作对象是地区性、乡村性、隐蔽性的上层分子，全省性及暴露的另由区党委直接做。

(2) 乡村——不愿当乡、保、甲长或不愿出来做事的绅士、中间地主，要切实联络，必要时鼓励他出去做事，并帮助他解决困难。

(二) 做法：

(1) 抓紧中心，放松其次，争取其大，放松其小，如对政治上中间、民主，经济上贪污，生活腐化者，也因抓紧前者而放松其后者，对于莫……。

(2) 目前对上层工作主要多推动做社会上、地方公众上有利的东西及从个人利害着手，然后联系到大局，也有从大局关系联系到个人利害，但前者往往多生效，必须强调。

(3) 直接、间接、上下配合、内线外线等方式，应分别使

用，有时兼而用之，如既用姓氏或朋友关系去接近，同时又通过他的妻子、兄弟、叔伯——亲人去间接打气……。

(4) 联系上

1. 甘时示松，苦时示紧，平时稍疏，紧时要密。

2. 绝不可贪小便宜，还须牺牲小便宜。

(5) 时间要长，经过事件要多，从相互了解中、觉悟中加强密切。

(6) 分别以中间或民主进步的个别分子或集团派系、姓氏关系的面目出现。有的对内不加入（如对某些集团派别组织然），对外以其集团面目出现（例如对连阳少壮派……）。

(7) 注意培养专门做上层工作干部，没有这是搞不来的。

四、武装工作问题

(一) 意义和方针。

和平民主斗争方针，今天在广东仍占主要，但由于全面内战爆发，全面分裂大可能至十一月分晓，因而华南广东武装工作有逐渐加强之必要。

这个加强，并不是轻易作战或扩大集中部队，暴露目标，牺牲力量，而是加强领导，进一步整理精干、分散（有中心的）隐蔽和巩固自己，切实解决困难，提出新办法，创造自己生存发展之新条件，达到长期持久斗争与保存力量，并积极争取各色中间性的与可能争取的武装，在隐蔽方式下取得联系，而成为华南、广东反内战、反独裁的各色武装与人民力量之中心骨干，以待时机。

(二) 自己部队。

1. 现提出三个具体方针。

(1) 有条件坚持的一定坚持下去，并长期保存巩固之，如西江、粤北、南路、潮汕、中区等。

(2) 确无坚持条件的可进行转化或复员，如江南、河源、中山等。

(3) 无坚持条件的但复员又不可能，不得不一面继续自卫斗争（在保存力量下），一面积极创造复员转化之条件，能够时便实行。

2. 活动方向、方法及解决各种问题。

(1) 在精干、隐蔽、巩固原则下，积极进行群众工作（一面加强现有群众基础和群众关系，一面派武工队或人员到新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群众基础与扩大群众关系，保护群众利益，领导群众进行必要的自卫斗争与改善生活斗争，但要照顾到群众不受损失摧残。

(2) 方向——主要靠群众支持外，还须靠山地、边境发展，培养干部，特别地方干部，队员亦力求地方占多数或全数，长期生根。

(3) 解决经济——主要靠群众，和群众一起生产，也可指定短小队伍——小组或一班人专责解决经济（目的是为解决生产基金及过渡时期之费用，从长期生产解决部队经济，在今天情况下，才是根本正确的办法，基金解决了，生活有办法了，捞经济的办法应该减少以至停止），但必须过界（驻地之外）去搞，免暴露及群众被摧残。部队活动表现形式，应以普通土匪面目出现为适当，迷惑K之视线。

(4) 加强教育，提倡各种适宜情况之文化娱乐游戏，爬山、游泳、编故事、讲故事、简单的军民联欢会（在自己乡村）、识字、写字、聚餐等等。同时，如部队与群众结合生产，而且确实隐蔽下，可适当许可其与当地民众结婚，以坚定其精神，减少性之苦闷（西江部人员多犯手淫病）。

(5) 保持对民兵队员（复员者）的联系，加强对他们的生产与政治、军事教育，关照他们之困难。

积极争取附近土匪及民众武装取得联络，特别与K冲突过而素质较中间之土匪。

(6) 武装组织单位，小股以一组或一班，大股以一班至多不

得超过五十人，但各股必有一中队伍，为全股中心骨干，由该股主要领导者直接指挥之。

(7) 西江、南路、粤北及沿海附近地区武装，区党委直接领导，远的和小的队伍，由该当地特委领导，但该特委下应设一干部专管其事。

(三) K统治下之武装工作

(1) 一面积极争取地方性、中间性、民众性之武装，如乡警卫班、联防队、自卫队——同时，要有计划的派人到K正规军、军官总队(有万余人，在曲江集中九千余，广州千余，厌战情绪及不愿到北方去的相当多)、保安队、警察、各军事机关活动，建立工作，探听情报，尤其注意据上重要位置，平时不露声色，准备将来大用。也必须由各级特委按期输送若干人(数人)考入其军警学校学习和工作。

(2) 利用K拚命扩大民团之际，藉机组织能够掌握的民众地方合法武装，但要反对调离乡井，或归并于警察或保安队……及进攻人民。

(3) 注意收容为抗征跑上山的青年及民众武装。

(4) 在K军中有计划散布反内战宣传，鼓动下级官兵逃跑，拒向内战前线(北调或本省)，可能时鼓励其率队上山为匪。加强K军中的矛盾(官兵之间、部队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争取中间分子、地方分子，孤立打击中央系最坏分子和最坏部分。

五、土匪问题

(一) 土匪情况特点：

(1) 多由于内战局面与K加紧征兵、征粮与普遍饥荒和失业，今后更多而普遍，目前不仅山区、边境有土匪，市镇及干线也多匪，同样猖獗了(最甚是东、北、西江及广州以至广州外围)。土匪多，民众受害，但对K也不利，对我也有害，但也有利，如对我某些队伍有掩护作用。

(2)土匪有数类：

1. 失业军人、流氓地痞为主干组成，多与军警有关，本质极坏，少打官府，多劫平民，政治顽固。

2. 为K所迫，包括半流氓、中间性的失业军人和抗征、抗政府驻军而被迫上山之正义分子与善良青年，本质较好，可能改变，多打官府及富豪者，少劫平民，政治仇视官府——对我中间。这类在某些地区乡村民众有密切关系。

3. 我复员人员，为K及生活所迫而搞土匪（江南最多）本质上可能变化，如及时争取与领导也可能不变。专打豪富及官府，少劫平民。现和我还有关系，和可能且必要求得联系与领导。

4. 职业土匪，即一贯以土匪行业为生，不降官府，对民众也乱抢，但对其驻地居民则例外。对乡镇捞家关系很密切。本质相当坏，但政治无兴趣，只求发财。

(3)一般人对土匪观感有改变，普通是为失业、生活与被压迫而当土匪（有政治头脑的当然认为时局黑暗的产物之一），同情其动机，同情其部分行动。

(4)K对土匪政策基本是剿抚兼施，其具体态度：

1. 大股主抚，小股主剿（如江南）。前者为免付代价与麻烦，尤其为增厚实力。后者为表示维持治安，笼络民心（如对东宝土匪然）。

2. 减少甚至不套“奸匪”名，为免上被斥，下影响。但“奸匪”则多套上土匪，图博社会同情其进剿，表示匪患甚微，也便于推诿责任（军推政，上推下）。

(二)土匪工作：

(1)方针——积极争取与领导，使与自己武装工作和K统治下之武装工作配合。但对土匪的正确方针也是两面政策的，忽视这，也搞不通的。

(2)具体做法：

1. 对上述土匪种类中之三、二两类，不但要争取联络，还要

争取直接领导，给他正确方针（由抢富劫官，救贫救己达到反内战、反独裁、反侵略之政治斗争）与实际教育，整理其组织（通过他们自己），逐渐改善其质素与培养干部，使成为反K之中间武装力量。其组织和我们队严格分开，亦不应露现政治色彩。

2. 对一、四两类土匪，原则上也应争取联络与领导（第一类可能很少，第四类还有可能），但应该严密提防它对我之袭击，投降K，为K利用。特别是对第一类之警惕。因此，与它联络和在它队伍里活动的同志，都严密注意政治面目的暴露，作风突出与呆板，也不应将我队伍和他们驻在一起，就是和他们联合行动时，也应十分小心，严防其叛变。特别是我队力弱，彼队力强，或互相伯仲时候。但警惕和提防，外表不露声色，免得他生疑而疏隔起来。与土匪往来和联合行动，在经济上，在条件上一定先讲明后弄清，一面尊重其独立与利益及其生活习惯、土匪风纪等，一面保持自己的立场与公正态度，特别是设法阻止他们乱劫平民，损害民众利益。如它硬要，当给予必要之斗争，甚至镇压之，解决其最坏头子，解决其力量。

3. 对他们，特别是二、三类之土匪的组织，应注意帮口宜多，不宜大，并宜分散活动。每一帮应了解及培养其领袖，并选择培养其领袖帮口，以便必要时号召一致行动。

4. 还有一种土匪，是不脱离生产和家乡的，有捞时集中去捞，事后分散回家生产，有时兼贩人口、赌钱，但他们是为生产而不能解决生活，没有出路与苦闷中而出此。他们往往在乡村中起决定作用。乡、保、甲长也要怕他，不敢报官，有时还替他们掩护，因为他们出劫，完全出外地，乡绅父老有时还同情他们，认为他们会捞。这类土匪也须深入活动，取得联络与领导。

5. 派做土匪工作的同志，须慎重选择，否则会偷鸡折犊米，甚至吃大亏，不但要能力强，观念强，还要有相当社会经验，耐劳，耐心，态度豪爽、老实。不但要机警能干，而且要能打，才能使对方尊重与信任。

六、组织问题

(一) 组织情形：

(1) 数量：

1. 收到：五千七百八十。未收：一千三百七十，还有部队组织及其直管之某些地方组织在外。

2. 分布：

南路二百八十（钦四属一百七十四在外）。中区六百四十。潮汕九百。江南七百二十（另有未收的三百）。后东三百九十。江北一百七十三（另有未收的四百）。广州市郊二百六十。北江三百一十（另有未收的五百）。海陆丰三百三十三。西江一百二十五。领机及散二十。

3. 全省除六个县外（西江四，北江二）其余各县都有，但成为全县性的只小半，限于县之一隅者占大半，在城镇及交通线者少，乡村及边境者多。在解放区及游击区者占绝大多数。

(2) 成份：

1. 农民占大多数，知识分子少数（教员、学生占绝大多数，别的知识分子甚少），但在K统治区内（即非解放区及游击区），知识分子多过农民一些。

2. 质素，一般是纯洁的，好的，中有部分差些，有多少待清洗，但必经过重新审查，然后下结论。干部本质及数量如何，也待审查后才统计。

上面情形，只是初步接中的初步了解，当是初步参考的轮只收廓。

(3) 特点：

(1) 相当混乱，不稳定，由于北撤复员、疏散、撤退、转移，干部及组织机构新调整。

(2) 多数暴露，包括地区、组织、干部、党员，及基本群众，有的旧的暴露未克服，新的暴露又产生，暴露地区接收困难，接收到了又难活动。

(3)干部——外来多，本地少，多不能立足，甚至全不能立足。地方干部多红，撤退，新的提拔少，赶不及需要，有的简直无从提拔。到处闹干部荒，形成基层组织相当动荡。

(4)社会化、职业化未普遍，经济基础未建立，支出日大，收入少（党员收入无几），生活困难，活动费缺乏，影响工作甚大。

(5)联系差，有的脱节，组织生活少，领导力弱，尤其县、区、支干部未能相当单独解决问题，对党政策方针掌握不住。会议生活少，检查制度未建立（部队党不详，已接触者几全停顿，只事务上之联系而已）。

(6)个别自我学习，很小部分能保持，大部分没有学习，极少集体学习。

(7)新方针、新作风与组织单线意义，还未彻底深入、普遍了解与实行。公开和秘密、此线和彼线、部队和地方的分开未严格、分开了又如何去统一联系配合又未适当建立。秘工差，横关系多，忽视纪律。

(8)当然，党的优点甚多，如还保存相当数量（干部党员），相当全省性的基础，部分骨干部队，部分群众基础，相当好的群众关系，党的地位和威信相当高和普遍，干部、党员质素一般是纯洁，经验丰富，意识观念强，工作情绪与向上精神很好。方针作风已开始转变，组织调整与隐蔽，已有初步效果……，这一切，加上党的正确领导，今后一定向前巩固与发展的。

但是，上述弱点的一面，已严重说明广东党特别是乡村党是非常不巩固的，困难甚多，危机也重。今后局势越恶劣，而我暴露地区、干部、同志及未暴露地区之外来干部同志均可能遭新破坏与新困难。因此，今天广东党的中心任务不但要充分警惕，而且要迅速及时地实际地克服这困难与危机。

(二)今后方针与做法：

(1)力求隐蔽、稳定以至巩固，迅速克服暴露与突出、混乱、脱节的状态，在此原则下，还要点滴地积蓄新的力量，没有前者难

达保存干部、保存党基础之中心要求，有了后者才能给前者以新的血液新的掩护，加强巩固，并造成将来新的发展的准备基础。

(2)做法：

1. 普遍深入传达讨论新的方针、作风，新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打通干部、党员思想关节，使大家领会和运用，不断改善自己。

2. 彻底撤退与安置暴露人员，有计划的〔地〕冲淡暴露地区、暴露阵地、暴露团体（必要时分散转移），掩护目标，避开锋芒。

3. 组织上、地区上、职责上，严格划分，斩断横关系，加强秘工纪律的教育，密切联系，加强领导，按期计划，定期汇报、检查总结。

4. 具体调整及加强各级领干，要求每级（区、县、特各级）领干增到一正一副，力求干部地方化，立即训练提拔一批地方而隐蔽的干部，返去各县、区长期坚持，并立即开始党的审查工作。首先审查区党委干部，各地区干部同样分头讨论计划实行，并首先审查对我为可疑的干部党员，到明年九月得到全体干部初步审查之总结。并对党员一般的了解。

5. 建立交通联络机关（乡村工委本身及对各地区），密切联系，并输送必要书报、文件给各地区。

6. 除立即训练一批地方隐蔽干部外，整个干部，都应整个讨论计划给予教育，有的按级进行，有的各级分头进行，有的开班训练，有的自我学习，和二、三个一起学习。目前干部要求教育训练甚为普遍，事实上没有新的教育训练，要求充实干部，长期坚持与保存力量是很艰〔难〕的。

7. 具体帮助下级建立经济基础，多给办法，并实行提此助彼，提彼助此（因有些地区很穷，无条件建立，有的地区经济条件较好），提倡各种生产开源，并督促干部党员职业化，安定生活，增加党费收入，按期预算结算。

8. 开始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我组织情况，武装情况，农村

斗争情况……指定干部主持，拟好计划，讨论实行。

9. 选择新的重要地区，如战略据点，交通干线，重要学校及K之重要各部门，选送干部，建立新工作基础，广交新的朋友，团结新的大众，逐渐冲破局促一隅。

六、具体布置

立即深入整理，隐蔽稳定，巩固组织与部队，保存力量，长期坚持，克服暴露与过左……这一基本任务与中心工作，所属各单位一致坚决彻底执行外，还有个别问题着重分别提出，分别实行。

(一) 对各地区：

(1) 江南着重争取领导土匪及民众武装，并开辟城镇工作与上层知识分子工作。

(2) 后冬着重健全各级领机及审查教育工作及建立城镇城郊之新基础。

(3) 粤北除重视武装工作外，着重地方上层工作（如莫、沈、少壮派），加强联系，加强其力量，并注意建立城镇及交通干线之新工作基础，包括乐昌在内。

(4) 西江除武装工作重视外，还要注意上层工作，如蔡系，及开荒工作，包括高要、四会、封川、德庆在内，特别是肇庆的工作建立。

(5) 中区着重华侨及知识分子工作与沿海民众工作。

(6) 南路除重视武装外，还要注意上层工作。

(7) 广州市郊区着重交通重镇之新开荒工作、知识分子工作与情报工作。

(8) 潮汕——华侨及知识分子工作。

(9) 各地区切实注意领导农民之抗征（抗粮、抗征兵）斗争，逐渐使之成为一种运动。

(二) 武装：

以西江、粤北、南路为三大中心区。

中区、潮汕、江北次之。

西江武装应靠粤、桂、湘边境活动，尤其注意向粤汉路西侧之边境活动。

粤北武装应靠近粤、赣边向东，以便与闽、粤、赣边取得接近，也应分支向湘、粤边活动（即粤北铁路东侧省边）。

南路武装主要向粤桂、粤越边境十万大山一带活动，别的山地次之。

中区武装，第一是靠沿海山地，第二是靠县边山地，如新兴、鹤山、高明各县边山地。

江北则应靠山地并准备派一干部重新建立从北山地武工队。英德、新丰、翁源武装应靠当地山地。

潮汕武装要切实靠南山、南洋山、八乡山地带。

（三）除江南积极争取领导土匪及民众武装外，别的地区也要重视。

七、一年工作计划：由一九四六年十月至一九四七年九月止。

（一）关于地方党：

（1）目标：做到完全隐蔽、稳定，以及干部上（思想上、组织上）之基本巩固。

1. 隐蔽稳定，上半年完成中区、西江、北江、潮汕、市郊二区。下半年完成江南、后东、南路、海陆丰。

2. 干部巩固：上半年完成省级、特级。下半年完成县、区、支级及所有干部。

3. 划分和调整：上半年完成地区和组织的划分及初步调整干部，下半年完成特、县、区、中心支各级领干有一正一副。

4. 训练：首半年完成三个训班（小型），选地方隐蔽干部（红地区）受训，派返原地区工作。下半年完成三至四个班，受训干部主要是在职的。并令各特、县级也开办（班数由其自定，但须帮助其教材）。

5. 解决省、特级间交通联络及必要书报、文件输送机关及交通人员。

(上半年完成省与广州市郊区、南路、中区、潮汕、江南五区,下半年完成省与北江、西江、后东、海陆丰)。

6. 接收:上半年完成接收博、龙、英、翁、新丰、佛冈各区。下半年完成还有条件收到的尚失联络之地区,并完成初步调查统计(整个组织)与党员之一般了解。

(二)关于部队的:

(1)上半年完成取得各单位的联系与初步了解,给予必要指示和整理精干,基本隐蔽稳定,包括武装本身、武装党及其所属之某些地方党组织。建立武装领导系统。

(2)下半年完成队的干部、队内党干部及其所属地区党干部之审查工作,完成他们在政策上、行动上、生活上得到基本之巩固保证,并建立经常联系机关,定期联系,输送书报。

(3)某些特级设一军领干,如南路、潮汕等直接受区党委领导,但政治上受当地特书领导。

(4)下半年将失散各地之军干重新训练(选择)部分,个别充实各队干部,可能时直由部队调来受训后返队(先决条件是否钱能解决)。

(三)关于领机的:

完成领机内各单位之隐蔽巩固与领机内(包括各单位)各种工作制度与领导系统之建立,如:

1. 集中领导,个别负责,具体分工……

2. 汇报制(每周一次)、会议制(半月一次,必要时可临时召集),检查制(每三个月检查、总结一次)。

对各地区联系,一般是三个月一次。一月半交通联络一次。设外交系统人员及地址(此为该地负责人来港时住食之地),由各地自行负责在港建立。内交,暂由领机内之女同志负责。

3. 建立学习制度,组织学习系统,指定负责人主持领导,每

人每天至少读书两点钟（水准高的由重要文件读起，水准低另定），每月集中讨论一次（三人为限）。

4. 建立直接支及小组，一律开始过组织生活。

5. 依据审查委员会决定，立即计划实施审查工作。

6. 经费上原则是自立，但本年主要靠上级（确定批准数目，按月一次或二次发给，以便预算结算）。并注意下一年经费主要自给之条件。

①上级如何帮助？

②依据所属范围条件想办法。

7. 与别的系统，原则绝断，但如必要而上级批准的也可以立某些特定之横关系（限在香港）。

方方致军委请即转苏北电

——请即派人与吴联络

（1946年11月1日）

军委请即转苏北：

广东军(15)或(45)师直属炮兵营营长吴膺朝是一进步青年，现住南通，最近写信要求反正，希派人与其取得联系，去人自称李一明并说是曾天斛介绍来的与吴联系的，还有好些进步青年。

方

成东

评“广东省参议会”

(1946年11月2日《正报》社论)

被粉饰为“民主政治的先声”与“从小康到繁荣的四大会议”（罗卓英语）之一的广东省参议会已于上月二十五日闭幕。综观这次大会，历时凡十六天，在竞选议长这一幕“莫使人见”的戏剧表演过后，随着是一连串“疲劳轰炸”的官府报告，是一天内“流水通过”两百多件“提案”，之后便是驻会委员的选举和闭幕仪式。罗卓英说，这一次大会已“代表了人民说话，行使了人民权责”。

究竟人民权责在哪里？究竟这些代表们是怎样被选举出来的？我们不抹煞参议员里也有公正人士，但其中大部分都是经过有力者的撑腰，化费巨万金钱，费尽心机，勾心斗角争得来的，其与广大人民连形式上也没有发生关系，这且不细说。单就这次大会举行过程内，由于参议员对政府的质问虽然是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但也提防因而暴露了政府的诸般丑相，因而对口头质询都力加拦阻。大会曾通过设立“民众投诉箱”，但直至闭会时止，“还没有一个老百姓去应景”（见《星岛日报》）。而所谓“请愿民众代表接待所”也毫不发市，“依旧是参座们的休息室，只有三两人在那里私语”（广州《建国日报》）。广东人民自始至终保持缄默，也就说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一党包办的假民主决不寄予任何希望！所谓“全省最高民意机关”举行会议竟在人民中丝毫不发生关系，真是一个有力的讽刺！而所谓“人民的代表”，他们除了竞选议长和驻会委员才热热闹闹，听报告，讨论提案就不感兴趣，迟到早退，借小便退出会场散闷，打瞌睡，吃瓜子，看小报，好象一群顽皮的小学生，胡涂透顶。说这是一幕戏吗，也不能不是一幕连戏子们也不满意的戏。

根据罗卓英的说法，政府是要在这次会上“采纳民意”，使广东从“小康”进于“繁荣”的。不错，大会通过二百七十三件提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通过的是六十余件，也算比较细心些。二十四日一个整天将二百多提案由两个科长宣读，一律以“无异议照审查意见通过”。事后官方发表不详，人民连过目的权利也没有，谁晓得白纸黑字究竟写的是什么？我们要寻找，只好在大会宣言里找出他的踪影，那就是“总其大纲，不外三者”。二百多宗决议就只构成一篇官样文章。老实说，这些文章人民读得太多了，还能生一点效力吗？

且拿几点来说一说。其“经济建设”一项，说是要“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工商事业……以达成主席所昭示我人增进社会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为目的之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事实上。今天政府为了大打内战，征粮抽丁，大大破坏了农业生产。官僚资本和美货倾销，窒死了民间工商业。在二十二日对于省府“函请审议”的“下半年省府预算”时，若干参议员指出省府要起征征实旧欠，实系增加人民负担，毫不体恤人民痛苦的做法，但在“起征旧欠系中央规定”的压力下，就只好“一致通过”。蒋管区的人民因内战而日益痛苦了，稍舒喘息也不可能，谁敢想象到“提高生活”的奢望？

其“政治建设”一项，提到“确立政风，肃清贪污”，可见人民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政府作风的不满，已经不能掩盖，不得不轻描淡写两句以为搪塞。事实上，目前省行政会议举行的时候，就有十六个县长被控贪污，可是会毕人散，这批贪官还不是平安无事的回任吗？这次大会上，李扬敬出席报告民政和二十一日罗卓英出席答复口头询问时，“被控县长为何至今不办？”的质问连串而来，可是质问不但落空，而且省府发言人称，省府须有保障县长政策，严禁妄控县长以确立政府威信了。保护贪污枉法成为政府“政策”，成为“政府威信”所系，这样的“政风”现在已经“确立”起来了，在官僚集团统治下，贪污成风，层层包庇，已成定例，参议会的宣言写下灵符一样的“肃清贪污”四个大字，只有使受难的人民看了

而倍觉感伤而已。

参议会的决议案，照广州《建国日报》说：有人“希望打个五折，就已经使人心满意足”。半官方言论也掩盖不下其失望情绪。至于老百姓呢，连决议的事项是甚么也不知其详，读了无关痛痒的文告只好哑然失笑。他们从来就没有寄托过甚么希望，所以也不会因而失望！不过，我们从头到尾看了关于参议会的报道，所感到奇怪的是，为甚么这幕伪装“民主”的戏，竟然是这般“乏味和疲劳”的过去了。从这次一党包办的省参议会大会，也可推知行将不顾一切而召集的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的花样。

（原载《正报》第12期，1946年11月2日）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广西情况报告

（1946年11月7日）

中央并转周董廖：

钱戎虞广西工委书记，钱兴到港讨论工作情形，约一个月，解决的问题如下：

第一，审查广西四二年午以及其后来柳州之破坏经过，前者原因是秘密组织与大部干部已照南委决定划分郭、潘叛变遂成导火线，但幸撤退尚迅速，能吃苦下乡转业为开荒，不敢保存干部。后者则是撤退不彻底，认为离前次破坏将及一年可无问题，但终被叛徒跟踪破坏，钱个人确是脱险立与大部干部几年埋在农村苦干。现有四百多党员中除有个别自首分子，余尚清楚已要钱回来个别处理加强教育然后工作需要发展越南、粤边工作。

第二，检查去年群众工作，虽然有二十一个地区十多个县民众武装暴动，但宣布敌寇没达到，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制止了进攻县城，缺乏军事干部警戒，集中致受顽军袭击即垮。幸在顽攻击中，立即动员复员，故尚保存百余武装在群众支持中，其今后小部以土匪面目活动迂迴，其他应配合群众斗争反征实、征兵，求得成为群众所悦，而在长久胜利精神下活动，积蓄力量待机。

第三，决定支持广西民主力量（李任公）联合民主力量（黄旭初）集中力量及行动对桂全部劫夺，利用地方民主力量掩护下层救荒救饥，领导反征实征兵合法运动。

第四，集中力量恢复及发展越粤边及过去游击区工作，加强地方工作，桂林、柳州条件坏，近来无法，站不住足的干部，撤越学习，勤交朋友。

第五，准备两三年内掌握依靠群众，独立工作。

第六，钱思想及认识，这次讨论工作对好些中革问题，战略策略具体运用问题，放手动员及有理、有利有节问题，组织上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问题，党下层建设问题，审干整风问题，特委负责同志自我反省的提示，总结过去工作，分析，曾反复漫谈，提示他如上训练班很好的理解，将毛主席路线在桂开花结实。

第七，钱历史全部审查，政治面目清楚，材料将来送上。

方林
成虞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接受传达之指示

(1946年11月7日)

中央并转周董：

连回来传达的指示全部接受，绝不因顽和平攻势而迷醉，刻在具体布置中，如何再详告。

方 林

戊虞

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处理战斗问题原则

(1946年11月9日)

中央并转周董廖：

对于南方武装斗争问题，我们过去处理原则如下：

一、大部武装在可能条件下长期坚持，小部武装分散为武工队，在各地点保护群众利益，保护赤干，发展新据点，新建立的为普遍群众化地方性利用国民党的各种名义，作为待机作战。

二、海南减员问题，我们据庄田说，非战斗员太多（一万四千人吃饭，只有战斗员四千余）不能长期坚持，故向他们提出除主力

精干外，多派小队分散活动，配合意见请冯考虑，这次庄田从南京回说：主力整训以五百人左右，活动我们也不作确定，由冯据情有利措理。闽西南也是经济困难，顽军有六团包围，非对非战斗员及老弱复员难以支持，并非分散削弱战力，而是活动方式，于据灵活变动而已。

三、发动武斗问题，我们即刻需要的，有利二个原则，需要服从有利，但对此胜利条件配合群众及征实，征借，征兵，则一贯坚持教育与指示每个干部。

四、直接来电和我们发动武斗（加强）士兵信心再具体布置好详告。①

林平

戎佳

①中央11月17日复电：“方林：一、戎佳来电，尚有打算继续撤退粤桂干部入越南之思想，难以同意。目前华南干部应尽可能下乡或归回部队，坚决执行中央戎鱼对华南游击战争指示。二、你们对各地武装应设法建立联络，尤应首先抽调得力干部加强粤北（曲江）与南路两支队之领导，或以此两支队为基础建立粤北与南路特委，配备电台通讯员，并就近指挥与联络邻近小股。三、广东敌人兵力空虚，灾荒遍地，国民党又征兵征粮，因此造成了发展与坚持游击战争的客观有利环境。应在党内消除过去认为广东特别长期黑暗，因而必须无了期埋伏之思想；广东党今后中心任务即在于全力布置游击战争，目前香港干部集中，决非好现象，应坚决疏散一部到武装部队中工作。”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转周恩来电

——组织划分问题

(1946年11月10日)

中央并转周董廖：

组织划分问题，自工委与区党委分开工作即开始，现据指示再具体划分如下：

一、南委下划城委一，专管南方城市工作，包括香港、广州、澳门、桂林、梧州、汕头、厦门等地。又划广东区党委、闽粤边委、海南特委、广西工委四个单位，进行小城市及农村工作。

二、城委为第二线，下辖市委，设正副特派员两三人，吸引在职干部分管工厂、学校、街道、公路、市郊五部门，及个别联系。南委以下却为秘密第三线，如有部分暴露党员及个别地撤来港的，则划为第三线。另行组织分散近乡埋藏，但不与第三线混合，各地党委为第二线，以地区扩大武工队。

三、南路（特派员正副二人以代过去特委组织），下辖县委（边县）、区委（或总支）、支部（分学校支部、农村支部），县以下即分二线及一线平行组织。

四、县委以下干部不脱离生产，采取干部渗入商业掩护。

五、各地党委均另定×人专门负责城委及三线系统。只对书记负责，闽粤边以王维负责，海南以何浚负责。

六、城委以梁广负责并兼管第二线系统。陈能兴为副书记，专管第四线系统，到整理完善即分开独立管理。

七、方方负责组织一切工作，下二个干事，一为联系第二线暂缺，一为苏惠联系第三，决定秩序条例，审查党员要点及划分办

法，先由香港做起取得经验。

八、广东农委及大股武装由方、林直接领导，小股武工队由地方二线管理，合法武装由地方三线管理。

九、群众领袖虽由第二线群众领导不参加二三线组织，但以群众面目出现，以免暴露自己面目。

方 林

戊灰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周恩来电

——向琼提意见之根据

(1946年11月19日)

中央并周董廖：

一、中央指出：在现时我们向琼崖、闽西提复员方针意见是不妥的。我们完全接受，但我们向他们提精干意见是有如下根据：

甲、琼崖现保存据点在澄迈琼山边、乐会万宁边、临高儋县边、文昌琼山边合计二十余乡人口不上十万，仍常受敌进攻而不巩固。

乙、老据点琼、文二县壮丁损失二分一，如战前上千余人之南阳江现在不上五百人。整个地区并没做过减租减息，任何为群谋利施政。

丙、征粮工作最多时收到五万石，而群众同时又要交敌伪顽的粮草，负担很重，刻仍要负担我与顽征粮。

丁、一万三四千人吃饭，战斗员不上五千人，时常三天吃两餐稀饭，琼病人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支队级干部无一身体健康并缺乏弹

药，每条枪平均三十发左右，补充极难，只有刺刀。

戊、干部牺牲甚大，只琼山州乡地区干部半年牺牲二百多人，部队下层干部牺牲更大，缺乏指导作战能力，马团结干部、信任干部差，到港之干部都不愿回琼崖。

己、保安队装备虽比顽军差，但战斗力及顽强性、积极性则过之。和他作战很难缴获，到处堡垒林立，并尽力扶植地方团队，进行全面扫荡，他们认为照现状很难长期支持（庄田、林、罗、告）。

二、在如何长期支持游击战原则下，庄、林、罗都必承认队伍一贯只能打伏击偷袭（不可能打阵地）仗，非精干才能补充解决弹药困难，灵活活动，以取得最后胜利，故我们共同最后统一原则如下：

甲、保存精干的几个支队，主力位置于据点，巩固山地，向顽出击，组织无数二十至三十人小队，位置于平原据点，放手领导群斗，配合主力行动保卫地干安全，将老弱非战斗员复员，参加地方生产，数目字由他们依实情规定，以减轻群众负担，提高战士生活，减少后勤负担。

乙、加强群众减租减息，反三征及一切日常生活改善斗争领导，发展为群谋利的好例子。推动全党向其学习，才能取得与群众同生死，坚持游击战。

丙、调选灰色干部党员训练后，派到沿海工作，另立一线以打破顽军封锁。

丁、加强平原区乡上层统线以两面政策，助我及敷衍顽军，在形势好转时变为民主政权。

戊、全琼党应团结在冯周围，展开团结群众路线的二个中心问题，整风运动。各个问题，都以渠谈，交换经验方式，详细检讨并不作为决定或指示。

三、我们认为中央的指示很重要，给我们更大胆和信任放手发展游击战，但我们认为如何长期胜利的支持游击战，我们的意见并没有违背中央方针，值得琼崖党参考。

四、闽西已派人去传达，在山地的据点保一二队主力。在平原

及粤边则以武工队活动，提醒他们发展，谨防冒进退守，谨防不动的历史教训。

五、广东各地如何布置，在讨论中候告。

方 林
成皓

方方尹林平致中央并周恩来电

——对粤游击之布置有何指示

(1946年11月30日)

中央并周董：

我们对广东游击布置及经济预算等电，有何指示望即复，以便工作。

方 林
成皓

恶毒谣言不能等闲视之

(1946年11月30日《正报》社论)

近日省港两地国民党报纸忙着制造一种恶毒谣言，尽其耸动视听之能事，不是说“曾生南返”重新主持军事活动，便是说“方方、林平潜入内地”布置工作；说东江纵队不惯北方严寒，受人歧

视，大部潜回粤境，变做“土匪”；甚至说有“外籍军事人员到粤”指挥“匪党活动”。香港连续发生打单炸弹案，他们竟用大号标题说是“某纵队”所为，而内文又写着“东江某队”，这样就把本港的扰乱治安的非法活动嫁祸于中共头上。

谣言是不值一驳的，但是必须揭穿其背面的恶毒阴谋，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反动派今天在国内，在海外，都抱着唯一的一个目标是：如何消灭民主运动。他们就要象发动内战时有所谓“解除威胁”呀，“防守现地”呀等藉口一样，要镇压民主运动，要把统治区内的人民反抗用屠杀的办法镇压下去，也就少不了找藉口，做证据。所以就要制造谣言。例如要进攻中共就大播中共进攻的谣言：最近京沪下戒严令准备扑杀捕捉民主分子，他就造出一个“共军分子潜入活动”的谣言；现在省港间这一类谣言，难道只在于供给吃饱了饭找刺激的人过瘾吗？不，绝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召开国大，分裂中国，其带来给人民的是大灾难。除了长期内战是其一个直接后果之外，他们必定为了加强这个“合法”化了的独裁统治，势必尽其全力，更加疯狂的打击民主运动和镇压人民反抗，新的“四·一二”事变要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是意料中事。现在广东方面既已大造谣言，则将来在大事捕杀民主分子时，他们便可以说这是潜入粤境的“东纵人员”，那又是方方、林平布置下来的“匪党干部”。现在广州方面绑架拿人的风声日紧，谣言之后必有暴行，我们应睁开警惕的眼睛！

国内政局日非，反动日烈，国民党对海外华侨的民主运动更加忌恨，打击侨胞民主运动的举动也正愈演愈烈。远者如菲律宾国民党特务分子唆使马尼拉宪兵拘捕侨胞，搜查报馆学校，近者如棉兰的拘捕华侨中学教员，堤岸之压迫越南报停刊，如在曼谷之大闹光华堂等等，都是例证。在香港，国民党特务分子也做几回打人闹事丑剧，但因为香港是个法治的地方，所以他们还只能鬼鬼祟祟的做，这当然不能使他们心满意足。不过他们的反动意图是不肯罢休的，

凶暴的花样要想出来做出来的。现在国民党报纸把本港打单炸弹案嫁祸于中共，目的亦不外想师他们在海外破坏民主运动的故智，以便在香港打击民主分子和正义侨胞而已。人们都曾记得本年上季香港也是匪案频生，而国民党亦把它推到东江纵队身上，但结果是失效了，因为一切明眼人都知道事实的真相，而香港当局也是很了解这种内情。我们相信，他们这次重弹造谣老调，藉端嫁祸也是落空的。

（原载《正报》第16期，1946年11月30日）

秘 密 条 例

（1946年11月通过）

为着严密党的组织，保护党的安全，使能最后战胜特务统治，特制定秘密条例如下，作为地方党纪之一部，如违背此条例，即为违背党纪，应受党章所规定原则之处罚。

关于一般党员的

1. 不能和你发生关系的上下属同志以外的任何一人承认自己是党员。

2. 不能保留非经党许可的任何党内秘密文件。

3. 不能与你过去有组织关系而已割断的任何同志作党内性质通讯，并减少无必要的通讯。

4. 没有党的介绍信，不能到任何一地去找党的关系——即使你已碰到那个地方的党。

5. 不经党许可或特别意外事故，不能擅离开党所指定的你的职业岗位。

6. 对没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即使过去是你的领导同志，你可

尽量以朋友帮助他解决困难，一面向党报告，不能与之发生组织关系或恢复其组织。

7. 除党的公开宣传材料及党告诉你向人宣传事件，你得根据情况去宣传处，不许作党内党外小广播，暴露党的秘密。对党内有不满之事情，按级提出报告你的意见。

8. 不是你工作范围的事，你不可知道，更不可窃听，你偶然听到了，应尽量忘记它，并保证不向第三者泄露。

9. 党秘件的信件，你不能拆看，也不能记其来件地址。

10. 除你的领导同志和你所领导同志互知面目外，绝对禁止说出其他负责人岗位姓名。

11. 听到任何不利于党的消息或挑拨离间破坏，必须据实按级报告到上级来。

12. 与公开工作同志如有社会关系，不要特别表示亲热，反之公开工作同志不要找秘密工作同志，一定要找，也应以社会面目出现。

13. 秘密党员响应公开工作同志的号召，必须与群众同进退，不暴露自己，不损害自己工作岗位为原则。

14. 非公开党员被捕时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是党员，即使人供出，也应尽可能否认。

关于机关干部

15. 机关内不能存放秘密文件，临时常用的只能摘要代名保存，用过即缴或藏起。

16. 上下来往电讯即阅即烧，必要传达的应摘要改装。

17. 非经负责人许可，不能与任何人通讯，私人通讯党有检查之权。

18. 非经负责人许可，不能带任何人到机关或对任何人说自己住址及通讯处。

19. 经负责人许可出门，必须告知访何人，何事，何时回来。

20. 机关内不许作违背你的身份的活动（工是工，商是商，做行象行）。

21. 出入机关应多绕道，以自然态度侦察有无钉梢者。

22. 不要记和你没有关系的机关的住址及电话号码。

23. 不准在电话上谈组织问题或秘密性工作问题。

24. 不要在茶楼酒店咖啡室谈工作。

25. 不作书面指示。

26. 不互相介绍没有工作关系而不认识的同志。

27. 机关内私人生活应受党监督，不能对党保守机密。

28. 被捕只有牺牲自己，不能供出任何机关及任何人。

29. 公开党员对外发表谈话或涉及党的政策的文章，都需要经上级批准或同级互审，才可发表。

（各地及各机关可根据秘密原则需要再作增删）

尹林平致曾生电

——电谢东纵慰款

（1946年12月6日）

转曾生：

欣悉远道慰劳，感谢莫名，现尚无适当地址收款，仅代表留粤同人心领，并希诸干部同志，努力学习，加强锻炼，准备时机来到，自电告南返，为人民服[务]，语简心长，不尽所言。

林平

亥鱼

方方致中央并周恩来电

——经济开支情况

(1946年12月9日)

中央并周董：

一、酉月份我手结存港币八万九千一百元，法币二百五十一万元，美金一千六百元，已详前电。

二、戌月份林平支粤委服装费二万二千四百元，乔木支借翻译生活顶屋四千元，蒲特支借刷运洋一千五百元。夏衍支四百元，滌新支借五千元。华商支借五千元。方方家用一千零十八元。研组一百八十一元，闽桂二地交通费四百二十六元。总共支五万九千九百二十七元。

三、支出后存港币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元。法币二百五十一万元。美金一千六百元。我们要求将此款留作活资金。暂不支出，可否，盼示。

四、各部分存款详细支出，当与林平、滌新，再行详核。

方 方

亥佳

方方致曾生电

——请告款项如何开支

(1946年12月10日)

即转曾生：

你在我手中拿去一万五千六百万之款，如何开支请直接向港报告。

方方

亥灰

尹林平致曾生电

——雷波之组织关系

(1946年12月13日)

曾生：

前戍陷电复关于雷波（即张谷虹）组织关系有未尽之处，现再补充说明：雷原系一九四〇年在五华由李里明介绍入党，一九四一年转韶关文理学院与张云彬联系，张被捕后雷赴桂林师范学院断了关系，渡过封锁加入广西肖县挺进队，由何谷有谈话后得上级批准恢复关系，后该队停止活动乃转赴新西执教，同年冬返广州来港，随

队北撤（在港未见司马文森，前电有误）。

林平

亥元

论广州大恐怖

（1946年12月21日《正报》社论）

继上海摊贩大惨案发生后，大恐怖事件又在另一个大都市——广州出现。二天内，捕人三千，围搜了几家学校，拘捕了一批员生，中山大学同学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其数已难于统计。百万市民，奔走骇汗，惊惶失措，不可终日。他们都以“这是什么世界？”一句问话作为他们对统治者杀人犯的敢怒而不敢言的抗议。过去形容暴政，谓之虎狼当道，但是虎狼虽凶，也只能一次杀一个人，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国民党政府，在一天之内，明杀或暗杀，杀掉的中国人民容易统计得出来吗？大难临头，“蒋灾”日亟，天怒人怨，达于极点！

从这种大恐怖事件中，我们应该获得一些什么政治经验呢？第一个政治经验，是说明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进到“格杀勿论”的阶段。实行“格杀勿论”的统治，就是今天国民党召开一党“国大”的实质和直接结果。第二个政治经验，是说明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并不单止于对付中央，而是对付全国人民。他们用美国的飞机大炮进攻解放区，这是不能用“和平烟幕”所可掩盖的事实，但他们同时也用着同样的武器来向手无寸铁的人民进攻，不是也同样无可掩盖吗？第三，是说明了我们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人们过去对国民党反动派认识不足，对时局估计过于天真，思想上有了幻想，有了问题因而在实际工作上也有了毛病，而至于不能适应时局的逆转和激变，今后必

定要斗争下去，就必先在思想上弄清，用新的方法从事战斗！第四，我们不能认为这种屠杀政策是统治者强有力的表现，而且相反，这是万分虚弱的表现，用“格杀勿论”的办法来维持统治。就是说明他们的统治已经危险极了，政治危机快要来临了，他们快要不能统治下去了。国民党在全局是如此，在广东也是如此。为甚么大恐怖要在这时出现？不也是因为六十四师北调，广东当局拿来镇压人民的武力更形空虚，他们对人民的反抗更加担心，更加胆怯吗？

广东本已民变四起，现在征粮限期已迫，征兵日愈疯狂，再加上这种“格杀勿论”的统治政策，人民走头无路，势必迫上梁山，以自卫为自救。因此，民主的战士应该下大决心，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应该认识民主运动有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才是力量的伟大，生植根基，有如苍松古柏经得起暴风雨！广大知识青年更得回想起“一二·九”运动时提出的“到农村去”的口号。特别广东人民有抗战时期的经验可以吸取，过去他们赤手空拳奋斗出来，现在同样也可以起而自救给压迫者以严厉的教训！

（原载《正报》第19期，1946年12月21日）

燕 致 黄 电

——十一师调粤补充

（1946年12月29日）

黄：

甲、陈诚嫡系第十一师因被苏北击溃，调粤补充。现调粤军第六十四师绌国裸部三旅赴苏北，已出发一旬过汉。

乙、陈诚规划长期作战，拟在今后一年内将共军逼至山岳，肃

清所有平原地区，但其慕僚对此仍无信心，据谓蒋之嫡系部队除胡宗南外，大都集中徐州一带与东北地区，已不敷调遣。

丙、有人建议对蒋军作战应另准备少数未因参战而致疲劳之精兵专用以逐击缴械，使其不能休息整理则所获必多，因蒋军每值战败即易溃灭，而稍加停息亦易恢复。

燕

艳

在复杂的形势中作胜利的奋斗

——公开合法与秘密非法配合起来

(1946年)

星星(方方)

(一)内战是目前的特点

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企图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坚持其独裁的统治，由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企图殖民地化中国，以找寻其战后经济恐慌的出路，因此美蒋勾结一致向中国人民进攻的内战爆发了。尽管一年来的内战是时打时停，时紧时松，边打边谈，此起彼伏，那不过是因为反动派内部的困难，国际的顾忌，人民的反战运动，人民军队的强大足以阻止战争，我党的坚持和平方针种种条件，使它不能放手大打而已。但美之助蒋政策既未有转变象征，蒋之压我退出苏皖、热河、东北、山东等地及交通线，独裁独断的定期召开国民大会，推翻政协决议，一切都说明他们是在准备大打，准备放手大打。因此全面内战的危机仍是当前时局的特点。

（二）和平是肯定的方针

不管内战将如何发展至全面大打，但和平的方针仍是肯定的。国际人民、国内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安定人民的生活，也只有和平才能恢复战前的繁荣，这就是和平最广大和最巩固的基础。中国的长期的全面的战争，不仅足以毁灭中国，而且将牵动太平洋以及世界的和平，这在中国在太平洋有利益的盟国不能袖手旁观的，这不仅是英国（反美独占中国）、苏联（需要一和平民主对苏友好邻国）不能永久坐视中国内战下去，甚至美国正当商人将因中国长期内战而不能投资贸易，也不能不考虑与促其政府修改其助蒋之政策（当然主要的是苏联与各国人民的反对战争）。

中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力量，现在固然还不能发展至有直接制止内战的总行动，但由于反动派的出卖民族利益所引起的民族工商业的倒闭，征粮征实横征暴敛之农村之破产，特务横行，人权之毫无保证，死中求生的斗争总有一朝会爆发起来的。现在城市的和平民主运动，示威游行，罢工斗争，以及农村民不聊生，匪患频频，农民骚动，就是这种和平民主运动来潮的信号。

人民解放区及人民武装，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空前的发展与巩固，他们不仅有足够力量可以击退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即使是美式装备的中央军也仍比不上过去日寇的顽强善战），捍卫和平，而且有足够力量可以生产建设，日见繁荣，迈向民主的大道，成为全中国人民奋斗目标的榜样，这是和平民主必然实现的决定因素。

反动派依靠外援，竭泽而渔，幻想打烂了美国会帮他建设（陈立夫语），但打烂的是他自己，没有利润的建设，帝国主义又没有这样傻。而中国人民也断不容许他打烂，弄得活活饿死，总要起来和他算帐。甚至于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之反战，反动派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他们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打下去是他的雄心，但雄心却不能实现。

所以问题不在于反动派要不要和平，而是在于我党能坚持人民

所要求的和平与有力实现人民所要求的和平。这就叫“和平为大势所趋”，也就是和平肯定的方针。

（三）制止内战，迎接和平是我们奋斗的任务

因此我们目前努力的方向，便是如何制止内战，如何准备和平到来的工作。不制止内战，不能实现和平，不准备和平到来时的工作，便会失了预见，弄至和平到来时措手不及。

（四）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

在国民党地区领导制止内战，迎接和平，力争民主，本来都是公开合法的东西，但是由于反动派的独裁政策，使中国人民毫无一点民主自由权利，要和平，谈民主，和抗战前一样，谈抗日就有罪，因此自然而然的迫使我党不得不成为秘密与非法的组织，以各种方式来领导和平民民主的斗争。

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这两个问题在我们党内长期并没有解决得很好。大革命时期，我们的公开合法工作是对的，然而没有准备应有秘密的非法工作，到了“四·一二”事变，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才转入秘密与非法。内战时期，我们的秘密组织与非法斗争，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摈弃公开与合法的利用，结果断送了许多革命的好机会，甚至如“九·一八”、“一二·八”那样好的高潮。在另一方面所谓争取反帝拥苏配合红军行动的公开运动，又断送了许多秘密组织与干部。抗战时期，我们又以公开合法的姿态出现，然而对于秘密与非法的工作没有被重视，结果遭受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前后党的组织的继续遭受特务的大破坏。这些血的教训，值得今日我们必须严格来检讨。

根据我的痛苦的经验与今日我的认识，我认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从下面四个问题着手来研究，但是否说得对，我未敢作最后的肯定，希望同志们能够在我所提的这四个问题再作补充或修正。

第一个问题是对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的认识问题。

历史上我们为什么常常在公开合法工作的时间，忘记了秘密与非法，而在秘密与非法时间，又忘记了利用公开与合法，便是对于这两个问题没有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弄得清楚。

中国革命的对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统治是假借外力，依靠封建，出卖民族利益的独裁法西斯方式，人民丝毫没有半点民主的自由，独裁者的意旨就等于寡人的圣旨，因此对中国人民每一点意见都认为非法、叛逆、救国有罪、抗日有罪、民主有罪、批评美国帝国主义政策有罪，因此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人民解放斗争，尽管如何温和，都不容许，因此中国人民被迫不得不使用秘密的组织以领导非法的各种斗争，以便在展开解放运动时，避免遭受打击，保全自己。

可是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是软弱无能、矛盾多端的腐朽的统治。当各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矛盾或统治集团本身矛盾不能解决的时候，它不得不听命于某一个对于他较有利益的帝国主义，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因此给予中国人民在某一时期某一事件上可以利用它来击破某一个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及最坏的某一派别对于中国的侵略出卖。同时当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旧的统治方式（出卖独裁）惹起人民急剧反抗到了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它又被迫不能不作若干表面上的“改良”“民主”来缓和群众斗争。抗日战争以及日本投降后的和平运动，政协会议，就是被迫出来的。因此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便时常带有公开合法的方式出现。

但是，正因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出卖独裁的统治方式基本不变，因此当它被迫不能不给予群众以若干民主自由的时候，它仍时时刻刻企图消灭群众的力量，加强其特务政策以作屠杀破坏。抗战初期，我们便是过份相信他的“进步”，以为它会死心塌地的来打日本了，它会迁就群众的要求了，因此我们在公开合法合作的工作中

忘记了秘密掩蔽的工作，结果由一九三九年起到一九四二年，我们到处受破坏，捕捉、屠杀，这便是一个血的教训。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既然采取破坏、捕捉、屠杀我们的政策，而忘记了在这一阶段中它的基本矛盾尚未解决，它不能毫不顾忌地一直干下去，便只采取单方面的、秘密的、非法的工作方式，我们又犯了关门主义，失却利用公开合法来动员广大群众起来自救解放。便不能利用一切公开的特别群众的组织来巩固秘密而非法的党与群众的联系。

这说明了反革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有反革命的两面政策——既合作又反共，我们便不能不有革命的两面政策——既团结又斗争来对付它。而团结与斗争便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公开合法的群众的方式出现，才能广泛有力，同时又必须加强秘密与非法的党的组织方式来保护自己，不受打击。具体说起来就是我们对于群众工作应该采取放手的利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动员，使其尽量的普遍发展，而对于党的组织则应是短小精干，严肃秘密，埋藏在群众之中，以群众团体，群众面目，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群众情绪定出为群众所拥护的口号而工作。

第二个问题 群众问题

不管是利用公开合法或采取秘密非法，其唯一问题是争取群众的策略问题。

部分公开合法的党员，为着公开传播党的政治影响、政治主张，唯一目的在于争取群众教育群众。秘密非法的党，掩蔽在群众之中，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进退，唯一目的也在争取群众，教育群众。

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群众团体，群众工作，主要在于争取群众利益，保卫群众利益，即使有时被迫不能不采取非法的工作，非法的斗争（注意，是被迫不得已时），也是为着争取群众利益，保卫群众利益。

譬如抗战初期，环境容许我们作公开合法的活动，因此我们各处派代表，设办事处，办报纸，组织救亡团体，发展救亡运动，从公开合法的方式来争取群众。到了武汉沦陷前后，反动派的独裁面目复露，封闭群众团体，限制救亡运动，坚持失败主义的片面抗战，那时我们为着民族利益，我们便不能不根据群众的要求以及群众的力量，适当地采取“非法的冲破其限制来争取群众”，而不能始终局限于公开合法的方式了。可惜那时我们大后方的党，没有明确的那样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譬如救亡运动公开合法的，而改善群众生活被反动派认为是“非法”的。我们认为只有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扬其抗战热情，支持长期战争，则我们也唯有放手动员，利用公开合法的救亡运动，而又必须适当的利用多种社会习惯，甚至敢于冲破其限制的作“非法”的改善群众生活的斗争领导。也可可惜那时我们大后方的党，没有明确的那样做，因此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但是，不管是冲破其限制组织群众也好，不管是冲破其限制改善群众生活也好，都是为着争取群众，支持抗战，坚持抗战，逼迫国民党抗战到底，到胜利，而不是分裂的政策。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利用公开合法的方式，足以动员群众，改善群众的生活，我们便应利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反动派禁止我们以公开合法的面目来动员群众了，我们便应根据群众的力量，群众要求，适当采取非法的来冲破它，一直到争取转变成为公开合法，迫他不得不承认。——服从于当时党的总任务。这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因此，好象今天的民主运动，人权保障，本来都是公开合法的，我们应该放手的来动员，即使是反动派认为民主自由是非法的。我们也应冲破其限制，用各种方式来动员。不能因为反动派〔的〕控制，而不敢作这种“非法”的斗争。同时这一斗争的目的又仍不超出于实现民主与自由。

第三个问题 联系问题

正因为反动派所采取的是反革命的两面政策，因此即使某一个时期有比较公开合法的工作的条件，但仍采取上松下紧，时松时紧的作法，松为着使暴露，以便紧时的打击。因此我们对于公开合法与秘密作法的二个工作方式的如何正确联系。也不能不加以检讨确定。

上松，说明了我们的上层人物，上层工作，更容易于有条件进行公开合法的工作；下紧，说明了我们下层应更多注意于秘密掩蔽的工作；时松时紧，松也是为着暴露革命力量，以便于紧的打击，说明了斗争的迂迴曲折，长期复杂，使我们必须从最坏打算。

因此公开合法的上层，应是轰轰烈烈的公开号召，而秘密非法的下层，则应是切切实实的埋头工作。上层为了争取好的条件以掩蔽下层，下层为了切实的动员群众支持上层。没有上层的公开合法的轰轰烈烈的工作，则下层秘密非法切切实实的工作难以展开，也容易暴露。没有下层切切实实的扩大的群众工作、群众基础以支持上层，则上层的轰轰烈烈的公开合法的工作，结果只能是空空洞洞。抗战初期，我们便是犯了这种错误。

因此，目前我们的工作步骤，上层为先，下层为后，而斗争策略则以公开合法为主，秘密非法为辅，秘密非法服从于公开合法的号召（它有便利的条件），而一切公开合法的工作，则应为了下层的切切实实，才能有所得。

因此，目前轰轰烈烈的城市的民主运动或农村上层工作，是为着掩[护]切切实实的工厂工作，农村工作，是为着培养干部，创造干部去发展切切实实的农村工作，工厂工作。目前必须派遣干部建立城市工作，城市工作的开展，就能更好的影响与推动农村工作。

第四个问题 配备问题。

一切工作方针决定后。如果没有好的组织工作，只能等于一句

空话。配备工作是组织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要有好的配备，必须了解干部，熟悉干部，因此就必须审查干部。干部的政治面目，干部的社会关系，干部的工作特长，干部的工作兴趣，是审查时必须解决的四个要点。

了解干部的政治面目，利用其社会关系，适合其工作兴趣，发挥其工作特长，妥当处理其岗位，信任干部，让干部长期的放手去干则干部自能胜任愉快的工作。

有良好的社会地位，有威信，有社会关系，有公开的活动能力而配备在农村工作，下层工作，秘密工作，这是才非所用。——虽然给他们在下层锻炼是好的。

一时公开，一时秘密，又管公开，又管秘密，这等于向敌人告密，妨害不浅。

政治面目不清，随便拉入党内作秘密工作，这是破坏党的严肃性，遗害无穷。害怕“活动”分子，因其有若干缺点而不敢因材施教，这是关门主义，限制我们事业的发展。

过分使用，过早使用，要求过高，贪目前的便利而忘永久的利益，这是短视的手工业方式，忘记了伟大发展的前途。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过去在配备干部于公开合法或秘密非法时所犯的毛病，必须予以纠正。

（五）我们一定要胜利

问题似乎很复杂，既是战争，又是和平，既要公开，又要秘密，不是很矛盾吗？很麻烦吗？但是革命就是要解决矛盾，革命就应不怕麻烦，让我们从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中，学会公开合法的工作，也学会秘密非法的工作，更学会公开合法与秘密非法如何同时工作；如何正确联系，以解决这个复杂形势走上胜利之道路吧！

东江纵队北撤与广东新形势

(1946年)

林 平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东江纵队人员二千四百名，在沙鱼涌乘美国船北撤，七月五日安全抵达烟台。

东江纵队为什么要撤退呢？有人愤愤不平地说：经过长年岁月艰辛缔造的武装部队，就这样撤退了，岂不是全功尽弃么？八年来日本人尚且消除我们不了，现在反动派就能消除我们么？为什么不可以和反动派打下去呢？尤其是曾经共患难同生死，视东江纵队为救星的民众，更加不安，离别自己的子弟，固然伤心，今后生活如何，前途如何，尤为忧虑。

东江纵队是撤退了，它的撤退是为了执行中共中央的和平民主方针，忠实实践国共双十协议的；也即是为了实现广东的和平，使人民不再受战争的磨难和负担，得以安居乐业，保障既得的利益。

在八年的战争灾难中，人民已经受尽了无限痛苦，为了击退外来的侵略者，我们必须以战争消灭战争，一旦打倒了日寇，便应实现全国和平，进行建国，如再战争下去，实在是违背人民意志的举动。只有和平，才能使灾难消除，元气恢复，倘真心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必须和平合作，断不容兵戎相见。抗战之后，复继以内战，这是投人民于水火，使人民重受灾难，实在是残暴的非正义的行为。只有和平，才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也就是中共的主张。全国的和平实现了，广东的和平民主也就会实现。为着换取广东及全国的和平民主，东江纵队就是本着这个方针撤退的。

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设战

后的新中国，奠定和平建设的基础，曾经双方签订了双十协议。在协议上同意了中共武装撤出广东地区。中共一贯是言行一致的，忠实执行自己的诺言的，对于协议的事情，不管别人做与不做，自己一定做到。为了忠实执行诺言，东江纵队就撤退了，这一撤退，是中共很大的让步，是为着顾全大局，服从全国的利益的，只求对人民有利，即使是一时的，局部的，中共都愿意争取，愿意让步的。这种让步的代价，就是人们得到休养生息的，不受战争痛苦。而且国民党当局曾答应了种种保证：保障解放区内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歧视复员人员与家属，继续实行民主建设，改善生活。我们是希望政府当局能做出比以前更好的建设来。至于东江纵队的业绩，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不会前功尽弃的。

东江纵队并不限于东江，其实是包括了抗战中培养锻炼出来的各地青年干部和队员，差不多是除了琼崖纵队以外全广东的中共武装人员。如此庞大一个部队，只得二千四百人的撤退名额，这本是极不公平的事，但是为了委曲求全，取得协议，使已经拖延许久的问题得以早日解决，俾各地进行的内战得以早日停止，免得更多的人民与战士作无谓牺牲，只好再作让步，把大部分人员遣散或复员，尽量缩编而将重要干部及优秀分子都随队撤退，使革命斗争中长成的精华得以保存，而他们到了华北之后，可以协同我们的兄弟军共同建设解放区，为人民服务，加强学习，继续深造，以期将来，贡献更大的能力于民主事业和桑梓人民的幸福。

东江纵队此撤之后，有人以为党在华南的力量是薄弱了，对前途失了信心；有人感到徬徨，不知怎样做法。是的，东江纵队北撤后，广东出现了新的形势，新的局面。国共力量对比起了变化，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广东又占了绝大优势，人民还要暂时忍受着蹂躏，这是我们应该重视之点。

抗战前陈济棠统治广东时代是形成着地方势力反抗中央压迫；在抗战中，余汉谋拥有相当数量的自己嫡系军队，仍带有多少地方色彩；但是在今天，整个广东已中央化（即特务化）了，各级党政

机关，差不多都掌握在军统、中统法西斯的反动派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成为抗战后广东最大的一个变化。

但这种新的变化，并没有消除或减少各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一年来的事实证明：各种矛盾复杂的斗争，更尖锐，更紧张。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实行内战分裂独裁卖国政府的结果。

由于实行内战独裁政策，便要征实征购以充军粮；便要征兵拉丁以充兵源；便要增赋税发纸币以充内战经费；便要把联总物资移作军用；便要出卖国家无限主权以博取外援；便要开放门户，奉送海关以摧残民族工商业；便要加紧各种政治压迫预防一切反抗。于是便造成了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的现象；便要造成了官僚买办资本八面威风，民族资本救死不暇的现象；便造成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无忌，民族正气消沉沦丧的现象；在广东同时又造成了外国帝国主义利益上的严重冲突，其结果，便是政府与人民之间，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法西斯之间以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都存在着矛盾斗争，而且日益复杂与尖锐。

国民党反动派明知这种矛盾于己不利，而且力图缓和这些矛盾与掩盖这些矛盾，极尽其欺瞒嫁祸之能事，如把卖国描写成“爱国”；把州官杀人放火描写成“维持法纪尊严”；把内战描写成“和平统一”；把一切祸乱的烂帐都会转嫁在中共身上，但人民所经验的事实太多，一切谣言巧语都无用处，尽管反动派想控制整个西南，巩固其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大本营，但人心的丧失不能挽回，人民的贫困不能解决；社会的治安不能维持；工商业危机不能解救，被排挤的地方实力派仍有其强大的潜在力量，邻省的广西，西南中心的云南，地方势力与中央特务的斗争日益激烈，一切这些说明广东的反动统治者不过坐在潜层较深的火山上面，这就是我们对于广东的局势看法的另一面。

我们又必须明确认识有关于广东人民武装自卫斗争问题，在东江纵队撤退前，从粤北到海南从南路到韩江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

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无视“双十协议与停战命令”，企图在最短时间内，把中共部队消灭。把主力的东江纵队从江北迫到江南，江南迫下海，而且卑鄙地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部队，阻挠第八小组工作；到无法否认之后，又横生枝节，诸多拖延，同时对各地解放区疯狂进攻，想在未获协议之前一网打尽；到协议之后，又企图沿途截杀，并在集中大鹏时聚而歼之。当时的借口是有中共部队，非打不可，现在东江纵队已经撤退，理应恢复秩序，和平建设，不料竟不顾信义，完全违背自己所作的协议诺言，立即布置大规模的“绥靖”“清乡”，军政最高当局从六月底到八月中不断的来去奔波，在江北、粤赣边、韩江中区、琼崖、东江召开治安会议，亲自督促，限期全面肃清“土匪”，联防联剿，联保联坐，强迫自新对解放区民主政权摧毁无余，恢复以前的苛政，强迫成立自卫队，恢复征兵与征实征购。妄言中共准备暴动，扰乱治安，实施戒严，在广州、惠州举行所谓“警备大演习”，对民主运动压迫备至、实行恐怖手段迫使民主人士逃离广州。而对于东纵复员人员，更宣布要登记，以便集中受训（就是集中营）加以歧视虐待，毫无安全保障。对琼崖纵队不仅继续否认，而且除原有一军兵力外，又增调五个保安团围剿，并由保安副司令亲自指挥务期歼灭，借以图赖。这些残暴的罪行，充分证明了反动派是自食其言的背信弃义者，在人民面前显出他自己的真面目。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反动派气焰必然更嚣张，广东定会有有一个时期陷于黑暗局面的。这样做，怎能使人安居乐业？什么地方有和平？什么地方人能够安分守己？压榨剥削愈大，人民就会铤而走险，自动拿起一切武器，起来作保卫自己争取生存的斗争。我们警告反动派，如果仍然实行政治高压，经济榨取反动政策，人民的头脑是清醒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拳头更是无情的，他们不会因为东江纵队撤退了，就软弱无力，任由宰割而不敢反抗，谁敢背叛人民，反对人民的，必然走上死路。

我们是与人民结合的，是与一切民主利益结合的。我们必须团

结各阶层的人民在一起，大大发展民主运动，因此我们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应当做，必须做。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的优势并不可怕，他们有许多矛盾对消其力量，有许多矛盾之间的空隙可以运用，我们显然是在于劣势地位，但〔我〕们并不是孤立的，我们有生存与发展的条件，问题只在于我们自己，怎样去做？做不做得好？

东江纵队撤退后，在广东除琼崖以外的地区，武装斗争虽停止了，但我们决不会放弃政治斗争。中共部队是撤退了，党是没有撤退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依然在指导着运动的发展，每个党员都在继续为人民服务，为争取广东的和平民主而奋斗。但在目前高压恐怖黑暗统治之下，党还不能公开合法的进行斗争，必须改变作风，改变方式。每个党员要与社会上一切人士建立友谊关系，深入到群众中去，把自己的业务和功课勤谨做好，善于保存和坚守自己的岗位，从此实地去观察社会的各个方面，就可以发现统治阶级内部的许多矛盾，社会关系中存在的许多矛盾，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之间，就有着可以生存可以活动的条件，要抱着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避免轻举妄动，力戒急求事功，只要实事求是，沉着处事，一定可以克服困难，积蓄好力量，配合全国斗争的有利条件（民主反战运动的高涨，人民军队的强大，军事政治斗争的胜利，国际的压力，以及反动派本身的许多弱点）以坚强的必胜信心，毫不松懈的坚决斗争下去。在总的形势好转时，广东的黑暗局面是不能长久的，一定被打破的。

但是，更应该了解，胜利是不会自己来到的，我们不去努力，或松懈努力，那就等于放弃阵地，放弃斗争，使一切有利条件都会落空，把胜利的时间推到很远，另一方面，又要了解，胜利并不是一蹴即就的，以为样样都有利，反动派诸多弱点，不堪一击，那也是不对的。革命是长期的艰苦的，是一步一步争取到胜利的，不是很爽快的一觉醒来，就天下太平的。只有抱定努力决心进行斗争，毫不松懈，毫不悲观，只有长期奋斗，坚持到底，不急躁，不撩切，胜利是一定到来的！

广东区党委关于 游击区武装问题处理办法

(1946年)①

甲、方针为长期荫〔隐〕蔽，避免遭受打击，积蓄待机。

乙、具体措〔处〕理：

(一)已复员而有安全保证地区，绝对不动，勤业，勤交友，与群众同进退，斗争采用群众路线的公开合法方式，不随便拿出武装来。

(二)已消化在地方团队或乡族自卫性武装，维持治安，保卫群众利益，强调地方化，并职业化，反对集中，逐渐肃清过去民国生活样式。

(三)未声明撤退地区武装，在安全条件下自动复员，如部分复员不安全又有生存条件则保留短小精干的小部作自卫，筹借生产基金，与支点群众合作生产、学习，不要随便行动，万不得已，配合群众斗争也应以群众面目出现。

(四)仍受进攻地方，利用社会上层缓和局面，在群众掩护下用不刺激方法肃清敌特，求得支点隐蔽的巩固，白皮红心去应付局面，掩护我埋藏山上，形势缓和后依第三项措〔处〕理。

(五)群众斗争应以和平合法为主，有广大群众行动的斗争（如抗征实），也多采合法方式的恳求、说理、拖延顽抗、减少，互为配合，不轻易使用武装，万不得已时，才采少奇同志所谓依山为群众做好事，但不能反害及群众。

①年份、作者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六) 队员流入土匪不愿回家生产的需要领导，但应建立另一系统，另作联系，指示其劫富济贫，可能时，找到生产基金后设法生产，以免乱碰受到损失及害群众受清剿。

广东临委与 扩大军政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武装斗争、根据地工作情况和当前任务

(1946年底)

第一，除东珠队活动区外，停止发展，当时任务发展游击战争，发展游击区深入敌后，发展中心着重在武装工作。

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九四四年八月，此任务未变化。

其次是如何联系及审查破坏组织，主要是防止破坏的扩大，保存一些干部疏散到部队，城市工作是保存现有力量，等待将来时机恢复活动。

这些任务是对与正确的，表现：

1. 过去不注重敌后的武装斗争与工作，这弱点——错误克服过来！

2. 过去没有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已克服过来（许多干部都送去敌后）。

此时又派人到各地去恢复联系，多数在一九四四年后接上的。

不对与弱点：

1. 对地方工作无更明确的具体指导（此时曾几次要求中央对

一些已审清楚的恢复，但不准抽些干部到敌后整风——这一点自己没有做得好，没整个的计划。

对东珠正在工作的，又未很好强化起来。

2. 对部队的党也不重视，会为不健全地拖下去。

3. 城市工作也不注重（在八月会议才较重视），因此到敌投降时存在的极少，派回的也极少，甚至保持也不能，削弱了。

那是不了解城市工作重要所致。

4. 对统一战线没计划（过去要创造广东统线模范省）比从前反了过来。

那时思想上还没有解决广东问题，虽有独立自主与游击战争（张认为广东武装没有前途，后又认为干部好，有前途）。

在敌人未打通粤汉路前，以后才有一些（坚持信心，建立根据地信心也有，但眼光不大）。

（没有看到□□的坚决性与人民觉悟）

第二，一九四四年四月敌人新的进攻，牵动到广东。

这时才考虑到打开广东新局面及夺取广东的思想，及大大发展广东武装斗争，要党配合武装斗争，建立解放区（梅花点的发展）。八月会议才指出：一切为着打开广东局面，建立四个大解放区，中山根据地，广东完全变成敌后，只少部分未给敌占，〔培〕训了二千多干部，派了干部到各地，又恢复了城市工作、地党工作（中央同意了这意见），把城市工作看与其他工作等。

派队出西、北、中区、东区，过江北（十二月中央来示指示这些决定完全正确）。

一九四五年五、六月，中央指示要靠山地发展向北靠，须与中心决定第一步到江北，以后看情形再决定。

决定了各地抽主力北上，并再增部队上去，中心工作在打开广东新局面并恢复地党工作，并准备在敌可能占地区发展，武装群众，组织政权，减租减息、民兵等也已强调起来（初期一些同志认为新地区勿提减租减息，恐刺激了地主）。

这些决议是我们广东党思想上的进步，都是正确的。

但是这些决议的贯彻性不够，如鄧的调回，敌降后自己也起了变化，是不是可以完成成了疑问，也没有再继续坚持，更谈不上进一步发展。

其次，恢复组织，统一领导也搞不好（统得暴露了清光，无原则，麻胡〔马虎〕，一般化）。

这也由于领导上未能具体正确的指示，城市工作的目的、方针、政策〔未〕更清楚，也一般化。

敌人降后

第三，对创造五岭根据地的思想已起变化。

第一时期由一九四三年一月临委成立到一九四四年八月。

第二时期 一九四四年八月——日降

第三时期 日降后至北撤。

宣布降，那时仍接中央要越快越好，仍决定走，决定九月十三日走，十八日宣布非□命令日不降。其次朱宣布第三两天回去（九月初）上与不上？犹疑中，九月七日K来进攻，中央复电日突降，起变化，认为不上是对（那时自己已到江南）。到江南，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毛去重庆，看到广东斗争非常残酷，提出一方面迎接斗争，一方面迎接和平，提出部队精干，派人出城市，以后城市到乡村，当时这样做法是对的。

不对的是坚持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实现八月决议未提到，是否坚持到解决广东问题，还是坚持到民主实现。但K不实现又如何？未解决，没有想到。所以没根据地思想、没战略思想是不能说的，但没有坚持是事实。这问题十月会议时也未解决。

城市工作也是着重作和平民主实现的布置，也无具体意见，〔部〕队的精简未从精神上精简，促成悲观逃跑。

对今后广东严重斗争只是一个时期的，对地方党工作（十月）未着重研究讨论。

第四，双十协定以后；

双十协定后有指示，政协后又有指示。

整军协定，当时看法是一定要进入和平，实现民主（第四阶段是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看到这一面，没看到另一面，那时提出突破广州法西斯堡垒，议会的，群众的斗争、武装斗争是尾声，当时斗争是地方反动派违背上头命令而有的尾声，宣传干部配备也依此精精。

另一方面，东纵的坚持斗争如何实现未有解决，不知要依靠山地，分散到能生存的各地去，加上实际情况K十二（集团军）的进攻（十二月路西填空格地），经济地区差不多完蛋，减员厉害，日降阶段为最高峰，一万三千到七千，以是强调实际的困难。那时不设法去解决，依靠谈判、和平、撤退，以保持力量。

那时虽提出冲出也是保持的动机，不是坚持的动机。

则能领——实际上坚持精神有弱点。

指挥部冲出问题。

（二月九日去渝）

撤退：1. 为保持力量，坚持。2. 实际情况的困难。3. 全国形势决定（不撤亦要撤——毛）。

撤是失败或成功——是成功，提出撤后要掩三五个月，以避扫荡锋芒也对，但有毛病。

临区的领导基本上是对的，但因思想上弄不通，搞得有些弱点是事实，在大变动下思想上有些弄不通；强调撤退，坚持问题没有解决，生产结合群众未强调，停止党生活，党领导，不对。

根源：（1）把中央指示片面的认识，一切从和平民主局面实现去打算（把可能性当作事实），这是非无产阶级的幻想做根据（对K是幻想）。

（2）强调撤退坚持不够，有一般的号召无具体的解决问题。

对决议计划的贯彻性不够。

民主集中的领导不够。

干：（1）这次检讨不仅是组织的团结，而且是思想上的团结

(自觉的服从)，使团结更进一步的提高。

(2)着重弄清楚各阶段条件对与不对，轻重。

(3)检查是积极性的，保证今后更顺利的发展。

争论中心：

原因：

(1)客观的：中国革命发展过程这时期是复杂的形势，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

(2)主观的：没有深入研究“七大”决议、方针。

偏向：问题的大小轻重分不清。

全期□□思想的领导。

根据地靠山问题(日降时间解决广东)。

当前形势发展与特点：

(一)蒋记下决心全面大打：

1. 蒋的政策，经济危机无办法，想从大打中找出路，这就是说不是他更加强了，而是无办法中的狗[急]跳墙。军事上想提高士气，企图在集中战场中打出个名堂，打出一两条交通线；政治上，改组政府[也]不掂，因为遮门面的东西。但无法也只得拿出来，经济上，不能长期战争，想早结束战争，以解决危机。

2. 美帝帮助他：借款五亿，因反对，不能实现，用其他方式借他(物资)。

3. 军事上提高，政治上欺骗，经济上不仅牺牲农民，甚至牺牲中小资产阶级。

其次是加强特务的政治上、文化上[的统治]，因此全面大打不仅是军事上打名堂，经济上对中资，政治上造大阴谋。

这是个危险形势的到来，但同样要指出这是绝望措施。

1. 军事上士无斗志(陈诚也不满)。(张答：只有半年)

越打越弱：(1)放下武器的多，(2)快速交通纵队也一样垮(子奇的自杀)。

2. 政治上，改组政府会□□得出来，但只能代表其一人，大

逮捕已被暴露。

3. 经济上：五亿不过支持一两个月。

去年十二月农民暴动都不过土匪形式，现已是群众行动了。

合起来可能造成总危机、总崩溃。

故打出和平条件是存在的，但新的条件增加，另一形式下的和平也会到来。

(二) 当前造成一个总反攻，打出一个和平。

1. 军事上继续消灭其主力，发展游击战争，发展政治上新的力量。

2. 揭破他的阴谋，改组政府是御用的：(1) 伪装民主下的屠杀逮捕的特务政策；(2) 保有我们在城市的据点（不作大规模活动）；(3) 孤立独裁，稍有威望不参加其政府；(4) 整个群众运动从当前特点生活上、经济的反特务的、动员群众保卫保存力量。

3. 组织方针严密巩固发展据点，准备干部，加深群众的联系。准备干部是两面的准备（城市与乡村）进一步的联系（对已广泛发动起来的要组织使用）。

当前工作：

1. 放手发动农民斗争，需要时配合（适当的）武装斗争，如发展有利时可大胆地搞起来，没有利时要适当的退出。

2. 和健地推动城市爱国民主运动、反特务斗争，策略上暂时的退却，但又要自己的退却。

3. 对城市党的工作要深入地放点，巩固地放点：(1) 看来来潮快；(2) 目前弱。

4. 依照计划、审干整风（以刘报告为中心，联系林报告工作总结）。

具体划分公开、秘密。了解干部，适当分配干部，准备大胜利时来使用。

关于群众工作问题

(1946年底)

1. 群众工作的意义

群众工作的观点

群众工作的路线

2. 怎样放手发动群众工作问题，从中国的群众运动史上及广东方〔式〕过去都是由城市到农村，如“五·四”、“五·卅”、抗日战争时期都是由城市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回去发动农民起来抗日斗争，武装对日一般来说都是能够发动起来，但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注意组织收成，停留在宣传上，第二点是不能深入下层，一般都是少男少女，或农村半知识分子，但对农民、贫民、雇农、贫苦人民身上〔却不注意〕。

第三点没有和群众的经济生活密切配合，使他们和我们更加密切起来，基础不稳，因此逆流一来便不能坚持斗争。

这就是说，环境好时不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但同时又不敢及时收来。

3. 怎样改正不良的群众观点与正确的作风。

目前基本上我们是放手发动群众，但也要顾到工作的长期性，要注〔意〕到不过左及保存力量这个问题上，当成熟时期不轻易发动大斗争，对每一个斗争都要注意到“本钱”与“赚钱”的问题。

- a. 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
- b. 群众工作的内容问题。
- c. 对各种地〔区〕不同的工作问题。
- d. 对新地区与老地区工作问题。
- e. 群众工作的领导问题。

4. 依照各地情况而组织形式也不同，大概可分：

①K完全统制区，②K半统制区，③我们完全统制区。

组织形式上可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合法的问题，在我们后方地〔区〕以半公开、半合法为主，如对当地公开但对外秘密的形式，如组织农会、减租减息委员会，这些团体都和我队有密切关系，但又秘密的。除了这个形式之外还可采用二个：一个完全秘密的，一个是公开的。一个公开组织里面又有秘密的核心组织。

（所谓合法，一种是K认识的，一种是社会习惯或民众承认的）

在K统区或K半统制区的群众组织形式，以公开合法为主，同时也可以有秘密组织。

其次有关连的问题，地区不宜太过庞大，因为容易暴露力量

a. 斗争方式可分为军事、文化、经济等的斗争方式。在我这以非法斗争为主（其实在我方是合法的），在半统制区或K区以合法斗争为主。总之一切以达到胜利，不使群众失利的原则，当群众自己起来要斗争时不可制止，（估计到无利时）时，也应该大胆领导他们斗争，取得胜利抑或失败时不遭到大损失。

b. 群众工作的内容，原则上是那一件事情能够吸引群众最多，对群众最有利，过去是集中在打击敌人上面，我们应该以吸引群众最多着手而慢慢提高到政治斗争上去，这也是从人民生活迫切要求，广大人民的要求与需要下发动群众问题，从现实问题提高到国民运动，凡是对群众有益的事情不论大小我们都要做，即使很小也要做，而且我们做法也要从小做起，如借贷、救济、生产、水利、福利、解除纠纷、维持治安、反对三征、提高文化等……

c. 对各地的的工作要因其具体情况不同，而进行各种不同的斗争及其具体的组织形式与步骤的方式、方法等，这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也是群众的方向的问题，应该相信群众，向群众学习去进行工作。

d. 对群众的领导问题。

1. 怎样去提出斗争的口号，我们要实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总结群众的意见成为一致的口号，然后向群众学习解决的方法。

2. 怎样去组织这个运动。第一，要在群众中去组织积极分子，首先是和他们最有关系的分子身上去〔工作〕，以他们为骨干去团结更多的积极分子。同时对积极分子要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我们要通过积极分子团结所有多数的群众参加到斗争中来，对每一项斗争都是广大群众的运动，不是少数分子的单独突出行动，并以此种运动去教育人民，去扩大组织力量。

3. 常碰到的困难是常常下层群众不容易起来，常常通过中农及知识分子为桥樑，但这些分子是不稳的，经不起强烈斗争的考验（个别分子是可以的），但这些人又容易成为最初群众的领袖。因此我们在斗争中应及时大胆的提拔下层干部为骨干，使他在领机中取得地位，取得领导权。这样才能坚持斗争，对中农及半知识分子则要防止他的腐化，而且这种人也容易腐化，所以要及时检查督促，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4. 对群众运动我们不包办、替代，而应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发挥其创造性。

5. 在群众运动中要注意到许多偶然事变，不放过每一个微小事情去帮忙群众组织起来。

6. 善于将这—个斗争转移到另一种运动，善于将每一种斗争形式提高，从一个形式推为更多的形式，从逐步的过程中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性，对各种不同的条件，发动各种不同的斗争。一方面又拉紧几个或一个中心地区，以影响周围作为标志。

7. 纠缠不过正，对群众的斗争某些过左不必害怕，而应善为领导纳为正轨。

8. 在运动中要注意组织的收成，及时收缩巩固已得力量，内容是：1. 培养干部，2. 发展党的组织，3. 有无切实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利益。

9. 对群众运动要有预见，及时收缩，转变各种形式，保存群众干部，埋伏干部，准备长期不同阶段的持久斗争。

一个负责同志对临委领导时的意见

——关于领导作风、时局估计、
武装撤退等问题

(1946年底)

一、东纵北撤后，自己错误，强调公开斗争，忽视非法斗争，以为以后广东就是公开政治议会及群众团体的斗争，这一点除自己幼稚之外，区党委领导有影响。

二、我一向在政治部工作，对东纵领导作风有意见。所谓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甚差，我是接近领导机关，但对国内政治及斗争政策，所知极少。初以为是秘密范围，后来觉得不对，对形势及方针、任务如不清楚，干部如何能做好工作。所以认为交一件、做一件的办法，是不好的。我觉得几年来进步少，常苦闷，这是我深刻的感觉。近一、二月，领导始有改变。

对区党委政治领导，我因水准低，从未打开脑筋研究，但现在也能看见一些弱点。我觉得过去对武装斗争有甚严重的保守主义，虽知道百年大计方针，但不敢放手，如一九四四提出“一年打开新局面”的口号，以后成为空洞的口号，不能实行，以后罗浮大会，曾生提出对这口号如无具体实行，应作检讨。当时林平同志甚生火气发言，说当时有布置，使曾生不敢发生〔言〕，此案无结果。我认为口号虽正确，但无具体方针，方法如何，领导上并无解决，又如敌人进惠东、博，东纵向北江发展，但是仍保守惠东宝，不敢放手开展山地新地区。当时敌人深入，国民党败退，我队一路前进，

甚少阻碍，当时如大胆推向紫、五及河源、龙门，是可以开展工作的。所以我认为如及时以精干部队开展江北山地，一定有成绩，以后会发生大的作用。这种保守主义也说明没有根据地思想。

又中央指示北上湘粤赣，但一直拖延至敌人投降后，也显然错失时机。当时干部大家准备北上，但许久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种保守主义，由于政治估计未曾充分注意前途曲折困难，留恋三角洲黄金地带。政协后政治估计，粤北负责同志对蒋认识存有幻想。我所知政协后杨康华召集五、六干部讨论（大概未接区党委指示），杨发言“和平民主实现，独裁大梦冲破，斗争以政治为主”，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如果对《论联合政府》毛主席的基本观点，对革命长期性、不平衡性有研究，就不会说这种话，当时会议讨论布置城市工作，忽视坚持武装斗争。因此粤北武装斗争松懈，活动陷于停顿，当部队到齐集中之后，至四月我离开部队，并无做什么工作，除一、二乡有点群众工作外，部队在等候，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工作任务，干部饱食终日无事，大家等候军队国家化，大家讨论广东军队将来如何。及见整军方案，大家失望，以后又等候北撤。总之这个时间没有做坚持的工作，以后又撤退太多，留下干部极少。今日要开展游击战争，就少了本钱。

北撤之后，过于强调困难，三、五年掩蔽，消极不动，对广东情况研究不够，常是国际国内一大篇，广东形势就忽略，这就难免主观和教条，根据我及《正报》同志研究，广东统治东纵北撤至九月暂时安定。十月后，开始动摇，因国军北调空虚，征兵、征实激起民变，东纵是可以坚持的，因为未撤前八个军不能消灭我，以后国军北调（至少一部）更不能消灭我。十月后民变土匪四起，我大多未领导，我的工作和领导落在形势后面，都是北撤太过的结果。北撤不适当，由于对广东情况不了解，缺乏调查研究，主观教条主义的领导。

我希望“赤色割根〔据〕”的口号，不要象以前“一年打开新局面”的口号一样，成为空洞教条的口号，这就须要调查研究具体情

况，定出有效方针、方法，切实执行。

几年对接近杨康华、王作尧，对林、曾疏隔，对林望而生畏，对曾觉得印象好，因他接近下层态度较温和，对王官僚军阀气浓厚，享乐倾向大，结果北上至翁源，最困难时王的脾气最大，干部发生离心，参谋部干部不满，一到始兴北山，参谋部人员情绪不好，小病称大病，怠工，缩手不理。北上时曾极刻苦，但打一汉奸收集一担衣物，送老婆走，老婆半路被捉，下级认为该死。王在军事领导上弱点甚大，对战术研究、掌握材料、研究情况不够，或冲动或畏缩，表现于挺进麻渣〔榨〕时对国民〔军〕情况不明，马上后撤。当国军集中扫荡时，不镇定，手忙脚乱，兜圈子走。在〔领导〕军事斗争，失败多于胜利，增龙博战斗分兵同时打二点失败；第二次轮番作战分兵几队；第三次梁贵平狼狈时应集中打击，但分兵打二、三个点，结果打持久战，一无所获。

杨甚得干部欢心，本人肯学习，温〔和〕霭可亲，注意干部思想教育，细心研究文件。但有相当大的弱点，干部听话者多接近，不听话者冷淡，不能一视同仁，故一部分干部说杨喜欢能讲能写者，不看实际工作者，有人说他有小宗派，他知道人议论，但漠然置之。

三、我参加部队时间短，所知有限，与区党委接触少，所提意见只是零碎，感想或道闻途听，少事实根据，但有知必说。前省委忽视武装，以后临委重视武装，成绩极大，但缺点甚大，党务工作注意不够，部、军、党工作不健全，支部、小组不起作用，似乎一切以军事解决问题，因此政治工作不够，军阀官僚主义严重，军事首长盛气凌人，如杨、王之间有此现象。政治部与参谋处配合不好，党的政治的干部有职无权，对全省各区党工作的领导布置不够，如对西江，当时林平与冯叔布置很简单，各单位如何去接关系，北上部队因此不能得地方党帮助。党的领导，偏于一隅，不能照顾全局，对各地政治上、思想上领导不够，如整风没有全面，一般有系统开展，在罗浮山几月安定，本可整风，但没有做，平日领导成为交一件，做一件，工作多布置军事、政权，甚少布置党，每个号召动员

（如建立五岭根据地），不能通过党与组织动员。北上前及北上中，并无好好布置，对广东情况调查研究不够，对形势曲折发生估计不足（同意 B 意见），罗浮干部会议上曾生对一年打开新局面这一口号提议检讨问题（同意 B 意见），如先注意山地，恢复党及其领导，先做群众工作，以后武装就发展顺利，这是根据地思想问题。

根据地问题，不能说区党委完全无，但不明确，不彻底，如 B 所说干部会情形，又日本投降之日区党委会议，关于派若干部队北上问题，有人说一中队，曾生说一大队，主力留来接收日人投降，林平说原来准备的队伍都去，是正确的，但出发一路并无做根据地工作。王震走后，并无做根据地工作，故虽有思想，但不贯彻见之实行。我自己模糊，认为应集中江南，解除伪军政局估计，我到港后有几个指示，自己太乐观。粤北讨论城市工作，杨有准备出城市工作的精神，当时工作提出公开合法为主，西北支南三当被围时，甚坚决坚持突围主张。但接到政协消息后，认为必须复员解散，派人与地方接洽，准备埋枪（粤北指挥部有此意见，认为不必建五岭基地，静候解决）。区党委指示当时对美蒋有幻想，认为美帮助中国民主，故夸大政协成果，将决议视为事实，和平民主视为必然，对武装斗争认为不会有且不应有，着重公开政治斗争的讨论布置，指示上并无说及以后的武装斗争。这种估计不仅是乐观，对广东同时是悲观，不敢正视广东现实，如何坚持困难的斗争。

在港组织因此今天对形势变化莫明其妙，对马估计问题。

北撤后强调长期掩蔽积蓄，主要反对左倾，宁右莫左，不做任何政治活动，一般强调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不敢放手动员群众如当时鲁明及△△同志下面的组织，只是搞好职业，不谈其他工作，可以打打麻将。另方面实际上有过左的作风存在，但如何去检查、纠正，则没有，东纵撤后组织混乱，有些不应接的关系接起来，应接的不接，公开、秘密分不清，跳线跨线现象，领导作风民主化不够，部队在粤北时我未参加过党会议，没有小组生活，工作独断独

行，个别交代少思想领导，林平与下层接近很不够，我只在会议上见面听他说话，但不曾和他作工作谈话，因此了解情况搜集材料就差，不〔无〕点军人气象，照顾全面不够，听片面材料就认为某人不好。杨、王有官僚军阀作风，王尤甚，一般认为首长对地方党不注意，等级森严，动辄闹人家，发脾气，人家叫他王老虎，下命令，说他人“安”主观主义。杨、王脱离下层，终日坐指挥部，少接触士兵和连级干部，疏散时不照顾困难，对伤病照顾不够，如马昭平之逃跑与王、杨作风实有关系。

四、时局估计，我当时认为美是赞成中国和平民主，蒋倚美，故内战虽发生，当为期极短。政协后产生一结论，以为过去见解是对的。以后蒋更反动，使我发生疑问，但不能解决，以后犯了一些错误。这与区党委那个指示有关系，因为照那个指示看问题，故认为以后形势是日趋好转，各地惨案是反动派最后挣扎，对广州提出动员一切力量，突破这个堡垒，各杂志刊物一致联合。一致形式，根源在于对美帝认识不足，不认识与蒋联合政府也为消灭蒋，《新华报》有错，说蒋要如何，美不肯，几句相连，对美政策估计不足，领导不注意思想打通，只解决个别问题，简单注入。对广东情况不熟悉，如统战工作，各阶层各党派情况如何，我应争取谁，如何做法，如对民盟，他的政策如何，阶级基础，具体人物，各派主张等等，都无研究。各部门工作配合不够，争取某人，不只是派人接近就够，须配合斗争，如工商业统线应利用禁止出入口，大加宣传，然后派记者去联络出入口商，只限个人联络，不能打开工作，这与领导上有关。

调查研究，罗浮会议林报告，大家觉太简单原则，听后仍不了解。现在广东有几个力量，关系如何，我政策如何，仍属模糊，甚至打错对象。如民大校长本中立，改国立问题，《正报》言论不妥。如能了解，干部就能灵活执行，不失时机。

五、中区教训。区党委政治领导乐观，不久以前已大家感觉。区党委政治领导（去年一年）乐观的根源：1. 投降路线影响余毒，

对蒋幻想；2. 对敌在广东力量估计过高，对坚持无信心，不是依靠群众，不靠山根据地坚持斗争，出路寄托在和平，林平说快点和平，否则不知死几多人。因此政协后指示说……后受打击，再指示说基本正确。幻想仍存在，但比较正确，改正一些错误，但以后高估环境过坏；3. 中央报纸影响；4. 区缺乏思想领导，不民主，不发扬下层意见。

武装斗争已决定建立赤色割据，依靠农村，建立根据地，目前广东统治已开始动摇，有可能。过去区党委认为根据地是（1）需要否，（2）可能否。在东纵撤退问题到底如何认识？东纵撤退，保存干部是对的，撤退过分就不对，区党委指示说今后不会有也不应有武斗，是完全错的。目前建立根据地已经肯定，有条件就应下定决心去做，将来撤退与否，目前不要管。

领导作风除各个人应该负相当责任，大家应共同负责。

六、以后武装是否撤退问题，如说以后撤，现在就不做，是不对的。撤退为保存力量。将来可能以退为进，是对的，过分拔钉就不对，不能因过去撤退有错误而反对今日建立根据地。

党的民主精神问题，是党领导上一个大转变，罗浮会议的批评已有开始，现在提出，已进一步发展。但对某个人的批评该从帮助改造思想着手，不是批评承认就算了事。过去只叫你做什么事，但不详细，不深刻了解，又不敢问，怕啰嗦，所以做时发生问题，仍不敢提出意见，因无民主，错也不敢说，上级知道就责备，大家无信心，曾常骂人，开会时大家战战兢兢，事后多小广播。我因尊重他，大家说我拍马屁。后经一次民主批评，转变较好。

七、第一次检查广东最高领导机关，但是由学习小组提起，还不是区领导。区对下意见是否知道呢？知道一些，但不能启发批评，甚憾。现在一面检讨上面，应同时发动下面自我批评和反省。

武斗前省委不重视，一九三九——四〇开始注意，派干部入中区，但很不够。根据地思想，未提出重新开展游击以前，不明显、不重视，如珠纵、东纵不注意山地工作，长期打算干部集中珠、东，不

注意部分分散到山地。如以前注意山地根据地，今日情形当不同。

时局估计第一〔次〕指示，乐观、尾声、不会、不应等等，中区领导机关讨论认为对，今日看来成问题，我自己很差，盲从，不能研究。第二次，修正指示基本对（即和平民主会到来，取消白皮红心不对），我发生怀疑，既然须用白皮红心，和平民主何以即将到来。

记得一位同志指示说快则半月，迟则二月，即可打开广州局面。我又怀疑不决，广州问题准备反民主游行示威，我布置转变性质，如不能成功，群众不敢；我又怀疑区的指示。第三次指示，坚持无可能，单线联络，环境严重，我又怀疑，如果取消部队党，如何能生存，一切服从撤退。当时区二个意见，小林主张要撤，但应留人坚持，我同情〔意〕小林意见。以后传达服从林平意见，我又放弃个人意见。我当时自己认为可以留，一些干部也可留。以后有人批评我不肯放干部走，我认为有些地方支部应保存，事实上我也如此布置。停止发展问题，撤退这样多，又不发展，将来基础一定很差，如××地部队十人左右，群众协助，结果坚持下去，隐蔽起来，国军侵害地主，地主来联络我们。当时区对形势估计悲观，实不了解下情，组织上精神消极掩蔽，交友，经济及社会地位较好，但不注意群众斗争，改变作风，用各种方式方法去组织群众。指示说……尾声……不会也不应，影响部队干部精神甚大。大家说复员，说职业，不想坚持，北撤退更无信心，无党领导，将来如何能坚持。负责同志小刘、小严都极切望北撤。土匪形式不能用，是土匪，被人打，是解放军，人家敢接近，客观上可能坚持的，许多地方人家要求我去住，维持治安。领导作风问题，对地方党关心不够，多由部队转达，极少看见文件指示，靠自己摸索（临委时如此，区委时也如此），连同志到中区年余，对我指示极少，以后专派特委二个同志住指挥部，仍极少得指导。连同志集中精神在部队，对地方党工作关照不够，对地方干部经常抽出，堆在政治部〔等〕工作分配，领导又不好，大家情绪差，想回地方做工作更好。可说连同志成为小严的俘虏，不能纠正小严错误。中区一次总结工作关于单线联系问

题，△同志按旧时指出方针总结，但连同志说旧时方针不是这样。我返港除看《华商报》外，连同志对我们政治领导太少，领导一般，缺乏具体领导，解决问题犹疑不定，又是又不是，如目前的战三阶段，同志有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个别问题解决有些拖泥带水，如一海外同志等了很久，尚未解决问题，有的等一、二月，后来又匆忙解决，下面有些干部因此不满。

八、学习小组提此问题甚重要，我认为是思想斗争问题，思想斗争，如路线错误，干部遭过困难，自然爆发，斗争得好，巩固组织，不好，损害组织，动机应纯洁，目的为巩固党，否则危险。撤退问题同意大家意见，撤退是正确的，但当时区党委了解认识就有问题，强调政治斗争（二八指出），强调撤退，忽视坚持。当时如重视农村坚持，并布置得好，今天情形当不同。根据地思想准备是有的，如一九四四年，但当时是建立进可攻、退可守，以迎接盟军。日投降后就没有听见下文。以后武装是否撤呢，应该撤就撤，不应撤就不撤，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组织领导，不说对下，本身也不健全，例如罗浮大会，筹备甚久，报告分工，林、曾、杨第一句说：我是个人意见，未和林、曾交换过。大家觉得可笑。又例如，林平与小林意见不能一致，领导分歧，林平同志领导上我觉得偏重军事，对党任务照顾不够。党的组织做不好，一切工作都有损失。部队中党不能起作用，支部书记好象队长的勤务员，虽然整风，但宗派仍很严重，如杨对干部，大家对外来干部不融洽，有一个干部要见林平同志，到门口又走回来。北撤布置，如重视地方党，由江南至江北、粤北，应将政工人员、非武装人员逐步一路安插，则部队及地方党两方都好，平时忽视地方党，故纯军事行动，拖累多，致遭损失。

九、补充，冯叔同志指出思想斗争得好有益，不好有害，下面干部而应注意发扬民主，改正错误，得出经验是好的，如有人企图报复，打击个人，就是错误。区党委应注意，下面提意见并非偶然，大部分干部都同样有此种意见，故如何研究大家意见，是很重要的。

对目前形势几个特点应有认识

(1946年)^①

和谈之门，已由蒋介石一手关闭，全面破裂，经已到来，对当前形势发展若干问题之认识，因其错综复杂，自易发生偏向，特制定此提纲，以供党内教育、党外宣传。

一、目前革命斗争性质

目前革命斗争性质，仍是反帝与反封建并列。反帝，是反美帝国主义；反封，是反四大家族独裁统治。从反美帝与反独裁的斗争中，求得民族独立、和平民主，解决土地问题，美帝及其走狗蒋介石四大家族，是现阶段的主要敌人，其他凡站在敌对地位，而毫不改悔的中外反动派，也自然均在打倒之列——参看《正报》二十一期《中国革命第四阶段内容与实质》。

和平民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能作为已成事实。中央宣传着重独立、和平、民主，是完全正确的。而地方必须根据其当前所处环境之特点，提出自卫战或强调解决土地问题，为保卫土地而战，才能有力实现中央的口号，才是正确的。东纵未撤时，我们强调和平，而不强调自卫战争，把努力趋势看成现实，是不懂得具体运用中央指示的错误。

二、危机仅是总崩溃的开始

蒋的军事危机所促起的经济危机，有可能互相影响，而日见加深，形成总危机的到来，总崩溃的到来，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

^①原件未署作者。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不是目前的现实，目前仅仅能说这些危机是总崩溃的开始。因为，危机的基本上虽不可能挽救，但危机在某一时一地一点，仍可缓和，例如：

1. 蒋军虽遭受到我很大的歼灭，士无斗气，补充困难，兵力分散与不够配合，但蒋仍可获得器材、军火的帮助，集结优势兵力，在一二个战场上不惜冒险牺牲与我作战，以达到再占领一些城市或暂时打通某一段交通线，以大吹大擂向国内外宣传，挽其颓势，振奋一时人心，再找出路，挽救危机。

2. 蒋的经济危机，虽将达到山穷水尽，但仍可仗着枪杆子宣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以加紧向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进攻，仍可向其后台老板叩头乞援而得到联总剩余物资贷款，棉花铁道贷款，日本赔款，甚至美帝仍可考虑其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来实现其五万万美金的贷款来和缓其崩溃。

3. 蒋的独裁面目，虽已在中外人士中暴露无遗，但伪装民主改组政策仍在必行。除了民青二个傀儡以外，仍在极力拉拢其御用的“社会贤达”，甚至仍将保留若干额位，给予民盟与我党（在未对我下讨伐令以前），用以欺骗中外群众。军事上虽已决心大打，而口头上也仍可能重申“政治解决”以欺骗群众。

当然，我们必〔再〕一次着重的〔地〕指出，这些办法基本上是无法挽救其危机的，但因为强大而狡猾的美帝对他的帮助，有国际反动派对他的支持，再由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南方落后于北方，城市受残酷摧残，使工作一时落后于农村，农村斗争又未能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发展，故他的危机取得一时缓和，是仍有可能的，但这种缓和是下降的，更加削弱的，则是可以肯定的。

因此，我们说：目前他的危机，仅是总崩溃的开始，革命形势虽是继续增长，但要达到促进他的总崩溃的时间，仍将经过许多迂迴曲折发展的过程，仍将有待于我们以及全国民主人士更大的努力，才能加速它的到来。

三、一切战争为着促成总反攻

和谈全面最后破裂，不是显示蒋之强，而是显示蒋之弱，——在万分没有办法中不得不采取“狗急跳墙”的硬碰办法。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在整个战局看起来，我们仍然尚未完全脱离防御的战略阶段。虽然我们在若干地方开始了局部的反攻，收复了若干失地，而蒋军为着集结力量与我决战，不得不放弃若干地方，但在整个战局上，我们仍未能停止敌之进攻。故我们仍必须采取强大的防御的运动战、歼灭战，继续消灭敌人进攻军，在敌人的空隙中展开游击战，围困敌人于点线之间，以至截断其供给线，摧毁其若干据点，造成宽广战场，以利于野战军以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而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从这样不断歼敌战争中，来转变敌我形势，停止敌之进攻，而促成我之总反攻。

游击战在战区或边邻区说起来，是直接配合作战，应服从于大的决战的利益而照顾自己，保卫群众，保卫土地的任务；在蒋管区说起来，是间接配合作战，可以起破坏敌人后方的征调补给，牵制若干兵力，但因离战区远，不能起直接配合作用，故应从群众利益出发，在群众中斗争需要中，取得有利条件，才能发动，才能胜利保证，既能起着间接配合作战作用，而又能发动群众，等待时机，作彻底解放运动。

一城一市之得失，固然无关于整个战局，但当敌我形势将临发生变动的时候，一城一市之固守，以吸引更多敌人，麻醉更多敌人，消灭更多敌人，往往成为战局转变之关键，故对于延安保卫战，应依朱总司令声明解释，不能再有增加或减少任何东西，以免犯错误。

四、对美蒋不应有任何幻想

从其本质来说，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都是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敌人。

从其当前政策来说，一个是想独霸全世界，想从利用各国反动势力来作他的傀儡，来殖民地化各弱小民族；一个是想依靠于国外反动力量的支持来坚持其独裁，消灭民主力量，巩固其四大家族的统治。一个出钱出军火，甚至出兵来支持其内战，一个以出卖投降作依靠，来决心大打，这已经是明显不过的事实了。

从其过去的最近教训来说，一个是伪装调处，实则帮其运兵北上，帮其全副武装，待机大打；一个是伪装和平，欺骗群众，在获得外援站好阵地后即向人民进攻，也已经明若观火。故对美蒋，如果还有丝毫幻想，那便是彻头彻底的出卖革命利益者。

但是，一切问题的决定，最后是属于人民，帝国主义与独裁者，他们是没有决定权的。人民的战争胜利了，人民的民主运动开展了，帝国主义与独裁者是不能不在人民面前举手投降的。

人民的解放运动，是迂迴曲折的，尤其是要达到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其所走的道路将要更加迂迴曲折。因此，人民将在战争中赢得和平与民主的基础，又将从和平中更进一步去争取更多的民主。因此，打出一个和平民主局面出来，这个条件并不是不存在的，因此，不能肯定的〔地〕说，以后没有和谈的一日了。

但是，我们尤其必须知道，以后的和谈，绝不是美帝的修改政策（除非美国民主人士已完全占优势），也绝不是蒋的良心发现，同时也不是简单的第三方面的呼吁所能起其作用，而主要是由于人民战争的胜利，人民的民主运动的开展，人民迫逼美蒋除了投降了人民以外，只有死亡。因此，那时他们便可能知难而止，作城下之盟。

联合政府是一定要出现的，被请客的联合政府是假的，我们不来。有否决权而能实现若干民主的联合政府，只有在人民打了胜仗，他们被迫才不能不这样做。至于完全是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则有待于人民不断的努力，不断增长力量，不断的斗争，也自然而且一定会到来的。

人民决定一切，今后人民在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决定独裁者的命运。

林同志对广东临委会的报告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

(1946年)

第一，广东党自敌进攻华南到粤北省委破坏，整个精神不注重武工，后来个别地方不注意武工。

表现：前个时期会议并没有讨论过武工斗争的方针，如广州沦陷无布置武装工作，这是一。

〔其〕次中区吴超部队有一千至二千人，他倾向我的条件，纵没有也应该去布置武工，但他几次派人来找，也无讨论过，虽派过人，只是敷衍式，并无整个方针。

再次，劳干班，党有〔很〕多干部在这里，并有很多武装，我们也无理之，护干班绝大多数在敌后，地区也相当大，我们也无注意。曾山部队初来也由其自生自灭，后来又只剩下来百余人而已。赣南部队也送给K去了。对张炎部队又无正确政策，纵或有也不正确的，如坪山等差不多就是左。潮汕武装也有矛盾。虽有政策和领导等问题，一般说都无整个政策方针。

为什么？

1. 对中国革命特点认识不清楚——毛〔主席〕指出过：中国革命特点武〔装〕斗〔争〕为主。

2. 无认识革命的长期性——革命要长期打算，要长期建设。

3. 抗日战争中又合作又斗争——要团结，但K又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买办的半封建、投机取巧的坏东西，抗日战争是被迫的。当时我没有认识这点，就发生右倾倾向，极力帮助12集团军，结果反而杀我们，都由于自己没有独立自主路线。

这是右，有些地方又是左，如把坪山看成小延安，也弄不成，两点都是相同的。

第二，武装斗争发展是个波浪式的发展，不是直线的——如敌人占领时，民众要求抗日情绪高，潮汕、广州、珠江三角洲等地情况可为证明。每当敌人占领一个城市时，人民又会动乱起来。

东纵为例：向广九、或惠州、或北江等都是波浪式的，一起一伏的发展，掌握住的时候有成绩，否则会扑个空，站不住。连〔联〕想到毛主席游击战的学说，能放手发展做得的，不一定收手做得好。所谓收缩就是整顿干部，加强队伍，在这里我们有的做不好（如郭强、卢伟良为例），无论过去、现在都证明了这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日本投降后，我退出八个地区，无巩固东北也是如此）。

有的人，对发展都看到，但是尽量使用力量，如潮汕南路等为例。即是不应该放出的，都放出去了，或遭受损失，这都与大胆放手的基本精神毫无相同之处。东纵有些干部，又没有理解到收缩、巩固地区，要先解决人民要求，不要犹豫，坚决干下去，不然最后不成，巩固也做不到的。如目前解放区的解决土地问题为一明证。就东江解放区也证明了这点。目前琼崖因为没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办法发展与巩固，抗战中我有四分之三地区，现在只有十万人地区的地区了。收缩时以训练干部为主，如东纵的四面发展时，我党干部不够。

暴动后即应大发展，如在南路张炎主攻高州，而我反对，说要整理，没有乘敌人措手不及攻下敌人首脑，而给敌人调两团来。给人打败了。这就证明了暴动后，不乘敌人慌乱时打垮它，结果会被动，这是暴动者的死路，但到一定时，就要整理，一直搞下去，打一次或二次败仗，就会完蛋了。潮汕、东江也有如此的例子，当部队败仗后，情绪不好时，干部消极时，就应该由首要负责人去掌握这点，自己坚定过来，然后才能改造干部及部队。慢慢安定下来。东纵有一个时期也曾有过这情形，至一九四三年才克服过来（一九四二年打败仗）。

大发展时，人民会参加，绿林豪客也会参加，我们如何对之，据毛主席说：来尽管其来，加强其教育和领导，生活慢慢地改，并信任之。东纵做得非常之差，总是想出许多名堂去控制。你以为如此阶级立场站得很稳，其实结果许多土匪有哪几个肯来投诚呢？！反而工作损失，如果他要去，好，等他去，来也还招待之，这样会加强他们对我们的信任，而由事实上（由他们身经百怕）来教育和改造他们！什么都相信土匪或土匪一来即控制而缴获之，都是不良的偏向。

第三，游击战争几个问题应该解决。

1. 游击武装斗争，过去革命斗争证明这点，也是毛泽东路线，在战争中他把坚定、忠实、刻苦、耐劳而有能力的干部都放在部队中。

2. 地方武装的发展，不要把地方党暴露了，因为在敌我力量悬殊下，不定能在某地坚持下去，若武装撤退了！党岂不是会给连根拔去吗？！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保存部分〔掩〕蔽的党，使以后恢复容易（北上时就有如此不顾地方党的情况，都由于上面初来交带〔待〕得不够），以备长期斗争，必要拿出来的就应该坚决的拿出来。

3. 部队发展采取阶段性的发展，由民兵、游击队至正规军。不到成熟时，不可随便改编，使人民不相信，结果实在破坏了力量，组织不起来。由于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的性质不同，编制、组织与作战任务、方法都不同，更由于人民情绪和认识不同，我们对之亦应有所区别。

4. 战术指挥应该看作一般发展过程——小的要打，大的不打，如东纵为例，由打小胜仗，逐渐锻炼到打大胜仗，是指挥作战的必经阶段，没有打大胜仗的条件，应该去锻炼和培养，但不要怕去锻炼。

5. 不要过分使用人力，劳民伤财。节省民力，增加生产。积蓄民力留作后用。

问题：

1. 如何分兵和集中兵力？（即在何种条件下）

分时机：

2. 配合作战问题：

(1) 目前以强调自己生存为主。

(2) 如能联络则〔继〕续以援助。

3. 党、政、军关系与配合如何？

4. 中区保守主义涵义如何？

(1) 提出与四海共存亡口号。

(2) 与土匪合污。

(3) 武装领导上没有一个正确的主张和政策。

(4) 以自己为主，不敢拿出力量去和人合作，当发展而不发展，当干而不敢干，都是保守主义在作怪。

5. 掩蔽与发展与斗争：

(1) 形势决定我们要掩蔽，但有 机会发展就应发展，不然就是死守，不过发动方式不同而已。

(2) 在掩蔽时要有自卫斗争，但有时也该掩蔽，以便长久打算，因为斗争目的，一则在打垮敌人，再则求得自己发展，离此则有坏倾向。

6. 军打民团有办法，但对K正规军则无办法？

(1) 首先精神问题。

(2) 打正规军布置包围，取得胜利来教育之。改变我们的观念。

(3) 研究K正规军呆板作战规律，来想出袭击他办法，来教育自己部队。

7. 对余政策的重新检讨。（即如余去粤北，我们为抗日自主即开进去是否适当）。

8. 独立自主抗日游击战争问题：

(1) 抗日战略配合。

(2)政治军事路线要有自主独立发展，因靠不住，要消灭我。
(3)我配备不同，给养不同，不能不是抗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了。

9. 目前广东减租减息问题：

(1)以双方自愿为好。

(2)减的程度可不定，由少而多，逐步来。

(3)实质的土地解决，首先要我有政权，或有坚强控制区，这时可依延安法规，敌人占领期的占领土地是不承认，或推动土地卷。

(4)目前还是研究减租减息的办法。

(5)颁布法令，但没有实行，是可发动群众逐渐争取实行之，是群众斗争问题。

(6)减租减息是普遍性的，与恶霸占土地斗争是部分性，其条件就群众基础有，群众要求，群众自己动起来。

向广州学生致敬

(1947年1月18日《正报》社论)

海珠江头终于发出了爱国的怒吼，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退的示威大游行，在广州学生爱国热潮高涨之下，英勇地举行过了。保持并发扬了广东革命传统的广州学生是光荣的。我们向爱国的广州学生致敬！向为首发动这次爱国游行的中大同学致敬！

反动的国民党当局连月以来不断在广州制造恐怖，青年学生大批被绑架失踪，大批被缉捕逃亡，要读书固然不能安心，生命自由也时刻遭受威胁。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的家臣们正认为莫之于毒，尽可以放心卖国了。但是，当北平传来美军暴行的消息，广州学生受抑压的心头怒火爆发了。他们排万难，冒锋镝，挺起胸膛，横挥

热泪，高举爱国大旗，为南中国爱国民主运动开路前进。每一个爱国同胞看到或听到他们英勇冲破反动派的铁丝网，硬要走进沙面叫喊出“美军滚出中国”那个壮烈的场面时，都要热血沸腾，奋臂欢呼的。

广州学生是英勇无畏热爱祖国的。这有抗日救亡的史页作证明，提起永汉分局门前的大流血，提起荔枝湾畔的野蛮虐杀，谁不在回忆里闪耀着广州学生的值得骄傲的光辉？“抗日有罪”的国民党当局，那个时候不是用尽阴谋手段来破坏禁压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么？但是公正的历史作了最后的裁判人，为了抗日爱国而受难流血的青年学生是对的；破坏禁压爱国运动的国民党当局要不是当了汉奸遗臭万年，就是象蒋介石之流，厚颜无耻地想篡窃抗战胜利的果实。在今天，卖国的国民党当局于和日本交易不成功之后，又另找到新主子美国帝国主义者，要把中国出卖给它了。国民党当局这个新的主子在我们的国土之内，正全部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套，而日变本加厉。中华民族的危机是更加深刻了，这次新的爱国运动的掀起，表示青年学生再度负担国家的兴亡重责，广州学生的示威游行，就是以轰烈的行动来推开广东以至整个南中国爱国民主运动的新局面。

火点起，开路者已经走在前头，本港以及海外的青年学生们，一切爱国同胞们，我们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血脉相连，我们对祖国的责任同样重大，我们甘心姊妹妻女受人凌辱？我们愿意让卖国贼明目张胆地把我们卖给美帝国主义者做奴隶吗？不能！一定不能！爱国长者陈嘉庚先生也对我们发出号召了：“所有中国同胞必须支持目前的学生运动！”、“驱逐破坏中国主权、延长内战和危害世界和平的驻华美军！”、“采取严厉步骤来维护我们的主权”！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要起来响应这个号召，把国内外的爱国民主运动连成一片，让侵略者和卖国贼在中国人民的铁拳下面跌倒！

对于广州学生，示威游行虽然结束，爱国民主运动却没有结束。马歇尔布置了阴谋诡计回国就任国务卿了，范登堡的声明宣布

了美国对华政策必将愈超反动，美帝国主义者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步骤也愈来愈紧了。中国人民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任务也愈加沉重而迫切。解放区的军民目前正以胜利的爱国自卫斗争来担负这任务的主要部分，我们蒋管区里的爱国民主运动就必须加倍猛烈扩大发展，把两股爱国巨流汇合在一起，好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永生。

因此，广州学生们应该继续并发扬这次示威游行英勇爱国的战斗精神，马上把运动配合具体环境具体条件扩大和持久下去，在城市，必须把这个运动的范围冲出学生圈子，深入百万市民群众中来加以扩大，把它和市民反对美货倾销，反对苛征暴敛，反对抽丁摊派等日常斗争结合起来，以增强爱国民主运动的力量；同时，寒假就要到了，应该接受抗日时期下乡工作的经验，利用这个假期，各人回归故里时，就在农村里展开广泛的抗议美军暴行反对统治集团卖国的爱国宣传，唤起农民，为他们指引出路，普遍散播爱国种子，准备将来把农民救死求生的斗争，和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结合起来。

人民的爱国怒潮必将愈湧愈高，让我们互相勉励，勇敢地负起祖国给我们的任务吧！

（原载《正报》第22期，1947年1月18日）

广州学生怒吼了

（1947年1月7日）

梦 坚

愤怒的火花

自从美军强奸北大同学沈女士的事件传到这里后，每个人的心

胸都爆裂出愤怒的呼喊，每个人都为这暴行而表示仇恨和激昂情绪的，在宿舍，在行人道上，在课室，在民主墙上，到处都张贴着抗议的标语和告同学书：“美军滚出中国去”，“美军一日不离中国人民一日没有安宁”，“美军驻华是内战的帮凶”，“是时候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同学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不幸的事件有系统的揭露并作正义的呼吁。

四日晚，在石牌福利食堂聚集着三百多个为这事件表示关切和愤怒的同学，由一个同学首先站起来，用沉痛的声调诉说着这事件的发生：“同学们！我们压抑得太久了，窒息得太久了，我们南中国的革命青年不能再沉默了！”听，多激昂慷慨的情绪，一个个站立起来。

“同学们，不怕红帽子压在我们的头上，不要怕反动者的阴谋，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不能被人侮辱的，我们有良心，要为我们的良心而发出呼吁！用热情用行动来表示我们的抗议。”

“美军为什么还留在中国？做内战的帮凶？我们要反对内战，要美军滚出中国去！”

好，用行动表示我们的抗议，即刻决定组织沈案后援会筹备会，并决定六日上午召开全体同学大会。

更多的标语，壁报贴满在墙壁了，筹备会的委员和一群热情同学漏夜工作，并派人到各校联系。

石牌燃起愤怒的火花了。

向京沪学生看齐

六日上午十时，洪亮的钟声在宿舍响起了，这是开会的信号啊！

在五座宿舍前的广场上，站立着一千多个同学，每个人都心与心联结在一起，要把胸头的积愤发泄出来。

主席宣布召开大会的理由后，一个同学首先提议：

“在未开会之前，我提议对于被侮辱的同学，全体同学为她而

致沉痛的默念！”

沉默一分钟，炸弹般的提案爆裂出来了。

“今天在这里，不用再辩论，是政治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不光是说话的时候了，我们要向京沪学生看齐，我们要联络全市各校罢课示威游行，表示我们的抗议。”一阵热烈的鼓掌，又一阵呼喊！

我们还要美军滚出去，通电马歇尔司徒大使表示抗议，并要他们向全中国人民道歉！”

“我们要通电全国响应！”

“我们要致函慰问被侮辱的女同学和她的家属！”

“……”在热情的澎湃和掌声中，七日罢课游行决定了。

“国立中山大学沈案后援会”正式产生了，推出二十五个同学为委员，大会没有经费啊！随即当场乐捐，花绿的纸币由四面八方主席台前抛掷。

正当收拾纸币中，训导长黄尊生来了，“欢迎训导长领导示威游行！”一阵欢呼。

训导长站在主席台上了，打着官腔：“我同情这事件，也同情大家对这事件的表示，但是，大家要冷静，这是美军私人行为，这是法律问题……”

“嘘！嘘！……”“训导长有没有良心？”“训导长有没有女儿？”一连串质问来了。

“我是有良心，有良心的！”训导长口呐的解释，随即质问又炮弹般射出：

“那么，你的良心呢？你的良心在哪里？”

训导长无可如何说：“好，我就没有良心吧！”并接着说：“我是有女儿的，并且准备择婿。”

“择美国人做女婿吧！”“哈！哈”全场发出大笑。

看着会场不能这样拖下去，一个同学提议：

“主席，我们的会已开得不少时间了，要讨论的都讨论了，我们要开始准备工作，不能给训导长这样拖下去，我提议散会。”

训导长被请下台了，主席并宣布：“我们还是照大会决议实行，训导长是站在学校说话的。”一阵掌声和歌声中决定了“向京沪同学看齐！”

“大队人马来了”

中大学生示威巡行的消息，在各报登出来了，平山堂的附中周围也贴满了通告和标语，壁报。

十时，住在市区的同学，先集合在平山堂，到处唱起了“抗议美军暴行歌”，一堆堆的人丛中，都兴奋而激情地谈着今天的巡行。

旗帜飞扬着，沸腾的情绪要滚动了。

各报的记者也来了，向负责的同学包围，探询着今天巡行的意义和目的，负责同学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并热烈的握手：“参加我们的行列啊！”

几百人拥挤在平山堂门口，伸长着颈子，等待石牌大队的到来。

石牌一千多同学九点钟出发，步行来市，要经过二十多里的路程才能到达。

“大队人马来了”象发现了新大陆，大家拥挤到街口，向昂步的队伍招手，摇旗，欢呼：“欢迎！”“欢迎！”

举着大旗，走在前头的是二个女同学，挺起胸膛，显出多么的英勇。在“抗议美军在华暴行”的歌声中，踏进了平山堂的广场。

怒吼的行列开动了

汇合了文理、文化学院、中大附中……等校的队伍，伟大而壮烈的行列开动了。

一辆汽车领前，高挂着“抗议美军在华暴行示威巡行”的大块牌子。接着是女同学、男同学，打着各样旗帜的长列的队伍。

“反对美军暴行！”

“请美军退出中国！”

“中国不是殖民地，我们不愿做奴隶！”

“请美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美军滚蛋！”“滚蛋”“滚蛋”……

一连串的口号响彻晴空，震撼着这沉默的南中国大城。

标语，传单，贴在汽车上，街道上，市民们用欢笑迎接这怒吼着的队伍。

“欢迎参加巡行！”一批批市民参加到行列里，队伍壮大了。

“我们要反对暴行，我们要赶走美军！”

“大家一齐起来，叫他滚出去！……”

是嘹亮的歌声啊！激动着每个人，大家都张大喉咙歌唱，举起拳头呼喊。

队伍经过惠爱路、汉民路、一德路、太平路、上下九、第十甫、大同路……。

广州的学生怒吼了。

碰到铁栅了。

队伍到六二三路了，要通过西桥到沙面去。

但，桥头的铁栅关住了，武装的宪兵、军队，如临大敌的把守着，不让我们通过。

队伍站住了，派代表去交涉。

“沙面是我们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

“U、S、A滚出去。”

“中国人有在中国土地上行动的自由。”

狂烈的呼喊，情绪紧张极了。

代表回来了，向大家宣布：“行辕张主任的命令，不准通过。”

“不行！我们要冲过去，从铁栅上面爬过去！”嘈杂的呼喊，在愤怒的呼喊中，意见分歧极了。

相持了半点钟没有结果。有人主张继续游行，有人主张用艇渡过去，忽然，沙面那边一个人高喊：“东桥无军队，可从那里过来。”

于是队伍汹涌的开到东桥。

铁丝网是拦不住的，冲过去！

队伍到达东桥时，宪兵军队又先到把守着，荷枪实弹，插起刺刀，用铁丝网摆在桥头，做防线。

领队站在桥上向大家宣布：

“同学们！刚才我们碰到铁栅门，现在又碰到铁丝网了，现在再派代表进去交涉，如没有答复，再作决定。”

队伍怒吼了，愤怒的喊出各种口号：

“沙面不是外国人的，中国人有权进去！”

“中国军队保护中国人，不是保护外国人！”

“美军滚出中国去！”

……

交涉的代表出来了，又是行辕张主任的命令，无论如何也不准通过。

“不行！我们不能忍受这耻辱！”“我们要冲过去！”“我们反对军阀！”……群情激昂，声势汹涌。

领队经过一度商议，向大家宣布：

“为了避免不幸事件，我们一面派代表到行辕交涉，一面继续巡行，请大家服从前头的领队，他会带我们到要到的地方去的。”

情绪突然压抑着，整理队伍了，准备移动。

“U S A get out”一连串英文口号，站在桥上领导高呼的同学，每喊一句都狂跳起来。接着是中文口号：“沙面是我们的！”

“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抗议！”

喊口号中，一个身材高大的同学跑到桥上说：

“同学们！我们要用行动表示我们的抗议，那里不准我们通过，我们就从那里过去！”他把胸膛一拍：“我告诉大家，我是独生子，我不怕牺牲，我领头冲过去！”

“冲过去！”“冲过去”一阵呐喊，再也压抑不住了。

几百人率领着队伍冲，把铁丝网拉开了，几十个勇敢的同学迅

速跑过去，抱住了宪兵和军队，钳住他们的枪柄。

潮水般的队伍冲过去了。

冲进沙面，每个人都以胜利者的姿态，狂呼欢笑，高扬着旗帜跳跃起来。

“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广东青年是勇敢的！”

“暴力不能屈服我们！”

“我们是民族解放的先锋！”

“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

口号和歌声震响着天空。

整理好队伍，继续在沙面游行，在美领事馆前，在有美人站立的屋前，都投以愤怒的呼喊：

“美军滚蛋！”“滚蛋！”“滚蛋！”

“U S A get out！”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沿途都有满载武装警备军队的卡车跟在队伍的前后，在枪刺监视下的游行，经过五个多钟头，胜利地回到平山堂了。

播音筒发出胜利的声音：

“同学们！今天的胜利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这说明了中国前途的光明，也说明了中国青年是有勇气抗拒一切的，帝国主义不可怕，只要有决心，有力量，我们自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今天的游行，不仅表现出中大同学的力量，也表现出全市各校同学的力量，在以后的华南民主运动中，还需要各校同学紧密的团结。”

热烈的掌声中，同学们提议：

“行辕不准我们通过沙面，我们向行辕抗议！”

“今天冲桥时，一位同学受伤，我们要以全体同学的名义向他慰问。”

“今天带领我们冲桥的是周△△同学，我们要向他致敬。”

一阵热烈的掌声又接着一阵掌声。

又唱起了“反对美军暴行歌”。

敬礼，英雄！

雄亮的歌声中，英雄来了。

大家欢呼着，几个同学把他扛上主席台。

身躯高大的周同学，微笑地接受大家的敬礼。

主席宣布说：“周同学是中大的，他今天的勇气，不仅表现中大的光荣，也是中国青年的光荣，我们要以大会名义，把今天游行的一面大旗送给他，作为光荣的纪念！”

热烈的掌声中，周同学接受了这面光荣的旗帜。

队伍在再一次歌声中解散了。

（一、七日晚）

（原载《正报》22期，1947年1月18日）

内外夹攻下的广东工商业

——“广东一年间”之二

（1947年1月25日）

李 维 之

广东在中国说来，算是比较富庶的一个省份，这不仅是说它有多种农产品和工艺品分销各省与南洋等海外各地，可以填补一部分贸易入超，而且还有大量的侨汇弥补每年中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使中国资金不致马上引起枯竭；同时，又因为它是西南各省对外贸易的吐纳口，对于一向依赖关税收入以为最大财政挹注的中国政府，

也是一个不小的财库。此外，它也有一点点的民族工业，可算是中国民族经济的一片幼芽。虽然经过敌人七年的统治，元气已经大伤，但在敌人统治期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敌人也创设了不少的工业，如果不是收复之后国民党政府凶狠的“劫收”，那么到现在，它的基础还是相当好的。就是收复以后，因后方游资的复元，新设的工厂也不少，一时曾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气象。然而，经过去年一年来国民党卖办官僚反动派的迫害，到今天已是残叶飘零奄奄垂毙了。而广东人民，除了四大家族的臣奴及其帮凶之外，也都在盘剥敲榨下愈来愈穷困而至于无法生活下去了。

所以，要说到一年来的广东经济，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幅愁惨的图画，一个殖民地化更加深刻的场面。下面我们就来对此作一个简括的说明。

一、劫收后算不清的糊涂账

广东和其他各地一样，抗战胜利后，经过三十四年半年间国民党政府形同剧盗的劫收，所有敌人遗留下来的物资及建立起来的大小工业都已大部分化为乌有了。当时国民党最高当局对于此事是充耳不闻的，所以接收人员越来越心越狠，一次不足，再来二次三次的搜括，把仅余的物资也弄得精光了。

然而，这样的丑事闹得太凶时，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威信总是有影响的，所以当各地舆论纷纷起来责难，甚至连国民党御用的参政会也看不过眼而大肆抨击之后，国民党政府于去年事后也不能不做一下遮丑的功夫，装模作样地组织所谓接收清查团，出发各地清查接收舞弊案件。然而我们不说接收过了一年之后，一切证据物资都已销声灭迹，根本无法清查起，就是清查有舞弊行为而又证据确凿时，也还不是如湘鄂清查团团长仇鳌所说：“接收人员均系‘关系方面’人物，我无上方宝剑，不能先斩后奏，小机关里大有背景的人物在我面前还神气活现，我有什么办法？”不过经过清查团这么一搅，沉淀了的“劫收”臭迹，也多少给翻腾了起来。

广东清查团于去年八月十四日抵达广州开始工作，团长阳叔葆，团员七人，但实际参加工作的只三人，就张良修、陆幼刚、胡文灿，清查时间规定为五十天，期满即告结束。我们只要看看这个团的组织和阵容，以及它所规定时间的短促，我们就早已预料得到，它必无结果。果然，五十天期满之后，除该团发表了一篇空洞的报告及扣留了一个军政部派员莫舆硕及其办公厅主任李节文之外，关于接收舞弊的案件应如何处置，迄今尚无下文。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对于劫夺国家财产的贪污行为是视若等闲的，派出所谓清查团清查接收也不过是虚应故事搪塞舆论而已。

不过尽管如此，却也翻起了一些劫收臭史而给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国民党反动派所谓“接收主权”的真面目，原来如此。

根据八月二十三日清查团的各界招待会上出席代表的报告，接收人员的劫夺行为是十分凶狠的，依省参议员黄佩纶所说，接收有三个三部曲：“第一个三部曲是：最先入城的是先遣军，再来是杂牌军，最后是新一军；第二个三部曲是：接收了的物资多变少，好变坏，坏变没有；第三个三部曲是：始初是‘分’，其次是‘卖’，等到不能交代时，就以一把火烧了了之。”又说：“海南岛有一百七十多个工厂，接收前还是开着的，接收后就停下来，机器则放在那里发锈。”（见九月十日上海《中国新报》）

按照一般估计，敌人在广州的工厂和仓库，至低限度有几百个单位，此外还有不少的车辆船只和各种物资，无法计算清楚，但劫收了以后，大部分已不知去向了，据经济部广州特派员办公处于去年一月十九日所发表，该处所接收之厂库仅得五十七处，而且大部分工厂因机器丧失无法开工，莫舆硕被扣留后清查出来被吞没的仓库也只有几十处，去年一月底宋子文抵粤视察，曾令各接收机关于三日内将接收清册呈报，但是报者寥寥无几，日人投降时所交出之清册则已无影无踪，根本无从追查。故实际上劫收去了多少，根本是一笔糊涂帐，永远无法清查得出来。

依前述招待会上伍根华的报告，“广州大沙头有接收过来的五

百吨浅水船一百多艘，这些船的机器都被拉走了，船壳则放在那里霉烂。”又据机器总工会代表李盈的报告：“广东最大的纸厂——盐埗纸厂在敌伪盘踞时，每日可出卷烟纸六千磅，包皮纸一千磅，但在接收后，所有厂内的马达、皮带和其他物资，可拿则拿，可拆则拆，弄得分崩离析。”李氏言后因为悲愤已极，当场放声一哭，会场都被他感动（见前途中国新报所载）。此外，还听说敌人的广东化工厂前后被劫夺十一次，看守人最后一次几乎因拒绝洗劫而致丧命，结果该厂除一部分笨重机器因嵌进三合土里面无法移动致俾得保存外，其余一概荡然无存。还有众所周知的，就是接收大员对中山大学的洗劫，据张良修在参政会第三次大会的报告说：“中山大学敌人并无破坏，但自经军队驻扎过后，现在空空如也，连学生上课的椅子桌子也没有，晚上通通睡地板，校内设备都拆卖一空，据说运到香港卖了二千多万元。”又据另一参政员关于海南岛接收黑幕的报告，也指出过这样的情形：“因为日本人在海南岛建设颇多，于是各种名目的接收人员都纷纷飞去，空军也接收了农场，但有两段铁路无人接收，问交通部的人，交通部的人说：“铁路两旁的设备通通已被抢光了，光是铁轨无人接收，因为铁轨不能放进腰包，所以那两段铁轨无人要也无人管。”又据报载：“敌人遗留在琼崖的汽车二千五百余辆，经接收后，因发动机之盗运私卖，剩下车身锈坏者在千辆以上，有若干车辆则以外来牌照占为私有，有若干车辆运走私卖，车轮车胎之过海（私运出琼），汽油机件之腾空（由空私运），司空见惯，人人共知。海口拍卖之陈品充斥，广州湾各地之堆栈库房满载，行无其事，当局若充耳不闻。”（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广州《人民报》）

以上所举的还只是从报纸上透漏出来的点点滴滴消息，如果把未公开的事实也搜罗出来，那真不知要说到什么时候才说得完。所以当清查团还在广州的时候，省港两地的报纸已不断地发出询问：接收的黄金何处去了？大量的白报纸何处去了？然而那里会有下文？莫與硕、李节文只因为接收物资中有一百七十七箱鸦片烟和枪

械四千杆被吞没的嫌疑，数量太大而灭跡手续又未清，所以才引起波澜而已，但到现在还不是一了百了？当时虽有人提出要彻底清查，并且要请关在集中营里面的田中久一和三井三菱老板出来作证，对验那些清册，然而这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后来虽还陆续在广东省银行仓库查出前伪省行钨砂铜仙等四十八包，约值千余万元，省行对此诬称并不知情；新填地仓库所藏仓品十余箱，直到去年五月军政部方才移交后勤部，但已大部霉烂；又各仓库药品及卫生器材，为数极钜，始终未有列册交出，据缪培南称，单是药品一项，用十年也用不完，此外还在警探魏炳住宅查出车胎、棉纱，颜料等物约值三千余万元；又接收物资中，新一军奉陈诚命令可以随意提取使用，故究竟拿去多少，军政部广州特派员办公处认为无法清算，这种种都也因为怕粪坑愈捞愈臭，大家装聋作哑算了事了。怪不得连省参议员陈继烈先生也愤慨地说：“与其说是‘接收’，毋宁说是‘劫收’。接收的情形简直是漆黑一团”了。

虽然如此，但据何应钦总司令抵粤视察时，却还公开发表谈话，说广东的接收情形算是比较良好的。那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看来，贪污舞弊根本就不算什么一回事，这里又得到更确切的证明。所以清查之无结果，乃是必然的归宿，因此，清查团走了之后，接收的事情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二、民族工商业惨景

国民党政府在经过对敌伪物资的劫夺之后，这一年来又对中国人民施行无穷的迫害和搜劫。

广东工商业在去年一年中，由蓬勃兴起走向倒闭破产衰落，到现在，工厂的倒闭已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商业也陷于极度的衰颓。

根据广东省政府建设厅所发表，广州市共有大小民营工厂九百八十七家，其中织布厂二百二十九家；印刷厂一百五十七家；成药制造厂一百三十二家；装造厂八十九家；机器厂六十四家；针织厂七十三家；火柴工业十五家；石印业十四家；碾谷厂十四家；橡胶

业四十二家；酿酒业三十八家；化砂玻璃业二十六家；烟丝切制业二十五家；化妆品业二十五家；土油榨面业二十三家；煤油业十一家；机制饼干面类六家等。其他各地之已登记者则有顺德制糖厂四十五家；汕头、东莞、罗定、高要、饶平、潮安等县火柴厂等七家，故全省合计民营工厂当在一千多家以上，此项数字系建设厅的调查，实际数目恐不止此数。但纵然如此，若和人家比较，实际还并不算怎么多。

至于公营工厂，若把敌伪工厂并连海南的也算在里面，则收复之前，应有数百单位，但劫收之后，散失殆尽，现存的不过是勉强东拼西凑而成。现据调查，计有经济部的二十一单位，军政部的十八单位，资源委员会的十九单位，省营的已开工者有六个单位，其余都在筹备或整理中。资委会的以集中于海南者为多，经军两部及省府所经营的则多在广州。经济部经营的包括捲烟、化工、火柴、汽水、橡胶、制冰、制药、炼气、锯木、制皂、机器等等；军政部经营的包括制呢、被服、制革、修车、修械、电讯器材修理，营养品制造等；省营的包括建设厅的土敏土厂和实业公司的制糖、纺织、饮料、酿造、制冰等厂；资委会经营的多属重工业，包括铁矿、石油、钨矿、化学、电力、水泥、酿造等。据过去调查，敌伪统治海南时代，原有厂矿一百七十多个单位，包括矿山、制铁、冶窑、机械制造修理、造船、电气、化学、纤维、木材、电信、食品加工、印刷、皮革等十余部门，其中著名的有航空修理厂，田独铁矿、石碌铁矿和安逊发电厂等，现在所公布的十九个单位，当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想已大部分劫夺去了。

这些工业不管民营的也好，公营的也好，经过去年这一年来的内外夹击，到今天已呈着怎样的状态呢？

据调查，捲烟业当全盛时共有烟厂一百二十多家，现在仅得二十余家，而且还在断断续续地开工中，橡胶业最多时有二百余家，织布业四百余家，但到现在已有八成停工了，尤其棉纱限制南运以后，对织布业更给予了最后的打击。其他火柴、化妆品、制药等各

部门的情形也大致与此相彷彿。

至于公营工厂，则虽有政府做后盾，并享受着资金通融税捐减免的便利，但其命运也和民营工业差不多。例如经济部经营的工厂，除炼气厂与制冰厂稍有盈余之外，其他的都亏累甚巨，化工一厂、二厂及其附属的二、三间火柴厂，海口第一、第二机器厂及制烟、饮料、制药等厂已先后停工，锯木厂等也在陆续标售了。军政部经营的，因内战方殷，军事需要紧迫，各厂生产尚能维持，惟产量则亦不免减少，如制革厂在敌伪时代每日产皮七百张，而现在则每日至多产三百张，由此也可窥知其他各厂的情形，省营各厂则士敏土厂的生产能力不过战前的三分之一，每月开工时间都是十余天或者最多是二十天左右，纺织厂修复开工的锭子也不过一万枚，仅合战前之半数，其余如饮料、酿造等厂都同样因亏折不堪，无法维持，先后宣告停工。此外，能够赚钱的只有顺德糖厂，该厂设备完善，生产能力颇大，每日搾蔗一千万，出产白砂糖一千多市担，本省的食糖该厂供应了大部分，然而该厂之所以赚钱，却不是依靠自己经营所得，而是藉剥削农民得来，因农民每担蔗送到该厂压榨后只得换回蔗糖五斤半，而敌伪时代倒可换到七斤的。至于建厅的化工厂、丝织厂和实业公司的麻织厂、机器厂等七八单位，直到现在都还未能复工。最近省府又决定将辖下各厂分别标售、出租或委托民营了，虽然它所提出的理由是叫做甚么“免贻与民争利之讥”，但实际上如果还是有利可图，它竟肯放手不干吗？

除了工业方面表现着如此衰落破产之外，商业方面亦普遍呈现着萧条倒歇的景象，据广州《建国日报》的调查，年关倒闭的商店，广州一地即达二万余家，平均每条街都有商号倒闭及改换名称，繁盛的一德路则倒闭商号凡三十余间。全市一百五十多家电池业，几乎无一倖存，盐业于全盛期仅广州一地即达三百余家，但现所仅存者只及一百家左右而已。此种衰颓情形不限于某一方面，而实际上是普遍于各个行业，未倒闭的虽然还能继续维持营业，事实上却亏累不堪，而且大部分都是赖去年上半年旺盛期的盈余以赔

累的。

三、内外的夹攻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形呢？一句话说来，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数目，发动内战，所以无限制地发行钞票，充作军费，又为取得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不惜出卖主权，开放门户，让美国商品泛滥于中国市场，这样，在货币贬值与美货倾销的影响下，中国工商业就全部沦于破产倒闭的状态。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不顾人民死活，以各种捐税的名目搜括人民膏血，官僚资本利用积极方法对民营工商业施行无理的迫害，更加速了它的崩溃过程。

根据估计，自从抗战胜利直至去年年底止，国民党政府的钞票发行额至少增加了十倍，总额达到四万亿元至七万亿元。依照去年一年来计算，广州方面黄金和美钞价格各涨了三倍，港币则涨了六倍，这就是说，法币的价值在一年内降低了五倍至六倍了。法币贬值的反面就是物价高涨，在去年一年内，上半年广州物价涨势较速，大致由一月至六月，一般物价上涨了三四倍左右，尤其是米价涨得最厉害。由年初的二万多元的一担，涨到六月间的八万多元一担，到了下半年，因为社会购买力的一般趋降和香港走私货物的汹涌而至，所以都呈着跌下和趑趄不前趋势，然而当币值不断跌下的时候，物价趑趄不前，却是更加加速了工商业之危机的。

在这种情形下面，首先受到影响的当然就是民族工业，这和全国各地一样，绝无例外。不过广州因为靠近香港的关系，它所遭受的损害程度更为严重罢了。我们还在去年五、六月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广州方面好几种工业宣告破产了，首先就是卷烟业，那时美国香烟如杜鲁门、车利士等每包不过卖四百元到四百五十元，而土制香烟如金马、飞轮等牌子每包卖价亦在三百五十元至四百元左右，但美国香烟味道较好，买者都乐于吸用，土烟自然就无法和人家竞争。其次则为化妆品、纺织等各业也都同样几乎无一不碰到如此的

命运。

商业方面的倒风虽没有工业来的那么严重，但那是因为各行在上半年来都获有巨利尚堪负累，而且再加上走私盛行的原故。本来外币不绝飞涨的结果，商人卖出去的货物，就不能买回原来的数量，但因私货的充斥而来，货价趋降，故尚能保持其原有的商品额，然若折算为货币的话，则实际上已无利可获甚至亏蚀了。至于非外来货品则商品额亦不能保持，如十一月一日广州《越华报》记载，广州米粮商人称：“以春间粮价较之现在，目前仅及春季时六成，例如年初时可能存米一千包，现仅得六百包，所费资金亦达四千余万元”。由此可见商业方面的衰落情形也仅有程度的分别而已。如果洋货再有任何升降现象发生，则商业上所掀起的波澜也一定是非常巨大的。故目前广东各地的商号行庄都潜伏着一枚烈性炸弹，只要那样的时候一到来，它便要马上爆发而至于不可收拾。

但工商百业的处境虽然如此困难，而国民党政府却不唯没有减轻对它的压迫，反而更加要从它的身上榨完其最后的一滴血。“只许四大家族发财，不准老百姓喝水”，这就是今天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所谓经济政策的真面目。

这里让我们来看看国民党政府怎样迫害民间的工商业吧。

第一，国民党政府除滥发钞票促致币值跌落物价飞涨之外，它所采取的惯常手段就是贪取无厌的增税。在去年一年中，除国民党中央政府决定增设麦粉、水泥、皮毛、茶叶等七种货物统税并提高棉纱、烟叶、盐等旧税税率各地地方政府必须遵令开征外，去年这一年来广东当局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殚思竭虑于如何加税增捐，譬如营业税和所利得税，最初规定每半年评定税率一次，但由下半年起又奉财政部命令改为每月查征一次。而税率按营业收入额抽征百分之一点五，不论盈亏，一律缴纳，此种规定本来已经不合理，更有甚者，则征额率由税局评定，商人不得异言，因此之故，税收人员即可以从中舞弊，随意敲索，而商人之负担则毫无标准之可言。就广州市而言，其中筵席税一项，即争持月余之久，税局规定全市筵席

税为每天二千八百万元，商人认为太重，不能负担，要求按照上半年旧征额三百六十万元加五征收，双方相持不下，后率由税局改为每天征收八百六十万元，然后得到解决，但依此税率而论，商人负担仍然十分苛重。此外去年底，又决定把旧房捐改为土地改良物税，重新估定房屋产价，还不消说又是增税之一法。而其中最不合理者，则为追征三十四年度营业所利得税，以广州市来说，是年九月然后收复，收复之前在敌伪统治之下，被迫使用伪券，收复之后，伪券对法币被无理规定为二百比一，商人财产立即化为乌有，此种举措本已近于抢劫，而收复后喘息方定，工商各业亦无获利之可言，其中有些行号还是在收复后几个月后开设，但竟亦无例外地追征开设前的所利得税，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除了所谓法定税捐之外，还有无法计算的摊派，名目繁多。兹举其犖犖大者而言，则去年中仅广州市一地工商行号就须负担下面的几种非法税捐：粮食救济基金五亿元，警费义捐十二亿元，新兵慰劳费七千五百万元，又有所谓献校祝寿筹款，党部特别基金，数目漫无一致，年底又打算开征什么马路修理费，估计各户每井须负担六万元。至其他各县则公然巧立名目非法开征，据财政部视察钟孟谋报告，粤南各县非法税捐有“所谓汽车捐、冥镗捐、牛皮捐、特种娱乐捐、船舶出入口货脚捐、旅店附加捐、屠宰附加捐等，甚至街市小贩也要抽捐，乡愚挑柴一担也要抽捐”等等不一而足，就钟视察本身也认为“在此元气未复之南路地区、竭泽而渔，恐非善策，广东地方财政之紊乱，言之痛心”（十月十七日广州《越华报》）。其实此种情形何独南路一地为然，凡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区几无一地不如是。去年十月广东召开全省商会代表大会时，有一个报纸访问了三十七个单位的代表，在这些代表中有二十几个都异口同声地道出税捐压迫之痛苦，这种意见难道还不够反映出工商百业在国民党政府压榨下的惨状吗？

第二，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横暴压迫和摧残。这里我们也可以举出许多显著的事实，首先就是纱布禁止南运事件。去年九月国

民党政府当局以防止走私为理由，禁止上海纱布运销广州，此消息传出后，广州纱布接着飞涨，如二十支双马纱由每包一百五十万元升涨至三百四十三万二千元（十月十二日市价），十二磅细布由每疋七万元升涨至十二万六千元，嗣经广东商人联合呼吁，方始改为限制南运，但与实际需要相距甚远，据纱商估计，广州每月所需棉纱至少二万件，但十月份获准南运的棉纱只得二千九百六十七件，仅及实际需要的十分之一。于是广州市数百家织造工厂不得不纷纷停闭关门，十余万工人陷于失业，然而走私出口却未因此截止，而中纺公司却于此时反而运了千多件棉纱到广州，大获厚利，这种情形弥足令人愤慨，正如广州棉纱业商会吁请解禁电文中所说“重重限制，处处留难，将使正当商人无法立足，反令官僚资本乘机舞弊，操纵一切，窒息社会生机”。迨十一月间，还是借了外力帮忙，香港政府宣布绝对禁止棉纱布经港出口，纱布涨价的狂潮才得压住一时。香港政府又为救济香港纺织业原料断绝之危机，由日本贩运大量棉纱到港，其价格比之沪纱尤为便宜，二十支纱每条仅值国币一百九十万元左右，价格相差低了一半有奇，因这样的影响，广州纱价也随即回跌，由三百多万元跌至二百八十万元左右，至今年一月初，再跌至二百四十四万余元。但在这时，中纺公司广州办事处却突然宣告开配棉纱，定价每件比市价仅低三、四万元，这且不去说它，但中纺公司在这个时候开配，正如棉纱业同业公司理事长伍锡璋氏所说：“无异把纱价再推它一下，使零落中的纱商业，益陷泥沼，未免有落井下石之嫌”（见广州《前锋日报》）。因为今年一月已近旧历年底，市面银根吃紧，商人都欲及早脱售存货。以求得现款，应付年关，中纺公司于此时抛售，岂非欲使市面存货冻结，纱业商人既吃纱价上涨之苦，现在又受纱价下跌之害吗？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彰明较著的例子，其他的迫害事件还是很多。例如广州的船业，在胜利初期本是十分发达的，可是，因征调军运及不堪重重苛索之苦，数月之间即已零落殆尽，而为有力者所代替，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又如运输业在去年六月初，因不堪善教分署

的攘夺竞争于倒垮之前曾作过一次迫切的呼吁，据车商的报告：“善救分署拥有新型汽车六十辆，每辆载重两吨半，最多可载七吨，它们有种种的便利，可以不缴公路养路费，来去自如，不受阻难，因此可以最低的运价，揽载甚多之商货，如此一来，纯正的汽车运输业，受到致命的打击，只有站不住而倒下去了。……自四月九日至五月二十五止，善救分署行驶车次已达八十二次之多，行走广韶公路线的平均五辆中即有二辆拨出载运商货……普通商业汽车行驶韶坪段一次包车运费约需二十五万元，而分署的车辆只要十八万即可承运，其他的可以类推。”此外，如农民银行迫死广东丝业钊子吴谷五；封闭广州银号八十余家；顺德丝业竟按值征收百分之二的所谓“出口特捐”，曲江县政府竟没收民营的电灯公司，这些都是报纸上俯拾即得的实例，不尽枚举。尤其是官僚资本的广东实业公司，囤积居奇，推销洋货，与民争利，更为广东商人所同声诉病，甚至省参议会亦纷加指责。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之摧残民资是如何的不留余地了。

四、官僚买办另有打算

在国民党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实行横征暴敛政策，把民营工商业摧残破毁之后，在他们看来，这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一回事，原来他们心里是另有打算的。例如身负发展广东经济重责的宋家家臣广东建设厅厅长谢文龙就说过如下的话：“目前大量洋货进口，致使国内现有工业濒于崩溃，当然是不好的现象，不过，大量进口货物，供应了本国市场的需求，在最近的日子，的确使国内物价趋于安定……如果真的牺牲了国内现有的若干工业，而稳定了野马般跃涨的物价，换来国内民生的安定，工业的惨遭牺牲也有它底代价的，同时，现有的工业质量实在都很渺小，全国民生的安定却更加重要啊。”（去年七月十九日广州《建国日报》）。其实谢文龙的这一顿话完全是扣住良心说的欺人之谈，因为今天物价之高涨主要是通货膨胀所引起，纵使全国工业破产倒闭净尽，只要国民党政府的内

战政策不改变，依然养着大量的军队，支出庞大的军费，则纸币滥发无由停止，物价之继续高涨也是无法阻遏的。而工商业倒闭下去，结果只有使“一个政党”的国家名存实亡而真真正正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而已。

可是，这在四大家族及其家臣操纵下的国民党政府看来，那是无关宏旨的。可不是吗？当他们把广东的民间工商业扫荡一次之后，他们就借着干爸爸的美国捲资南来了。远的如中纺公司、石油公司等早在广州开设分店以便囊括华南市场，这些我们且不去说它，就最近仅在报章上所看到的，我们已知道有如下的动态了：

第一，据国民党喉舌的香港《星岛日报》去年十二月十日所载：“自中美商约签订后，美国厂商……纷纷来华，择地设厂，查美商除在华中、华北一带筹设工厂外，并以粤市为华南重镇，交通四达，烟丝等资源丰富，特拟至粤设厂就地制造各种捲烟……据捲烟界谈：美商原拟在香港设厂，惟港方采商业保护政策……颇多挠阻。美商为利便计，故转而明以市为目标。……本市捲烟厂，因资本微薄，将来实难与竞争，前途殊堪忧虑”。又据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华侨日报》载：“顷据沙面美商透露消息，（华）南方面美商已准备大量资金在广州黄埔及梧州等处购地建筑大规模工厂，以扩展两广工商业。同时美航业界为配合此种发展起见，除将香港之办事处扩大外，并计划在广州、梧州设立办事处，大约明年即可实现，届时即有八百吨以下之轻便快船二□艘行走广州、梧州、汕头、海口之间，……近日来往广州、梧州之美人渐多，显与此种业务有关。……据有资格之观察家称：美商此种航业及工商业计划，明年即可实现，不独我工业制品无法与之竞争，内河及沿海之航业亦□崩溃之虞。”

第二，就是官僚资本的南侵。据十一月五日广州《前锋日报》所载：“金融界巨子宋子良，将于香港及本市（指广州）组设一规模宏大资本雄厚之进出口公司，由宋氏自任经理，陆品琴任副经理，与宋子安主持之□货银行，陈光甫主持之国民商业储蓄银行相

联系,名为富中公司。预料此公司出现后,本市以至全国之出入口事业,该公司将有一种控制力。”这一经营出入口的公司,而不是经营其他的公司,按出口货物几乎无一可与口货竞争(如丝、茶国内市价高于纽约市价就是一例),而表现极度衰落的今天,出口事业当无若何可做之处,是则该公司将为包揽推销美货无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官僚买办之结合是如何地密切了。又据十二月三日《越华报》登载:“近有国内实业界,在沪组织南洋企业公司,在广西设分公司,地点在梧州,至桂林、柳州、广州三地则分设办事处,……主要业务是经营桐油、玉桂、糖类等土产之产销及大宗入口货,近已在外国定购胶轮一大批,价值四亿元以上,又收购桐油等一大批,值二亿元以上,刻下两广商业已渐为外省资本势力渗入,本地小本商人,不免受其影响。”这样,不管出口入口,今后将握在官僚资本之手,不只胼手胝足的农民,终年辛劳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就由官僚买办直接垄断剥削操纵,就是地方商人也将被他们排挤至于无法生存的境地了。

由这些例子看来,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四大家族及其奴才对于全国工商破产无动于中,原来为的就是想在破产后的废墟上面,借着美国爸爸的庇力,藉着人民的膏血来建立起他们的殖民地奴隶总管的宝座。

然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一定要这样做,其将引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对,那是可以断言的。而其结果则国民党反动派连自己的性命也将难保。

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原载《正报》第26期,1947年2月22日)

商杰致尧并笼董电

——拥护建立香港分局

(1947年1月31日)

尧并笼董：

一、尧对建立香港分局决定，我们认为在加强南方党的各地，分清公私，以保长期斗争，放手工作，以迎新的高潮完全需要，一致拥护。

二、分局领导下的南方区党委，我们认为机构过于庞大，且可能与分局领导有重复，故提议不需南方区党委，而改设广东区党、闽粤赣边区党委、琼崖区党委，广西(工)委，将来形势发展，则再建立粤桂湘区党委、粤赣湘区党委，这些地方略有武装四五百以上，且已有广大群众基础及党的工作，都是一个独立工作的战略单位。

三、分局以刘长胜为书记，商、杰为副书记，以刘、商、杰、汉夫为常委，分局委员分工：以刘、梁广专管城委，商、杰专管各区党委。汉夫、夏衍、连贯专管港工委，潘仍负原来工作，各部分专门研究结果，提由分局会议通过执行。个别上层关系仍由原来联系领导。

四、城委书记梁广，港工委书记汉夫，组织苏△，报委汉夫兼，统委连贯，文委夏衍，外围组织乔木，经委许，群委宁一，现冯燊代，闽粤赣边区党委书记魏金水，广东区党委书记周楠，暂由黄松坚代，广西(工)委书记钱兴。

五、刘少文现在沪请催刘即来工作。

商、燊等

子世

继续发展与深入的南方民主运动

(1947年2月)

闻 挺

一年来的南方民主运动，有了重大的飞跃发展，这是各方面民主战士英勇奋斗所创造出来的成绩，也是南方人民在国民党反动当局压迫下日益觉醒与积极起来反抗的重要标志。

和平民主是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要求，因此，民主运动也是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事业。在今天，构成民主力量之基础的，很明白地已不只是一两个阶级，而是包括除开大地主买办及军阀官僚的反动集团以外的各阶层人民。他们为着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团结一致组成共同的民主阵线与民主敌人进行坚决的战斗。

固然，在民主阵线里面，因为有几个阶级的存在，而各个阶级又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觉悟程度之不同，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有团结又有斗争的现象。但我们认为：这种斗争是无法避免的，可是却并不可怕。正确的斗争正是为了队伍的更加团结，步骤的更加一致，方向的更加坚定。去年一年中，在民主阵线里面，曾发生过若干的斗争，结果，一部分假借民主以为猎官阶梯的政客官僚终于现出原形，而民主力量却并未因之受到削弱，相反的，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而威信也因之更加提高。一个革命的人民团体，必要受得起考验，有斗争现象的发生并随着能取得正确的解决，非表示这个团体的削弱或瓦解，而是表示这个团体走向于更加巩固。

南方的民主运动，在这一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有团结，也有斗争，然而，基本上说来却是一直在团结的轨道上发展与壮大起来

的，这种团结的精神，我们认为十分难能可贵而值得歌颂，表示了南方民主战线上各方面战士的認識一致。至于所谓斗争，那也是跟全国范围内民社党部分政客的叛卖行为有关的，这就是民社党光棍政客徐傅霖之流，曾在一个时期里面，也混进到南方的民主阵线里来，躲躲闪闪，然而他的伺机摇身一变以便出卖自己投靠敌人的面目，却早为真正的民主战士所識破，所以当他忍受不起反动派三番四次的诱惑而至出卖投靠的时候，只落得一个寡人而去，对民主阵线的团结和力量不发生丝毫影响。我们致力于南方民主运动的战士们，我们必须宝贵这种团结，把这种团结更加扩大开去，只要这种团结能够继续保持，并更加坚牢地发展下去，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大的力量，并最终战胜了民主的敌人。

南方的民主运动，经过一年来的英勇斗争，不只经得起严重的考验，而且已获得伟大的发展了。在国民党统治区里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怖政策和残酷压迫，表面上看起来，民主运动是好像沉寂下去了，然而，实际上却是更深入更实际，比以前和民众结合得更加密切了。在非国民党统治地区，如海外各地，它长成得更加雄伟和壮阔。譬如香港今天在民主阵线上，支持与领导民主运动的，除了政治团体如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华侨致公党等之外，还有许多的青年妇女团体、文化团体等，都是民主力量的骨干；又如南洋各地，几个月来民主运动也有蓬勃的发展，许多地区都先后成立了民主团体，先后起来为反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独裁卖国而斗争。这种情形，我们相信必将继续发展下去，力量一天比一天壮大，阵线一天比一天巩固。最近，广州学生为抗议美兵的强奸中国大学生及美军驻华的爱国运动又重新爆发起来了，我们相信只要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执行它的卖国政策，只要美帝国主义者继续驻军中国援助一党独裁内战，则这种爱国运动也必将随着扩大与发展。这种爱国运动是今天中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和整个民主斗争是不可分的。由这个运动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尽管反动派采取怎样横暴残酷的压迫，人民力量终

是无法消灭的，民主的根苗是始终存在而不断潜滋暗长的。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民主运动虽然不断的在发展，民主力量虽然日趋于强大；但如果它不能取得全体农民的支持，则这个力量仍然是不能长久坚持并扩大发展以至最后取得胜利的。因为农民，是今天中国民主革命的支柱，也是革命力量的主要源泉；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也是革命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我们若忽视了或看轻了这个力量或这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斗争就变为空洞而不切实际，力量的基础就变为薄弱而不巩固。所以，我们在民主运动有了发展的今天，我们绝不能以已有的成绩为满足，绝不能停留在城市的斗争范围，我们应该把民主运动的方向扩展到农村去，把城市的民主斗争和农村的农民斗争结合起来，扩大民主运动的力量基础。

今天南方农村里面的农民，在国民党当局征兵征粮及种种的盘剥欺压下，早已喘不过气来并且不能再次忍受下去了。他们要求生存，迫着他们不能不起来斗争。我们早就指出过，当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挺身而出向反动派展开搏斗时，就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开辟了内战的第二战场，这样，就加速了国民党独裁统治更快的崩溃。那么，今天我们面对着这样的情况，我们是让农民纷纷起来作孤立的斗争呢？还是直接参加领导而把这两个斗争的巨流汇合起来以便加速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呢？毫无疑问地，我们是应该选择后者的道路的。

今天，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广东、广西两省各县，许多地方的农民，不堪忍受国民党当局征实征借和拉丁抓丁以及贪污勒索的煎迫而零星地起来反抗？内地为逃避兵役而纷纷偷来香港及海外的壮丁不是络绎于途吗？广东国民党军事当局不是再三表示“匪氛”猖獗吗？国民党当局的征兵征粮不是三令五申并出动大员亲自督促而到现在也还不满二分之一吗？好些督征官吏不是连自己的性命也断送在抗征人民手里吗？这种种情形只要我们检拾一下内地的报纸，纵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周密文网下，我们还可以不断发现出来。我们

相信，这种陆续分散的反抗现象，必然会普遍地在各地发生，而且发展为武装起义的性质。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客观现实，就要求我们每个民主战士都要去作慎重的考虑：我们应该如何把这种民众反抗的现象和我们当前的斗争结合起来？我们应该怎样把城市人民的民主斗争和农村农民的民主斗争取得行动配合并进行一致的攻击？这是今天民主运动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南方民主运动，要求得它更加广大的和深入的发展，必须朝着这一个方向走去。只有如此，它才有伟大的前途和取得最后胜利，希望我们民主阵线上每一个战士都注意并讨论之。

（原载《正报》第23期，1947年2月1日）

张发奎的“治安”谈

（1947年2月15日《正报》社论）

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于本月四日在官舍举行三十六年首次记者招待会，他首先替自己做一番洗刷，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知道“守法”，几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违法”的事。然而在人民看来，不必说几十年，只说过去一年，在张氏手下已经不知若干人死亡，若干人挨饿，若干人流离转徙，若干人迫上梁山，若干人陈尸沟壑！这就是张发奎氏的“守法”的结果，这就是张氏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的结果。没有做一件“违法”的事，除了可以获得专制头儿的称赞之外，决不能取得人民饶恕的！他还为着他所做的，闻名全国的，三千人大逮捕罪案掩饰，说在广州十个月来，无论公开或秘密，始终未逮捕过一个，“事实俱在，无耻谣言不攻自破”。但是，这除了张发奎自己一张嘴说出来之外，我们

那里去找“事实”看呢？

关于“治安”问题，张发奎氏谈了许多，因为这个问题随着六十四师调走之后而更见严重了。各地抗征民众的武装斗争不断发生了，各江轮渡被劫案件频繁起来了，广州市的内打单强抢骤增了，海南岛已成为“人民武装世界”了，南路国民党的“政令已成废纸”了，东北江又已“至令人关心”了……这就成了问题，反动统治的双脚不是被摇撼着吗？

从张发奎这次谈话中，看到他对于“绥靖”事业再也没有信心了。他只能车一阵大炮，自显其过去的“功绩”，此次宣布了一个“剿匪”的新数字，说一共“剿灭”了一万三千多人，恰好比之他在一个月前所公布的数字多了十倍。这个“大炮”有什么作用呢？是作为推开责任的根据。他说：“土匪之未能肃清，行辕固有责任，但地方政府责任尤大”。这等于说，过去我有大军可用，今天我没有兵，就没有办法，只好由你们地方政府去管了。

张氏的谈话虽然故示“乐观”，但也透露了统治阶层对人民反抗的惶恐。他说：“过去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军队，一切都依靠国军，军队一调开，匪徒又死灰复燃”。为什么会“复燃”呢？那可不是说明，过去依靠“国军”也不能达到压平人民反抗和安定其反动统治的目的；现在“国军”走掉，统治便见无能，“匪势”因而浩大起来吗？所以，“六十四师调后，各地方政府纷纷来电，请兵保护”，张氏斥之为“实属可笑，然而军队抽空所引起的统治阶层的惶恐，也就表露无遗了。

张氏对“治安”的对策，在统治阶层看来，是不免太过轻率了。他认现在之“匪”不过蕞尔小丑，地方武装足以应付而有余。但他对自己的话也不免怀疑起来，说：“去年民厅报告，全省各县共需要补充枪枝二万杆，经如数拨用，但各县地方实力依然不济”。这个“不济”的事实，就说明他的“治安”对策的落空。

由此足以说明，广东在兵力抽空和人民反抗的情况下，统治者充满了苦恼，因而军政当局之间，统治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矛盾也随

之增长。人民力量要冲破这个脆弱无能的反动机构是完全有可能的。

(原载《正报》第25期, 1947年2月15日)

血腥统治的动摇

——一年来广东国民党当局的“绥靖”

(1947年2月)

俞 同

本年初, 张发奎在一个纪念周上报告行辕一年来的工作, 说明他过去是如何热心于“剿匪”, 把“绥靖一项列为首要工作”, 而且今后为了“解除人民疾苦”, 使人民得到“安居乐业”, 仍然继续进行“绥靖”, 实行“穷追猛剿”。他同时又指出, 过去绥靖工作已有“相当成绩”, “但因部队逐渐调离, 多未能依照计划完成”, 今后, “国军人数已经减少”, 其所赖以从事于屠杀人民的绥靖工作, 只能侧重“充实地方自卫力量”, “健全政府基层组织”, “促进军民合作”, 仍冀以此维持其血腥的统治。

国民党反动集团就是军事法西斯集团, 国民党的专政在其主要方面来说是军阀专政, 国民党统治工具主要的是它的反人民军队, 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就是以武力“接收”人民主权, 在尸林血海之上恢复其大地主大买办的统治的血腥政策: 这在过去一年来广东局势的演变中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作者本文的目的, 在于对国民党当局在过去一年多, 如何以内战屠杀来恢复其反动统治, 又如何以表面的暂时稳定趋向统治的动摇, 提供材料, 以便致力于广东的民主斗

争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人士参考。

一、从抗战爆发后次年敌人南侵占领广州起，到一九四四年敌人发动“救死攻势”，西江、粤北沦陷止，基本上说，广东是全面沦陷了。在广东的抗战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广东人民和敌人抗战，国民党当局除了一些必要的招架外，并没有对敌人认真的抗战，这是最为清楚的事实。

国民党当局在广东抛弃了土地和人民，但当敌人投降之后，他们掉头回来，就看到广东已不是本来面目。在被抛弃的广东土地上，人民独立自主的起来进行抗日斗争，组织了人民自己的军队和政权。那里包括：（一）东江纵队活动地区是惠阳、东莞、宝安、博罗、增城、龙门、海丰、紫金、河源，在大部地区进行过减租减息，建立了民主政权。在敌人侵攻湘粤桂，西江、粤北沦陷的时候，东江纵队派出劲旅，并与珠江纵队同时挺进粤北，成立粤北支队，活动于从化，佛岗、新丰、四会，广宁，清远、英德、翁源、曲江、仁化、始兴、南雄，和平、连平及赣省之大庾、信丰各地。

（二）琼崖独立纵队，原为土地革命时代之红军游击队，抗战后改编，由国民党政府给予“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大队”名义，后又奉命扩编为独立总队，其活动遍及全琼各县，并普遍成立民主政权。

（三）珠江纵队及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前者原为“广州市郊游击队第二支队”，活动于中山、顺德、番禺、南海、三水及广州市区；西江沦陷后，派出劲旅，挺进中区，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活动范围包括新会、鹤山、高明、高要、恩平、开平，台山、新兴、阳春、阳江。（四）南路人民解放军，诞生于雷州半岛沦陷之后，活动于高雷钦廉各州县。（五）韩江纵队，活动于普宁、揭阳、潮安、饶平、潮阳、惠来等县。这种情况，就使得国民党广东当局要把“绥靖”工作做为“复员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张发奎语），亦即是说，要把武力消灭抗日的人民武装，“接受”人民政权，以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复员”过来。所以当时的内战主力军新一军便公开宣告他们第一个任务是“清剿奸匪”，第

二个任务才是“解除敌人武装”。

那就是说，在敌人进攻广东的时候，国民党当局是抛弃土地，抛弃人民，弃甲曳兵而走，而广东人民遂还从事独立自主的自救的抗战，创立了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权。敌人投降之后，民族敌人被打倒了，民主的敌人跑回来了。当时的情形便是：广东人民，以农村的人民军队和广大农民为中坚力量，配合城市的民主运动，进行着保卫人民的政权，保卫人民既得利益，争取广东民主政治的实现的斗争；而国民党的广东当局则藉着其优势的军事力量，企图消灭全省人民武装，以便压倒广东人民民主运动，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人民统治，替四大家族鱼肉广东各阶层人民杀开一条血腥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广东的民主与反民主斗争，一开始就以最残酷的内战方式表现出来的根源。

然而，说是这个斗争开始于敌人投降之后，也不尽符合事实。实际上，当敌人南侵，国民党采取避战政策，一退千里，使广东人民从实际经验当中了解中国抗战绝对不能依靠国民党，而必须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决心采取了独立自主政策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便已不顾民族存亡，采取帮助敌伪压迫人民的政策，其手段主要的也是内战。过去在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由于交通梗阻，故这种国民党在广东的内战罪行还不为社会人士所普遍知道。如在东江，当曾生、王作尧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还在国民党政府领有名义的时候，即于一九四〇年被国民党企图武力消灭，自此之后，内战就从没有一天停止过。国民党军队虽然见敌即逃，但始终要留下一个师或一个独立旅以上的正规部队，配合地方团队，勾结敌伪，来对付东江纵队。如在琼崖，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爆发了“美合事变”，企图包围消灭琼崖纵队，此后内战也没有一天停止过。如在珠江三角洲，国民党勾结敌伪向人民进攻，曾将广东的著名农民领袖吴勤司令惨杀。如在南路，他们不但对南路人民解放军进攻，并且对当时奋起抗战的十九路军旧部自张炎将军以下，如庞成、文绍昌、邹敏天、孙兰泉、陈以铁诸氏尽加杀害。其他在西江，在潮

油，在始兴，都是当人民抗日部队诞生之日，就被国民党当局用的内战屠杀来对付。

国民党在广东守土失责，抗日无功，抗战八年的历史，就是他们见敌即逃，闻风先遁，抛弃土地，抛弃人民的历史，同时又是他们阻碍抗战，积极内战，反对人民，屠杀人民的历史。不过当时日本人也不会放松他们，所以他们在敌人面前不能不把主力撤走，只留下一部分力量和地方反动的力量结合以从事内战，而且因而不能不勾结敌伪，和走“曲线救国”的道路。敌人投降后，大部分伪军五、六万人均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收编完竣，张发奎亲口说出“他们伪军都是受中央策动”的，就是例证。

二、敌人投降后，广东国民党当局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以“绥靖”、“剿匪”的名义下，对广东人民进行空前大规模的 内战 屠杀。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张发奎在广州行营召开“粤桂两省绥靖会议”，各地内战，随即开始，国民党使用兵力空前强大，计在东江为新一军之三十师、三十八师、五十师，五十四军之三十六师，六十三军之一五三师，及一五四军，六十五军之一八六师，保安第二、第十、第十二团，地方团队陆如钧、赖耀庭、钟超武、萧天来，伪军吴东权、陈培等部及收编为惠陆先遣队的龟龄岛伪海军，共四万余人，并经常出动空军配合作战。在琼崖为四十六军之一七五师、一八八师、新十九师，保安第六团及各县团队共一万五千人。在中区西江为六十四军之一五六师、一五九师，保安第一、第八、第九团，及各县团队，约一万人。在南路原有三个师从事内战，后来两师调赴琼崖。在粤北，其始为六十五军之一六〇师，该师随余汉谋赴浙后，继为五十四军之第八师，后来是六十四军之一三一师，及江西保安团两个团。其内战总兵力为正规军六个军十一个师，保安团九个团及各县团队，收编伪军等，几占当时全省国民党军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绥靖会议”上，曾限期两个月内肃清“奸匪”，满以为挟

其雷霆万钧之势，便可短期内以其血腥手段恢复统治。军事上采取过“网形合围”“反复扫荡”及“填空战术”，如在东江江南区，他们把一切公路及大小交通线严密封锁，禁绝行人，每日出动四围村庄反复搜索，穷乡深谷，无处不到，每到一地，必以几路包围，企图迫使人民军队无立足及掩藏之地。强迫人民“五家联保”，组织联防队，组织“军民稽查处”抢掠烧杀，迫缴军粮等。对人民军队及民主政权，民众团体人员，则用最残酷的屠杀手段，普遍实行“杀头示众”，宝安龙华乡民主乡长周振华被击毙后还挖去眼睛，撬掉牙齿。东莞樟木头乡委员吴佛生之五岁儿子被活生生抛到池塘去。东宝中学校长的母亲，七十余岁的曾老太太被拘捕施刑，人民军队的女同志被捕遭轮奸后处死，裸体示众。另一方面又强迫抗日人民自新，发出传单说：“不自新只有死路一条”。这种种做法叫做“拔根政策”。结果，除了被屠杀者之外，抗日人民被关在惠阳、东莞、石龙、广州、曲江、阳山、乳源、茂名、潮安、翁源各地监狱中的达二千余人，被迫抛离乡井，流亡来香港者有数万之众。这种空前浩劫，人民所遭受的灾难，生命财产的损失，实在无从统计。

广东国民党当局出尽全力的“绥靖”工作，究竟除了大事〔肆〕摧残酷〔苦〕了人民外，有的是什么“成绩”呢？当然，在强大的残酷的军事进攻之下，人民力量方面不能不撤出了某些地区，特别是平原地区，而转进山岳地区坚持斗争。例如东江纵队不能不把一部分兵力转移到紫金、河源、五华及连平、和平的九连山区；又如南路人民解放军便把主力转移至粤桂边的十万大山。过去大部分民主政权被捣毁了，民众组织被打散了。但是，人民军队并没有被消灭。我们可以引证去年一月六日张发奎在香港各界欢迎会上两段话为证：

“十月下旬开过绥靖会议，但是任务始终未曾达成。要问几时达成？我不欺骗同胞，要看政治组织能否臻健全，交通通讯有无保证。”（见去年一月七日《华商报》）

“所谓绥靖意思就是清剿奸匪，可惜他们善用游击战术，兵来

匪去，漂忽无踪。所以东宝一带，当局曾策动大兵进攻，但有一个团进军两周，还未遇过一个奸匪打过一粒子弹。”（同上）

这可见当时的广东“剿匪”军事的毫无收获和“剿匪”统帅的缺乏信心了。

又看看张发奎的行辕工作报告中所列举的“战绩”：“综合一年来各区剿匪所得战果，计击毙匪五百余人、伤匪八百余人，俘获二百八十余人，卤获机枪八十九挺，步枪五百六十支”（见今年一月七日广州各报）按照国民党一贯夸大作风，这个数字本身，应该大打折扣。但根据他们估计，各地的“奸匪”数在三万五千人左右，那末就以张氏这个报告来说，也就说明他们的所谓“肃清奸匪”的伟大计划，是完全落空的。相反的，根据琼崖地区的统计，去年上半年琼崖纵队在自卫战争中，国民党军伤亡一千五百人，被俘中校营长及副官以下官兵二百二十余人；琼崖纵队伤亡四百五十余人，被捕六十余人。双方比数为三比一强。

三、前年十月到十二月间广东的内战，是国民党撕毁双十协议，发动全国内战的一环。但是在内战主要战场的华北，由于冀南豫北一役的覆没，国民党显然也输了，如果没有调动军队的时间，那么他们已经不可继续打下去了，这就出现了去年一月十日的停战令和政协会议。停战令和政协会议，是国民党在其内战不利的时候，用以争取时间，调动军队，取得外援，准备从新作战；而在全国民主力量方面，则是坚持和平民主，在政治上争取有利阵地，企图通过政治妥协和平方式来达到实现民主的目的，减少人民的痛苦。但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在广东则认为是内战仍然有利的地方，故此实行不顾停战令而继续内战。这就是停战令下达后广东国民党当局坚拒调处的原因。这就说明了国民党对停战令，对和平的所谓“诚意”。直到今天，蒋介石还在最近几次声明中，把他的破坏停战说做遵守停战，把他的假意和谈说做诚意和谈，还在时不时玩弄“和平攻势”，这对于我们熟识“停战”与“调处”在广东的表现的人，真正是滑稽之至！

去年一月停战后的大势既不同于停战前的大势，也不同于七月大打后的大势。因此，在广东方面，国民党当局则认为内战仍然对他们有利，故此继续进攻内战，拒绝调处工作。但在人民方面，由于全国大势要在停战令和政协决议的有利基础上，力争和平达到民主的实现，广东的斗争便不能不是应该成为全国和平运动的一环。因此，必然就要遵守停战协议并力促其实现，后来又遵守北撤协议并力促其实现。

去年一月十日的停战令，本应于十三日生效；但蒋介石却密令广东当局限期于一月底肃清广东中共部队，张发奎执行这个命令，继续内战。一月二十五日军调部广州执行小组（第八小组）抵穗，美方代表为米勒上校，国民党代表为黄维勤少校，中共代表为方方少将。广州行营发言人于次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谓“粤桂两省地区，除发现零星土匪散兵抢劫外，从未发现中共部队，对调执组此来甚感惊诧”。对第八小组工作不予协助，并通飭全市报纸禁载该组活动消息。一月十二日，张发奎在行营招待记者，郑重声明：“行营以未奉到辖区内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人马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事实在粤境扰乱治安者，仅属地方零星土匪及伪军残余与逃亡日兵”（中央社电）。同时又诬称“重庆最高当局未有把粤桂两地包括在停火协定范围以内”。东江纵队曾在战场上截获五十四军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转达张发奎所发之密令内称：“委座停战命令其执行范围仅限于长江以北之地区；本辖区为维持地方治安，清剿土匪，仍称继续加紧实施，依限肃清”。用“清剿土匪”来掩饰内战，用“停战令仅适用于长江以北”来阻挡调处，这就是当时张发奎的两张牌。由此，我们既看到张发奎之志在消灭人民力量的决心，也看到蒋介石对停战和平之所谓“诚意”了。这个时期，广东当局集中海陆空军的全力，进攻东江纵队在惠东宝解放区之最后基地大鹏半岛，企图把东江纵队打散了，或完全驱入荒僻山地里，就可以把停战令和执行小组置之不顾。

张发奎的做法激起广大人士的愤怒和全国的注意。一月三十

日，东江纵队司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广东当局否认中共部队存在的荒谬加以驳斥和抗议。接着，何香凝先生与民盟南总负责人通电呼吁和平，要求执行小组立即停止双方冲突，并要求派员随同执组出发视察协助调处。二月十一日，香港基督教会督何明华致电张发奎，请求“立即停止进攻东江区的爱国的中共军队”。新加坡、暹罗等地华侨函电交驰，呼吁停战。在这种广大人民和国际人士的正义呼声底下，张发奎的拒绝调处实已理屈辞穷。此时，重庆三人委员会及北平执行部亦电复执行小组，指出凡属“中共领导下部队有指挥负责人者”均在调处范围之内，并承认广东的中共部队为东江纵队，以曾生为指挥负责人。三人小组和执行部的这个指出，使张发奎的两张牌都失效了，但他仍无悔改之心。一方面在说，东江纵队是有的，但它无番号无纪律，不能承认为军队，抗战时广东是有过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但他们不是正规的武装部队。这已属无法自圆其说，不能做拒绝调处的藉口，只不过是“死要面子”，自己的无理谎说被揭穿无余后，还在抵赖不认错，臭官僚军阀的无耻可见一斑。但他这时认为，只要执行小组和中共部队接不上头，那也无奈我何。因此执行小组在二月十八日出发东江视察，就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自走一遭，作了一次“春季旅行”，仍然无法展开工作。之后，军调部又电令东江纵队派遣代表到广州与执行小组联络，而广东当局却不允许保障代表安全，又成为不可克服之困难。三月九日，东江纵队政委林平飞抵重庆，至此广东停战问题才由重庆三人小组获得协议，并派出军事代表团于三月三十日飞抵广州处理，四月二日国共双方成立了北撤协议。这个协议在重庆时的决定是“广东和海南岛的中共军”均由美国协助运往山东。但到了广州之后，由于张发奎之反对，北撤范围变成海南岛除外。

四月二日成立了北撤协议，到六月底才实现，其中原因是广州行营不允许给予中共部队的集中至登船过程的安全的具体保证，亦不允下停战命令。而且内战仍然一面进行，一面重新部署。保安副司令韦镇福，率保安第三、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团兵共五个

团兵力，绥靖江南，一五三师则担当惠、博、紫、河各县的内战军事；粤北方面，一三一师仍积极进攻，并动员江西团队配合，老隆到梅坑一线，屯驻重兵一个师之众，志在截击东纵粤北支队南下。然而东江纵队为了贯彻协议，冲破困难，依靠自己，不依靠所谓“保证”遵议北撤。这之间，也完全显露了广东当局企图以北撤协议麻木中共，来达到打击中共的阴谋。但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广东正规队的新一军、五十四军、六十三军都已调离广东，开抵东北华北，而广东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大为减弱，因而在当他拚其全力还没有能够消灭了中共部队，那么在军事力量削减之后就休再想消灭得中共部队，这就使得张发奎觉得东纵北撤倒还是算了。在内战有利的时候便决不停战，在内战已经趋向不利的时候那才让协议付诸实行。这就是广东国民党当局对停战及北撤问题上的态度。

因此，对东纵北撤认识为中共没有力量坚持斗争，那是错误的。同样，以为东纵北撤之后广东就可以有了和平，也是错误的。东纵北撤，是为了贯彻中共当时以和平达到民主方针，这是全国人民利益的问题，这是部分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的问题。

四、东江纵队北撤之后，广东国民党当局以血腥手段来恢复其反动统治的做法，无疑是更为积极了。张发奎在他的行辕工作报告中，认为去年夏秋数月时间各地“治安”情形“均有进步”（海南岛除外），指的就是这个时期。这就是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出现一个短暂的表面稳定的时期。

这个时期，广东当局在军事上的两大任务，一是在原日各解放区进行“清乡”，一是在琼崖加强内战。张发奎氏曾于此时东南西北四面分飞，各处召开绥靖会议，表示其对主子效忠的真诚。这个时期的特点，又是广东的“绥靖”任务，由于正规军的大部调走，已开始转入由保安团队为主，从七月一日起由省保安司令部负其全责。六月一日，保安司令部正副司令罗卓英、韦镇福召开全省治安会议，确定了全省绥靖计划，他的办法主要三点：一、建立各县民众自卫队；二、积极进行保甲；三、实行联剿，连保、连坐办法。

按照这个办法，在原日解放区里实施起来，那就是在“接收”了那里人民政权之后，就要恢复那里的土豪恶霸的统治，作为国民党统治的基层组织；帮助这些“土皇帝”建立武装，作为镇压人民的助手。实行“连保连坐”法，据韦镇福的解释，是“一方面促使民众切实互相连保，以清乱源，一方面则斩草除根，断其蔓延”，意思即是用这个“株连九族”的屠杀政策，把一切过去参加抗日和民主工作的人民尽加屠戮。因此，原日解放区人民在内战摧残之后，又复雪上加霜；广州行营所谓保证这些地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过是一张废纸！

这里以东莞的梅塘乡作为一个例子：

“民主政权自然是摧毁了，却成立了汉奸土匪乡公所，正乡长翟连夸曾勾结伪军陷害过抗日的，副乡长李宁以前是翦径偷牛的土匪。汉奸土匪和徐东来狼狈为奸，犖犖大者有三样德政：一是残杀民兵抗属并抄家勒索；二是强收军谷征实征购；三是压迫农民缴还所减租息。……以前参加过抗日的民兵，为了怕受抗日罪，个个远离家乡。一个民兵陈衍秀因无力在外谋生，冒险回家，第二天便遭杀害。不敢回家的，他的父母妻子也受逮捕问罪，有的猪牛给牵走了，有的家屋被拆光了，从前做过民选乡长的翟锦荣先生（已病故）的母亲被枪毙了。……径口村二位绅耆黄子明（基督教传教士）和黄潮日也给拉去弄死了。连那曾赞助过创办战时中学的陈哲夫先生至今也不敢回乡。”（见本报新八号：“梅塘血泪连篇”）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东纵北撤后，广东当局的“清乡”是何等惨酷的作为，而国民党在那里恢复的统治又是何等血腥的统治了！

国民党当局的“清乡”，目的是“斩草除根”，那么他们对中共复员人员，当然碍难放过，所谓“并不歧视”的保证，只是狗屁！

七月十七日，广州行营发表公报谓奉“中央”命令举行中共复员人员“集训”，企图搜捕中共复员人员，把他们关在集中营里。

这个阴谋却落了空，除了截留了几个之外，再把原日在各地监牢里的“残余”政治犯集中起来，也不过三十余人，这就使得张发奎大为叹惜。这些刽子手们始终没有明白：中共部队是来自人民，一贯依靠人民的；他们有了人民的援助，决不会容易落在杀人犯的手里。中共复员人员数目就有一万多，他们生存在人民当中，他们并不是孤单的。

经过内战，调查，北撤，“清乡”，广东本部各地人民的斗争转入潜伏状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走向表面稳定：这就是统治者所无限依恋的“夏秋几个月期间”。然而在人民武装坚持斗争的琼崖，始终是个民主堡垒。

琼崖内战的大规模展开，是韩练成部四十六军赴琼“接收”，何应钦一月间亲飞琼崖指示后开始。广东的内战首领们对付琼崖纵队比之对付东纵还要伤脑筋一些。四十六军从二月打到五月，没有收获。五月中，张发奎亲飞琼崖，提出“政治瓦解和军事歼灭并进”政策，也没有结果。七月中，罗卓英、韦镇福飞琼打气，也没有结果。八月中，四十六军（改师）两个师（改称旅）调赴华北，琼崖内战主力抽空，只留新十九师（改旅）驻守榆林港（该师最近亦已调走）。这就忙煞了保安司令部，八月下旬，保安副司令韦镇福又驾临琼岛了，他率领过来的是三个保安总队（原保安团），连原驻琼崖的二个总队，共为五个团，并拟定九月一日开始全面“进剿”，后因调兵阻滞，延至十月一日开始，以六个月分三期进行“清剿”。琼崖剿匪指挥所亦于九月一日成立，由省府办公处主任蔡劲军兼指挥官。蔡氏独掌军政大权，实行大屠杀政策，他的部下杨开东公然提出这样的口号：“随便杀死一百人，总会有几个是匪”。屠村惨剧便不断演出了。毫无疑问，由于主力抽走，他们的所谓“全面清剿”就只是壮壮胆子的锣鼓，他们的屠杀政策只有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怒和坚决斗争。琼崖纵队不但没有被“清剿”掉，而且从九月开始实行了自卫反击，取得更大胜利，曾攻入万宁县城及黎圭市、阳江市、那大市等重镇，十二月二十七于那大市附近，

将保安第二总队一个大队击溃，并歼灭其一个连全部。据十月七日上海新闻报载：自四十六军调走后，海南岛已成为人民武装活动世界。照张发奎自己的话：海南岛“清剿工作，本人向极重视，……但因剿匪部队言语不通，地形不熟，剿匪进展，颇为迟缓”。

五、依靠武力屠杀政策，杀掉千千万万人民之后，只能使人民慑服于一时，血腥统治决无长治久安之策，这是历史统治者的悲哀，也是今天广东统治者的悲哀。当去年十月，广东各地“治安”问题严重的时候，一张广州报纸在社论上面说：

“各地一致的要求，首先是治安，其次是治安，最后还是治安。……凶年不免死亡，凶岁子弟多暴。铤而走险，无怪其然，治匪贵乎严刑峻法。但别一方面，民不畏死，必不能光是“以死惧之”。”（十月八日广州《建国日报》）结论是应使民众有饭吃，有衣穿。

这就道破了统治者的真相。广东统治者对人民的屠杀政策，其目的是只许四大家族有饭吃，一席一席人民血肉的筵席吃个饱，却决不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人民没有饭吃的结果，便“铤而走险，无怪其然”，便起来作不能以死惧之的反抗斗争，和统治者的血腥屠杀严刑峻法的政策拚个你死我活！一切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都是在这样情况下，从动摇、崩溃，到灭亡！

过去的内战清乡，种下了仇恨；征实征兵的恢复，加深了仇恨；过去的摧残，人民没有饭吃；恢复了征兵征实，人民更加没希望有饭吃。这是蒋介石在七月开始的全面内战政策，和广东当局的全面支持内战政策的必然结果。另一结果是过去从全副武装镇压人民，取得一时的慑服；后来抽走了正规部队，即是抽去了广东当局的主要统治工具，于是人民的反抗就复燃了。血腥的统治开始动摇了，他们所留恋不置的“夏秋之间”已经完结了。

从去年八月中，四十六师（原军）调走后，广东统治武力还有的是六十四师三个旅，八个保安警察总队（原保安团），还可借用的有赣南的一五二旅（原师）。他的分布是：以五个保安总队应付

琼崖内战，六十四师之一五九旅拱卫广州，六十四师之一五六旅和一个保安队镇压南路，一个保安总队驻守东江，六十四师之一三一旅以一个团保护粤汉铁路，一个团在北江之四会广宁及小北江，一个团驻守仁化、始兴、曲江、翁源四县，南雄、连平、和平三县绥靖工作交由赣南之一五二旅兼负。粤桂边组织三个联防处，将二省边县划入统一指挥。粤闽赣边绥靖区由曾举直指挥。水陆交通防务，水道方面东江由梁桂平，北江由莫雄，江门由张平，西江由陆满负责，翁源、英德、曲江三县组联防处护路。照当时行辕参谋处在全省行政专员治安座谈会上（去年九月二十五日）所宣布的“匪情”，则有韩江千人，东江千二百人，北江五百人，南路千四百人，海南岛六千人，中区三角洲五百人。这里所谓“匪”其中也有土匪，但大多数是武装人民，而海南岛方面则指的是琼崖纵队。就这个数字来看，还是相当浩大的，这使广东当局痛感难于应付了。

去年十月，触目惊心的是劫案频传，其中以各江河道及四邑三角洲为严重。据十月份不完全材料，被劫船渡在东江河道为三洲、海珠、冠东、复兴、非洲、福星等五艘；广州市桥之桥安渡、广州官山之利樵轮，广州新塘之天成轮，广州两阳之新利兴轮，清远之新宇宙轮，广州梧州之穗昌渡等。据韦镇福报告称：“单仗护航队实力，必陷鞭长莫及。陆路交通治安以广（州）韶（关）段及韶（关）兴（宁）段以及广（州）从（化）之三角插花地带匪徒最凶”。据“国大”代表通电描写，四邑“土匪如入无人之境，予取予携”。海兴军舰亦会于此时在芒洲被人民武装所俘。此时舆纷纭，交口指责，都是治安问题，而广东当局也为此而忙碌不堪。据去年十一月十四日香港《星岛日报》专讯中称：“省军政当局之意，咸主治乱世用重典，飭令驻军团队放手做去”，意思即是放手杀人，因而“各地庇匪土豪劣绅区乡镇长被捕枪决者不少，匪党被处死者甚多，高州各县市一个月内平均在七十人以上”（见同上专讯）。这里所指高州各地，其对象正是南路人民武装，那么所谓“庇匪”土劣实则开明士绅。由此可见，广东当局的武力屠杀政策，要因其统治力量的削

弱而更加疯狂凶暴。

六十四师北调在去年十一月底开始，至今年初，它的最后一部分兵力，一个旅部和一个营，都走光了。填防部队曾在报章出现过许多个师的番号，但实际上只有二〇五师（青年军）一个旅部驻在曲江，其工作为整训，并无负地方绥靖责任，而且在粤兵力仅为一个团。拱卫广州之一五九旅扫数调走后，开来接替的是在苏北宿沭大战全部被歼后抓丁补充之六十九师戴之奇（已作无谓牺牲，现改由李棠充任）的残余部队九十二旅（旅长艾霏），名为接防，实际不过是整补。该旅旅长到省之日，即表示“兵力太少，责任太重”，没有信心了。至原在南路“清剿”的一五六旅，撤防后已没有部队接防。

正规部队完全调走了，调回来的不是整训就是残兵。广东当局为了弥补兵力空虚的致命弱点，首先就是扩编保安总队作为绥靖的基干兵力，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已将两个保安总队增编完整，连前共十个总队，最近还要增编。增编的办法是收罗土匪武装，譬如已编竣的第九、第十两总队，便是从那些曾武装割抢民间收成的沙区自卫队为主。最近韦镇福出巡东江，任务也是收编游杂土匪武装。这种“以土匪维持治安”的办法，就是他们非法的鱼肉人民的行为变成“合法”化，就可以表面上减少一下抢案的数目字，可以部分“安定”了国民党的所谓“治安”，同时又可以利用他们平日欺压老百姓的性格，以便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在统治者方面来说，这是一贯来的老作风，也是一种“一举两得”的办法。无疑，善良的老百姓是更遭荼毒了。徐东来等的累年为祸东江口是显例。

其次是加强各县地方团队，这个计划也是在正规军北调后一再着重的。自去年十月起，全省各县市增加警察，由二万五千〔千〕人增至三万二千人。同时通令将各县警察改称为保安警察，隶属县市警察局指挥，行轍并拨给枪二万枝，加强武装。最近又将各县警察统由保安司令部及各区保安司令指挥，准备认真用来协助“剿匪”。这种由各地就地征兵筹饷，又可供“进剿”之用的地方武力

的扩大和统一指挥，是在财政困难不容易大量扩编基干兵力的情形下的一种加强统治力量的办法。

最后就是起用地方势力了。地方系的游杂部队在“接收”时期，命运不如伪军远甚。大部分伪军被收编了，而虽曾有过若干反共功劳的游杂部队却被遣散。这就是广东要彻底“中央化”的表现之一。可是到了广东当局眼见自己兵力已捉襟见肘，绥靖办法已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不能不改变方针，重行起用地方实力。去年十一月中旬宣布组织“中区绥靖督导委员会”，派陆满为主任委员，林小亚、周汉铃、黄进荣、吴康楠、刘超常、欧阳倡等六人为委员，十二月一日正式成立，负责南、三、番、中、顺、东、宝、增、从、花、新、台、开、恩、赤等十五县的绥靖工作，各县保警队统由该会指挥，并召开过十五县军事科长参加的治安会议，建立各县“清剿工作团”，组织五邑联防队，定三个月为期“肃清匪患”，初期工作着重招抚。张发奎对这个委员会的看法，据说是“寄予莫大期待”。这之间，虽不免有“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存在，但就广东统治者目前困难情况而言，不能不是一着重要的棋子，传拟在其他各区亦同样进行。因为地方与中央纵有矛盾，这个矛盾有时可能减少其积极性，但他们由于切身利益关系，在对付当地人民的反抗上面，有时又要更加凶恶的。

以上就是广东当局的绥靖军事的近况。究竟他的力量加强还是减弱呢？毫无疑问，他们的力量是大大的减弱了，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今后将要发展起来，做成许多间隙。

广东统治的动摇现象，表现于四个方面。第一是海南岛方面中共领导下的琼崖独立纵队的坚持斗争和胜利，这不但对于琼崖人民的解放事业有决定作用，而且对整个广东人民的斗争也是有鼓励和帮助作用。第二是原日解放区的中共复员人员被迫自卫结合人民，重新拿起武器，以他们过去八年抗战的经验，他们深知道现在应该怎样做。第三，各地抗征抗税的斗争，今年初已开始出现武装斗争形

式，虽然今天还在萌芽状态，还只是分散的，零星的，但随着内战持续，三征政策，粮食恐慌等的灾难加深，势必蔓延成燎原大火。第四，各地土匪活动，对这些土匪已不能用老眼光来看它。土匪产生的根源是农村破产，农民铤而走险。广东各地向来存在着许多积匪，他们固然在破坏了统治者的“治安”，但也损害人民利益。这些土匪，在今天统治者采取“招抚”“收编”政策，特别是起用地方势力以便利拢络控制之下，他们会逐渐变为统治者手下反人民的工具。但在三征交迫下的农村中正不断产生“迫上梁山”的人物，这些“土匪”，实际上就是反抗的农民，统治者对付他们也不是“招抚”而是“剿灭”，他们在政治教育之下了解了正确的斗争道路和方法，了解了爱护人民和人民结合，他们就成为人民力量，他们是可以改造的。

广东当局的血腥统治已呈显动摇，人民的反抗力量正方兴未艾；这是去年入冬以来的现实情势。加强斗争力量冲破黑暗樊篱，创造民主堡垒，结束血腥统治，直到民主自由、人民解放的新广东的实现，这是每个广东人民斗争的方向。

（原载《正报》□期，1947年2月15日）

梁嘉黄松坚等致林平转区党委函

——对一年多来广东斗争和
区党委领导的意见

（1947年2月16日）

林平同志转区党委：

在一个星期时间之内，对于领导问题及武装问题，我们做了

初步研究，讨论了领导上几个基本问题，广东形势和革命根据地的政策思想问题。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并做了初步反省。此外，对于区党委的领导，有关于政治估计和基本方针，有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和政策，及有关于领导作风这三个问题，我们一致提出意见，以供区党委参考。

因为时间短促，我们各人所知有限，故所提意见是不完全的，并可能是只见一端的偏见。并且我们只提出问题，说明其内容与结果，对于问题的性质与根源，我们不欲发表意见，此所以表示我们对领导机关的尊重。但我们祈望区党委能因此对过去的领导，从政治上到组织上，作比较系统性的检查，做出结论，以指导和教育全党。我们认为这样做并非没有可能。否则，目前党内对过去工作认识意见的分歧，及因此而产生对工作前途的惶惑，将无法克服。

我们郑重声明，此举是出于对革命事业，对领导机关及负责干部的爱护和帮助，是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任。

我们的意见分述如下：

（一）关于政治估计和基本方针

甲、政协时期

政协之后区党委没有正确的把握着，对于全国及广东复杂曲折的斗争形势，区党委的估计是不能把握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斗争的全面条件，而是只是过分强调和平民主的一面，对于蒋坚持内战独裁政策，没有足够的估计，因而对于广东形势的估计是过于乐观的，忽视内战独裁，是夸大片面的。杨康华同志在粤北的报告中曾说：“中国的和平民主已开始实现，独裁政治从此一去不复返”（大意如此）。区党委在一个关于政协后形势的指示上写道：“今后广东的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已成尾声”，“今后中国不会有也不应有武装斗争”（大意如此）。这个指示后来区党委是

有修正了这个指示，但仍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因为政治估计片面夸大和平民主，所以基本方针片面朝向和平民主。

武装工作朝向是过分强调北撤和复员（小严同志意见），区党委对中区的指示说：“一切为了北撤，一切服从复员，工作部分损失在所不计”（大意如此）。在这个方针之下，武装干部就撤退过量，和发生强迫复员的现象。目下所留在各地坚持武装斗争的部分，并不完全是由于坚持斗争方针的结果，而一部分是因为不能北撤或来不及北撤和不能复员。

组织工作朝向城市，城市集中了大批干部，农村则撤出了大批干部。城市在准备设立党的公开机关，准备党的公开干部，在拟草“广东和平民主施政纲领”，农村则在混乱、削弱，东江、北江有半数左右的地方组织因失联系陷于停顿。只有强调城市群众堡垒，没有同时强调农村革命根据地。

武装适当北撤，适当复员是对的，但如果忽视坚持斗争的必要和可能，就发生错误。组织适当朝向城市及适当准备城市的公开工作也是对的，但如果忽视和过分削弱农村，也就发生错误。

乙、北撤时期

北撤之后，对于广东形势的估计，区党委仍然不能作全面正确的把握，又转入另一个偏向。强调困难，忽视有利的条件和时机，看不见群众斗争来潮的前途，尤其是我党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是改变广东形势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誇大片面的。区党委曾指出广东革命斗争的形势已经进入低潮时期，可能几年恶劣。林平同志所写“东纵北撤后广东形势”这篇文章，也表现了这种基本精神。

因为对广东形势片面誇大困难，所以长期方针的执行上是消极掩蔽，而在具体运用上表现消极掩蔽（不敢放手动员群众），不是积极的积蓄力量。

在武装工作方面，留下的部队，宣布一年至二年停止党的领

导，停止政治工作，甚至在停止部队中党的组织和活动，甚至连看报纸都要禁止。强调土匪形式，所谓“政治土匪”，不过是主观主义的概念而已，没有一个地方做得通。一般地禁止采用原来名义，绝对禁止向人民表示党的领导。绝对禁止对复员人员的领导和联系。对粤北限期三个月绝对秘密掩蔽（杨康华同志的意见）。对闽粤边根据地的武装部队也提出复员和疏散（林平同志意见）。对南路提出继续撤退和复员，并说今天虽未被消灭，明天也会被消灭（小林同志及林美南同志均有此意见）。

虽然区党委也曾提出坚持武装斗争的方针和任务，但按照上述办法来执行的结果恰恰相反，不可能达到目的。使干部悲观失望，士气颓丧，部队瓦解，使党的武装陷于严重危机，只是由于各地干部在执行上是不彻底及有些修改，其后区党委有些改变，因此仍能保存力量，否则是不堪设想的。

在组织工作方面。一般地取消支部生活，全体党员单线联系，个别领导。干部政策上表现无配备计划的自由放任，只求目前有可安插，如往海外，去可以，不去也可以；表现滥用于部，不珍重干部资本，如放出十个，损失七八，收成二三、也算有成绩。在党员和干部的任务上强调搞好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培养自己成为地主、富农，这是偏重“自我为主”“个人为主”的工作观点，没有同时强调群众路线。因为过份强调掩蔽，而没有同时强调放手动员群众的结果，下层组织消极埋藏，不敢领导斗争，脱离群众的现象，颇为普遍。

方式方法适当灵活的转变和运用是对的，但一般性，绝对性的死板运用，就发生错误。组织掩蔽也是对的，但削弱或忽视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也就发生错误。干部分散也是对的，但无计划的配合，不珍重干部，也就发生错误。对复员人员，尤其是干部的关照也不够重视，引起复员人员普遍的不满。

（二）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和政策

甲、革命根据地问题

这是武装斗争的政策思想问题。自区党委成立以来，还没有在“赤色割据”的思想上确立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政策。一九四三年以后，广东各地沦陷区和前线，武装工作胜利发展，成绩极大，意义极重要。但日本投降以前为配合盟军登陆，夺取城市，兵力多集中于沿海，是对的，然而亦应估计到可能夺取不到的一面，当时区党委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日本失败后，我与反动势力在广东的斗争，区党委的估计是轻敌，片面乐观的，因此武装斗争就片面朝向沿海、平原、交通线，而没有同时朝向边境山地。东江、南路、西江、北江、潮汕等地的武装领导，都没有靠山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的思想，政策方针和具体布置。听说中央曾一再指示，督促将沿海部队北上湘粤赣边建立根据地，但区党委等到日本投降前后才实行这个指示，已经失去时机，成为被迫被动之势了。沿海部队北上到湘粤赣边之后，因为没有确立根据地的政策方针，结果仍“非北撤不可”。北撤之余和复员之余，当然就是留下来的不能不坚持斗争下来了，怎样坚持斗争呢？几年不领导，没有组织原则和组织生活，没有政治工作，没有部署计划。这是坚持“政治土匪”的政策思想，不是坚持革命根据地的政策思想。最后，在我们学习小组上，林平同志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的报告，仍然没有提到革命武装的根据地问题。

乙、广东武装北撤问题

这是有关于武装斗争政策方针的运用问题。如果从服从全国和平民主的政策方针，从积蓄力量和培养干部训练干部这一方面来说，广东武装北撤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离开革命第四阶段中必须建

立广东武装斗争根据地这个思想和政策方针，不同时重视保存原来基础，不同时重视必要坚持的武装斗争，孤立来处理武装北撤，就发生错误。区党委的做法就恰恰如此。以今天的认识来说，应该全省以坚持为主，东江以撤退为主，东纵留下的部分也应靠省境边境山地为主。如果武装部队过量复员，军事干部过量北撤（区党委曾提出东纵班长以上，及优秀队员都北撤），将来北撤的人员回来，也因为原来基础已弱，形势虽好，仍是困难的。不能掌握有利形势的，如果不是下层干部按照实际办事，如果不是后来许多办法经过下层干部的修正，那么留下的部队，前途是很难想象的，将来北撤的人员来了，工作也很难想象的。因此片面孤立处理北撤问题，和对留下部队领导的忽视，如不从速纠正，对于将来广东的武装斗争与革命事业，一定发生重大的损失。

（三）关于领导作风问题

对于区党委过去的领导作风，我们未曾做一般的研究。但我们一致认为必须向区党委提供如下四个意见。

甲、在集中领导之下，积极发扬民主。

乙、注重思想领导，帮助干部总结经验，研究问题，领导干部注意向下层学习。

丙、指导的严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一方面坚持真理，一方面随时修正错误。

丁、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团结干部，了解下层。耐心听取干部反映各种意见。

戊、研究各地不同情况，对各地工作，注意具体领导。

刘建华、严霜、欧初、梁嘉、黄松坚、谢文、林光。

反特斗争报告提纲

(1947年2月18日)

(一) 敌特破坏的严重性。

- 一、整套方式中最阴险方式。
- 二、越失败越卑鄙的举动。
- 三、国际性、群众性、长期性的斗争。
- 四、我们有什么可乘之隙(刘一汉,从时间说,从地区说,从部门说)。
- 五、建立颠扑不破的党的必要。

(二) 敌特目前阴谋与我们所见

一、组织上:公开的(党团),秘密的(特),骨干的(核心组),群众的(利用自首分子),封建的(三合会),现代的(警察),地方的(潮帮琼帮),国际的(中美缉私队, H 警),职业化(律师、侍役、茶花)社团的男的、女的;普遍散布,无孔不入,其人物如杨祈候(中)、李维绵(军)、沈哲臣、陈素、高信、李福秋、包天放、邓不奴……等。

二、步骤:①调查研究;②进攻弱点;③利用社会关系建内线;④突击、分化、争取。

三、方针:推毁上层,动摇中层,瓦解下层,又采:保障公开活动者(某个时候,某个具体人物),监视城市潜伏者,扑灭城市以外潜伏者,——看具体而定,粤也有破坏,而汕被破坏后受其上批评。

四、已发生事件:①汕事件;②南事件;③新事件;④莹事

件，⑤达所闻。

五、我们反映的麻木——如南路的洗刷，如关系的移转，如随便接头。

（三）如何展开对敌斗争

一、思想上应有认识：真正负胜利之责之严肃性，反自由主义（收集小广播），跟踪到底，划分界线之谨慎性，分清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

二、全党动员，自上而下，首长负责，具体分工，完成审干计划，建立专人组织员制，建立组织会议。

三、有系统收集敌情决定应付：①听、写，依时依级报告；②单线建立情报网；③各单位专人负责；④专门会议。

四、过渡时期对组织措理：

①审查结论的依线联系，负责报告中央，可转关系。

②未审的原则不转关系，不动岗位，移动岗位，仍由原人联系。

③未审的原则上不能负组织工作，已负的别转时须说明。

④未明历史的一般看待，依其原来工作谈其工作。

⑤非正式转关系及附历史结论的只谈一般工作，不谈组织。

⑥未审查的不能介绍新党员，只能交友待审后再定。

五、依靠农村，依靠群众，必要时依靠武装，保存干部，城市非有把握安全条件（灰色、职业化……）不建组织（以刘光方式出现）。

六、缩小秘密与公开联系，避免受其跟踪，具体执行秘例（通过党派进步面目潜入我党）。

关于关系转移的通知

(1947年2月20日)

为着严密党的组织，对于未经审查党员组织关系决定如下：

一、凡已经审查完毕，做成历史结论，政治面目清楚的党员，在转移关系时，应附以结论，由地委以上或等于地委级党委介绍之。

二、凡未经审查党员，原则上不随便调动岗位，更不得转移关系，不得已调动岗位时，仍由原来领导人或领导机关联系，不转关系。

三、凡未经审查党员，原则上不能提起来负责组织工作，已负的应审查清楚，否则转移关系时，应说明未经审查。

四、凡历史上有些不明白之党员及干部，只能依其原来所负工作范围内谈其工作，不能谈及其范围外组织问题。

五、非正式转移关系及附其本人历史结论党员，虽清楚其是党员，但只能谈一般工作，不能谈组织问题及恢复其组织关系。

六、未审查的党员，暂时不能介绍新党员，只能找寻对象交朋友，作介绍的预备工作（教育），待自己审查好后再介绍或介绍由审查完毕的党员介绍之，有特殊情况的另作个别具体决定。

应该知道，使用一切可以使用力量来进行革命工作是一件事，纯洁党与巩固党是一件事，前者是灵活性，后者是原则性，灵活性必须服从于原则性，才能有坚定立场使×不遭受任何意外挫折。

△△△二月二十日

方方尹林平致华中局并转东纵电

——同意对东纵之措理

(1947年2月24日)

华中局并转东纵：

一、东纵措理原则同意你们决定，望能在华中局领导下，培养以多数东纵及南方干部为骨干的主力部队，目前参加作战将来待机施用。

二、广东现已无正式顽军，只有十余个保安总队，此维持统治情况，对我发展上大有利，留港干部已一部回农村工作，提出为创造新点到根据地而斗争口号。

三、回粤干部俟发展需要再电告，目前望加紧教育；广东各地有群众关系，游击经验干部请每地准备二、三个待调。

四、杨烈之父来港准备住港，叫杨烈回来经商，谢南石可能时与杨同返，以便派回潮汕工作。

方、林

丑敬

风雨过了天未晴（广州通讯）

（1947年2月）

虞 岫

广州人在光复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对于握住手里使用的货币突然变得不值钱的经验是有过一次的，那就是伪储备券对法币二百比一。那时候，穷苦的小市民在胜利的狂欢之际，受着深刻的痛苦，曾经有过将造饭的沙钵倒吊在庆祝胜利的牌楼上，以示讽刺当局的事情。胜利后的乐观幻想，救不了命，天天有倒在路死去的人，那些不死的，咬着牙过下去，而这次法币大跌的狂潮，象决了堤的黄水，不可抵挡的向你头上淹没过来，要逃没处逃，咬牙也过不去，挣扎呼号，最后一点的幻想粉碎了。对法币的幻想粉碎，象征着对什么东西的信仰的死去呢，你说？

法币暴跌成灾，固不自今日始，但上个月政府又发放了大批的巨额新钞，不能不说是严重的一击，击开了已经漏水的缺口，而使整个败坏的堤倾坍了。

广州是以新钞刺激起的不安迎接这个新春的，在二月十一日以前，法币的惨跌，使商人愁眉苦脸，终日拿着电话机，差不多每分钟法币都要低数点，卖出货后即买不回货，各行商家徬徨万分。物价的暴涨，职工店员的生活大成问题，纷纷请求加薪，到处工潮涌起。米价破了十三万大关，公务员及教员多以杂粮代米。平价食堂食客之拥挤，几至室内不能走动，而在门口排列购票者，每家有余人。小童抢食之风又告猖獗。从二月二日到二月十日港币由一千五百元涨到二千五百元，黄金由五十万涨到七十万元，路毙的人也由每日九人增到十五人。

二月九日广东省银行行长刘佐人出席广东省政府新闻记者招待会，他肯定的说：目前金融波动是很自然的，他想中央必定会有办法，使金融波动平静〔下〕来，经过这一些时候，物价也可下降。他以为人心的不变是不合理的，所以新闻记者的报纸不要过分的宣传，以刺激人心。回答却是可怕的事实，老百姓并不要听报纸上的“宣传”，只相信事实：柴米油盐等日用品的飞涨，起确超过二倍，有的四倍，这事实摆在眼前，谁也没法安心的。

暴风雨的日子，是在二月十日这一天，上白米最高成价至二十八万元。由于批发商与零售商议价不合，卒被停止买卖，米市休息三天。单以丰宁路的平价食堂来说，顾客排到电话所那边，足有二十丈长。老百姓站在零售米店门口，眼光光看到米签瞬息万变，一点钟内就改写五、六次，由每百元二两升到每百元六钱。茶楼酒店茶点一刻数变，太平南一间酒家，开市时点心每碟八百，转过头来计数时又每碟一千，喝午茶每碟一千二，最后忽然关上店门说：“涨价了，明天再卖。”最疯狂无理性的是金融行情，黄金每两最高价一百二十万元，美钞每元最高价一万四千元，港币每元最高价三千三百五十元。十三行有一家亏空了约达九亿元，联保牵连四家停止营业。规模较小的银号倒闭了十六家，橡胶厂五家被牵倒闭，全市进出口商业完全停闭。在省府的“安定金融紧急措施”的布告之下，十三行的金融贸易场所，一律挂着“奉命休息”的牌子，黄金买卖最热闹的同安街，显得奇异的沉寂，西濠口和汉民路各金银银行号，金银找换店，也静悄悄地关上店门。照“安定金融紧急措施”规定，超过二钱的黄金买卖，即便是首饰，也是违法而且可以处罪的。但这是明市。投机分子仍然对黄金和外币看好，惯于在黄金和外汇的内层穿来穿去的人，自然会有办法穿过“紧急措施”，黑市在继续，纷乱在各处蔓延着，扩大着。有两家米铺发生抢米潮，抢米的地点就是在繁盛的一德路和六二三路上。

纷乱在公共汽车站上表现得特别显著，公共汽车停开的超过三分之二，任何一线的车站上站满了候车的人群，车老板停开的理由

就是“港纸太利害”，汽油涨价，每罐由七千元涨到三万五千元，有钱还买不到。市长欧阳驹却说是车老板们“作怪”，市府已和三个外国汽油公司的广州经理处商定了公价配售汽油给公共汽车，每天每辆公共汽车可以配给十加仑，公价是二万五千元，但汽车老板们配了汽油后，都将汽油“移作别用”，而使公共汽车抛了锚。

现在十一日、十二日大风雨的日子过去了，风雨过去却非天际清明，物价高了上去就不肯再下来，“紧急措施”下面的稳定只是短时的，望着手里握着的法币，人心沉重得很，痛苦是长期的，“以后怎样办呢？”

（原载《群众》第5期，1947年2月27日）

还我血汗钱

——四大家族如何侵吞广东侨汇

（“广东的一年间”之三）

（1947年2月）

桐 庐

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氏专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同来的人除了央行十多个干员之外，还加上一位英国籍的顾问罗杰斯，贝祖诒启行前夕，曾亲赴南京晋谒宋院长请示，到港之翌晨，就和罗杰斯顾问及随行专家十余人开了两小时的会议，这排场显然就不像个只是“探访旧故”的样子。二十八日的《华商报》就说：“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氏此次南来，在港与英国

金融经济界接洽，其中有一重要问题，即为管理英属马来亚及南洋各地华侨汇款，将取得英国之协助，统由中央银行办理，以加强中央外汇基金。”《工商日报》更把香港在侨汇中的地位加以说明：

“目前我国各地之侨汇，无论是英国属地，抑或美洲各国，多集中于香港，换言之，我国海外侨胞汇款返国时，多先汇来香港，然后转汇至国内，故香港无异为侨汇之枢纽。”这些都对的了。时至今日，事实证明贝氏南来的若干重要任务之一是企图收复大量逃出国银行的侨汇，这已经是十分明白的了。

贝祖诒如此忙急于收复侨汇为的是什么呢？看这个事实就知道的。蒋介石妄想征服中国人民的内战是打得如此紧张，军事预算是如此庞大的天文数字，法币印刷机在纽约、伦敦、上海片刻不停的赶印（只上海一处每天要生产二百三十亿元），还不济事；而五亿美元的贷款吗，尚未上手，盗卖救济品吗，尚有轲轳，在这时候获得外汇，买进军火，挽救其日益显露的军事危机，维持四大家族的独裁统治，这确是当务之急。

其次蒋管区财政经济危机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特别是法币的暴跌使得信用破产，在这时获得外汇以稍微稳定外汇比率，也是紧要问题。而侨汇，历来在我国平衡国际收支上占很重要的位置，抗战以前，侨汇每年约达二亿至三亿元之间，成为弥补入超的重要项目。抗战期间，侨汇在太平洋战争以前，数字仍甚可观，一九三九年估计为十亿元，一九四〇年十二亿元。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因交通阻塞与各地外汇统制，侨汇才陷于半停顿状态中。日本投降后，侨汇数量立即激增，据估计去年一月至八月由美汇来的有三百万美元，九月份达四百万美元，十月份五百万美元，十一月份六百万美元，十二月尚未有统计数字。而总计去年全年的侨汇共达国币六百一十一亿元之巨（本年一月二十六《星岛日报》）。这个数字和蒋政府今年公开宣布的军费预计三万八千一百亿元比起来固然不够他打一日内战就化完了（照他公开宣布的预算，一日要一百零四亿多，实际上不止此数，至少要三倍以上），但在全国的国际收

入上看，仍然是个平衡国际收支的重大数字。这在了然于蒋政府的金融财政状况的贝祖诒看来，这笔垂手可得的侨汇，仍然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太白金星，其所以急图收复，并非没有道理的。

此外，还有这么一点：在抗战期间和胜利以后，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国银行，如同劫收敌伪金融机关那么琳琅满目劫到满心暗笑，他们同样从侨汇中，以侨眷的上吊和活活饿死为代价，接收了巨额的侨胞血汗钱。如今这一块×肥肉竟落入外人手里，岂可不奋力挽回，并乘势全部转入央行掌握？这一点也使贝祖诒感到兴趣的。

侨汇税减之谜

然而，在官方的统计上，侨汇是日益减少了。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侨汇，日益减少，但这并不说华侨汇回家乡的款子是逐月减少，像上面列举的去年由美国汇的数目特别自下半年起，是逐月增加的。那么，所谓侨汇锐减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侨汇逃避了国家银行而经由外国银行或本国私家银号批局汇寄出去了。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美联社电：“中国银行在二月前，每月有五百万美元之侨汇，但三月后，政府开辟外汇市场后，已急降至二百万美元，现仍续降中。”又说：“以中国银行为例，在十一月份中，该银行接获之侨汇，比十月不致多过六成。据说每月一千万美元之侨汇，已经由各种非法途径，由广州逃往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和胜利后几乎全部包办南洋侨汇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上海分局外汇部负责人宣称：“战后侨汇与战前比较，折合法币金额，数量激增，然外币数目则较战前减少百分之七十五，因黑市猖獗，侨汇逃避”（三十五年二月五日广州《中山日报》）。

纯属广东范围的侨汇也是同样情形。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广州《建国日报》指出：“本年八月份由美洲及南洋各地直接汇入国家银行汇款为国币一百一十亿元，但九月已减至八十亿万，十月竟减

至六十亿元；三个月内前后减少及半，惟香港外国银行之侨汇则日益增加”。汕头中国银行统计，九月份共八千八百余万元，十月份降至二千四百余万（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星岛报》）。

这些“锐减”下来的广东侨汇究竟往那里去了呢？广州《中山日报》答复这问题：“据估计约有十分之八之侨汇均逃〔入〕香港之外国银行中”。

侨汇为什么会这样大规模的逃避国家银行而愿意经过外国银行或私人银号批局呢？这要看侨汇曾经在国家银行吃了些什么亏？

手续烦难耗费又多

第一是手续烦难耗费又多。胜利之初，侨汇已经源源而来，财部限制侨汇须由中国银行专营，而不准各省行兼营侨汇，但因各侨眷散布乡间，中行不能在各县设立行处，汇款只好登报招领，领款时由总行转汇来的汇费（三十五年五月一日中行才实行通汇办法，侨汇不须通过总行转汇）又要你出，远道的还须出旅费。尤其是领款时找铺保更伤脑筋，例如：“无论在台城或新昌的中国银行，都要找二间商号担保，方予发给，因此，远地的侨属们便不得以汇额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来分给每间铺户而觅取担保；但取到了保后，都还有等到三数天才领到的。至于那些汇单数目较大的，那就耐心地长期等候通知，如果你不耐烦而去问银行，则所得的答复，不是说重庆未有通知，就是说现钞不够”（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正报》台山通讯）。还有一件也是台山侨眷的控诉：“新昌的中国银行，要两家店保，店保担保额累积起来不能超过资本额，而弄妥这些，也要从早到晚的在行里等，有时直到深夜才领了出来。路途较远出门不多的侨属，尤其是妇孺，真是麻烦极了。一些侨眷摇头叹气：我们不是领赈济呵！单就汇率说来，我们已经吃亏不小了，还要这样麻烦，难道要我们饿死吗？”（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正报》）后来，广东省银行（属中国银行系）算是准许无铺保的侨眷可由各乡镇长盖印证明，便可领取，可是这个也并非方便，乡下人特别是

远道的人，找乡镇长不也是要钱？谁都知道乡镇长是喝血为生的魔王。

汇率上的吃亏

二是汇率上的吃亏。以美国侨汇为例，民国三十年起定每元美金合国币二十元。后来政府宣布侨汇津贴百分之五十，即一元美金可收得三十元。后来又增加津贴至百分之一百，即一元美金可收得四十元。三十四年七月六金大会后又宣布侨汇津贴为二十四倍，即一元美金可收得五百元的国币。“津贴”“津贴”，听来十分漂亮，但实际如何呢？去年二月间，上海重庆美金黑市已经一千四百多元了，但侨汇还是给你个五百元。这甜头至于引起纽约美国私家银行的垂涎，标起一个美金收六百元的比率，经理侨汇，还要赚一倍以上；那么中国银行不是每一美元的侨汇要赚九百元国币吗？他还有脸皮说“津贴”“哩！”

但是更无耻的是中国银行连所谓二十四倍也不给。去年八月，美洲拥二十二个分会的有力侨团安良工商会，在必球十城的年会上发出通电给蒋介石，把中行这种强吞侨汇罪状宣告出来：“查三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按即每美元“津贴”二十四倍法令公布之日）以前，侨胞自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电汇，航空邮汇火急救家款项，经过数月，甚至一两年以上积存国内中国银行尚未有交款者，（笔者注：积存的钱拿去做囤积生意去了）！此项积存侨汇，不仅因其延交以至侨眷无款购粮而饿毙者，日有所闻，当时国内物价，已突飞猛涨，苟非此项积存侨汇亦享有二十四倍津贴，无以救家人之死亡，于是侨胞自七月十四日起纷向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请求将积存侨汇停止付款，或即退汇，以期获得二十四倍津贴之补助，该行对停付退汇手续，谓需电告国内总行办理，每项收取电费美金七元五角，孰料……国内中国银行，对此退汇电讯，置若罔闻，反按照百分之百津贴，即照汇款原数加给一倍补助办法，尽速将积存侨汇交清。查一般侨胞请求纽约分行发电退汇时间为七月、八月，而侨眷来函则谓国内

各地分行交款时间，为十月、十一月。又查美致国内电报一两日可达，纽约分行则稽延三数月后，始向侨胞宣称国内总行复电，已将积存汇款付讫。尽管收取七元五角之电费，国内分行尽管将积存侨汇依百分之百从速付讫惟恐不及，以侨眷不获二十四倍之补助为得计，对于物价高涨，侨眷以百分之百“补助”不敷购粮而饿毙者日见其多，中国银行亦视若无事！看了这一段，看到中国银行的血盆大口还在贪馋地咀嚼着，并向美洲侨胞投射着蔑视的目光。咀嚼的是你们给他抢去的二十四倍和以外应得的一大堆血汗钱，蔑视的是笑他们二十四倍终于不能拿到，还给他再捞走七元五角美金。安良工商会代表诸君，你们还错了一件事，你们可敬的一生勤俭老实的美洲侨胞在受骗之后，除了发出“中国银行取巧图利，计诚得矣，不知侨眷数年来因此饿死十之三四，所以侨胞胼手胝足竭血汗以救国，结果人亡家破，斩绝宗代，虽胜利亦椎心泣血饮恨无穷者也”这一至情的感伤之外，还向蒋介石许下了“尚惟鉴宥”（以上俱见三十五年八月六日《前锋日报》）的心愿；你们显然还未知道蒋介石原来就是中央四行二局的最高老板，你们被白白侵吞的血汗钱，他自己也分得一份的，你们家人的“饿毙”，正是他们蒋宋孔陈四大吸血家族富裕的前提；你们“椎心泣血”，在他们却笑逐颜开。

压积侨汇惨剧重重

第三是侨汇普遍遭受压积，造成千宗万件的惨死命案。去年四月二十二日，四邑一位女士叫谢柳蝉的写信给《建国日报》这样说：“我们一家六口是靠侨美芝加哥的父亲和哥哥汇款维持的，从香港沦陷起就受到中国银行积压侨汇的痛苦，往往收到父亲电汇的通知信，半年仍无下文，持信询之行员，则说，总行无电通知，无可查。……常常连接父亲和哥哥来信，说前月有十万元，去月有十万元电汇，然而年老的母亲，只有守着这些信，眼看儿孙饥饿啼哭，不禁老泪纵横。这是港沦陷后全体侨眷的遭遇。然而，过去让他过去，我们不愿再提了，自从去年九月胜利后，满以为交通恢复，不要再吃压积

的苦，然而残酷的事实来了。……去年八月父亲电汇的二十万元，九月末旬，我们已经收到了信，一直等着中国银行的通知单，到今年一月十八日才收到。相隔半年，我们吃亏多少？那时米每担才五千元，一月十八日已三万了。憾事的是这位写信的女士，在控诉这些事实之后，还带上一笔：“现在侨眷还在搜集去年十、十一、十二月份华侨汇款通知信，俟元首南来广州，亲呈凄苦，替我们解决，看几许贪官头颅能幸存？”显然的，她没有晓得蒋“元首”其实就是中行的最高老板。

四邑一带时常发生“金山婆”拿着汇票上吊的惨案，就是凭票拿不到钱，生借全无，只好寻死。比较顽强的妇女，不甘寻死的，则流浪到广州，沦为妓女。这是谁也听过的故事了。

在潮汕，因侨汇被压积而饿死或者自杀的事实，尤普遍。一篇从普宁写出的通讯上说：邻家的一位阿婶，她的丈夫往槟榔屿多年，家里老妻和两个幼子，生活全靠南洋，在大批侨汇断绝中，先后饿死二人，现在只存一个大儿子在外乡替人牵牛。前天，南洋的父亲寄来一信，说去年曾寄五万元回家，是否收到了？唯一活着的这个大儿子看了信眼泪直流。”又说：“梁陇乡有一个中年的人，七年未得丈夫信息，以为是死了。后来因不堪生活的威迫，便嫁给弥高乡的某批局主人做阿二。去年春天，这批局主人把搁存的大批番信拿来晒太阳，不意她检出她的前夫寄给她十一万元的一封信。这妇人在一时刺激下，竟悬梁自尽。”（三十五年一月十九《正报》）。

从上面三种侨汇的吃亏上看，我们知道中国银行（尚有其他银号批局，但数量甚小）凭藉着法令的强制和超经济的掠夺，对南洋美洲华侨汇回来养活家属的血汗钱，麻烦之不足，加以汇率之克扣，克扣之不足，加以压积和吞没，真真是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难怪去年三月一开放外汇，侨汇就不约而同的逃汇到香港去，因为这一来能够迅速收到而且照黑市算价。一个很有眼光的侨眷在他的通讯中就曾去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建国日报》这样预言着：“我

相信不出半年，全部侨汇，会转到香港去，因为买办银行固然吸血，但是还能迅速依时。”这确是代表千万侨胞的心声，且为侨汇逃港最恰当的解释。

向四大家族清算

为了使侨汇不致落入四大家族的私人荷包，不致被利用之以损害人民利益，我们第一要向中国银行清算收回过去被其剋扣压积侵吞的一切损失！在过去一年中，侨汇——最主要部分是广东华侨汇款，遭受中国银行用拖延、剋扣、压积吞没种种手段刮收去的，其数目是惊人的庞大！侨眷因此陷于困苦，流离，饿死，自杀者盈千累万。吾居住在家乡的广东人民，抗战以来遭受日寇汉奸及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压迫摧残和他们造成种种灾害，被杀死、迫死、饿死、流离折磨而死者，已经使原有三千五百万之众的广东人口，减至二千九百八十余万人（据民政厅统计，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工商日报》），而远走海外，受苦受气，“胼手胝足竭血汗以救国”之广东侨胞的在乡侨眷，由于中国银行之剋扣压积与吞没侨汇，更加速其走入“人亡家破，斩绝宗传”之惨境；他们则以此蛮横掠夺得来的侨胞血汗钱，增加他们自己蒋宋孔陈四大吸血家族的财富。他们的财产总额已达二百亿美元之多。他们在美国、英国甚至在巴西和瑞士都有大量的存款。他们甚至在亚马森河两岸购买了大批地皮（地皮上面有橡树园，畜牧场和制革工厂），其长度等于从重庆到巴东。他们够富有了，我们没有把侨胞血汗钱再去增加其产业之义务，而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财产，为了替惨死的侨眷们伸冤雪屈，我们必须向中国银行清算被剋扣积压及吞没之侨汇损失，让自家血汗换来的金钱归自家享用！

第二，不要把侨汇交给官立银行助长内战！

我们要明白贝祖诒之所以急图收复侨汇，除了满足四大家族继续侵吞华侨汇款而外，其目前迫切的要求，在于利用此项侨款外汇，向外国购买军火，继续进行内战屠杀解放区无辜人民，以逐其

消灭人民军队与民主运动之阴谋，维持其腐败的罪恶独裁统治。侨胞的汇款若经过官办银行，即等于供给蒋介石外汇买军火杀同胞；侨胞的汇款若经过私家银行信局，则等于反对蒋介石进行内战，促成和平民主的实现。蒋介石得不到外国军火，他就无法再坚持武力独裁的政策。

第三，中小金融行号信局，应急图自救！

侨汇尽入央行，又是四大吸血家族金融资本独占性之另一表露，他们正在不留情地打击地方金融资本和私家金融行号信局的生路，故私家行号和信局要求生存，只有自己振作，使汇率更公允，手续更简单，送款更迅速，提高侨胞对自己的信用，争取侨汇到自己手里，并团结一致有效地反对央行此种自己独占摧残中小金融行号信局的毒辣措施，否则一定在四大家族和金融独占压迫下归于灭亡。

（原载《正报》27期，1947年2月28日）

关于武装斗争及北撤问题

（1947年2月28日）

文：我觉得过去武装斗争存在着很严重的保守主义。如一九四四〔年〕国军在湘桂大败以后，区党委提出一年内打开广东新局面的号召，建立各个根据地，这是百年大计，正确的方针，但以后不放手大胆去做，终成空洞的口号。罗浮会议曾生提议对这口号不能具体实现。应加检讨；林平当时发言甚生火气，说当时何、曾没有具体布置，使曾生不敢再发言，这提议终无结果。又如日寇占领增、博之后，兵力甚空虚，国军败退，东纵渡江，一路甚少阻碍；当时，杨、王所带兵力只一大队，刘培支队很迟才赶到。当时仍太注重保守惠东宝，不敢放手派大兵团向增、龙、博山地推进建立基础。又如中

央指示北上湘粤赣边，建立五岭根据地，当时干部大家准备北上，但许久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一直拖延到日寇投降后，错失时机。这是由于未充分估计前途曲折困难，留恋三角洲膏腴地带。现在我希望目前建立广东根据地的口号，不再成为空洞的口号。

殷：我认为不能说区党委没有根据地思想，但可以说不明确、不彻底，如文同志所指出，一年内开展广东新局面的号召，又关于部队北上五岭时，有人说一中队就好，曾生说一大队就好，林平说凡原来准备北上的都照数出发，这就可为证明，但出发一路及到达后，并没有进行根据地准备及实际工作。以后也再没有提根据地问题了，我当时自己也极模糊，我赞成部队集中江南，以解决伪军。

陈：区党委指示说“会后不会有，也不应有武装斗争”，这是错的，关于区党委有没有根据地思想问题，究竟区党委当时如何认识，需要根据地否？东纵需要适当留一部坚持否？可能建立根据地否？东纵留一部坚持可能否？我希望区党委自己深入检讨。我认为保存力量而北撤是对的，过分北撤就不对。现在要建立广东武装根据地是确定了，就要下决心去做，将来撤退与否，目前不考虑，看将来全国局势及自己努力如何。

谭：东纵北撤为保存力量，将来可用以退为进，是正确的，但过分“拔钉”就不对。以后武装撤退与否，如以后力量大，自然可以不撤，但如果因此次北撤有错误，及以后又要撤，因此现在就不再搞武装，这又是错误的。今天需要；今天就做。

谢：以前省委时期，极不注重武装斗争，直至一九四〇年才稍注意。如派干部到中区，但仍很不够，根据地问题，在此次提出以前，也不重视，如东纵、珠纵，没有注意开展可以坚持长期斗争的山地根据地。许多干部集中在东纵、珠纵，不注意配备一些到山地去，如果以前注意山地根据地，今日情形当有不同。

冯：东纵北撤问题，我同意大家意见，北撤是对的，但当时区党委在认识上就有问题，强调政治斗争（如二八指示），强调撤退，忽视坚持。当时如重视农村坚持斗争，今天情形当不同。区党

委根据地思想是有的，如一九四四年一年内打开广东新局面的号召，但很不够，当时是建立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以迎接盟军，日本投降后就没有下文。至于将来武装会不会再撤退，我同意谭同志意见，应撤就撤，不应撤就不撤，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

关于时局及方针问题

黄：我有一个感想，我自己的错误是强调公开合法的斗争，忽视非法斗争，搞好社会地位以备竞选，以为国内和平出现，在广东也只是全〔传〕精神搞群众工作同竞选就够了。这种错误是由于我自己幼稚，但区党委的精神也有影响。我和林平同志个别谈话中，说到广东环境及国内形势时，他曾说现在希望北方打胜仗，这也影响到我对广东困难局面的过分估计。

文：我觉得当时粤北负责同志对时局的估计，是对蒋存有幻想的。当停战令下后，杨康华同志召集几个干部开会讨论时局，说和平民主已实现，独裁大门已冲破，以后斗争以政治为主，军事为次。因此，当时会议上就讨论和布置城市工作，而忽略坚持农村斗争的讨论和布置。直至我离开部队之前，我所知道的，部队松懈，政治工作停顿，干部闲散，无所事事，当时盼望全国军队问题如何解决，及至整军方案发表，广东武装无地位，大家失望。领导机关说对整军方案暂不公布，静候指示解决。及第八小组到广州，大家又在等候北撤了。总之，北上五岭部队，实际上毫无坚持斗争的精神，以后又北撤过多，留下干部极少，今日要搞游击战争，就觉得本钱不够了。我到港后，又听说强调困难，我觉得领导机关对广东情况了解是很不够的，常是国际国内一大套，广东寥寥几句，对广东情况缺乏调查研究，这就难免要主观和教条了。我和《正报》同志研究结果，认为北撤至九月，广东统治暂时安定，十月起又开始动摇，因国军北调，征兵征实激起兵变。东纵原来是可以坚持的，因为八个军不能消灭东纵，以后国军陆续北调，更不能消灭东纵。十月后兵变和土匪四起，多没有我领导，我工作落在形势后面，原

因是北撤太过，北撤不适当，原因是广东情况缺乏调查研究，主观和教条主义领导。

殷：粤北讨论城市工作时，我觉得杨康华当时有准备出城市的精神，当时干部已不作坚持准备，大谈政治斗争，公开合法斗争。如西北支南三当被围时，曾决定坚决突围，但得到政协消息后，就认为应该复员解散，派人找地方党接洽埋枪（当时粤北指挥所没有这种意见，但认为不必建立五岭基地，静候解决）。区党委指出（政协后）对美认识不足，以为帮助中国民主。对政协决议看成事实，以为和平民主是必然的，武装斗争已成尾声，今后不会有也不应有武装斗争，这是错误的，由于如此估计，故工作着眼点放在公开合法的政治斗争，指示上并无说及以后的武装斗争如何坚持，对全国这种乐观，实际上对广东是悲观的，把希望寄托在全国和平上面，不敢正视广东的现实，如何坚持困难的斗争，以后补充指示，虽强调武装问题，但仍说上次指示基本是正确的，因此不能纠正上次指示错误的精神，因此对坚持武装斗争仍不能有具体的切实的布置。北撤后，广东提出长期打算，强调困难，这一悲观观点是一贯的，反对左倾发展成宁右莫左的口号，党员四个任务，搞好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交友、学习，不敢领导斗争，不说其他工作。另一方面实际上左的作风仍存在，又没有真正纠正，也就说没有真正的掩蔽。

加：对政协前后时局估计，我初时认为既然美赞成中国民主，蒋又必须靠美，故民主实为必然，内战必不能长久打下去。政协后，更信以为然，但以后蒋反动，我总生疑问，但看了区党委的指示，仍信形势以后会好转，各地惨案不过是反动派最后挣扎，因此工作上犯了一些错误，提出动员一切力量突破广州反动堡垒，文化工作不作长期打算，连许崇清的“新建设”也采取攻势，集体行动，以后被一网打尽，干部撤退。我以为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对美蒋反动认识不够，下级干部理论修养差，领导上如能加强思想教育，也可补救。新华社社论对美认识似也有问题，它说，蒋要什么什么，美国

不肯。一连几句重迭，使人读后，对美发生幻想。此外，我也觉得区党委对调查研究工作注意不够，罗浮会议林平同志的政治报告，大家觉得太简单、太原则，我听后对形势仍不了解。我现在做统线工作，广东有几种力量，关系如何，我对各种人政策如何，我自己仍茫然，有时甚至打错对象（如《正报》对民大校长）。

陈：过去政治领导有偏向，我认为：①其根源是抗战时期投降路线的余毒。②对国民党在广东力量估计过高，对坚持斗争无信心，精神上不是依靠群众，依靠农村山地，而将出路寄托在和平上面，林平同志说过，要快点和平，否则不知要死几多人。故对中央指示主观片面了解，说和平民主已实现，今后不会有也不应有武装斗争，以后虽修正，但仍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基本上仍有幻想。③中央报纸新华报的影响（如加所说）。④区党委领导民主精神不够，不能发扬下层意见，下层也没有研究时局风气。

谢：区党委二八指示，中区领导机关讨论后，认为对的，我自己很差、盲从，不能研究，以后修正指示，说基本上是对的，我就发生疑问。基本上是对的，就是和平民主必然到来，但修正指示指出，取消白皮红心是不对的，既然仍要白皮红心，和平民主何以即将到来？有一位同志来传达说，快则半月，迟则二月，即可打开广州局面，我听了也怀疑不决，因为在广州反动派曾策动反苏巡行，我曾企图布置转变成为民主巡行，但群众不参加反苏巡行，也不参加民主巡行，故我觉得短期冲破广州黑暗局面，未免言之过易。以后又一次指示，说环境严重，我又发生疑问，如果取消部队中的党，今后将如何坚持。说到干部撤退问题，一切服从撤退，我自己认为可以留，其他也有人可以留，后来有人批评我不肯放干部走，对林平和小林关于干部撤退的不同意见，我原是同情小林的，但后来传达服从林平意见。关于单线联系问题，我认为正确的，但我又认为一些地方支部可以保留活动，实际上我也如此布置，保留一些地方支部的活动。区党委估计形势严重，我认为是不了解下情，如某区我队十余人终靠群众避免国军的扫荡，国军侵害了地主，有些地主来通

连我队。有些地方来要求我队去活动驻扎，以维持治安，土匪形式是行不通的，说土匪就挨打，说是解放军就有群众敢接近，我认为中区部队就地坚持是可能的。区党委指示（二八指示），给干部影响极大，大家终日谈复员、谈职业，不打算坚持，负责同志小严、小刘都切望北撤，北撤之后，大家更无信心，因为没有党领导。如何坚持下去。组织工作上精神是消极掩蔽的，党员任务搞好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但不注意群众斗争，改变作风，用各种形式组织群众。

关于地方党的工作及部队中党务工作

殷：区党委在武装工作上成绩极大，但党务工作就注意不够，部队中党务工作不健全，支部小组不起作用，似乎一切以军事解决问题，因此政治工作也不够，军阀官僚作风很严重，军事干部盛气凌人。如杨、王之间，参谋部与政治部之间，关系均不正确，军事干部轻视政治干部。区党委对全省各地方党的工作领导很差，如对西江，当时林平与××同志布置工作，非常简单，各单位关系处置不好，部队北上因此不能得地方党帮助。区党委对地方组织的领导，偏于一隅，不能照顾全局，多注意军事、政权方面，少注意党的地方组织方面，每个号召（如北上五岭），极少能通过党的组织去动员。如光注意山地，加强山地地方党及群众工作，以后武装发展就顺利些。东纵北撤后，各地方党组织混乱，初期自不可免，但现在仍未认真检查整理。

谢：区党委对地方党领导不够，指示多由部队口头传达，我极少看见文件指示，靠自己摸索，连同志到中区年余，对我指示也极少。以后我们特委专派二人驻部队，希望能接近领导，但仍极少得到指导，连同志集中精神在军队工作上面，对地方党实在关心不够。经常由地方抽调干部入部队，但堆在政治部，不能好好分配工作，领导又不够，使许多干部情绪极不好，想不如回地方去工作，我觉得连同志好像成为小严同志的俘虏。

冯：我觉得林平同志负责区党委总的责任，领导上偏在军事方

面，对党及地方党照顾不够。如果党的组织工作做不好，一切工作都有困难，部队中党不能起作用，支书好像队长的勤务兵，虽然整风，但宗派主义很浓厚，对外来干部有点不融洽。

关于领导作风，及对个别同志的意见

文：我一向在政治部工作，对东纵领导作风，觉得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很差，我虽接近领导机关，但对国内形势及政策方针，所知极少。起初以为事关秘密，不能公开，但后来觉得不对，如果干部不懂政治，不懂政策方针，工作一定做不好。所以，后来认为交一件做一件的领导方法，是不好的，我觉得几年来进步极少，深感苦闷，近来领导始有转变。

对各负责同志的意见。我几年接近杨康华同志，他甚得干部放心，本人肯学习，和蔼可亲，稍能注意从思想上教育干部，自己很细心研究文件，但他的弱点是对听话的干部亲近，对不听话的干部冷淡，不能一视同仁，故干部中有人说他喜欢能讲能写的人，不喜欢实际工作的人，甚至有人说他是宗派主义，他虽知道，但漠然置之。林平同志使人望而生畏。曾生同志给人印象好，因他接近下层，态度温和。王作尧同志官僚军阀气派浓厚，享乐倾向很大；北上至翁源时，最困难，他的脾气也最大，大闹干部，使干部发生离心倾向；参谋部干部全体不满，到始兴北山，全部告病，无病说有病，小病说大病，全体怠工；路上曾打一汉奸，没收财产，王同志收拾一大担，送他爱人走，路上被捕，下层说该死，无人同情。王同志在军事上弱点也甚大，对战术研究，掌握材料，研究情况很差，有时冲动，有时畏缩，如在麻乍、永清时，刘培部已到，力量较大，决定进攻上述二地，但行动之前得悉敌已增加，本应集中力量打击一地，他不信敌增兵消息，分兵打击二地，结果失败。又一次也是轻敌，分兵轮番作战，又如打梁贵平时，又分兵二处，结果打持久战，一无所获，这是他冲动轻敌的表现；如在麻乍，国军尚未集中，但放出谣言，他就退却不敢进攻，又当敌人放出空气要扫荡

时，他就仓惶失措，带队兜圈子走，引起干部不满，这是他畏缩胆怯的表现。总之他是主观主义，不慎密了解情况的。

殷：领导作风缺乏民主。我参加北上五岭，我未参加过党的会议，没有小组生活，工作独断独行，个别交待，少思想领导。林平同志与下层接触很少，我只在会议上听他说话，但不曾和他作工作谈话，这就不能详细了解情况，搜集材料，他有军人气象，照顾全局不够，听一面之词，就认为某人不好。杨康华、王作尧都有官僚军阀作风，王尤利害，动辄闹脾气，人家叫他王老虎，他下命令时，下层说这是主观主义的命令。杨也终日坐在指挥部，少接近下层，脱离群众，部队中等级森严，照顾下层困难，照顾伤病〔员〕都不够，如马昭平的逃跑，与王的作风实大有关系。

加：领导不注重思想教育，解决个别问题多简单、注入式，对广东情况不详细了解。如统线工作，各阶层各党派情况如何，我应争取谁，政策如何，如何做。如民盟，它的政策如何，阶级成份如何，各派主张如何，各个具体人物如何，都缺乏研究，如能指导干部研究，干部就能灵活执行工作。

谭：过去领导只叫你做什么事，但不详细开导思想，故了解不深刻，又不敢问，怕被嫌啰嗦，做起来发生问题，仍不敢提意见，因为缺乏民主，做错了也不敢说，怕上级责备，大家对工作常无信。曾生同志常骂人，开会时大家战战兢兢，但事后多小广播。

谢：我到港后，除看《华商报》之外，连同志对我政治领导极不够，领导很一般，不具体，解决问题犹疑不定，如目前内战是否三个阶段，似是似不是，个别问题拖泥带水，如一海外同志等了二个月，但结果匆匆解决，下面有些干部现在不满。

冯：区党委的组织领导，不用说对下面弄不好，就是自己本身也弄不好，罗浮会议时，筹备甚久，杨康华报告开始说，他是个人意见，未经其他同志同意，大家觉得莫明其妙。又如林平与小林意见不一致，不能克服。有一个干部原要见林平同志，但走到门口又缩回来，许多干部都怕他。杨康华我认为有官僚作风，如“演剧一事”。

关于检讨和批评的态度

陈：此次检讨区党委领导，应接受中区教训，当时对小严批评不独弄到他自己无信心，连许多干部也无信心，因为一切都是错误，领导作风上的缺点，除领导机关负责干部应负责任外，大家都有责任。

谭：此次检讨区党委领导，是一种民主精神的表现和发扬，罗浮会议检讨以来，这次是一大进步，但对某个人的批评，应从帮助改造思想出发，不是批评之后，承认就了事。我同意冯叔指出，这是思想斗争，斗得好有益，不好就有害，下层干部应注意，发扬民主，改正错误，得出经验，是好的，但如有人乘机报复，打击个人，就很坏了。区党委应注意，下层提出意见，并非偶然，绝大多数干部同样提出一致意见，是值得虚心去研究的。

谢：此次是第一次检讨广东最高领导机关的领导，其动因不是区党委号召或有计划领导，是由下层干部酝酿起来，区党委事前对下层的个别批评，原来是否已经知道一些，但不能启发干部的批评，实是缺点，现在区党委来领导这个检讨，是很好的，大家不应只批评上面，应同时发动下面自我批评和反省自己。

冯：这个学习小组提出检讨是很重要的，我认为这是一种思想斗争，党内的思想斗争，如果是领导错误，遭受困难和损失，自然要爆发，但斗争得好就巩固了党，斗争得不好，反而损害了党，我认为思想斗争，动机应纯洁，目的为了巩固党，否则有危险。

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人民一定要胜利

(1947年初)①

一、战局依我要求顺利发展：战争走谁的道路呢？蒋介石安排用袭歼、围歼、割歼三种战法，企图歼灭我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我们安排给蒋介石的是：运动战、游击、动员决战，以歼灭进犯军的主力。游击战以麻痹进犯军的活动，争取时间大规模地动员以完成决战要求，结果战争的发展是符合我们的要求，违反蒋介石的要求。半年来交战的结果究竟怎样？这是一纸清单：

苏皖蒋军四十万，被我歼灭十三万多；晋南胡宗南部，被我歼四万多。

鲁东蒋军二十万，被我歼灭四万；晋绥冀察热蒋军二十六万，被我歼五万多。

晋冀鲁豫四十五万，被我歼灭十二万多，东北蒋军二十万，连伪被歼十五万多。

总结起蒋军一共损失了六十万人，正因为蒋军损失得如此惨重，遂补充了我军十五万的兵员，并帮助我装备十个全齐的机械师。然而蒋介石呢？补充就不容易，美国军火已有枯竭之虑，而去年征兵额六十万，即使全部找齐也不能抵上损失，何况抓到的只有二十万。进攻延安的计划正在计划进行中，并不因鲁西之败仗而中止，但我已决定强占追歼的计划，一打便是三、四夜的不停，一追就跟踪到他完全被歼灭为止。我们应该重视此次鲁南的胜利，蒋介石不仅有两个快速纵队，我竟获得一个，这实在太占蒋介石的便宜。我们打算顽强战斗，展开反攻，实现一年半载打出一个局面来

①原件未署作者，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的计划，另行深入动员，扩大加强主力动员，人民生产准备必要的长期更大胜利的战斗。

二、爱国民主运动新的高涨：由于去年圣诞节前夜，美国水兵强姦北大女生而引起的，各大中城市要求撤退的美军的示威游行。据新华社广播参加此运动者有三十万人。广州这个为特务紧箍得象铁桶一样的城市，在东纵撤退之后，在无人不捉的情形之下，还出现冲过铁丝网，直捣沙面的大巡行。可说出乎意外，是石头上长草，以此足见群情愤激，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高涨的革命情绪。

中央指出这是“五·四”、“五·三”、“一二·九”的先声，此运动可能扩展到和解放区胜利斗争相配合。

国大青年党根本是K的走狗，民社党已分化，据说一些名人参加国大，如黄琪翔，×是老婆押上车的，民盟则坚决不参加。第三方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它们的毛病在于不够坚定，在于没有下层组织，现在由于不断的在清洗是更坚定了，并且决心开展下层组织了，显然是一大进步，这是爱国民主战争力量的增加。

三、农村斗争急剧开展：去年五、六月间民变连九省，变民达二十万，四川发生民变者计达十二县，广东二十七县，灾荒遍十九省灾民三十万，这都是民变的后备军，我们要记得农村斗争已经走到一动手便是武装斗争的阶段，可见其尖锐性质。

四、K的困难和新的企图：军事上的倾向，首先是兵力的不足，胡宗南回复陈诚说：“只能抽出十五万兵进攻延安，并且打延安则西安不能保。”K某高级军官说：“中共控制面，K控制点与线，而且四面楚歌，美械四十九个师只剩三分之二，军火已使用战时德日腐货了”。又一个说：“K不能补充兵役；二美械已感已不够用；三K日行三、四十里集中怕被消灭，拉长则怕逃跑”。

经济上的崩溃：去年化去七万五千万亿，收入二万亿，今年国库开销据马寅初估计最少要用二十万亿至四十万亿，美国物资等用八千亿元，而且是物资不容易变成货币，即使五亿美元借款成功也只等于一万七千五百亿，连存货至多够打两月。

政治上的破产：从倖胜到惨败，从四强到殖民地，从人心思汉到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在人民面前信用破产，和平攻势再出现了。马歇尔的声明，骂K是骂过了老话，而且结论是蒋介石是好的，宪法是民主的；骂我则是新的恶毒和中伤，一咀戈培尔的口气，整个策略是指示K组成一个已收买的小党派，不必有中共的所谓联合政府来抵消就好了。然而即使马的骗术如此露了马脚，罗隆基也有点飘飘然来了，这是够提醒我们注意这类人物的动摇性。但是没有中共参加的联合政府，是没有一点实际内容的，这样人民没有得到实权的联合政府，这是专制独裁的伪装，我们是不承认的。蒋介石的独裁反共，他屡次说他不消灭共产党死也不瞑目，可以清楚其本质，故此他更投降美帝，依靠美帝来作孤注一掷的战争形势仍存着，那时只有变成长期的战争，从面的包围K的点线，那时国际上解决了欧洲问题必解决太平洋问题。苏联五年计划成功，新民主国家更巩固，英法人民更加左倾，美经济恐慌必来三征，暴政必变，民变蠢起，第三方面力量必更壮大，K内部必发生变化，——如当权在野，政学系与CC、复兴社、地方政府与中央，军队与民间必然问题发生。这保障军事上长期作战以面的包围消灭老K点线之能力愿实现，而那时候也就不再是讨论一月十三日地位问题了。

五、人民要胜利：一面打出一个局面，这是目前所努力要求的，一面是准备长期战下去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必然的准备工作。

（三）把爱国民主运动与农村斗争在广东开展起来（弄清楚我们奋斗的前途）（原件缺（一）、（二）——编者）

一、统治阶级的困难矛盾削弱：全部兵力北调，除六十四A仅留一部外，只有宪兵两团十个保安团；财政空虚，今年九百亿预算税收二百亿，K中央补一百四十亿，征粮至十二月底只得一百五十万市石即三分之一而已。

天怨人怨的走私，接收贪污，肃奸的贪污救济品以及吏治的贪污案件真是数不清，走私数量则在六亿美元的美货入口中，走私的

就占五亿美元，占去百分之六十二点五，严重损害了海关的税收。

广州特务恐怖，五月四日毁劫广州文化书报机关；六月五日警察局、社会局和保安司令部出动大批宪警搜劫书店，三十余种杂志被迫停刊；六月十三日制造共产党暴动谣言，搜查捉拿三百余人；六月三十日封闭了十三个文化机关；十二月清查全市行人，捉去三千余人；半年间竟公开□出大规模暴行五次，任意逮捕市民不下四千人；整个广州笼罩着黑色恐怖的毒雾，这方面也暴露出统治阶级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地方与 C C，省府与行营，职员与长官，参议会与行政机关矛盾屡出不穷。如周演明案，以省参议会选举案等，都是这种矛盾的表现（选举结果发表之前夜占压倒票数，罗翼群被蒋介石一电打消了，只好让位给 C C 的林翼中，罗结果出卖两间洋房五千万元抵偿活动费）。

工商业的破产与失业的增加，去年一年广州一地自行停业的商店百余间；卷烟业一百余宗倒闭了九十宗；失业人数五万余人；广州九百余间织造厂因……80%自行停业，十万男女工人失业，旧历年这个难关……。

二、人民继续顽强斗争：在……

今天中心的问题是如何把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到乡村去的问题，这自然不是说把城市的学生搬到乡村去游行示威的问题，或者要乡下如法泡制自己来搅一下，而是说依靠乡村的环境和群众要求，采取群众所愿意而又乐于参加的方式，在自己求生改善生活的行动上，配合和在意义上贯通于城市爱国民主运动。

为了实现这个新的工作，第一应该反对和平幻想或者幻想和平。我们应晓得和平虽为大势所趋，但只有加强斗争，斗到顽固派低头才能获得，同时和平到来也是南方暂时黑暗的时候，也未渡过黑暗找到光明，特别对毛主席说的，赤色割据的理论根据，仍供大家研究认识。结束独裁统治的斗争，其前途是可能的话，先造成这割据的局面；即使和平到来时，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和平

时期不便以武装斗争，这不便是因为如果有利的话，还是可武斗（只是斗的方式如何出现的研究如何而已），故今天的问题不是敢不敢造成赤色割据的问题，当然应注意到靠山的问题，两面政策的问题，进可攻退可守的问题。

第二，应该反对死等的掩蔽。东纵撤退对发动斗争总的方面有过大顾虑，如停止活动，但不同于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的完全错误的掩蔽不动，而是为看待机，时机到了就干，中央指示有条件就大搅，无条件则创造条件以待机大搅。对此次沈案中央曾说不要对此卷〔蛰〕伏不动，要有纵深配备，准备一线暴露而大部还是掩蔽得好好的行动来响应，用群众的口号和群众的面目出现，即使暴露可取偿于向踊出的干部发展，只有赚而没有蚀的，应该时刻斗争地斗，准备着待机或者说动以待机、积力待机，反对死等待机。

第三，反对看不见前途：前途就是敢于在有利条件下搞成赤色割据，和平到来了才谈判。因那时到来的和平就不是政协的政府的一纸和平，而是结束独裁统治的实和平。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已经打起来了，决心从打中打出一个象样的和平，故将来的和平是要彻底的、实在的、有实权的。不然就不谈判，即使谈判也是为着想揭破K的虚伪而已。

第四，要反对城市的享乐主义：提高俭朴勤劳的工农革命的优良作风，担心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坏影响，担心城市奢侈生活的习惯，腐蚀自己的思想意识，腐化自己的生活，提高廉好明志守静致动的精神。有的同志说要学跳舞打牌，这是不对的，思想腐蚀〔不〕便工农艰苦进行领导群斗。

第五，要反对走直线，两个拳头打人，攻坚要注意一部分干部，保留一部分力量以备后用，应靠群众不可孤军拼命，应该采用革命两〔面〕政策——进可攻退可守。

目前的口号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各种方式依靠群众，在此有利时机，大胆放手而又细心稳健的战斗下去。

这里所谓大搅并非拿出党的大旗到处武装斗争。建立自己政权

之意，主要还是以群众面目出现搅群众斗争，从斗争运动中经常积蓄力量，以备将来决战之用，现在还不是决战时期。

现在群众斗争是要放手大搅又要武斗了，那末当时何必撤呢？撤是否错了呢？不会错的，不撤是可能受到大部损失的，有损无益，撤了赚起本钱，仍存有本钱可以再搅，日日增加力量有益无损，K大军北调是我北撤的直接结果，此时机也是北撤后的结果，重要的问题是不要再错过这个时机，依靠留下本钱再搅，再赚钱。

对南路工作的指示

(1947年初)①

温、吴、欧诸同志：

来信收到，由于南路同志的努力与吴同志放手的精神，获得很大成绩，甚慰。

对于你们的工作布置以及一些争论问题，我们有如下意见，提供你们参考。但主要方面，我们想集中于说当前工作问题，对于一些不同意见，如无关于当前工作的，留待以后再讨论。

一、目前南路中心问题，在于如何从发展中求得打破顽军行即到来的围剿，固然这个围剿的兵力有限，但凑成一个正规团与一个保总队的兵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已经调动到你处了，甚至张、罗、邓却有亲手布置之可能。他们是企图用主力打击我主力以后，再进行围乡清剿，政治欺骗，建立地方武装以自卫。现在全广东以及西南群众游击已普遍发展，这种计划当然将遭受人民斗争——特

①原件未署作者，从内容判断，此件是广东区党委于1947年初对南路工作的指示。

别是南路人民的英勇斗争所打破，不过，南路党应如何警惕与准备领导群众来应付这一局面，则是千万不可忽视。

你们这次布置应付这一反清剿工作，我们基本上完全同意。我们要着重告诉你们的，希望你们不要迷醉于目前所建立的政权及基地的胜利，这些胜利固然大大的鼓起了群众的斗争勇气，作为我们动员粉碎敌人围剿的基础，但要在这样狭小地区来打破敌人的围剿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从发展中来破坏敌人围剿的计划，从积极行动中不断歼灭敌人，才能巩固这些地方以至扩大这些地方。

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坚决集中一部主要力量向着勾漏山脉——容县，北流以南，廉、化、茂以北大量发展积极行动。而以较少的原来地方部队坚持原来地区的斗争，以麻醉敌人，吸引敌人，保卫群众。合浦、灵山部队，我们同意你们意见，向着东面来发展，可能时向着桂边博白发展，求得与高雷北上部队之配合。

因为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打破敌人二个月来布置的计划，同时也才能展开更大的局面以更有力支持长期战争，而打下了边区的建立的基础。

二、要能够动员群众来接受我们对于战争的指导，就必须迅速采取有效方法去动员群众，给群众以切实的利益。因此，对于我军所到地方必须立即将“政府”谷仓存粮分配给群众，提出“二五”减租口号，立即领导群众与地主清算去年冬季租额，逼迫地主照“二五”减租规定退还租谷给群众，在实行减租之后，如群众春耕时的耕牛、肥料、粮食尚缺乏，仍可发动斗争向地主无利借贷。对于汉奸地主，则宣布没收分配。从不断解决群众生活中把群众组织起来。地主土地及顽派土地，暂时仍然采取减租减息方针，俟以后发展再来决定分配与否，目前不可过急，以免失却争取许多动摇顽派，同时也避免刺激整个地主阶级，妨碍南方各地游击之更快发展。

关于这个工作，在其他许多地方都已积极进行（如江北没收分配一万多石谷），南路在这方面的成绩，因集中于武力发展，故有

不够的地方，望能细心坚决执行，求得最短时间有更大成绩。

三、游击战争一定要有根据地，是不成问题的，但根据地是否建立政权，则看形势而定。你们已经建立的政权，在群众要求下，必须如此发展是对的。但在领导方面，我们必须认识今天在南方平原地方，要建立巩固的政权是困难的，敌人仍可来反复扫荡的，如何应付敌人的扫荡这种精神准备是必要的。因此，对于政权如属平原不稳固的地方，我们不作一种准备，必定要使群众受到意外的摧残，妨害我们以后的动员。因此敢于放手根据群众需要建立政权是对的，不作准备应付围剿时如何保存群众利益，使其不遭受更大损失是有缺点的。两面政权的运用，主要便在于领导者的预见的准备，而不是未动手作事就先准备束手束脚。

因此，目前在可能被敌再占的地方，准备如何保存部分地下党，保存部分好的仕绅，保存部分灰色干部，以便能领导群众应付这一清剿是必要的，望勿忽视。

同样，在我军游击地区而目前未可能巩固的建立政权地区，采取两面政策的应付仍是必要的。

四、为得获得更好而胜利的大搞，最后结束独裁地方统治的政权，目前最主要仍应采取流动游击战，这个游击战在地区来说是在粤桂边积极行动，消灭地方反动势力，培植地方革命力量——建党建民兵……从不断的反复斗争中增强人民力量（包括主力与地方），不断削弱顽派力量（主力及其地方势力），在我们基础普遍发展与巩固状况下，在反动派无法再增大兵来对付我状况下，在地方反动力量完全消灭或降服我下，则边区形式即已形成。如果以为我们目前靠住一个地方，守住一点，从这一个地方巩固的来打出去，来完成边区，那是不可能的，结果一定要失败，这点望你们能接受我们的意见，积极向外去发展为要。但是这种发展不是去攻坚，去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而是要不断消灭敌人的弱点，积小胜为大胜。

为着达到军事更积极发展，我们同意你们意见。建立边区指挥

司令部（虽然尚早一点，可是公开了便算了），以庄田为正司令，唐为副司令，温为政委，吴为副政委，欧初为政治部主任，可能时我们再派一人去当参谋长。在庄、唐未到以前，政策方针由温、吴、欧三人决定，部队出发行动暂由吴、欧二同志指挥。温留指挥地方工作及地方部队。

边区指挥部的军事主力，最好能集中一千到千余人，应如何由各个单位动员组织起来，请你们根据实际情形决定。初期如不可能则应有五、六百人的集中行动，才能有力开展新区及策应各个单位的战斗。不过同时应考虑干部的指挥能力，给养的解决问题。

除了主力以外，各县的作战单位，就坚持原地斗争，应如何配备，由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但编制时应注意他能单独作战，不可削弱到他不能动作。

吴、欧应随主力行动，到各该地时并指挥各该地武装以配合作战，平时各地方武装，则由地委或县委指挥之。目前干部缺乏，指挥所或者暂缓成立，不知你们意见如何？

五、在月前敌顽布置进攻还未动手的时候，除了上面我们采取更广泛而积极的进攻游击战以及动员群众以外，对于上层统线，仍要猛烈开展，争取更多的同情与配合，因此我们对于中间阶层甚至不坚决反动分子仍要照顾争取，以孤立敌顽的地方势力，打破邓龙光等利用家乡宗族名义去建立地方反动组织，放手时固然不怕左，但能照顾得到仍要照顾。因为目前的统线是极其广泛的爱国民主统线，特别在粤桂这些地方，将来会有许多中间人士来和我们一道走的（他们已在准备，只要我们搞得好的）。因此，我们除了积极树立我们自己力量，以便将来与他们合作时能以我们为主，而争取更多的力量，对于我们事业才能更快完成。对于你地区的十九路军派，应注意开展这一统线。

六、对于一些询问的问题，答复如下：

1. 关于指挥机构，除如上述外，高雷地方工作，均归温领导，×属负责同志因吴另分工决另由安南调来，届时仍由温代表边

委与之联系，到边委能直接领导时为止。

2. 关于边府暂缓组织，地方需成立政府由政治部负责。

3. 你处留港粤干部，当照来函促其回去。

4. 通讯器材先付去，人俟下次交通来带，因今天赶不及了。

5. 医生俟再物色，目前无法调人。

6. 各地对你配合，此间已有决定，免念。

7. 曾伟所谈问题，未有消息。

8. 船目前已租出，将来□建立又没有万分必要，故决定不调。

9. 听说陈学谈已决定回去，但现在表示不与我对立，故对他的态度仍应慎重。据说林英因不断失败及无兵无钱也表示难干。

10. 交通回你处后应立即派来，我们准备派一人到你处研究工作。我处以后寄信给你，签名吴耀翔。

关于广东武装工作意见

(1947年)①

一、扩大武装工作活动，有什么有利条件和困难。

国民党决心打内战了，为了粉碎蒋介石之进攻，保卫人民利益与民主自由，继续进行武装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国民党广东当局已破坏了亲手签字的协议与诺言，逮捕屠杀我复员之人员与民主分子，继续扩大广东内战，蹂躏了解放区人民，我们自没有什么政治约束可言了。我们进行扩大武装活动，不是中共废约，而是国民党迫使人民非武装起来反抗，则不能生存，不能保卫自己生命财产与自由。但扩大武装活动，能否坚持下去？其具体条件是什么？这又必须认清楚的，我们有什么条件。

①原件未署作者。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甲、于国民党不利，于我们工作有利的条件。

1. 农村破产，商业凋零与工业倒闭，人民无以为生，加以强迫三征，人民失业不满，民变是在酝酿着，一天比一天深刻，这是对国民党无可挽救的致命伤。而这种民变又是广泛于各阶层，在国内各省民变影响下，自身之痛苦又不可忍受，加以正确的诱导，此种运动是会广泛发展的。

2. 土匪蜂起，深刻的破坏了国民党之统治。而这种土匪，绝大多数是被迫得无以为生的农民，或由征兵所迫上梁山。因此这些土匪是含有群众性的民变意义，是农民对国民党反抗及求生路之一方面表现。

3. 国民党兵力空虚，六十四师连十三个保安队连直属队为数约三万人，假定其不拟再调往华北打内战，此种数字也绝不能解决其促襟见肘之状，使得张发奎不得不于前三月行政会议上宣布“维持治安乃县长之事”，与拼命扩大地方团队和再扩编两个保安总队（九日报载）。

国民党现在采取扩大各县保安队及强迫抽丁办法来解决其困难，可是由于内战不已与土匪横行，各处民变，使其不能不分散兵力，不能处驻重兵。

4. 国民党本身经济困难，内分派系，种种矛盾（如最近省府与市府为争夺市税务处事）贪污腐化，利益之争是影响其政策上执行效能。

5. 国民党之中央化是深入而加强了，但不能过分估计，在扩大农村中之保甲基层，同是受国民党所压迫的一群，绝大多数对我们无成见，而也有不少好感者，我们是可能争取与团结他们，在他们掩护下仍可以进行我们工作的。

6. 几年来的斗争结果，广大人民是已体验我党我队之所言所行，我党我队之威望是大大提高了，成为人民的解放救星，故可以说我党与群众在政治关系上已结合起来了。

7. 我队尚留下很多的队员与干部，集结起的也不少，现存的

武器也不少，某些地区仍留下相当力量，这种形势是有利于我们队伍重建，与数年前抗日时期中开始创建不可同日语也。而且今天我们所做的是正义的，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广东民主运动也天天向前发展，新的有利条件不断增加的。

乙、什么是我们困难：

1. 国民党之兵力虽空虚，但与我们现时比较，无论在质、在量方面都占着暂时的优势，还可以作一定程度之集中进剿。

2. 民变是在广泛酝酿着，但不能看成是现在的实际行动，广泛发展与对国民党起反抗之作用，尚须有其过程，而且国民党之反动分子也有经验，如得不到正确的指导，起来之民变也有被镇压下去之可能。

3. 国民党之政权机构虽坏得很，甚至有时显得“无能为力”，但仍不能看成一击即溃。在特务横行下，兼有封建坏势力支持，还有相当之稳定程度，民主力量仍〔有〕被打垮之可能。

4. 国民党军心动摇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今天在广东本部进剿当中，还未遇到劲敌，一般说他们深入乡村，是如入无人之境，发财之心仍是鼓舞了他们，不可估计其动摇太高。

5. 广东之地方势力，一般说是已被中央化打垮了，全省性的地方势力之再起，是在酝酿，暂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而且他们还有浓厚之投机性，一个地区的地方势力派系，是又与之为民主事业共事。但所知此等人还不多，而且国民党此期间也培养了不少广东人的坏分子了。

6. 我们本身还具有很多弱点的：

①党与群众有组织的具体结合不够。自东纵北撤以后，原来地区群众关系是减少了，国民党之屠杀镇压，不少群众不敢接近我们的。

②按现成之武装工作干部看来，是少的，有些地方是很弱的，这须要解决的问题。

③干部的思想、生活上腐化，个人主义发展，个别干部是很

严重的。一般的队员匪化意识也是发展了。

④数月来，我们的做法是退却坚持，潜伏下来，很少做过什么事。而且缺少了适当教育。因此，影响了战斗力，朝气不强。

7. 经济困难。

以上列之条件看来，甲项之1、2、3、4各条是国民党之基本弱点，是不可改变之弱点，乙项之七条困难是暂时的，是可改变的。总的说，基本形势是有利于我们的扩大武装活动，但也必须认识我们现有的困难是具体的，不可忽视，不可过低估计国民党，他也有反动的经验，还可以想各种办法加深我们的困难，与解决或缓和其自己困难。故此，在时间上说，还不是大搞而是小搞的时候，是准备大搞的时候。

由于延安形势紧张，显示内战更急剧发展，这个准备工作是刻不容缓，领导上需要加强，干部配备上，个别地区即要充实，使得准备工作准备得更好。

× × × ×

二、在准备扩大武装活动时期，我们要从哪几方面着手工作。

在此紧张局势当中，武装工作是需要加强，然而不是离开了长期打算的基本方针。形势是需要我们配合华北军民反对蒋军进攻，更需要于决定时机的配合，那便不是在未总的去配合之前而被打垮，那便须有步骤的稳步（而又放手）前进，不要尽用我们的资本，我们所走的路仍是曲折而困难，我们工作是看有利为定，有利为主，一面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一面要步步巩固自己阵地，我们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从整理现有的基础着手。另一面要作其他方面之准备，具体说来，我们于准备时期所要做的工作是：

1. 干部思想准备——说明时局发展，蒋介石与美国帝国主义已把决心下定了。国大之开幕与进攻延安军事行动，是显示了最后分裂局势之到来。我们绝不能在政治上有任何幻想，那些所谓社会贤达与小党派背弃人民，违反协议，参加一党召开之国大，是

深刻的揭露其虚伪行为，历史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民解放与民主胜利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团结。而今天的分裂局势，粉碎蒋介石之军事进攻，是依靠八路军、新四军与解放区前线胜利，我们有强大军队，有辽阔解放区，有广大人民支援，有全国民主运动形势配合，我们有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把握着胜利之舟，我们的胜利前途一定到来。坚定自己信心，但也不要以为胜利会轻易到来，须具有决心与奋斗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了解广东之具体斗争形势，不要轻率，稳步前进。

2. 粤北边境，西江粤桂边境，南路之粤桂边境，以现有之基础整理建立相当主力（不超五十人）加以训练，提高战斗兵力，同时这些地方也分散建立各种形式的小股武装以致配合。平原在可能坚持与自给经济原则下，可分散的建立精干小股人民自卫武装或不脱离生产的武装，以取得全配的形势。

然而有的地方在不易坚持与不符合长期打算原则者，仍作必须之精干复员，这是一个具体工作问题。

3. 重要据点，交通要道，具体研究其条件，建立武装、秘密武装小组或非武装之据点。

4. 干部培养——主要培养中下级的各种干部，某些地区必要干部充实之。目下留在省港之武装工作干部，有可能返回武装工作者，应选择，分批集中，加以短时训练弄通其头脑，作政治动员与思想准备，然后根据各地需要分配回去部队工作。同时必使干部明白，过去为了和平让步，撤退是正确的，今天形势需要重回部队也是正确的。

5. 对复员之干部队员，分别其工作性质，作缓急之联系与作政治动员。对某些复员人员，必要时可发给武装叫其进行武装活动，并指定人联系潜藏下来。对于已经脱离了生产起来武装自卫之复员人员，必须联系与指导。

6. 经济工作准备。

7. 加深对国民党统治破坏，具体掌握民众反三征斗争运动，

对某些据点之坏分子必须肃清。

此外，还需进行各种必要的调查准备工作。

三、一般口号、任务、活动方针、战斗原则、组织形式诸问题。

甲、一般的口号与任务。

国民党强迫实行征兵、征伕、征实，各阶层人士均蒙其害，而工农界负担尤重，据一般调查了解，中上层的人最关心的是征实与治安问题，中下层的人最关心的是征兵与救济问题。因此我们的口号：“反对三征，维持治安”，这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而是实际行动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反对内战的具体内容；这个口号是各阶层人士起来反抗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及反抗压迫的号召。

自然这口号还是一般的，对某一个斗争事件及各阶层的切身利益还须有其具体口号。然而一切具体口号之提出，都要符合民众的最切身利益要求，与其所能接受者。

至〔于〕我们的任务，最主要、最基本的是为人民做好事，保卫群众利益。我们作一般之政治号召与动员是需要的，但当民众还没有体验我们的言行，真正为了他们的时候，我们的脚跟站不牢的。因此，我们眼睛不要看到自己的生存利益，而更要看到群众的生存利益；因此，我们应该从为群众生存利益来求得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民众在政治同情为满足，更重要的要群众觉悟到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那末我们要在反三征斗争中，给他们的真实利益，给他们胜利信心。我们的兵员数量虽不多，但只有与群众结合起来，那将来便不成问题，我们便将获得人民的支持，立于不败地位。

乙、活动方针。

1. 对过去工作的一点意见。

除了中区海面队与中山队伍为国民党打散之外，据所知，大部都能坚持下来，坚持下来的队伍，有的仍保持过去的精神与传统（如潮汕、西江、南路）。有的却变了样，干部思想上、生活上腐

化了，队员匪化意识发展了，如中区海面队，不仅被人一击即垮了，而且党的队的威信是损失了，干部思想上损失了，若干中间人士对我们误解，也使自己队员同志对自己过去的光荣任务也糊涂起来了。

为什么西江与潮汕还保持原来的精神与传统？他们在总的方面是停止了过去的称号活动，但并未完全对群众把自己的面目（个人的、被迫不能复员的）掩盖起来。其次是干部相当强，领导联系还密切地保持，内部还保存一定程度的教育制度、经济来源与生活方式，西江未有基本改变，潮汕则干部很好的掌握上级指示经济方针和政策。

为什么中区海面队又遭受到这样大的损失，区党委所指出：叫我们为群众做事，保卫群众利益，提高干部，巩固保存自己的力量，分散活动。群众化社会化，经济生产化的方针是否正确呢？我认为基本是正确的，那么其具体原因是什么？

主要的是干部太弱，抓不紧这个方针，对政策不了解，头脑并未弄得很通。其次是生活方式与经济来源，不是循着自给生产的方向，而是以捞为主，结果成为“土匪行动，政党面目”，无教育、无制度，不注意与坏倾向斗争。

由此而联系过去工作做法上有几点意见：

①各地干部对于坚持工作尚未提到一定程度之重视，因此对于坚持工作的干部，无计划的适当的分配留下。

②对于联系方面，所提出以后联系很少，甚至无联系，这对后来工作有影响的。

③对于坚留队之出现形式，精神上强调了豪侠的，梁山泊式的，劫富济贫的，也不大妥当，这是不易转变的，即使转变也不大好的。

④不能政治化，政党化，这大前提是正确的，但对内要停止政治教育，不谈政治这一点，是有偏了。

因为第③、④项是很容易为干部所误解，便容易使他们忽视了

为群众做事，保卫群众利益这个基本政策。

为什么这是不容易转变成为水浒传梁山泊式的，因为：

①所活动地区与群众都是原来的地区，老百姓均认识的。

②我们干部及同志无那样的经验，无掬家作风气派。经济困难也促其饥不择食乱搞。

由于干部对此方针了解与掌握不够，这样许多细节地方便做坏了，掬的办法个别地方成了风气，因之大大影响党的队的威信，及其他损失。

2. 活动名义与恢复政治活动：

我们的政治主张与提出口号，反对三征维持治安是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但人民还未十分了解与还需要多种多样方式冲破困难，展开工作的时候，原则上暂不用党的或过去各地原来之名义活动，可以用人民自卫的名义活动，可以说是我们是东纵的复员人员，因被国民党追捕，无法生存而不得不拿起枪自卫，保卫自己生命财产，保卫人民利益，反抗国民党之强迫三征。此外可以用其他名义或无名义的活动，只要可以生存下去什么名义均好。一般说，为了放手组织群众，在今天的局势，那些较大的队伍是以人民自卫的或以复员人员自卫的名义较好。

由于形势发展与出现的面目不同，用人民自卫的或复员人员自卫的名义出现的可以恢复其政治活动，恢复对内对外的政治教育与宣传。其他掩蔽的或合法的队伍，一般仍保持现存的状态继续潜藏活动，政治活动是与其所处之环境及出现方式灵活运用。为什么要恢复政治活动？若非此不易有效提高队的精神风气与培养干部。

然而还必须申明的，所谓群众的政治工作问题，自然是政治工作之一，谈谈国内国际、民主内战，主要是处理与研究群众周围的事情与如何领导群众反抗政府之压迫，反对三征的具体事情。

3. 一般做法。

平原与山地应有不相同的做法，各区内也有其具体的做法。一般说，在准备扩大活动时候，着重边境山地与重要之交通线上经

营。所谓边境山区也不是一般的说，而是有选择的。如粤湘边境，西江粤桂边境，南路粤桂边境，更肯定的说以粤北边境为最主要。

山区以现有基础建立一个精干的主力，该主力一般的要恢复政治教育生活，有制度，有训练，大批训练中下级各种干部与加强技术教育。今天仍不是大搞，而是小搞时候，着重内部整顿与各阶层群众关系之加强，由小搞中建立点线基础，准备好大搞条件。今天虽还未能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口号，可是我们须锐意经营，创造这个条件，准备将来建立。

活动原则仍是以分散活动为主，有不同情况的分散活动，如前进方向阻力太大的，可跃过这地方建立点的活动，在自己可控制的地方，也须作点的分散活动。某些地方仍保持其一定程度秘密性，若我们还未能完全阻止国民党深入扫荡，某些地区保持其秘密性是必须的。我们工作准备还离不开长期打算，即使大搞也须有两套方针布置，一面准备动员大搞的力量，一面也须准备在万一不得已时而开离该地区时，还有秘密的基础，不致连根拔起。过去因没有这样做而遭受损失之经验，是不要忘记的。

山区在有利的原则下扩大其非法活动，非此不能冲破各种限制放手组织群众，但也有分别，还保持一定程度秘密地方，仍须充分利用合法方式活动或社会化的传统习惯半合法的活动。

对国民党政权则加深破坏，使其政策不能施行，但今天暂未须以自己面目出现建立政权，而鼓励父老绅士自己出来办理自己的事（如族务委员会等），有的仍可通过国民党的形式选择公正父老做事，对国民党的法令则敷衍怠工或用别的办法减少行政效率。

山区里可以放手组织农民，我们还要大大依靠群众性的武力，反对三征，尤其反征兵运动将引导广大农民暴动与参军热潮。但农民的觉悟还有一定之限度，国民党军退了，热潮退了，他们思家离队的，因此我们必须在热潮集中时候，加以训练教育影响他，当低潮他们要回家时候，让他返去，不能住时又可以再来。我们目的是步步提高农民，处处不脱离农民，不过我们要警惕奸细可能混

入，这样的农民，还不能完全当作自己队员看，因此必须与自己主力隔离，保持我们力量的秘密，并避免不良之影响。山区里除了建立一股精干主力之外，仍须保持有各种形式的武工队，地方性的、不脱离生产的队伍活动，以致配合。

山区里的坏蛋分子，须加以肃清，并进〔行〕各种有益人民的事业，清除土匪，维持治安等。

平原区——因为斗争环境不同，其活动方针与边境山区是不一致的，他今天不是建立什么主力，而是以武工队似的，人民自卫或复员人员自卫的形式活动。但同时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活动形式分散点的活动并作有中心的联系指导，平原活动主要靠群众掩护，在有群众掩护，什么形式都好。

一般活动更要充分利用合法形式下进行，利用国民党政权下层机构掩护活动，一切商业、教育、会社形式下进行。那末我们对乡中上下层关系工作要做得好，对有地方性的势力分子，与乡中之中间人士，都须用很大精神注意，进行交友工作，上层有掩护，下面同心合力，平原地区什么工作都可搞起来。

此外还须注意交通要道之工作建立，大乡村之工作建立，一般的是要面向大乡村，不要着眼于小乡村。

对地方团队，有计划布置人打进去，向上爬，争取重要位置，少作政治活动，多作实际工作，联络势力分子为掩护，而从事点滴的工作，适合时机可进行起义。

至于土匪式活动，无论山区与平原，肯定的停止活动。因为这种土匪方法，使民众对所谓人民的斗争与土匪活动混合起来，也使干部队员思想与生活搞坏了，使统线的关系对我们糊涂误解不敢接近，而且也大大影响战斗力。今后经济来源，基本上是从事生产，以求得解决。其次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可进行募捐筹粮，至于捞的方式，这是个别的具体行动，应选择对象和地区，搞大而不是搞小，不多搞，搞完要注意善后掩蔽，执行这种任务，也不是个个队员做的。为了适当解决经济来〔源〕以补生产之不足，各区可组织

自己的经济队，这种人选应是不红的人，在表面形式上与我们无任何关系。经济制度，各区应有自己的规定制度，点滴归公，充实经费。

4. 战斗原则：

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分散活动准备工作时候，国民党军量与质还占着优势，我队内还有许多困难与限制，所以战斗原则一般避免硬打，保存实力为主。

对来进剿的正规军，以溜为主，保存实力，免群众遭受摧残，虽在适宜活动的山地可以用麻雀战地雷爆破杀伤敌人，阻其深入，及使其不敢放手抢劫民众。

我们进袭打击对象，是以地方之丑恶团队为对象，对深入乡村之小股部队及乡中的坏分子，也是打击对象。我们进行活动时，须迅速集中，也须迅速分散，在平原区由于限制条件更多，我们打击敌人对象是乡中坏蛋为主，进行打击敌人时应研究坏蛋分子生活规律，施以暗杀，或用土匪方式以补我们不足。

5. 对地主与商人

国民党对地主商人压迫不下于工农，虽然他们还存观望，不坚决，但在国民党的重重压迫下面，仍有可能团结他们共同进行反抗国民党之压迫的。因此我们进行工作时，认真照顾其利益，我们经济要求助于他们的，但不可取之过分，态度要好，避免过分刺激，分别谁是真正坏的，谁是受了坏影响的，打击坏蛋，一定同时注意对他们的争取，他们对于不明了我们之地方，应逐渐的使其了解。此外并注意活动区内治安维持，肃清土匪，安定保障其生活，这是争取他们的一个条件。

6. 土匪

土匪有多种，我们注意团结那些无以为活的临时集合起来的土匪，指导他们并帮助他们求得生活。

对于那些纯粹经济土匪，也应联络之，与他们联络共同防卫国民党之进攻。

与土匪合作解决经济有时是需要的，但是要事件合作，临时性的合作，组织生活形式不能混同，更不能同流合污。宽大中有镇压，镇压中不穷追，杀一个拉其他，这是我们的政策。

对于含有政治性的坏蛋土匪，应坚决消灭之。

7. 队内党的工作

队内党的工作，恢复支部小组生活，一般的停止发展组织，对于个别干部和有重要意义的据点可当具体问题解决。

十五日

家长同志对江南 工作报告的记录及口头指示

(1947年初)

一、三个月工作一般检讨

(一)基本上能够执行上级长期准备的方针。

整个情况已由动乱、暴露、撤退干部等到逐渐安定。组织上已重新划区，采用单线领导的组织形式。各地区已大部分接收，小部分则未；接收的已逐渐隐蔽。党员和干部的情绪已相当恢复。

(二)存在的缺点是：

(1)组织形式是比统一领导好得多，但未做到完全精干，完全适合地下的形式。每支部仍有十五人，支部范围距离还有十里路左右。

(2)干部方面，已撤走大批（北撤及来港）。但惠阳县一级干部二人仍是暴露，留下这些干部还是不适宜于长期的隐蔽的方针。

(3)在隐蔽中忽视提高素质，联系很浅，也有对群众工作忽视的。

(4)没有实际解决问题，在长期隐蔽中不够耐心，觉得沉闷。

(5)经济上注意不够，没有建立基础。这不单是经济问题，而是没有从长期方针上作根本的打算。

下级的经费还有上供给，使之不谋本身独立发展。参加生产人极少，甚至无，有的连党费也不收。

二、群众斗争及群众组织

(一)江南群众条件：

(1)觉悟程度高及组织性较好。

(2)对我队政策及我队存在着希望。

(3)群众要求：

①维持治安；

②安定与改善生活；

③提高文化教育，如积极办学校等。

在惠阳，大地主少，官僚政客少，中贫农多，海员多，打工多，土匪也不大反动，这是与东莞相反的。群众基础多数暴露，将来斗争激烈也在这些地方。

(二)群众斗争：

群众斗争须积极领导，不但要领导自发的，而且也要积极推动斗争，但不得妨碍长期方针，要保存力量与避免招致损失，斗争要适可而止，不要硬拼，采取有利有理有节的方针。

(三)斗争形式：

(1)反贪污斗争(如区乡长)；

(2)反征粮斗争(抗缴条件未成熟的，可用减征，虚报，拖等方式)；

(3)反征兵斗争。

在这方面宣传工作要特别加强。

广东区党委会议对形势武装斗争及东纵北撤问题检查记录

(1947年春)

一、关于广东形势的讨论

梁：广东一年来的形势有点变化，以去年六月为分界线，六月前K在战略形势上是局促一隅。

六月以后广东形势有了变化，六、七、八月K之统治较为稳定。在军事上很强大，这一强大是中央的力量，这力量不只是向民主力量进攻，还向地方实力进攻，这表现在：（一）整编袁带和张汉明武装实力；（二）撤换余汉谋系的县长。但八月以后这中央系军事力量开始北撤，九月大撤，于是广东兵力顿形薄弱。张发奎在召集省行政会议及绥靖会议上，强调治安责任要依靠地方团队为主，而各地土匪亦逐渐骚动，广东当局于是又不能不再要依靠各地方团队来进行绥靖工作，如陆满、袁带、林小亚、莫雄和梁桂等都升任各行政区的绥靖要职。

其次在政治上因为大批撤换旁系县长的结果，引起各地县议会不满（属旁系控制的），控告县长贪污者达六十余人，省当局于是又不能不撤查一些县长，稍为缓和一下舆情。在此时，省当局特别重视特务工作，撤换了二十多个警察局长，改组省、市党部，成为CC系的附属党员重新登记。成立各县的特务网，在学校内成立防奸小组，企图通过特务来把握下层。关于中央化广东问题，中央当局没有放弃，现在各县有三种势力，以CC为多数，其次政学系，最后是罗卓英。省市党部、省市参议会、文化机关——CC、行辕、警局——军统、省府——陈诚、财政——宋子文、市府——政学系吴

铁城。

在群众方面九月以后开始骚动，八月开始征粮，九月征兵，这个骚动开始扩大，反征粮斗争已在开展。九江农民请求专员公署免征减征，发生殴毙民众；三水、鹤山等地有一保长叫合格壮丁逃走；揭阳、连平、高明等县反抗割烟苗；九江市民捣毁K之税站；广州市民用消极方法反抗营业税、过分利得税，警察义捐，反对征兵；始兴民众击毙张发奎的姐姐；翁源骚动很凶；梅县有壮丁从华北战场逃回来，扩大宣传反对征兵。

K在政治上破产得更利害，民众根本不相信老K，香港市民认为老K死是死实了，只是中共在华南的力量薄弱一点（已经不是中共好不好的问题了）。工人因物价瞬息变幻，一日的工钱都无标准；中大教授被《前锋日报》记者访问时，一开口就哭起来，公教人员的生活完全陷于饥饿；商店的资本都狂追购黄金外币，年底市区内倒闭二万所商店；学校考生全市三百人，说明农村崩溃的严重。今年粮荒的现象会更严重（前先由广州贵起，今由四乡开始涨起），闰二月，农村游资作粮食投机，征粮征空了，劳动力减少了。

在党派关系上，省府属陈诚系，但与中央有利益矛盾。财政三级制的决定使省之大财源统统拨入中央，省府与市府有财政上的矛盾，李汉魂的势力被消灭得最彻底；余汉谋还有些少；陈济棠系还有些活动；林翼中参加竞选便是陈济棠给以十万港币之结果，在港陈有民潮刊物，准备办《大同日报》由肖雋英负责。余汉谋在军队还有余力，下层军官多属陈济棠旧部。

在军事上九十二旅（属六十九军）危谖由苏北调来粤；二〇五师负责粤汉路韶汉段，并负责五省军训生集训。六十三军一五二师四五四团在南雄一带，市内有宪兵十六与二十六团二个团；行辕直属警卫团及特务连等二千人左右。保安司令部直属十一个总队，一个特务大队，每总队约七百人左右；市警察约二千人，各县警察总数约二万人；盐警二个团左右；海军陆战队一个团；护沙队三个总队。保安一总在市內和市桥，二——七在琼崖，八——九在东江，

十一——十一在中区西江。

省军事会议：1. 彻底执行中央的政策；2. 加紧开发经济。韦镇福表示全省已无大股土匪，南路较乱，其他都有小股。而琼崖则开始第二期进剿，决定蔡劲军集党政军于一身，全省军费百分之四十给琼崖，中央发一万枝枪与琼各县，琼各县中小学教员、中学生等都要参加剿匪工作。各行政区设立保安司令部，负责统率各地方团队进行绥靖工作，将各县成立保安大队，各乡成立保安警察，发给各县枪枝，但其精神是依靠各地地方团队力量。

英国陆军当局非常关怀广东当局的设施，他曾派员到《正报》询问：广州市何以改隶；公路修整建筑情形如何；西南会不会独立；各地民众骚动如何。英国对K较硬一点，一次捕捉青年行动派三十多人，要求设领事馆，取消K驻港支部，港方对《正报》、《华商报》认为对中英帮交采友谊态度，对香港建设提出积极的意见，他并关怀联合政府成立后广东会否成立偏安局面。

李济棠与李伯球等不同，陈属大地主封建势力，李伯球等则属民族资产阶级，陈等反中央。

托派有机刊物“青讯”空谈工人利益，说《正报》、《华商报》是空谈，说和谈谈夸了中央，分化了民盟。反对减租息要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工人改善生活，要实行对资本家斗争。

陈诚已与CC合作，政学系在广东与陈诚及CC都有矛盾，但与CC较接近（这与全国的政学系与CC矛盾不同），蒋为了敷衍美国，可能让政学系有些发展，因此在广东来说政学系也可能加强地位。

四大家族或五大家族内部有矛盾，但不可夸大这矛盾，在反民主反人民上，他们是一致的。

所谓征购的市价在去年十一月时相差不远，但一月以后可差得远了，于是买不到军粮了。

一五九旅有炮兵连的士兵拆了撞针逃走，机枪兵也逃走，不幸再被搜捕回去。

新一军欺骗湖南青年说跟他往上海训练，但广州时却逃了五、

六十人。

关于地方实力：广东统治者对地方势力采取打击态度，如翁照垣在潮汕一带有数百人，K至今把他当土匪来剿。

澄海、饶平有一姓洪的，有三中队，至今被K围剿。

林翼中依靠CC才能有今天的地位，他对旧主人是依靠的但逐渐疏远，对新主人逐渐加强。

中央以地方人士参加政府为形式来实现其中央化的政策，将某一部地方力量隔离与旧主之关系，使之加入中央系。但将来此种中央化的地方势力还是要被消灭，蒋的策略是“对地方势力一定要消灭，今天不能成功，则待诸他日”。

关于反动派对我进攻之布置：每一保安总队约六、七百人，配有炮五、六门，内一营有一重机连，兵力使用则以省保安队为主配合各县之保安大队行动，其进剿方针为招抚，但事实上并不实行。

在扩编之时，同时引起新的困难，群众不满，不愿支持这种部队。

香港厂商对K渐渐不满，不挂党旗，不挂蒋像，不实行团拜，避免庆祝什么制宪成功大会。

李汉魂决定放弃广东，力行中学庶务表示放弃该学，李可能出洋，也可能因该校变质。

市警所有军统三十多人，潮汕特务曾通过复员人员破坏地方组织，其活动已深入农村，特务的任务很简单明确，而且速战速决，完成任务后，即刻撤退。

有些地主也参加反征粮及征兵斗争，参加群众反三征的组织。

中山有些地主为自己利益都没有交粮，各乡乡长警告承办人使人不敢承办；有些民众用我名义威胁承办人不敢承办，征兵往市桥训练，用赌骗光了壮丁的钱。

潮：关于广东形势发展的特点：K因内战使广东兵力全数北调，使广东统治军事力量以地方团队为主。

K开始征粮征兵后，民众反抗便开始发展了。

K的三征政策使民众不能生活，但内战延长使三征更凶，于是民变更凶，这对我农村斗争更有利。

K在广东兵力只有削弱，难以加强，这使我可能放手大胆去展开斗争。

形势是这样发展，但仍需要经过一个培养力量的过程。

欧：K兵力虽空，但军事扫荡却加紧起来。东纵北撤后至十月，K扫荡较少，这可能摸不到我之主力，但十月以后却在各地开始军事行动。这一行动表现有下列几点：（1）不是全面来进攻，而是集中力量剿一股。（2）先扫土匪，后剿我军。（3）对平原河汉先搞。（4）多用本地团队，甚至连保安团也没有。

刘：广东自日本投降后，中央化的趋势是强化了，这对我们有利也不利。

统治者与地方封建势力更加结合，使今后我们在乡村中开展工作有了阻碍。

东纵北撤时，干部们对广东形势的估计太过悲观，但今天我们有了更好的条件，可是不可走到另一偏向——漠视困难。我们须正视自己主观力量的薄弱，马上进行稳健的准备工作，必须适应群众的落后的朴素的观点，脚踏实地，生长自己的力量。

蓝：K在六月时，只在江南地区便有十个团，后来陆续调走，九月以后只剩保八总队。

此时民众骚动很大，土匪到处活跃，K上级指示绥靖工作主要靠地方团队，不可依赖中央，在政治上办保甲等。同时对地方团队积极收编：（一）收编我复员人员——蔡祺，收编失业军人，利用其名义号召——何连方。（二）收编伪军土匪——刘发如、肥仔璋。（三）收编什牌部队——王玉如、王永春、肃天来等。这三种是以地主伪匪为主，对我复员人员不会很信任。

保八总队三大队一直属中队；惠阳二大队县警；东莞二个大队县警；宝安一个大队县警；虎门一大队；盐警二百人。

此时期军事行动较少，只个别围村有捉人，但捉后罚款放人，

上级命令如无力量不可乱捉人。

政治上主要是征兵征粮，但不及三分之一。

群众骚动渐多，我与群众围攻多祝，抢坪山谷仓，平海群众缴了督征兵的械。良平群众二百多人往莞城请愿免征，温塘打死巡官，K加以罚款结果没赔，翁山三妃一带糖寮联合抗税。

梁：关于广东问题应有几个问题作为深入明确的研究：

1. 目前的矛盾以那一个为主，我以为以CC与政学系的矛盾为主。地方势力与统治者的矛盾表现得有点投机，这反映在农村中去的时候其主要矛盾表现农村封建势力与统治者的矛盾，这就有我活动的余地。

2. 中央化到什么程度。中央化主要是特务化，他已深入到学校农村，但越下就越少效果，故此农村下层有我活动的余地。

3. 农村的爱国民主运动渐趋向高涨，但大多数为群众自发的，其前途一定与反K的武装斗争相结合，并与农村的统线对象（包括中小地主）的争取结合起来。这是由于K使用武装催征，K与中小地主有矛盾所致。

4. 今天在广东搞武装是有利的，但也要估计其调动之兵力，统计其可进攻之兵力最多是在某一地区内是千多人，这时机应具体掌握。

广东斗争之前途如何？这有两种：一、假如内战打下去，K便不能再抽兵力，只好靠地方团队，他要扩编，却发生养兵的困难（如广宁要养一队便要灶头、猪头、人头、牛头、鸡头各抽一百元）。因此，扩编便有限制，最多增加三万人，但仍是地方性质的。今天我K力量悬殊，K可能集中数千人，突击我一区，而在半年以后我能发展数倍，则K之扩编却不可能如我之快，是我之活动，大有极大余地，再加上民变发展，则K更加照顾不暇了。二、假如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实现，那么会有什么变化，我可以说此次联合政府一定不象政协会议时那样，许多条件一定会修改，广东形势当有有程度的转变，绝不会不变或者变得恶化，至少在城市我会有活动

可能。在农村又如何呢？则要看我之力量如何而定。封建力量与K结合时则我会有困难，相反，若爱国民主运动有了实际力量，则K是不可能摧毁的。K有可能调兵回来，但一定不会象过江南填空格式时那么多，但是同样的可能，我之力量也发展了，民变被我领导起来，从而推动全省的民主运动。然而，有些形势还是不能乐观，即是K在广东的统治力量仍占统治地位，特务活动会加强。

因此，我们可以坚持在广东活动，但要求得赤色割据的建立，以保证这一坚持成为可能——有主力、有政权、有群众，那么即使形势不会好转，我也有办法可以在广东坚持生存下去，直至胜利为止。

发展农村的爱国民主运动必须注意一些具体的切合群众要求的工作，如开仓救济贫民的斗争。

其次必须要照顾困难，做长期打算，应有步骤的执行我之方针。

温：今天广东局面已经走向中央化，已经开始深入，从省、市、县到乡（目前广州军官训练团派到各县去），但这中央化是否巩固呢？九月前是巩固的，九月后是削弱了——内部矛盾、与地方矛盾、与人民矛盾都发展了，应认识这两方面，否则会对中央化害怕。老K如何实行中央化呢？这主要靠军事上对我的进攻，消灭我们。其次是消灭地方势力，这个企图已部分成功，对我颇不利的。最其次是三征，以三征来维持中央统治。最其次是发展特务，并深入把农村也特务化起来。所有这些，把另一些矛盾发展了，中央与地方与人民的矛盾日渐深刻，特别是与人民的矛盾是没有办法解救的。而人民要解决切身的痛苦，捨武装自卫斗争之外，决无其他出路。故此，我们应看到这一发展前途，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东的武装自卫斗争，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所有形势都指示基本发展方向是对我有利，虽有困难，但有利是主要的，而且形势是可以转变的，我力量之发展是跟形势发展的，在一年内是我力量发展的关键，我既有力量，和平局面到来时，不可能再变成黑暗。

这个估计有无可能呢？可以！建立赤色割据不只是需要而且是可能的。故此，今天不须顾虑复员问题，北撤问题等等，而须全力

进行赤色割据！

阮：中央化在广东已四方八面在深入，这引起各阶层人民的反对。

广东局面英国政府是很重视的，英国可能在广东扶植一些势力。

地方势力虽与 K 有矛盾，但对我不一定同情，且有许多与我斗争过。

民众的觉悟渐高，生活渐苦，斗争性渐强，但我必须与群众结合，始能生存。

最初时从反三征斗争做起。

对广东问题应注意的大问题：（一）全国形势的变化。（二）农村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三）我之力量发展如何。（四）英美当局态度如何？（五）地方势力能否生存和发展问题。

刘：目前我们斗争的对象是谁？这是国民党的封建势力。这势力在广东有什么作用，是否很巩固呢？他是不能巩固的，因为他与人民利益根本矛盾的。今天广东社会力量是两头小，中间大，但在政治斗争上是两头大中间小，群众只知国共斗争尖锐，不倾向我就倾向 K，而 K 有无可能争取群众呢？没有可能的，因为 K 不能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问题。

今天的现实斗争应使我们正视困难，稳步前进。而且初期由于我干部弱，经济穷，这困难尤须注意。

K 有可能回师扫荡呢？可能的，但不会比东纵北撤时那样强。

联合政府成立有无可能复员呢？不可能！虽然联合政府实现还不能彻底解决一切问题，但一定比政协会更好一点。

关于“赤色割据”（二月十二日）

一、关于赤色割据的前途。

广东问题发展的前途有两个：一、全国成立联合政府，实现和

平民主。二、内战延长直打到老蒋垮台为止。

假如走第一个前途，则K可能回兵广东，K对我力量薄弱之地区可能加强统治。假如走第二个前途，则K难抽兵回师，但对蒋管区仍须加强统治，但是其注意力仍将集中到前线，因为形势不容他抽兵回蒋管区。因此，广东能熬得过K之回师扫荡（估计这扫荡在数月内），我们便能建立赤色割据，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掌握政策，坚持到底取得胜利。

二、如何进行建立“赤据”。

1. 要靠山地，特别是边区的地，建立基础，向平原发展。

2. 要靠群众，与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特别领导群众进行反三征斗争并从而进入较高级的斗争，减租减息。

3. 要适当领导两面政权，并须注意平原工作和农村的反蒋统一战线工作，这才能使赤据不陷于孤立。但在农村中应注意地主的阶级性，不可失了独立自主的立场；应以农民为主，不是以地主为主；斗争对象应是以蒋政权、中央化势力为主，也不是以一般中立地主为主。在平原城市中的工作应有深纵的配备，长期的精神和灵活的方式。

4. 要以梅花点的发展形式来建立“赤据”，要照顾全面，也要掌握中心。今天的中心是五岭，因为五岭是华南五省的枢纽，而且接近华中，易于配合全国的斗争。但也不放弃南路粤桂的边境，朝北却不放弃向南，向南但应照顾向北。

5. 要求得上下官兵、军民的大团结，保证工作的胜利。在原则问题上要坚持一致，枝节问题上则不必强求其同一。而在领导上特别需要虚心反省，起模范作用，要站稳领导的立场，给予下级以具体而明确的指示。过去我们撤得太多，留下干部不强，因而在领导上要特加强。

又一，还有一些意见补充一下：

1. 关于地方势力，我以为可以分成二种，一种是当权的；二

种是不当权的。前者是不可靠的；后者则较为可靠一点。但最基本的还是要强调独立自主，唯其有独立，故能利用敌人的矛盾，以孤立最凶恶的敌人。在所有矛盾之中，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矛盾，这就〔是〕最基本的农村的阶级矛盾，这个矛盾会因城市的工商业崩溃而加深，故此应注〔意〕反三征，减租息等斗争。而在另一方面，K会利用这种矛盾，以地方势力来对付地方势力。

2. 关于赤据问题在将来会可能碰到困难：（1）K军回师扫荡；（2）群众从而产生和平幻想。

但也有有利条件：（1）全国联合政府成立，群众更加觉悟，更不容许K再肆反动。（2）过去是撤退弱的小的来巩固大的强的，后来胜利了则可以抽调大的强的，援助弱的小的。（3）在半控制区内，阶级斗争还要发展，并受我影响，要求土地。（4）有中心也有分散；有山地也有平原；有农村也有城市；以这复杂的方式构成斗争的全景。

欧：对“赤据”的理解：

赤据的坚持和发展主要是群众，它不是靠集中些干部，调齐点大兵便可以解决，我们从研究“民利公司”的情况便可得到许多教训：（1）在地形来说，该地有桑树、河沟、禾田，地处边区；（2）其分子构成是农民，完全是本地农民，当地是不分贫富都喜欢当兵的，因为兵贼不分，因此其分布非常之广，而各区各有皇帝；（3）他们的做法是不抢本地，抢本地者衰仔，有多少的劫富济贫的作风，对士兵偏护、宝贵；（4）重视武装，遇有任何挫折也不放弃武装，对我或K都不信任，死也不肯收编，提高警惕，战术上是游击战术；（5）官兵与土匪不分，官不重视他，不彻底剿他，事实上官的作恶不下于他们；（6）基本上支持K的统治，但另有其自私目的，对我则有基本矛盾。

“赤据”是一种战略据点的坚持，故此，非至最后胜利不能撤退，但过去我们对此理解不够。

温：关于赤据的思想问题。

从日本投降后我们的领导机关没有赤据的思想，过去一向无赤据的思想教育，故此东纵撤退时前后都弄得不好。广东今天的方针应从赤据做起，以赤据解决广东的一切问题，不论任何前途，我们都赤据，因而我们必须建立这一思想。但是今天广东的赤据不是能全面做到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之，不论任何形式，不论任何困难，我都要坚持赤据。广东今天的条件是具备的，要就在今天动手建立起来，否则困难便会增加，今天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个。1. 要有主力，从群众中建立主力；2. 要有群众——群众要有赤据的思想。

今天工作的关键是大胆放手动员群众，群众的问题是生与死的问题，解决生与死的关键是赤据能否成功问题。具体工作是反三征，解决粮食；帮助春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和地主、商人建立反三征的统线，可以尽量扩大这一统线的成份，使之成为广泛的坚强的反蒋反独裁的伟大斗争。

今天的进程是从小搞到大搞，其步骤是：①思想准备；②群众工作准备；③山地地区准备；④主力准备；⑤政权的准备。

关于县城市内的青年工作，没有知识分子工作配合农村斗争，是不能胜利的，故此必须在城市内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

关于地方×工作，地方×必须是隐蔽的巩固的党，必要时须划出一部分地方不做武装活动。

关于休息隐蔽的地区，没有这种地区是不能坚持和巩固的。

关于领导问题，必须要求区党委解决毛泽东的领导上诸问题……

△：建立赤色割据的思想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北撤时，我们没有做坚持工作的打算。

△：所谓赤据就是建立民主根据地问题。今天K的经济崩溃，政治无威信，军事惨败是空前的，这有利于我们建立根据地，赤色割据是解决广东问题的关键。同时我们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自己救自己的力量。

在巩固赤据上我补充一个是：增加生产；在发展上补充一个：可以利用游击小组的方式；在干部教育上是加强群众路线的思想。

李：K经济崩溃使工作非常有利。

这是一个思想问题，必须解决干部的思想，才能有所收获。

与群众结合在今天便是要解决粮荒问题，可以用开仓借谷等办法。

建立农村的反蒋统一战线，向地主用和平商洽方式来解决群众的困难。

关于“谈判”问题

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有利于坚持的便可以谈判，但不是取消自己的谈判。

以后的谈判会走政协路线，但内容有些改变并加以充实，在广东则以保持独立自主的力量为主，这决定于几个条件：

1. 中央的全国和平民主方针如何？
2. 广东实际力量强弱如何？
3. K的力量和策略问题如何？

今天用什么名义可能影响今后谈判问题，但目前不应强调谈判问题。今天小搞不适宜用公开党的名义，避免过分打击，但大搞时一定需要名义，不过基本关节是在于力量大小，名义用什么是次要的（当然有其便利之处）。在老K来说承认我之合法与否是基于其本身利害所决定的，即是承认有利时则承认，不利时则不承认。

经过自卫斗争胜利之后，我们来谈判是有强大基础的，完全不同于政协时间，政协是迫他让步的，将来是迫他屈服。照目前来看，谈判在将来是有此可能的，但可能性不大，在K企图谈判时可能利用间隙先消灭我之力量。

林：赤据的思想，在过去省委的十年工作中，基本上是缺乏这种思想的，在部分同志中偶然有时有这思想，但不能起领导作用，

例如东纵、韩纵和琼崖，都有这种表现，他们曾有坚持的思想，但不是战略坚持。

区党委对撤退、复员、隐蔽、停止联系、土匪形式、党军脱离等决定是有倾向的、是消极的。又如对福建指示一如广东之方针。

后来，中央有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区党委个别同志有点强调大搞，这也是有偏向的。

但自己在领导上却有这些偏向，即是只有零碎的个别的思想，还未能把这些思想形成战略的有系统的思想。

把这赤据思想带到广东来的是方方同志，但这是作为教育问题而提出的，是抽象的。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有了更充实的内容，变成一个方针、行动的实际问题，这是从群众中来的，经过大家讨论研究而来的。

一、关于广东形势大致上都已讨论过了，但我想指出一个明确的趋势。

广东人民反独裁的斗争已经开始和向农村开展，这就是广东形势的最重要特点，这特点的形成是反动派自己造出来的，这个人民反独裁的运动带有如下的特点：（一）包括的阶层相当广泛；（二）一开始就带有非法性质、武装的、尖锐的斗争；（三）是没有党的领导的，自发的；（四）是个别的断续的，散漫无组织的。

根据这些特点，这运动是可以发展的，是完全有条件走向创立赤据的，但这运动还只是开始，因而还须下大的努力，切实与群众结合，加强对这自发斗争的领导，我们才能引导群众走向赤据。

二、赤据应作为一个前途来看，广东的前途除了这个便没有其他的前途，不走这个前途便是右倾，要马上走到这前途却又是过左过急甚至空谈。

全国有二个前途，打一下就和以及一直打下去。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可幻想K不会抽兵回来，或抽了些败兵回来，且也不要肯定他一定不会回来，干部的思想要突破这一点，赤据才能坚持。但用什么方法来坚持呢？

只有一个保证——毛泽东思想，走人民路线！

故此我完全同意同志们的意见，赤据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今天的问题是主观努力问题，要主观努力，必须使干部思想打通。

三、所谓波浪式的发展，主要是从实际上来认识运动发展规律，看到高潮时便大胆放手，看到低潮时，便收缩起来。要看到基本形势，大高小低时不要悲观，大低小高时不可盲动。

四、建立人民的政权，解放人民，统级和武装，是建立赤据的基本条件。这里所谓统线是指策略的统线对象，武工队不可纯军事观点来搞，要有群众工作干部，统线干部，政治干部，军事干部和组织干部构成。

五、大胆与小心，基本方针是长期的，今天偏重于数省的边区的建立，在平原城市是应小心而秘密的，为了长期，我们不能不小心。所谓小心，是事前经过调查考虑，合乎实际的分析，决定后便大胆去做。

六、检讨问题，要根据整个原则和原有的形势下是否应该那样做，检讨区党委的领导应从这两方面来出发，我以为区党委在过去的领导是基本上正确的，但有些地方则有偏向，这偏向是原则上的错误，但仍不是整个的错误。

温：现在我也来反省一下：（一）自己对这一思想只有萌芽，还未形成系统，在上级不同意之下，根本没有提出来。

（二）区党委对我们工作的指示过份死板不灵活，而精神上有点右的偏向。

（三）在这一期间使工作有损失，这应由我自己负责起来。

对广东形势的认识，林同志的指出是很重要的。但我认识这一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只是开始，因而我们对这一形势的掌握，须更加注意自己的努力，赤色割据的提出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根据民众求生存、求和平、求民主的要求而来的，这虽是毛泽东思想的启示，但这启示一定要与群众具体情况相结合，不然便会落空，这点需要被强调的。

梁：关于赤据思想的反省：

当时我只朴素的理解，是否可以坚持呢？没有武装，斗争能够胜利吗？以撤退为主？还是坚持为主？当时虽有坚持思想和决定一些坚持办法，但仍不是一种赤据思想的。原因：（一）立场站不稳；（二）消极的思想；（三）对决议的盲从。

欧：我以为九月以前区党委是偏向多于正确，而在九月以后才是正确多于偏向，例如对坚持部队的指示的决定。

所长：在敌人投降以前，中央曾有指示把主力放到五岭，但区党委并不坚决放主力下去，而且还中途停下来，怕刺激余汉谋，及至投降后，大家才急起来，然后派人北上五岭。以此事实来看，把这一战略行动都忽视了，确实是原则的错误，不能看作是小问题的错误。这是一种左的错误，不正确估计敌我力量；怕刺激余汉谋则是右的错误。区党委又曾指示过武装斗争在广东是尾声，而且又把老蒋当作是“新的中间派”，对老K有着许多幻想，打算公开什么干部做代表等等。中央对东纵北撤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我们在执行时却有偏向，中央叫广东北撤，不是叫广东取消革命武装，我以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一部分北撤，一部分要实际准备坚持，或者东纵以撤退为主，其他地区以坚持为主，不可笼统统统解决问题，把东江局部现象当作全广东的现象，而且只看到当时的现象，不看到将来内战打下去广东兵力要被吸引北去，我便有坚持的条件，不知道着重于坚持一面，建立赤色割据，却统统把自己的力量瓦解起来。故此，我同意欧同志的意见，认为九月以前的领导是偏向多于正确的（假如区党委不承认这一点，对下级是不服的，我不是搞武装的，也是不服的），我们再看区党委对不联系、隐蔽、土匪形式、不发展、大量复员等的决定，可以证明它是错误重于正确的。

林：区党委对北撤问题是有两面的，北撤与坚持，不过坚持一面不够明确，故此布置工作上有更严重的错误。

欧：区党委在九月以前对武装工作的领导是错误为主的，以后

则纠正过来，恢复活动、联系、坚持为主了。

北撤问题与整个武装斗争问题是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又例如活动形式问题，区党委提出政治土匪的形式，但我以为根本没有这个形式存在的。

林：区党委错误的纠正是在中央指示之后才纠正过来的。

刘：我想在对政治问题的了解上来反映一些意见：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区党委曾指示过要坚持，且要坚持一、二年，于是我们便准备坚持。两月以后区党委（林平从重庆回来）则很强调广东撤退后形势一定很严重，故决定红的干部必须撤退，班级以上干部可退则退，我以为在前后两个指示中有相反的精神，但两方面的精神却没有说得透彻和明确，故此我们有点模糊。而我自己反省起来，对老蒋并无幻想，但以为华北我之力量及国际民主力量已经很强大，对美国的态度的态度却不了解，对其对K援助估计不足，以为美国会压K下去。

其次对撤退问题，我以为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政协还未推翻，撤退是可以的，但以为东纵是可以的，珠纵则可以坚持下去，直至K承认为止也不是可以吗？

其次，对区党委的领导，我以为它对北撤或坚持没有一致的意见，也没有整个的意见，如何坚持，如何撤退都没有明确指示。直至最后东纵北撤后，才稍稍提出坚持，但已不能使下级了解了。

我以为今后区党委应在指示上取得一致和明确，别使下级手足无措。同时对大的问题我以为应召集一些主要干部来深入讨论，虚心听取下级意见的反映，不可三言两语，讲完就走，否则，下级弄错误，则是工作上的损失。而在下级方面，对上级指示不明白时则应大家讨论，讨论不决时应向上级反映，请求再指示明白，这是为了对群众负责，为了工作上的胜利。

其次是隐蔽只是一个战术问题，不是一个方针问题，打不过敌人唯有走为上着，隐蔽起来。

林：领导问题要弄清楚，否则我们便不能将上面的意见成为×

的意见，只能是私人的意见，只能将这些意见反映给上级，请他们详细考虑研究得出结论，然后来解答我们。

家长：广东党的领导缺乏思想的领导，过去省委长期忽视武工，都无人发现，这是由于广东×的经验少，水平低。过去区党委只有个人负责而缺乏集体领导，有了问题而不得解决，这是广东×在领导上有着历史上的机构的不健全所致，但基本上是思想领导的忽视，民主精神的萎缩，以后应该多反映意见，督促上级去解决应解决的问题。

阮：在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区党委曾有这样的决定，选出各部门专门人才，提出施政纲领，进行竞选。在军事上又希望成立一师，或各地区的若干队团等。而在当时重庆较场口事件爆发，而我们则解释为这是反动派力量薄弱所作的最后挣扎之表现，在北撤问题上大家很渴望焦急。

小林与林平对北撤意见不同，据一些同志的反映，小林要留，故主张坚持，林平要走，故主北撤。

梁：但我所知的，小林对北撤觉得可惜，以为将来广东问题要解决，但没有武装如何坚持解决呢？北上的人坐飞机回来么？

阮：北上或坚持应相联解决，两者都为了工作，但北上的太多，留下的少而弱，又如何坚持呢？

在坚持问题上原则是决定了，但没有实际的具体办法，却足以使坚持成为空谈。所谓坚持，坚持什么其目的是如何？当时一点也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说留下一些人坚持来保护干部，或者说留下来准备第二次撤退，等待琼崖一齐撤退。

梁：坚持的干部比如放一百出去，留下二、三十人便是成绩了，林平这样说法是有问题的。

众：不联系等于放弃组织，叫人去自由发展，听其自流。

阮：我要问：采取这一方针究竟为的是什么？得到什么？这是一个思想问题。

众：区党委这个决定是没有反映下层意见，没有从群众中来，

如何会正确呢？

所长：区党委内既有不同的意见，而他们却没有提高到原则的高度去解决。

家长：我们可以总结这里的意见在三日内交上去，请求解答后给大家回去。

其次我们应根据这个精神，大家在工作上反省自己。

区党委这一领导是基本的错误还是有某些步骤的部分的错误呢？

其次是对政治形势的估计。

一、以北撤为主还是以坚持为主——武装领导的政策。

二、东纵北撤是否正确？

所长：我以为东江以撤为主，六月大打以前以撤为主。其他地区以坚持为主，六月大打以后应以坚持为主。

祁：一、坚持广东武装工作是主要的，战略的，撤退部分力量是次要的，策略的。没有坚持，北撤也不可能保存干部。

二、东纵北撤是正确的，争取全国和平、广东和平、保存干部，长期打算都有很大意义，也是群众要求的。

三、区党委在精神有顾及两方面，但在事实上没有在坚持上得到成绩，事实上也没有坚持的整个战略思想。

△：一、北撤是正确的。

二、北撤后对坚持并没有思想上的准备，认为全国好转，广东自然好转。

三、在事实上也没有有效的办法使我们坚持下去，并决定许多办法事实上加速自己瓦解。

总结得几个问题，须反映给区党委的：

众：一、没有战略思想，没有赤色割据的思想。

二、多半可以坚持，但没有坚持。

三、坚持的地区，但办法恰恰使我们不能坚持。

四、东纵北撤是正确的。

五、东纵北撤后对复员人员的处置是不适当的，这是没有坚持

思想的反映。

家：赤据有几种：

一、我占有的一些山地、乡村、圩场、小市镇，建立政权，成为完整的一个根据地。

二、我只有山地、乡村，却没有圩场、市镇、城市，也无交通线，只能有两面政权，这种情形是赤据发展初期要经过的过程。即是由小点到小面，然而由小面到大点再到大面。针对这种情形，K可能集兵轮流分区扫荡，因此我们不必心急，不必急于占领城市，以免被困于城市被迫作战遭受损失，同时使我忽视乡村、边界地区的巩固工作，待自己力量生长好以后，有力食城市时才可吞下去。

其次群众工作问题，群众一方面害怕我，一方面又爱护我。其实，怕我是怕我没力量，不能保护他们，击退K的进攻和摧残。故此，解决我们的主力问题是建立赤据的一个关键，没有主力部队，就难以粉碎K之进攻。有无可能建立主力呢？有的，首先要在思想上注意这个问题。其次要加强士兵的质素和数量，以加强的干部配备，我们经常注意把三分之一力量建立成为主力队，有了主力，又能和群众结合，群众自然信任我们，不会害怕我们。

林：关于打正规军，我以为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不怕他有时不一定打得过，必须有主力，但有主力也不定打得夸K之正规军。然则靠什么？靠正确的军事路线，有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的领导。我以为：（一）突然袭击；（二）集中优势兵力；（三）马上解决迅速分散。可是我不是军事的人，这三点也不能全部说明毛泽东的军事领导。

刘：三角洲初时没有党，没有健全组织，因此部队许久都搞不好。后来有了组织并采用正确的战术，于是有了小小胜利，养成胜利作风，而队伍和枪枝扩大了。今天我们正是处于劣势，尤须采用这种做法，侦察清楚，集中火力，必胜则打。部队组织要灵活，能大能小，同时不可乱攻坚，但要准备炸药。

阮：各地作战特点：东江用地雷有成绩；珠江作战英勇；东江

打伏击，珠江打袭击。今天来说打夜袭较伏击为宜，打正规军，特别要发扬英勇精神，伏击不可希望全数斩获、训练士气，要从小战斗做起，一定胜利；伏击要选择良好地形，使敌无所遁形，一有不利，必须主动撤退。

兰：根据所做的事实反映：

（一）北撤前：1. 十月左右（填空格）时候，在路东司令部开会（曾主持）：精神将路西情况搬到路东，故决定精简。2. 将基干大队变为不脱生产（夸了、大家回家）。麻溪、平山、龙江、青溪（余下三十人）、（有人提议再抽队北江，不去）。3. 撤退人来香港（《正报》，民运，地党红人），以后对路东是打，但不如路西填空格，而用奔袭。其次没有估计地形与西不同，群众条件不同。4. 在军事上分两派：①黄二主张指司令，司令部曾去大朋，必要时，放下枪下英海；②蓝、叶峰、罗伟如主张：司、指主力北上，推上紫金。问林、又问中央，同意北上，但结〔果〕无上（那时交通还可以行得通），司、黄二搬到新界，尤其是黄二长在香港，对队散，士气低很大影响，何志升又在香港，认为区党委应叫他们返去。

（二）一九四六年一月，较和缓些，东路无填空格，大朋整个区控制，司部搬返半岛，黄二亦返。那时曾说：“广东武斗是尾声，和平民主局面开始实现”，可蓝等“右倾”、“将所有干部都撤到香港”，又发出“反右倾”文件。蓝不舒服、撤退干部是司部参加，指部撤退，骂则骂他们。

干部讨论，大家承认，但责任是领导上负责。年三十晚决定，又提保卫大朋半岛（一主大一主中），许多干部返去，但年初之即为K搅了，司令部又搬返新界又来指示：“反右倾需要，但不可过分强调”。蓝说：提出保卫大朋口号是不对的，应北上。年初四，黄二提出打仗问题：“打得过便打，打不过不打”、“K驻不打”。蓝等反对“K驻不打意见”，解黄说这是一月十三决定，但干部（尤其军干）主张打得过便打，有人提出一月十三日前不打，以及占的

便打，后来干部问过多，黄二与罗伟如说这是区×委决定。

（三）第八小组来后（林去重庆），此时区党指示少提斗争，多是准备北撤，又有准备公开的人，合法斗争指示。

此时干部以下等问题解决。

此时不注巩固队，不打、不扩大。

此时队同兵情绪低落。

小队长反映：北撤爽快些，不撤坚持爽快些，不可再骗“三”或“二”个月，说领导上是骗他。

上面解释说“今天坚持是等待广州之解决”，曾到广州后来指示，说迅速集中，准备北撤，将路西队认下北撤三十人，其他复员。复员人不同意不愿走，哭，强迫复员。后来又来指示强调坚持，又要扩大，但亦准备北撤，也要精干分散。

此示未达路西已复员了，路东蓝反对复员，但不是为了坚持，而是为了警戒。

（四）临北撤时，讨论几个问题：1. 北撤应该（蓝叶认为坚持为主），叶峰提，北撤为什么，如撤得空，我们返来时，群众是人的群众，我们工作便难展。蓝同意此意见，提出某些干部留，但林来信是干部都要撤退，小队长以上，乡长以上要撤，红的支书记。2. 武装问题争论：用江湖奇侠式活动，留下的人，不敢用队名留落（不是这样做），余清队留落是为了搞经济。

区党委决定：不联系（二、三年不定），取消党生活，光组织，不过政治生活，不开会，不上课。

对武器留下：将好枪带走，“说是不可为因小失大”，当时取多子弹、弹筒都不得。

对复员人员：大家反对复员不联系，蓝提出地党建三重（其中一部是复员的人）；结果江南复员人许多做土匪（十分之七），影响政治威信，下面了解是搅乱K后方，搅乱治安。

蓝说：认为困难是事实，但领导上有错，如正确是可以坚持，主要是士气问题，可是无根本政策。

认为六月以后对和平已无大希望，六月后应坚持为主，不论什么时候——对坚持应同样重视，东江是困难，但不是不可坚持。

路西部分：何晁一九四六年一月，两个不足大队，一机连，一两地大队，约四百人。K 逐步推进，指挥部精神，坚持，但无具体指示，支队长出香港（为了处理伤病兵），黄二也在香港。

有了北撤之后，区指认为是尾声，以后不会也不应有斗争，区委补充指示，说基本精神是对的，区委指示，准备复员，北上人员决定指示（大家骚动、干部苦闷）。

此时全无坚持、不打仗，而收公粮加紧（一队夸二十余人，失机枪二）。

三月指示，实行复员，路西带过路东，又指示不可复员，说不复员，要扩大（路西接两指示一星期，一队接到后三日），但精神毫无坚持之意。留下的人不满意而自己故意搞暴露，一队政委、一区党委。全省基本上应坚持为主，东江可以撤退（但撤退××），东纵北撤是正确，无坚持，北撤变无意义。

香港部分：

（一）1. 制纲领；2. 准备公开干部；3. 设办事处；4. 对军分三级，编师、地方团队，△△△。认为对形势太乐观。

（二）两个指示：1. 两指示对国内太好——后来又看到较场口事件，新华指社论有说，反动派六月还有内战，故提出：对今后困难不重视，轻淡，小刘说这是说明民主胜利，反动挣扎，不是表示其加强力量（林同志对此无意见）。第二次，对国内困难估计仍不够（那时还讨论纲领）。

2. 对广东形势，北退时候估计今后太困难，说明北退之重要。

3. 对复员问题，一切从复员（中区布置）为了北撤，工作受损失不顾，小严、小刘反映毫无坚持意见。

4. 北撤传达——匆促。

5. 香港干部，认为对地党干部应加强，认为复员人一定要联系。

九连部分：

听到此全队骚然、一部〔分〕干部想北撤，一部〔分〕不想撤，后来不能即撤，故分散活动，等候命令，精干复了部分人，小组到了先决定留一百人，后减低六十人，其理由：为撤而撤的精神布置。

对武器：

无好短枪，要求留弹筒则解说，将来如被人夺了，则给K说我不北撤，组织工作委员会——地方干部留一下。

对工作指示：（一个月）绝对掩蔽，步枪要埋下来，劫富救贫等方式，分散或掩山头。

结果，四月后集中起来统计，曾动摇想逃百分之二十，消极怠工百分之二十四。

对敌无斗争，该队可以坚持的地区无大问题，复员人哭、留下的话：抗战八年流血汗，胜利之后要复员。

对北撤与坚持，对时间无甚关系，主要了解当时情况与政策，撤退对全国和平是正确，坏处全无。干部应调批训练，东江不北撤可以坚持，不一定要北撤，东江非北撤亦可以，如今天这样搞，不北撤好过北撤。

广东区党委扩大会议 对广东党过去工作的检查记录

(1947年2月)①

黄：一个感想，我自己的错误在忽视非法斗争，搞好社会地位以便竞选，以为国内和平出现，在广东也全尽搞群众工作和竞选就够了，这由于个人幼稚，也由于区党委精神之影响。

文：在政治部工作期间，对东纵的领导，觉得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很差。如对国内政治情况、政策等等听到的很少；初时我以为此系属于秘密性的东西，一般干部不必知道，后来读了整风文件之后方才晓得。如果对于干部不是从思想上、政策上去教育，就无法工作，但其时因为领导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工作上都是交一件做一件，因此使到自己政治上开展很少，进步很慢。由此我便知道过去党的领导不注重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这是很大的缺点。

对于过〔去〕区党委的政治领导，由于自己脑筋未打开，所以只知服从，因此未曾起过怀疑，到现在事过之后，检讨起来然后知道。

对于过去的武装斗争，我以为最大毛病是没有一个固定政策，时而乐观，时而悲观，大至可以信心不够。如湘桂撤退后，提出一年内打开广东新局面的口号，就没有采取具体布置，因此使到干部不晓得如何做；前年开会时，曾生同志提出这一点，林同志答复认为有，大会没有召开讨论，但后来，却证明并没有什么进行。我个人认为此口号是对的，但实际布置，我以为是没有具体而合乎实际

①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的布置，中央当时提出开展五岭山脉，但我们没有做，所以我想区党委对总方针没有决定。

就东纵本身来说，也是存在严重的保守观点，如敌人占领增、博之后，部队渡江北，但没有很好开展。例如当时王、杨同志所带领的部队只一大队的实力，后来很迟刘培支队才开到，实际上当时敌人兵力十分空虚，K又退走，大有开展余地，然而，上级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肯派出大部队开去；当时增、龙、博山地本来大可以做山地根据地，然而那时因兵力不足，受K的强大力量的反击，无法成功。由此可知，如果我们不是采取保守观点，而当时能开进大部队去，我想在增、龙、博三县交界地的据点是可以建立的。

中央指示建立五岭根据地之后，但当时领导机关对此的执行不重视、拖延，是不正确的。中央指示之后，一直到敌人投降后，然后出发，假设我部队走快两日，就可以与王震部队会师，那时王部队是否必要北撤呢？当然实际上的迟缓不是两日，而是一两月时间，从这一点看来，我以为也是保守观点，同时对未来困难也没有深刻与充分的估计所造成。

政协之后：

粤北领导同志对时局估计，可说由于干部斗争经验不足，所以产生幻想。停战协定以后，杨同志曾召开过一次会议，讨论时局。当时认为：和平民主已实现，一党独裁大门已冲突〔破〕，斗争策略转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次，就今天来说，此估计自然错误，如果我们深刻了解中华的特点；深刻了解《论联合政府》的分析，那么是不会犯此错误。

其次关于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次这问题，当时会议上就着重讨论城市工作布置问题，而忽略农村工作布置问题，会议之后，我觉得：

(1) 停战协定恰巧公布，立即得出如此结论是否过早？

(2) 对部队干部布置城市工作，则置部队于何地？

由政治估计错误出发，因此，部队工作陷于松懈，部队政治工

作完全停顿，直至我离开之前都是如此，干部闲散，无所事事，当时所盼望的只是关心全国的军队如何解决问题，整军方案公布则保持秘密，暂不公布，等候指示。

撤退之后的情形，我就不（十）分清楚。

到港后，还没有听过上级政治指示，实际情形也不很清楚，只听说是强调艰苦。关于广东的形势，领机完全没有调查研究，每次会议，都是国际国内一大套，对于广东形势则非常基本的略为提及一下，没有作深入严密的分析，因此就没有决定具体的斗争策略。根据《正报》几个人的研究，我们认为从去年十月份起K在广东的统治，已开始发生动摇，由此可知，东纵可以坚持。当K军集中力量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尚可以坚持；则当他陆续调兵北上之后，当然更可坚持而且发展。由此便可以知道，我们对于广东形势的了解十分不够，没有调查研究，在领导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对个别同志领导问题：

对林——很少接近，只有一印象，就是令人望而生畏。

对曾——也很少接近，但从一般中级干部中所得材料，则似较好，这由于他对干部较关心的缘故。

对王——则在东纵干部一致的看法都认为是官僚军阀主义，享乐观点较强，如北上到翁源时，部队特别艰苦，那时他的脾气最盛，造成干部极度不满，尤其是参谋处。后来始兴北上，参谋处人员全部因病请假，要求掩蔽，不肯跟他走。其次影响及〔大〕的则为刘培及△△，大家都什么也不管，完全不理。关于享乐观点，如北上时期，他表现得很刻苦，但他的太太何英，到南雄时因病须离开，后来被捕，但一般干部听了，却反而高兴，认为他走时带了许多没收来的衣物，被捕系由此所累，活该。

对于他的军事领导，过去不清楚，但在江北时期则表现出对情况全不了解，或左或右，一时冲动，一时畏缩。如进攻麻乍时就是如此，K军尚未集中，只放出谣言，他就退却不敢进攻；又当敌人放出空气要扫荡时，他也仓皇失措，带着部队兜圈子，因此，引起

干部很不满，这是畏缩的一面；又，还有冲动的一面，如在麻乍、永清时，刘培等部已经到达，本来力量较大，决定进攻上面二地，但决定行动之前，听到敌人增兵，本来应集中力量打其一点，但他却分兵同时打二据点，致陷于失败。以后几次都是如此，都因冲动分兵的结果所招致的失败。

总而言之，他的表现也是主观主义，不慎密了解情况的错误作风。

对杨——他相当得干部拥戴，他的优点是肯学习、对干部和蔼可亲，肯注意在思想上解决问题，这是他的优点。至于弱点则表现在对干部政策上是对好的干部多接近，坏的不好的干部少接近，因此许多干部认为他喜欢能讲能写的干部，这一点他也知道，但认为不对。依我的意思则认为他对表现不好的干部少接近，这实在是他的一个缺点。

殷丹：广东党粤北省委时对武工非常忽视，东江武装建立后才开始重视，也有相当成绩，但也有相当大的缺点。是党务工作薄弱，有军事决定一切的情况；政治工作也薄弱，不注意思想上、政治上教育动员，产生军阀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军政干部不团结，军事部门和政治部门也不团结，党务负责同志的权力和威信都差。这时候，党的领导机关对全广东的工作不能全面顾及，工作布置草率从事，因此产生地方党和军队间的配合很差，这说明不能顾及全面工作，正是眼光短小只看到东江一隅之地的领导弱点。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不够，如整风运动在广东党就没有做出什么，在部队也是如此。每一个大事件到来时，没有展开思想上的大动员，如开辟山岳根据地问题，连中级干部也没有透彻打通思想，下面更加不了解。对广东的复杂情况不深入了解，故决定具体方针，如条件如何如何，根据地在哪里建立，城市工作如何做等等，都不能解决。当时依靠农村，以农村为主的思想也是不明确的，例如除了部队地区外，其他边区山地没有好好注意。

根据地问题：区党委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地观念，但不明确、

不彻底。在扩大会议时对“打开广东新局面”口号没有指出，敌降后，对北上问题有些同志认为要把计划改变，如派兵多少等。部队北上后对如何建立根据地问题就没有实际做，而且也没有提到了。

政治估计问题：政协之后，粤北部队精神集中于转入城市为主，农村、根据地、长期打算等也有提过，但部队中干部的情绪已不作坚持准备，当时提出“政治斗争”为主，“公开合法”为主，太过轻率，但大家思想上实在产生偏向。自我回港后，区党委指示（政协前后），对美之认识不足，认为它还是帮助中国和平民主的，政协召开后，认为民主之开端，确定了民主前途，这一点，不但对K蒋认识不足，对美也认识不足，肯定地说和平民主必然到来，武装斗争成为尾声，今后不会也不应有武装斗争，这是错误了，特别是“不应存在”这一点。由于政治乐观，故工作着眼点放在公开工作、干部等准备，这个做法保留了相当长的时期。这种乐观实际上又是对广东局面（特别是武装前途）的悲观估计，把希望寄托于全国的和平，在补充指示中认为上次指示“基本上正确”，故虽强调武装问题，但没有纠正上次之基本错误之点，故对武装斗争方面没有实际布置。由此，党员同志对美蒋幻想极大。事体变化，现在又使同志惶惑。七月大打以后，广东党提出长期打算，强调困难，这一个弱点之根源也就和一贯悲观底子，如组织形式之转变，宁右勿左的口号，及四个任务的提出。就四个任务本身说，如果离开了对整个政治局势前途、广东武装斗争、农村工作来了解那就错误了，变成消极隐蔽。实际工作上，群众工作上有了损害。另〔一〕方面，个别做法是左的，但又没有真正纠正，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正确的做到隐蔽。而区党委没有认真检查和具体布置组织工作，以至目前组织工作还是相当混乱，这现象如在北撤初期自不可免，但以后拖了半年还不上轨道，就是损失。

领导作风：党内民主精神不够，没有切实接触下层干部和听取干部意见，了解情况，收集材料，虚心、精细作风不够，相当严重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

政治估计问题：初时认为内战至多是短时的，因为美国支持中国的和平民主了，政协开会，更认为如此。以后发生怀疑，在工作有毛病，与区党委之指示有关系，认为基本上中国政治进入新的时期，K之反动不过是垂死挣扎，因而在文化工作上不作掩蔽打算，连许崇清的“新建设”也采取攻势，集体行动，以至一网打尽，干部撤退。

根源对美了解不够，对始终要消灭老蒋一关把握不稳，《新华日报》也有此错误。而下级干部理论修养不够，而领导上如能加强思想领导，则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有可补救的。

领导问题：只有一件交一件，不能使干部灵活地了解周围情况，定出自己的工作方针。如统线工作，对各中间派的倾向矛盾的实际情况，我之政策如何，没有明确指示，故工作者只能事务主义的做法，不能在独立工作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方向，而且整个工作的配合上也做得不好了。如统线工作，定出要争取什么人、什么派，不能只是接近就了，而是要和实际斗争配合。如K限制入口，对香港商人影响甚大，要统他们，便有宣传上配合，故领导上，一不是根据具体的分析给予干部以上工作方向，发挥其创造能力。

了解情况：过去对广东情况了解太原则化，区党委对广东之调查研究太不够了，对情况模糊，则掌握政策及运用策略就有错误，工作方针就不致摇摆不定。

陈：过去政治领导上有乐观估计，自己了解是受抗战时期右倾路线种下了根源，在广东党本身已有其历史上相当深固的根源。敌人投降后，党内下层对广东斗争已失去坚持信心，表示慌张，精神上没有寄托在依靠农村，依靠群众的思想，等到蒋、毛谈判后，把希望寄托于“和平”幻想之中，故对中央指示完全从主观片面去理解，因而歪曲了中央指示精神。当实际上碰到困难后纠正了一些，但基本上的幻想错误依然存在，因此过后又转到完全强调困难。这是区党委估计错误的根源，而一贯来下级对上级单纯服从，上级没有注意思想上、政治上启发下级，下级干部亦没有研究时局的风气。

关于武装斗争：现在依靠农村，结合人民，突破弱点，建立“割据”，这是确定的了。对过去检讨，应该：（一）区党委对农村武装斗争是否需要？（二）可能不可能？这必须联系北撤问题，希望深入检讨。至于提出武装斗争“不应有”的论点，就是对中华特点了解不透彻。武装斗争将来如何？一方面要看全国，一方面要看本身条件。

组织领导：广东党民主生活少，领导者官僚、军阀主义作风，未深刻领悟毛同志作风。

谭：关于今天开展武装斗争，到将来是否还要撤退的问题，我以为是不必考虑的，因为撤退与不撤退是看形势而决定。如果认为将来要撤退，今天就不做，那是思想上不正确的，因为今天需要，我们便要去，将来力量发展得大，那当然就不撤退。

关于民主精神问题，我以为很重要，区党委扩大会议时，大家已经提出，改变亦已开始，到今天经过学习小组提出之后，实在已逐渐在改变，但此系思想改造问题，每个人应负责。民主是党很需要的，如果民主精神提得高，则党的工作将有大成就。过去在许多工作上，的确有许多是命令式的，没有使下级从思想上彻底了解，这样去做工作，必然不会有好成绩，做错了，也只去遮遮掩掩，不敢报告，只图应付。

林、曾二同志喜欢骂人，使许多同志不敢说话，因此有一时期许多干部都和曾同志脱节，不敢和他说话，保持沉默。以我而论，曾有一时期，因为他是当地人，又是部队的创造者，所以我到后和他接近的较多，致引起许多怀疑，后来我和他清算后，才较好一点。

谢：对于领导的检讨是我抗战后所经历的第一次，但仍系由下面推动产生，而不是由上发动，此系一弱点。这个原因我想是由于区党委过去少倾听下级意见以致没收得反映的结果，但此种精神也很好，不过不能单纯检讨区党委，应各级进行。

对于领导，因我和区党委接近较少，不能获得许多材料，现只

就几个问题提出来谈谈。

(1) 武装斗争问题——由大张时代起，极不重视，直至一九四零年，才开始注意；派遣些少干部到沦陷区去，但仍不很重视。譬如过去中区有些暴露干部，不撤退到沦陷区而撤到大后方，这就是证明。至于根据地观念，在此次决定以前也不重视，如三角洲，东江扩大起来之后，还没有注意到开辟其他可以坚持长期斗争的根据地。因此，许多大后方干部大部集中在三角洲及东江两地，没有派到山岳地带去，这就〔是〕缺乏根据地观念的证明。

(2) 时局估计问题——去年初共发出三次指示。第一次太乐观，这各同志已说过，但当时我们自己也没有发现，这个原因第一由于我们对广东了解不够；第二，我们的理论水平差；第三，干部盲从，我自己就如此。第二次补充指示时，开始感觉有点不对，但只是怀疑，却没有展开讨论。还有一个指示说，城市局面，快则半月，迟则两个月就可以冲破，由这个指示的影响，曾在一地举行反苏游行时，我们策动抵制，但后来检讨，则觉得仍是过火，第三次指示则相反，几个问题都提及，尤其是部队内的党组织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取消部队党，则今后坚持将成问题。又说到干部撤退问题，我们当时也怀疑，故有些干部未撤，暴露的调到别地去。其次则为单线联系问题，基本上我认为正确，因为部队撤退，恐怖力量增大，必须如此做，然而，在精神上却是消极的。

此次指示对工作的影响：干部无信心，队员星散，对自己前途悲观，经常谈论的只是今后的职业和生活问题。

(3) 领导作风问题——区党委对地方党不关心，很少有正式文件交到，连同志到中区时，也很少对我们有指示，这是整个区党委应负责的。连同志一年来被小严俘虏了去，故中区武装斗争在政策上所犯的错误，小严须负主要责任，但全体干部及连同志也要负责。

又如中区地方党的单线联系问题，连同志的指示和过去的传达也不同，究竟如何到现在还不彻底。

到香港后，除了两次正式传达之外，连同志也没有很好帮助，可说只有一般的领导，没有具体布置。又如有些问题的解决，拖泥带水，不明确，如最近一个华侨的事情就是例子。

冯叔：此次学习小组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思想斗争问题，领导上不具体，有缺点，使干部执行遇到困难，结果引起不满，所以发生斗争，但斗争要执行正确，出发点要纯洁。

撤退是正确的，但区党委的了解如何，我们知道得不清楚，但我的观察认为，区党委对广东的武装斗争之坚持及根据地观念是不够的。

今天发动起来，将来要不要撤退？我同意谭、陈同志意见。

对于领导问题，不只下面干部不满，就是区党委本身也不健全，如前年开扩大会议时，就表现如此情形。

个别同志：林平——既是主要人，则应全面照顾，但他对组织方面，显〔然〕比不上对军事的注意，因此造成一般干部也不重视组织，许多干部怕他。

杨康华——我认为也有官僚，如“演戏事件”。

老板：此次检讨是很好的，但这是一种斗争，斗争得好，工作固有进步，但如果斗争得不好，则可能发生毛病。因此，我们不能容许干部藉此要挟，破坏纪律。

对于区党委的领导作风，虽然由学习小组的反映所引起，但是普遍的现象，故希望……。

对广东区党委 一年来领导工作的检查记录

(1947年春)

对区党委的批评综合

(一) 批评区党委对形势的估计

一、“区党委的估计是不能把握和平民主的趋势与内战独裁的趋势互相斗争的全面条件，是誇大片面，对和平民主过份估计，对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则估计不足。杨康华同志在粤北的政治报告中曾说：“中国的和平民主已经开始实现，独裁政治从此一去不复返”。区党委在一个指示上写：“今后广东的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已经成为尾声，今后中国（广东？）不会有，也不应有武装斗争”，这个指示后来虽有修正，但仍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北撤后对广东形势估计仍然是不能把握有利和困难的全面条件，仍然是誇大片面，忽视有利条件，没有看见群众斗争高潮前途，而是强调困难，指出广东斗争形势已入低潮，可能三几年恶劣（这是四七年二月十六日十四个干部同区党委意见者的意见）。

二、区党委第一次指示中有“粉碎华南法西斯堡垒”，未估计到广州反动力量还强大，怎能粉碎？第二次指示已纠正说有过去估计有过份乐观（家长）。

三、“北撤前对广东形势估计过份乐观，撤后对广东形势估计过份悲观”（良加）。

四、“区党委指示广东形势转入低潮”（美南）。

五、“区党委第一次指示对形势估计乐观，第二次指示已修正，但无彻底了解上次指示的错误”（大欧）。

六、在国内环境复杂变化中站不稳，政治上不够坚强，发生偏向——乐观或悲观，政协后乐观，毛赴渝谈判时开始乐观，政协时顶点，中央指示助长我们乐观，实在是自己不会分析。第一次指示精神强调好转直线，非曲折（小林）。

七、对全国估计过份乐观，对广东估计过份悲观，对K蒋估计不足。北撤后，强调广东K统治黑暗，斗争长期残酷，准备三五年埋头苦干，无着重估计K日趋困难。

忽视中央指示万一和平被破坏时如何应付（蒲特）。

八、对K本质了解有幻想，强调和平民主，对中央指示只是从字面上了解，基本精神上有些了解，不是具体细心研究，联系实际情况去决定。当时确着重和平，对广东撤退冲昏头脑，以为实现和平民主（连）。

九、“政协后，认为全国完全和平，广东迟早也和平，强调和平，捱过这时争取和平，转入政治斗争，没有强调坚持武装斗争”（林平）。

只看到一般国际国内情形，强调今天必走上和平，一切工作偏于和平政治斗争，万一不和平，就没有准备了，中央指示两个原则结合认识不够，偏于和谈。

对K阶级性，从无产阶级立场认识不够，对美蒋认识不够，强调广东特殊困难，产生强调和平。区党委双十协定后即幻想和平，是无根据的，到政协后才产生和平，对和平幻想，整个区党委决议充满这样精神，对坚持，如何坚持？坚持到何时不决定。

同意大家所说在大转变中把握不住，对中央指示不深入研究，很易走入偏向（林平）。

十、对蒋幻想，杨康华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今后以政治为主，军事为次，布置城市工作，忽视坚持农村斗争。

区党委对广东形势了解很不够，常是国际国内一大套，广东寥

寥无几句，对广东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就是明显主观和教条了（文俞）。

十一、区党委指示对美认识不足，以为帮助中国民主，以为政协后没有武装斗争，也不应有武装斗争。对全国乐观，实际上对广东悲观，把希望寄托全国和平上面，不敢正视广东现实。北撤后，广东提出长期打算，强调困难，这一悲观观点仍是一贯的（陈）。

十二、对美蒋反动认识不足，对调查研究工作注意不够（加人）。

十三、对国民党在广东力量估计过高，对坚持无信心，精神上不是依靠群众，依靠山地，而将出路寄托和平上面。林平同志说过，要快点和平，否则不知要死多少人，对中央指示主观片面了解（加人）。

1. “过高估计广东特殊，长期黑暗，停止游击战”（杜）。

2. 补充指示，不彻底修正，是面子主义，怕失威信（连）。

3. 强调全国好广东困难，对中央两个指示中说万一分裂，如何应对，没有去研究，不研究要坚持斗争才得和平，向干部与人士解释蒋会改变，对K本质无认识，反而认为可合作，太天真，我当时对美确相信（林平）。

（二）要不要北撤？北撤对不对？

一、北撤是服从全国民主和平，为了保存、训练干部，避免损失是对的。但北撤不与保存根据地和坚持武装斗争相结合，则犯错误，变成撤退过多，留下过少，影响坚持困难（美南研究组织）。

二、许多干部认为“东纵北撤为主，全省范围坚持为主；有些认为一部份撤退到山地，各地分别情况处理；有两位同志意见，认为东纵都不用撤。有些下级干部认为如能及早冲到紫金还可坚持”。

“军队干部和地方党干部都撤得太空”（良加报告意见）。

三、政协到K二中全会期间，东江撤是对的，但后来形势改

变，仍强调撤退，没坚持，是不对的（家长）。

四、“撤退是对的，但撤不了复员，复不了坚持，组织上可以联系，主要干部撤退，但每一领机要留一人，武装斗争到联合政府民主实现，方认为还不够，应坚持到以我为主”。

“全广东坚持为主，东江以撤为主，当时如此可能，对工作布置不同”（小林）。

五、“整个精神放在北撤”（连贯）。

六、“如能更好把山地根据地建立起来，东纵可不撤”。

当时“经济困难，战斗力减弱，兵力减员，在此情况下撤退有利，坚持下去，损失必重”。

“根据双十协定，江南撤退，广东一定了，广东我军不强大（万五）比不上华中，华中都撤，广东更要撤了。撤退换取和平，我党合法，因此我对广东毫无犹疑，非常坚决”。

“东纵的撤退，确是强调了一面的困难”（林平）。

“凡红的公开的干部都撤，不是可撤均撤，我强调暴露干部北上受训，再回来”（林平）。

七、“区党委没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去布置是事实，一般化的处理。当时实际上是执行东江为主撤退，各地坚持的，“南路可以坚持就不必撤退”（林说）、（大欧）。

八、“多数地方因统一领导而暴露，而不得不撤退，这些人撤了，但留下什么？怎样坚持？撤退是大损失。第二次又撤又是大损失”（小林）。

“北撤照林平做法是右倾取消路线”（小林）。

九、“撤退问题应研究毛泽东同志这句话：“不撤也要撤。”

在当时情况，我无可能在南方搞，这包括意思，是有可能就搞，拳头好？巴掌好？如项英执行中央路线，与华南配合，局面又不同了，何必撤？

武装斗争问题，当时认为K区不能进行（方方）。

十、“东纵应撤，撤中有弱点，有错，偏重撤退，强调困难，

没把坚持工作周密考虑，有严重弱点，坚持目的没解决，留什么人没解决”（林平）。

十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平〔项〕英来传达区党委意见，不能坚持不如解散，或交一个连给×山中心县委领导，引起领机大不满，决定不执行把部队分散，向新据点发展，亦没有复员”（魏）。

十二、“全省坚持为主，东江撤退为主，这一点我尚未成熟”。

在当时情况，北撤是对的，一切为了北撤也是对的，整个长江以南是要撤”。

“当时中心任务是北撤，应完成之，北撤是为了保存干部，照顾东北，将来回来，但在各方面是毛病，是不可免的，只要大的对，小的错多少是不要紧，强调北撤，又强调坚持是没有这样的思想方法论”。

北撤后强调形势困难是对的，去年七月至十月的攻势就应付过去了。今天已保存了干部，没失去农村，所以不是损失而是胜利，各方面批评可接受，但总方面还是对的”（方方）。

“区党委第一次指示中心应是打，然后以城市配合，后来指示应以安全撤退为重心（全省的干部的保存）照顾到坚持，撤后应强调困难，保存干部，掩蔽在扫荡中的稳定，又要照顾到胜利条件下的放手大搞”。

“没有安全撤退征象时，要坚持，在撤退有安全时要撤退，能坚持，才能撤，不能坚持也不能撤，可以撤时以撤为主”（方方）。

十三、“我认为保存力量而北撤是对的，过份北撤就不对”（陈）。

十四、“东纵北撤为保存力量将来可用，以退为进是正确的，但过份‘拔钉’就不对，以后撤退与否？力量大就不撤”（谭）。

十五、“北撤过多，留下干部太少，今日要搞好游击战争，就觉得本钱不够了”（文俞）。

十六、“北撤是对的，但当时区党委的認識上就有问题，强调

政治斗争，强调撤退，忽视坚持”（冯叔）。

“我们工作落在形势后面，原因北撤太过，北撤不适当”。

十七、东纵北撤为主，六月大打以前以撤为主，其他地区以坚持为主，六月大打以后应以坚持为主（△△）。

十八、坚持广东武装工作是主要的，战略的；撤退部份力量是次要的，策略的，没有坚持，北撤也不可能保存干部。

东纵北撤是正确的，争取全国和平，广东和平，保存干部，长期打算，都有很大意义，也是群众要求（祈）。

十九、不撤也得撤，撤为了更长期的坚持，坚持在配备上、领导上有弱点，没布置好干部、好武器，先研究坚持干部，后决定撤退的干部（方方）。

“如果从服从全国和平民主的政策方针，从积极积蓄力量训练干部这方面来说，北撤是正确的；如果不同时重视保存原来基础，不同时重视必要和可能坚持的武装斗争，而只是孤立来处理北撤，就要犯原则错误，区党委的做法，就是如此。

全省应坚持为主，东江应以北撤为主，留下的也应以靠省境边境山岳地带为主”（十余干部集体意见者）。

（三）对坚持的批评

一、“当时一切工作都侧重复员北撤，如南路、潮汕、闽西南都强调复员，进行得很彻底。区党委指示武装活动停止二、三年，停止党领导，用政治土匪形式，事实上搞不通，使部队垮，干部坏，这些办法是不能坚持的，有困难的，由此证明忽视坚持”（美南研究组意见）。

“对坚持者教育不够，发生埋怨不满，没信心，悲观失望，留下力量不够。如依当时区党委的指示去做，则前途很成问题，下级很多不依指示，不做土匪，仍用党领导”（美南研究组意见）。

二、武装干部过量北撤，和发生强迫复员现象，现在留下各地坚持武装斗争的队伍，并不是完全是由于坚持武装斗争方针而留

下，而是一部份因为不能北撤或来不及北撤，以及不能复员而被迫坚持的”（十四干部意见者）。

三、“留下是很勉强的，留下做什么也没有说明”（良加意见）。

四、“对坚持没研究创造根据地，只是保存干部与力量，没讲发展”。

复员未作长期打算，不从将来要用打算，只安置其食宿（蒲特）。

五、林着重北撤，保存干部是对的，但留下何人，都没有具体意见，没去帮助干部如何坚持（连）。

六、“政协后，没有强调坚持斗争”。

“当时认为武装斗争不过是暂时的，掩蔽几个月后再看，因为K必进攻，待进攻后，变成各种形式的武装，将来党要用到时再加改造”。

“对坚持，如何坚持？坚持到何时没决定”。

“坚持的干部配备如何也没有商定”（林平）。

七、“坚持斗争无明确目的，根据地思想模糊”，自己反省（小林）。

八、下级干部坚持是被动的，非自觉的（建华）。

九、“干部逃避坚持武装斗争，不突围东进出港”。

没认真执行与强调中央指示自卫战与和平攻势两原则的结合（社）。

十、“五岭部队实际上无坚持精神”（文俞）。

十一、北上太多，留下的少而弱，又如何坚持呢？坚持原则是决定了，但没有实际的具体办法。坚持什么？其目的如何？一点也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说留下一些人坚持下来，保护干部，或说留下来准备第二次北撤，等待琼崖一齐撤退（阮）。

十二、坚持的干部，比如放一百出去，收回二、三十便是成绩了，林平这样说法有问题（良加）。

十三、事实上没有坚持的战略思想（折）。

十四、事实上也没有有效的办法使我们坚持下去，并决定许多办法，事实上加速自己的瓦解（△）。

十五、“不用东纵原来各队名义、党名义，大家都同意，没有党领导，没有联系是不对的”（方方）。

十六、“留下坚持为了什么？区党委本身还没解决”，十一月后才了解，坚持到八路军南下，坚持到民主政府实现（以我为主的）（林平）。

十七、“停止党生活是不对的”（林平）。

十八、“北撤时强调困难是必要的，但过份，取消军队中、群众中的党的作用是不对的，损失即在此方面，北撤后的布置是小错，不是象有些人说的是基本错误”（美南）。

十九、撤不只是广东问题，整个来说是撤为主，一贯没有放弃坚持，现在形势又变，又要坚持（林平）。

二十、能坚持才能撤，不能坚持也不能撤，能够撤时，以撤为主（方）。

二十一、从力量对比，从保存干部，从将来远看，中原、东江、琼可能撤，争取撤。撤是为了长期的坚持，没有什么矛盾，城市的撤与坚持，我们经过太多了（汉年）。

二十二、撤退或坚持，区党委意见都不一致（向东）。

二十三、广州和谈中，多头领导，混乱状态，事务主义，日下数令，无一贯方针（杜连）。

二十四、复员是自由散失，大部失了联络（连）。

有无赤色割据思想问题

（1）“我认为不能说区党委没有根据地思想，但可说不明确、不彻底”（殷）。

（2）以前不重视根据地问题，如东纵、珠纵，没有注意开展可

以长期坚持的山地，根据地许多干部集中，东、珠纵，不愿配备到山地去（谢）。

（3）赤据是一种战略据点的坚持，故此，非到最后胜利不能撤退，但过去我们对此理解不够（欧）。

（4）从日本投降后，我们的领导机关没有赤据思想，过去一向无赤据的思想教育（温）。

（5）建立赤色割据的思想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北撤时，我们没有做到坚持工作的打算（△）。

（6）赤据思想，在过去省委的十年工作中，基本上是缺乏这种思想，在部分同志中有这思想，但不能起领导作用。例如东纵、韩纵和琼纵虽有坚持思想，但不是战略坚持的思想，把赤据思想带来广东的是方方同志，但初时只是作为教育问题而提出的。

赤据应作为一个前途来看，广东前途，除此外无他途（林）。

（7）没有战略的赤色割据思想（众）。

（8）赤据有几种：

一、我占有的一些山地、乡村、圩场、小市镇，建立政权，成为完整的一个根据地。

二、我只有山地乡村，却没有城市圩场、市镇，也无交通线，只能有两面政权，这里情形是赤据发展期要经过的过程，即是由小点到小面、然后由小面到大点，再到大面，针对这种情形，可能集中轮流分区扫荡，因此我们不必急于占领城市，以免被困城市，被迫作战遭受损失。同时使我忽视乡村边界地区的巩固工作，待自己力量生长好以后，有力食城市时才可吞下去（家长）。

（9）日投降及政协会议后，我无根据地思想了，到十一月才解决（林平）。

（10）一九四四年八月已提出建立山地根据地，号召打开广东新局面（杜、林）。

（11）虽有建立根据地思想，但不够，在敌后游击战是被迫的，非主动的，西江陷后，各地不重视发展（蒲）。

(12)林赴渝后，有讨论坚持建立根据地问题，但没配备，没决定任务（连）。

(13)为什么区党委决议建立山地根据地一年不实现，我以为仍是没有赤色割据思想。已想到没有做到，也不能说是对（美南）。

(14)内战到抗战，能建立强大武装，只有这一时期有大成绩，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有根据地思想，不能因运用不够，失时机，而说没有这思想，没有失去大时机（大欧）。

(15)区党委成立以来，还没有在“赤色割据”的政策思想上确立根据地的政策方针。

对革命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认识不足，忽视倚〔依〕靠边境、山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东、西、南、北、潮等地领机没有这种思想和布置。

所长对广东临时 省委以来广东党领导工作的意见书

（1947年3月8日）

家长转区党委及方同志：

对于林同志所作关于临委以来的领导工作的初步总结的报告，和方同志的补充，我有同意部分，亦有不同意部分。我们这次敢于检讨上级的领导，和上级亦能勇于承认自己在领导方针问题上的某些弱点和错误，这象征着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开始在广东走向成熟的道路。对广东今后工作的展开将起重大的影响，如方同志所说的一样，我们已由组织上的团结进到原则方针的团结，这是很有意义的。

对方、林两同志的报告和补充的认识，我已在会议上提出了意

见，不一定正确，但给大家深入研究这个初步总结，并使之完全正确，而对今后工作起指导作用，所以不管对不对，我也就大胆说了。

会后，我把自己提出的意见更思考一下，认为某些方面仍须更明确些，因此，我就通通地把它书面写出来，给你们参考。

（一）根据林同志的报告看来，从临委起至东纵北撤止，这一长时期整个上级领导机关还没有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关于广东革命胜利应走的道路，必须是以我为主的赤色农村割据，包围反革命城市和最后占领城市解决敌人的思想。林同志有以我为主的和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这是非常好的，值得广东全党同志发扬的，特别和向来是投降主义倾向领导的前省委对比的情况下。然而不可否认的，林同志的这个革命思想，仍带着片面性质，尚不是完整的，因而还不够明确。具体的说，就是最多只有着这个完整的革命思想的第一部分，尚缺乏这个完整的革命思想的第二部分，更谈不到这两个部分，经过里应外合互相的关联与统一起来。因此，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或在一个革命阶段中的不同时期，林同志的思想发展不时的变化，或者是向前发展了一步；或者是这个发展向着相反的方面走，我想这不是偶然的。

在广州沦陷至敌人救死攻势前这一时期，照林同志的说法，这时期他有以我为主思想，有在前线敌后坚持思想，却没有解决广东问题思想。这就是说，没有占领城市，解决敌人思想，反过来，它就不得不影响到以我为主的这个“主”的程度上来，同样也不得不影响到坚持的程度上来，那是显然的，虽然林同志还没有明确的指出这点。

在敌人救死攻势至敌人投降前这一时期，照林同志的说法，这时期他已有解决广东问题的思想，但由于他还没有懂得把农村割据与占领城市这个完整革命思想的两个部分，在里应外合这点上联系和统一起来，这样的来解决敌人和广东问题。因而，这时期的所谓有解决广东问题思想，显然的，只是由于当时广东全面沦陷，K力

走空等情况所引起的一种简单概念而已，这样无怪乎这时一方面产生对里应外合重要一部分的城市工作不重视，另一方面也必然产生较为容易解决广东问题的倾向。

在敌人投降后至东纵北撤这一时期，照林同志的说法，认为根据地的建立，只到和平民主实现的时期止。因此，在敌人投降以后，特别是在政协前后，就不得不产生对根据地思想的动摇，而有置坚持问题予不顾的错误。

这就是林同志的革命指导思想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临委以来的党的革命指导思想的发展过程。

为什么有这样的过程？原因是在于把中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问题和革命的各个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用到广东的实际上来时，没有完全正确认识所致。

因此，总结过去关于领导工作所得的教训，在今天，如何开始建立广东革命胜利应走的道路，必须是以我为主的赤色农村割据，包围反革命城市和最后占领城市解决敌人的思想道路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广东在没有反攻或占领城市时，农村的割据，仍有其重要性，就在这个时期，在任何强大敌人的进攻下，而认为不能坚持或不应坚持下去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只要主观不犯错误的话。同样在这个时期，任何和谈的成功，而认为农村割据，农村武装的不须坚持的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只有在最后占领城市解决敌人时，农村割据的重要性才成过去。这样，就显然的，农村割据的发展，必然是也不得不是走向占领城市，最后解决敌人，这就是割据的界线，割据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前途。

（二）如何在广东实现这个明确而完整的革命思想，这就不得不干涉到广东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及针对着这些具体情况，所采取的斗争策略问题。临委以后的上级，以林同志为首，如上面所说的，只有这个完整的革命思想的第一部分，而缺乏第二部分，但当检讨过去领导工作时并不妨碍以这个明确而完整的革命思想为依

据。因为它本身也是从广东过去的错误经验教训的总结而得来的，这样才能使每个时期的斗争策略的检讨总结。获得正确，并将之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提高到成为指导思想的高度，这就是说，要把关于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的总结与基本的整个革命指导思想的总结结合起来，用前者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去充实后者的总结，用后者的总结去指导前者的总结。

其次，检讨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仍须依据两个原则：第一是广东各时期的现实及可能发展；第二是全国各时期的情况和可能发展。我们主要是从广东各个时期的现实出发，但又不忽视全国情况的配合，同样也不忽视广东和全国的可能发展的估计的配合。如果只从广东各个时期的现实出发，或再加上全国各个时期的情况，而忽视其他，这样的检讨是比较容易接近真理，如林同志所说的一样，但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它是以事论事的观点，而缺乏远见；相反的，如果只从已发展了的方面出发，而忽视当时的现实，这种的检讨，如某些同志所作的一样，就会有要求过高，而会使被检讨的同志难以心悦诚服，因为它是事后聪明的观点，而脱离实际。这样把两种检讨态度的偏向结合起来而以前者为主是必要的，我非常同意方同志关于这方面的意见。

把基本的整个革命指导思想与各时期的斗争策略结合起来，把从现实出发与可能发展的估计结合起来，再把前者与后者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这次检讨应有的原则和态度。

根据这样检讨的原则和态度，我也提出临委以来各个时期关于领导工作方面的意见，作为我关于此次林、方同志的报告和补充问题的了解。

一、一九四四年四——一九四五年四——五〔月〕（大概的）的时期，这时期情况的特点：（1）敌人的救死攻势，席卷了整个华中、华南的蒋管区；（2）以罗斯福和史迪威为首的扶共抗敌弃蒋政策；（3）蒋的腐败无能的极端暴露，和被敌赶到贵州的山上；（4）二王及其他主力和大批重要干部的南下；（5）广东敌后游击武装广

泛的展开；（6）盟军的准备登陆反攻；（7）华北和东北是大陆决战的战场。

依据这些主客观的情况和条件，我们有较为迅速解决广东、占领广州及其他大城市的可能。因此，在这时期的红色割据的重心，应该放在沿海和广州外围的平原，一方面准备迎接盟军登陆反攻；另一方面在这时期到来时，一鼓而占领广州，解决广东革命问题。如果在这时期把红色割据的重心放在山地，就与这时期的情况不相符合，就要铸成大错。因此，这时期中央指示及临委的指导是正确的。

这时期临委的弱点（只是弱点而已），只在于没有这样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赤色农村割据，包围反革命城市和最后占领城市而解决敌人的思想，而只有这个完整的思想的一部分。这样和这时期的情况及斗争策略相结合起来的，只有这个完整思想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分，因此就产生对这个完整思想的一部分的贯彻性不够，和里应的大城市工作的不重视，而有较为容易占领广州大城市的倾向。

二、一九四五年四——五〔月〕以后至敌人投降的时期，这时期情况的特点：（1）以杜鲁门和赫尔利为首对华政策的转变，由扶共抗敌弃蒋政策转到扶蒋反共抗敌的政策；（2）敌人在黔桂路和湘桂路已作某些的撤退，用以发动和平阴谋的攻势；（3）苏军已进迫柏林外围，欧战迅将解决，远东盟军反攻也为期不远；（4）在美帝扶蒋反共政策之下，蒋暂时得到稳定和力量的某些加强；（5）二王南下还未到达广东。

根据这些主客观情况和条件，使前期我们认为有比较迅即解决广东、占领大城市解决广东革命的可能，不得不发生了变化。因此，在这时期红色割据的重心，就有由沿海及广州外围平原转移到山地上来，而以前者为次，后者为主。这样一方面仍可准备迎接盟军登陆反攻，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一方面（主要的）在不利自己的情况下作必要的退守，和将来待机进攻，占领城市解决问题。如果在这时期把红色割据的重心仍是“一本通书看到老”的作法，将之

原封不动地放在沿海及广州外围的平原，就要铸成大错，因此，这时期中央关于主力靠近五岭山地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区党委没有根据情况变化而改变作法，和对中央这时期的指示执行不够及时和不够彻底是错误的。

这时期区党委之所以错误，在于没有这样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赤色农村的割据，包围反革命城市和最后占领城市解决敌人的思想，而只有这个完整思想的一部分，就是这一部分也不能和这时期的情况及斗争策略正确的相结合起来，或结合得不够所致。

三、敌人投降以后至K二中全会的时期。

这时期情况的特点：（1）全国和平局面；（2）广东的内战局面，和K用十八个师进攻我们；（3）我们的力量损失将半，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仍在平原地区——东江；（4）二王主力返上。

从当时的现有条件（即全国和平，广东的内战）出发估计，广东有实现和平的可能，但必须经过一个时期艰苦的斗争过程。

因此，这时期应该以农村的武装斗争为主（但不是不要其他斗争）去取得广东的和平，而不是以城市的和平工作为主（但份量不妨加重些），而减轻农村的武装斗争。我同意方同志这方面的意见，认为区党委这时期将领导重心又放错了。

同样的，这时期为着配合中央的和平攻势，与广东革命的现在和将来的需要，就应该在这个最基本的赤色农村根据地包围反革命城市和最后占领城市解决敌人的革命思想的基础上，配合着当时的具体（全国和广东的）情况和条件，正确的去处理武装北撤和武装割据的坚持问题，那么就应该以北撤为主，坚持为次。如果只要北撤，不要坚持，那么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就等于取消割据、包围反革命城市和最后占领城市解决敌人的革命思想。这样就不得不造成将来对敌决战北撤干部返回时，陷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不能解决广东革命问题；另一方面在主观上就不得不形成对革命对象蒋介石有错误认为——新的中间派的幻想。因此，在这时期区党委无原则的不要

坚持的北撤这种主观上的想法，和对革命对象蒋介石等在思想上不正确的解决所起幻想的倾向，我认为也是错误的。

四、K二中全会至北撤时期。

这时期情况的特点：（1）政协等决议被K开始推翻，关外的局部打法有向关内全面大打的可能；（2）K为着要对付华北和东北主要战场，兵力不敷，已开始逐步从广东战场抽调兵力；（3）K对我广东武装的不承认和内战的继续；（4）我大部分山地武装已较为站稳，可以坚持下去，但部分的仍大有困难——东江的。

因此，这时期全国局势已开始发生变动，广东形势也开始发生某些变动（K开始抽兵走，我某些山地武装反扫荡胜利），这变动有随时间的增加而向前发展的可能。这样在最基本的赤色农村割据、包围反革命城市和最后占领城市解决敌人的革命思想的基础上，配合着这时期情况的某些变动的不同，而有关于不同前一时期处理武装北撤与武装坚持的问题，又有其必要，照我的意见，把两者放在同等地位来加以处理。如果完全照旧的一套不加变动的来处置是不对的，因为它是新情况的旧观点。至于这时期留下一部分武装并不是因为有明确的坚持割据的思想，而是被迫留下的（人家不答应全部北撤之故），正如林同志的报告指出，他在敌人投降以后，认为根据地建立的界线，只到和平民主实现的时期为止，因而在政协前后，对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已发生动摇，就是从当时我们武装的数目字，只有×××人这么多，而北撤干部占二千四人，这一点上也证明这个根据地思想已发生实际的变动，所以，这时期区党委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只要北撤，不要坚持的精神，这也是不对的；相反的，如某些同志这时期只看到自己地区可以坚持，而根本反对北撤的观点也是不对的。因为它忽视了其他部分的不能坚持和对广东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与及最后占领城市解决敌人的思想缺乏正确的认识，而犯着近视毛病。

（三）从上面的检讨看来，对临委以来的领导，我简单的概括起来的意见是：

一、在基本的革命指导思想方面：

(1)从临委建立后到敌人投降前的这一时期，只有这一完整的革命指导思想的第一部分，还缺乏第二部分，因此有其基本上对的地方，亦有其不够之处。

(2)在敌人投降后至东纵北撤的这一时期，就连只有这一完整的革命指导思想的第一部分——建立根据地思想的部分都起了极大的动摇和取消倾向，这是原则错误。

二、在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问题：

具体执行这个基本的革命指导思想时的斗争策略问题。

(1)在一九四四年四——一九四五年四至五月这个时期，将割据重心放在沿海和广州外围平原是对的。

(2)在一九四五年五——敌人投降前这一时期，对割据的重心，应放在山地，特别是五岭山地。区党委开始对此不注意，以后得中央指示，又执行得不够及时和彻底。

(3)敌人投降至东纵北撤这一时期。

由于对革命对象蒋介石等在思想上不正确解决而引起的幻想，因而产生对政治问题估计的错误；由于误认根据地的建立只到和平民主实现的时期止，因而产生对割据思想的动摇，对坚持问题的不要。所以就不能根据这时期的具体情况正确的从坚持中去解决北撤问题，从北撤中去解决坚持问题；相反的，区党委只要北撤，不要坚持。因此，这不得不是取消割据的北撤。推而言之，也不得不是将来进行决战时无法占领城市最后解决敌人的北撤；与有坚持的北撤，有割据的北撤，是有原则的区别。我认为区党委在这问题上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是错误的。

(四)我的要求：

为着正确的总结临委以来的领导工作，得出经验，教训广东全党；为着使广东全党上下同志，今后由组织上的团结走向原则问题

上的团结，因此，就应该从政治上、思想上来检讨和总结过去的领导工作，而不应该从个别具体问题解决本身来检讨和总结过去的领导工作。这样我就提出下面问题：

一、临委以来的领导，是否符合广东革命的战略原则规定，和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原则，所必须走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和最后占领城市，解决敌人？

二、临委以来的领导，是否符合广东革命应走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和最后占领城市解决敌人的道路，并在这个革命道路上，因各个革命策略阶段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如抗日的第三阶段，一方面（主要的）把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反动统治集团的代表蒋介石等当作策略同盟军来看待，对他采用斗争联合的政策（策略）；另一方面，又没有忘记他们是中国革命对象，在时机到来时，对他们采用的割头政策（战略）。又如，在革命的第四阶段，一方面（主要的）已把他们直接当作革命对象来解决（战略）；另一方面，在割头时机未到前，对他们仍采用斗争联合政策（策略）。

三、临委以来的领导，是否符合在各个不同的革命策略阶段过程中，各时期的具体斗争策略？

四、临委以来的领导，是否已在思想上解决蒋介石是革命对象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样，敬致
布礼

所长 一九四七. 三. 八

加强主观努力， 迎接群众斗争上涨的形势

(1947年3月15日《正报》社论)

自东纵北撤后，民主阵营方面人士对于广东形势发展的估计，一般来说都是悲观的；纵然他们对于全国范围的人民斗争的前途充满乐观，但是对于广东人民斗争的前途仍然免不了悲观。因此，他们就会认为必须等到全国范围人民斗争胜利了，才有可能在广东逐渐恢复阵地，才有可能慢慢的取得广东人民的斗争的胜利。对时局估计的悲观，无疑的是错误了；因而对实践工作的等待，就更加错误。

这个错误是由于对广东实际情况不了解，或了解得不够，或没有从变动的观点去了解。如果不了解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是十足的军事特务的统治，那就不会了解为什么当他们的军队抽空之后，就没有任何别的方法来稳定他们的血腥统治。这还不够，如果不了解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是企图走向完全“中央化”亦即四大家族的独占统治，因而它不但与广东的人民大众为敌，而且同时与广东地方的中间势力甚至于地方的反动势力，也产生了实际利益上的冲突，矛盾重重，因而它的统治就没有也不能够有稳固的底层做基础这个特点，那么我们就不会了解为什么当他们的的主要统治工具——军队——抽空之后，他们的统治就没有别的方法来稳定，而且动摇得那么迅速。这还不够，如果不了解或不看重广东人民在抗战八年来有过英勇的独立自主的斗争，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和团结，人民军队的先锋作用，民主政权的示范作用，人民军队曾经活动在全省过半数的县份，播下了种子，留下了传统这个因素，那么我们就不能了解为

什么东纵北撤之后，人民还是不会被征服，而且很迅速地重新起来奋斗，并有其广阔无边的道路和光明胜利的前途。对于上述这些特点如果不了解、不看重，那么对于广东形势的估计必定是悲观的，对广东斗争的实践必定是消极的等待的。这是必然产生的逻辑的结果。

在第二十一期本报的社论以及其他论文中，我们曾指出过广东现势的若干特点。我们认为去年一年以东纵北撤为转移的形势，是民主运动从上涨到低落和潜伏的形势，又是广东国民党统治从表面稳定很迅速的走到动摇的形势。这是说：人民力量是弱了，但反人民力量也弱了。有甚么不同呢？很大的不同。人民力量是不竭的泉源，是革命的动力，是新生的事物，一定要重新上涨，一定要增长胜利。反人民力量是垂死的力量，只会衰退，不会滋长。现在国民党的“中央”是继续执行全面大打的政策，“中央化”的广东国民党当局就不能不执行全面支持内战的政策，因而随着国民党“中央”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的到来和深化，广东国民党当局也陷入危机，已经削弱了的统治力量就继续削弱，这个情势在全面内战没有结束前不会变化。人民方面则反是，国民党统治者更加反动，更加压迫，更加吸血，人民的灾难更深更大，则人民的反抗就更广更剧，人民的力量一定要上涨、发展壮大。

时间转入一九四七年，这个情况表现得很明朗了。在岁尾年初的时候，广东的反动统治者已意识到他们的危机而大叹“命苦”，只好依恋于已经消逝的“夏秋之间”，对当前的危机只能表示“聊尽人事”的绝望。在城市，经济危机的深化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工厂关门，商号倒闭，失业失学，打单盗窃，自杀路毙……交织成一幅悲惨的图画。在农村，三征政策和苛捐重税交煎，人为因素提早和深化了春荒威胁，于是抗捐抗征，抗割烟苗，抗提赋谷，截抢粮船，打开粮仓等等也接连发生了，好多地方都因而爆发了武装斗争。不管这些斗争是有正确领导的，或者没有正确领导；不管它是有组织、有觉悟的行动，或者是偶发的暂时的行动；不管它是广大

人民的自发斗争，或者被豪绅地主所把持，这虽必然有其结果上和发展上的不同，但这些都是反内战、反独裁的自救求生斗争，都是群众性的正义行动，就可无疑问。从这里获得的结论是：广东群众斗争上涨的时期已迫到我们的面前来了。

广东人民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重新走向上涨了，这个上涨在农村要比城市来得早些。因为城市集中，农村分散；城市的反动统治力量相对的强，农村的反动统治力量相对的弱；城市的反动统治机构比较的完整，农村比较不完整；“中央化”、“特务化”在城市比较深入故统治办法可以落到底层，在农村则遇到矛盾的反拨到不了基层；再加上农村人民斗争传统比较深刻，在城市比较上不深刻。以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去影响推动农村斗争，由日见发展的农村斗争配合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将是广东人民斗争发展的一个规律，现在已开始为事实所证明了。农村的群众斗争虽然有许多形式，但必然要发展为武装斗争这个最主要的形式。现在不但有琼崖纵队在海南岛胜利的坚持武装斗争，有各地人民武装开展着武装斗争！而且有各地人民自发的进行武装斗争，这就是事实的证明。这种武装斗争，反动统治者说它是“造反”，是“叛乱”；但这是他们迫出来的。最近台湾人民的暴动，有那一个敢否认它不是国民党迫成的呢？不是连彭学沛也承认这是统治者“与民争利”（其实何止这一点）所迫成的吗？不是连彭学沛也不敢把抗争说做“非法”，把镇压说做“合法”吗？这不单台湾人民为然，全国人民也是如此。因而，现在是人民武装必须发展，民主堡垒必须创造，人民的自发斗争必须把它引导到自觉斗争的程度，这不是什么人的主观愿望，不是什么人的野心阴谋，而是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这是人民的利益问题，是人民的生死问题——这是占第一位的问题；又何况它又系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以配合解放区的爱国自卫战争，促成全国和平民主事业问题。

以上是从横的方面看，我们再从纵的发展看。

去年冬天，广东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开始动摇了，差不多同时

广东人民的斗争也已经开始了。当时已经有了足够的客观条件，但是人民觉悟和主观努力这两个条件还不够。因此当时有了一部分人民武装的重新兴起和活跃，但是没有全部放手活动，和坚决保卫人民利益；当时有了一些群众的反三征暴政的自发斗争，但没有能够扩展和持续，当时各地和交通要道上的盗匪出没很厉害，但这只是一种对统治者的不满与骚动，没有和群众利益结合，有时更会损害人民，在统治者“剿抚兼施”政策下，许多分子转而成为统治者反人民的工具。入春以来，情形有了显著的变化，摇撼着统治阶层的，主要是人民武装的到处活跃，人民武装活动区内农民的减租减息运动，此起彼伏不断发生的人民抗征抗税斗争，并且出现了武装斗争。以此与去冬情况相比较，就很清楚的看到农村人民反内战、反独裁的自救斗争是走向上涨了，更加具有群众性和革命意义了。因为现在不但客观条件更加成熟了，人民要求解救自己的决心也已经不同了。但还是不够，农村的群众斗争还存在着极大的弱点。这些斗争除了一部份已经获得正确的领导外，绝大部份还是散漫的、局部的、暂时性的自发斗争；这种自发斗争虽然也能够摇撼反动派的统治，也能够动员群众产生领袖，甚至也能够获得一时的胜利，但绝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甚至只是为少数阴谋人物或豪绅地主所利用，只为取得他们少数个人的利益，甚至被他们欺骗出卖。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农民运动都会因此而遭受失败，现在更加是如此。因此，现在是农村群众斗争已在上涨了，必须加强主观努力使它不断的上涨；群众性的自发斗争兴盛了，必须加强主观努力，把农村中已经发生的，将要发生的各种各式的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的阶段来。这是人民的需要，也是形势的需要。放手和有步骤的领导农村斗争到胜利的道路，就成为当前广东一切民主人士和人民战士的迫切任务。

（原载《正报》29期，1947年3月15日）

抢尽民间最后一粒谷

——一年来的广东田赋征实

(“广东的一年间”之五)

(1947年3月)

力 耕

田赋征实与征购征借，原来抗战时期紧急筹措军粮供应前线的临时办法，开始实行这个办法的三十年度，正是抗战形势十分险恶的时候，当时举国人民为了支持神圣的抗战，虽然自身的生活困苦艰难，也毅然挑负起足食足兵的沉重担子，直到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抗战胜利以后，本来军队复员，征实、征购、征借的临时应急办法自当取消，予人民以喘息休养的机会了。可是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府却不肯这样做，它要独霸抗战果实继续奴役人民，因此决心发动并扩大全面内战，初则以征购军粮名义向饥饿人民施行野蛮的粮食掠夺，继则不惜食言无耻，把名义上取消了的田赋征实也正式恢复起来。

早在去年六月间，蒋介石就在财粮会议上宣布：“政府一定得举办征粮……其原因是共产党想赤化中国（？），政府不得不有所准备！”到八月，广东经第六十五次省务会议通过，三十五年度的田赋征实，与全国蒋管区各省一齐开始实行。田赋征实的目的是为了打内战，这点在罗卓英也丝毫不加隐讳，他说：“三十五年度田赋征实，首在军粮获得供应”（见罗氏《告全省民众书》）。于是由八月一日开始，饥饿濒死的广东人民，就连嘴里最后一粒粮也被罗卓英、黄

秉勋等人拼命压榨出来，以支持蒋介石卖国残民的内战消耗了。

一、广东三十五度田赋征实总额最初定六百五十万石（内征实三百万石，征借和公粮各一百五十万石，积谷五十万石），后来几经人民哀求减免，征实数额三百万石不肯减少半粒，只把征借公粮两项数目各减一百万石，即连积谷仍征四百五十万石。据统治者说，这已经是“仁慈”万分云云。

实际情形怎样呢？以战前田赋征率比较，“战前田赋值百抽一，每亩一百元之产价只征一元，当时一元只值实谷十斤许……而现在一元赋额，则征实六斗五升，相差之数甚鉅”（今年一月五日《大光报》），就便是抗战时期，三十一年度每元只征二市斗，三十二年也不过征五市斗，所以以谷的数量计，现在所征已为战前的六倍半，以元为单位计算，则比战前增加了几万倍！而且还不止此，三十一年度下半年以来的历年“旧欠”，现在也一律追征！

但在民穷财尽的今天，无论怎样压榨，人民也不是容易有粮食拿出来的，所以八月以后的广东政府，就把大部份精神集中于办理征实征兵，上级迫下级，下级迫人民，电令纷驰，人民恐慌，而征到的粮食还是有限——十月底全省只收到三十余万石，约为原征额十五分之一，十一月底多收十七万石共四十七万石，亦不过原征额十分之一强，这使得所谓“最高领袖”的蒋介石也不能不亲自出马，手令广东当局加紧催征，说甚么“该省三十五年度田赋开征已久，据报收数甚微，进度迟缓，须知本年度征粮，关系“国家”军务，不得因循敷衍，贻误事机！”语气严厉，充份显露其懊恼。这样，广东的反动派便不顾人民死活，在“不得贻误事机”的淫威底下，省级统治机构的督征工作就更加“严”与“紧”起来，专设来搜刮民脂民膏的田赋机关不必说了，省政府的委员厅长也全部出动，分区奔赴各区督导，风尘仆仆，马不停蹄，决定要在年底之前扫数收起，同时颁布所谓“加强督征考核办法”，严令各级县乡保甲人员火速抢粮，又明令指示催粮人员采取“全力紧急严挤”、“逐保挨户验串扫正”，“加开夜工”，“新年例价照收”，于是各县

当局在施政考绩以三征成绩为标准的逼迫之下为了保持职位，纷纷组织“督促团”、“坐催队”下乡强征强抢，不管人民投河上吊，但求征粮“任完”完成了。

蒋介石的命令是要广东在十二月底把征实征借全数收起的，可是经过上述种种压榨迫勒，到去年除夕前后，也仅征起一百二十余万石，还不够原征额三分之一，这使得广东统治当局暴跳如雷，一下子就把七十多县的县长申诫记过（今年□月十一日《前锋日报》），并定出逾限罚息办法，要逾期缴纳的多纳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并且还定出“传案追缴”捉人逼交的严厉办法。但是一再展期，直到今天还是没法起征。

二、去年疯狂的田赋征实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呢？

举世皆知，去年的中国是闹粮荒最严重的国度，灾荒达十九省，灾民上万万。国民党当局对饿殍遍野的灾荒不仅没有半点恻隐之心，而且极力搜刮米粮，人为地加深灾荒的程度。大家总还记得，在正式恢复征实之前，有着抢购军米的灾难，因为所谓“购”其实是抢，是以低得仅及市价十分之一的价钱，强迫人民不吃也要卖给他。据张发奎自己招认，广东当时每月负担军粮共计十三万五千余大包（每大包一百八十斤）（去年八月十七日在本港侨团欢迎会上演讲），各级官吏为了筹措这大宗军粮，不惜亲自下乡火急督征，潮汕等地竟以逼侨捐来救乡的赈米拨去变卖抵数，结果弄致粮源枯竭粮价飞涨，造成广东罕有的大饥荒。可是为了要恢复征实，广东国民党当局也学其他各地的统治者那样，制造“本省各地普庆丰收”的谎言，田粮处更言之罄罄象煞有介事地说：“全省晚造丰收达五十县”，藉以掩盖他们的罪恶，便利进行搜刮。

实际情形怎样呢？就是后来田粮处也不得不承认本省“早季禾稻失收达七十一县，晚造报灾已达十六县”（见十月六日《前锋报》），而且事实还不止此，因为到十一月间，官方又承认灾歉县份已达二十单位，以后还陆续有报灾的县份（如十二月之封川县告灾），还有许多县份灾歉而县长故意延迟不报（见十二月八日《前

锋报》所载省参议员的质问案），故实际灾歉是相当严重的，据善救分署粮食调查队去年十二月的报告：“今年冬季广东仍将遇严重粮食恐慌，从总收入而言，本年度之生产数目（按指每亩生产量）仍比正常时期少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有的省份（如湖南、广西、广东）甚至竟达百分之四十。”就以正常时期计，广东战前每年缺粮亦达一千九百五十五万九千二百七十一市担（省田粮处报告），何况每亩田地比战前正常期间还减少这样多的产量！那末所谓“丰收”的真相，已可概见！再从全省灾民的数字来看，这种谎言也就完全可以揭露，根据去年十二月四日《越华报》披露：“各县市局所报急待救济难民人数为七百九十七万八千零一十六人，上列数字只为七十余县市局所报，尚有二十余未据报到”，可见全省难民人数当在八百万至一千万以上，就算其中有三成已找到职业（这仅是善救署冬赈会议上的假定。见十二月四日《越华报》），全省去冬仍有待赈的五百万至七百万的难民。以全省人口二千八百六十万入计算，竟占全省人口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广州一地去年饿死路尸共计七千余具（掩埋队报告）平均每月超过五百八十具，广东灾情之严重也由此可见。城市如此，农村的破产饥饿就更悲惨，省府地政科长出巡视察以后也为之慨叹道：“农民多以杂粮为活，生活之苦，达于极点！”（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山日报》），虽然饥荒严重到这个程度，国民党当局还是那样不留余地的向人民伸手要粮，那样的不留余地，但罗卓英还厚颜无耻说是“裕国利民”的呢！（见《告全省民众书》）。

三、国民党当局但求米粮到手，是不惜用最残酷的手段即“抢”、“封”、“抓”的办法来对付人民的。上半年的军粮是靠抢的，而且许多地方抢了之后再用高价卖给人民（如六十四军在都城所为），到处封存人民的粮仓、“让大家不得吃！”（一五九师参谋长语），恢复征实以后，就发展为“封割”和“抢割”，有的县份如顺德，由于人民无力缴纳苛重的赋税，县政府乃“下令各区晚造收获无论已否经过田亩申报，一律须事先纳完本年新赋方准收

获”（十一月二十五日《越华报》），就是说人民必须先纳了田赋才准下田收获，否则就要由官方没收来抵偿田赋。但是那一个人能在收获之前缴纳呢？（如果真能缴纳政府又何必出此下策！）这不是明白地要将人民全部禾稻没收完吗？在珠江三角洲上，南、番、中、顺、新各县，则到处发展为军队抢割民田风潮，省保安司令设立的“沙区指挥所”的“护沙队”公然向人民劫夺禾稻，如十一月九日“中山大小霖地方被‘匪’二百余人携机枪二十余挺，小钢炮二门，分头抢割民稻。同晚九区突有汽船一艘载有番号不明武装十余人纠集当地土匪由该乡土霸率领至民田抢割禾稻”（十一月二十八日《建国日报》）。在番禺沙湾附近的大均沙更“密集火力扫射，并带有禾镰绳索准备抢割”（同月二十九日《越华报》），在顺德罗五沙十一月二十五日有沙区自卫队数十名声称奉令剿匪，进占围第……并立即抢割谷粒，前后运去十七船”（二十六日《建国日报》），中山“海丰农场为护沙队占领，派百余人抢割，并准备船百三十艘将抢得之谷运至澳门，并声称在三天之内将田禾割尽！”（十一月二十八日《星岛日报》）这种“官与民争”，“兵与兵争”的抢割事件发展到整个珠江三角洲以至西江上游的高要，国民党统治者就是这样比强盗还凶地来抢劫人民的。

此外因催粮而抓人要命的更是屈指难数，几乎无地无之，因为省田粮处所提示的催征办法，就明白提出要“挤征”，它以征赋成数为标准作为提高县级人员待遇的“鼓励”，好使他们“悉力以赴”，所以督征团所到之处真是鬼哭神号，如番禺九如乡乡长和田赋稽征员“派队四出拘拿农民，且乱枪击毙农民李标”（一月九日《越华报》），南海金溪乡金利村第七保长蔡垣因该保滞纳田赋，被田赋办事处派人扣留（一月二十九日《越华报》），紫金田赋督征大队长李震欧等到乡民曾扬华家中收税，一时恰曾因事外出，仅其妻钟氏在家，因钟系一村妇，不明政府法令，触怒乡长，命令警兵将钟氏捆绑并用枪头乱击，复扣押保公所，迨曾前往探视，亦遭扣留”（一月九日《建国日报》）。这些都不过是万千个例子中

的几个，但已足以显示国民党当局要粮要命的虎狼面目的一斑了。

四、在田赋征实当中，又给国民党这个“坏政府”的各级人员以敲榨勒索的大好时机，所以人民的负担是远远超过“国库”的收入。因为实际上除了征实征借、省县公粮、积谷以及追征“旧欠”等所谓“正税”之外；又除了“封仓”、“封割”、“抢割”等之外；又除了各种各色的苛杂如什么乡公所办公费、警察服装费，“护沙队”（即抢封队）的经、粮、装备各费及“粮食救济基金”等不一而足的“附加”之外，区乡保甲长及各级征收人员、粮官等的勒索，更是难以胜计，有的县份，由于抗战时期失掉了田赋税册，地方政府便藉此随意自行规定税额，惠阳长安乡竟超过原额七倍以上。各县下乡“坐催”人员，不仅须由田粮户供应伙食烟酒招待，而且每人每日还要勒索“茶水费”。而最普遍最使人民痛恨的，就是征收人员使用超大量器（大斗），每市石原规定九十一司斤半的，但粮户则须交足一百二十司斤，即田赋每石比省府规定者多二十八司斤半！这种贪污现象，无县无之，如郁南连滩征收员“将斗加大，每斗约司码一百一十余斤，又附征公教团警生活费每元十余斤，又乡公所等附征共约十余斤，统计每元粮骨征谷至一百四十斤以上。还要双风双晒”（一月九日《建国日报》），国民党官吏对于出粮征收机构视为肥缺，于是与行政官吏有所谓“君子协定”，实行坐地分肥，其分配是“某长官每市石占三斤，经办人员占三斤，某会占一斤，某监会占一斤四两，某团体占四两，其他二十斤则由各乡征收分处及纳粮组自行分配”（见十二月十三日《建国日报》），台山的田粮分处征实，“公开加百分之二十征收，据一征收员云：多收百分之二十者，其中百分之十为孝敬县长，百分之五孝敬田粮科长，百分之五方为其自得”（一月九日《建国日报》）。从上面种种额外敲榨来看，人民的实际负担，估计至少当超过征实（包括各种名义的）总额的一倍以上！

五、国民党的田赋征实政策是中国各阶层人民的灾难。这里包括地主和商人在内。上半年征购军米使得多少商家被封或倒闭了，

征实征借更使得许多中小地主叫苦连天，他们往往全部地租收入还不够缴纳田赋，迫得借债或卖田来抵纳。然而受难最深的还是贫苦的农民，他们是一切压榨和剥削的主要的和最后的对象。贫苦农民除了缴纳“份内”的田赋之外，还得负担地主转嫁来的田赋。因为自田赋征实，地主的负担加重以后，一般地主都利用各种藉口，使用各种办法来转嫁他的负担于贫苦农民身上。他们有的藉口田赋过重要佃户分担一部，有的则藉口“旧订租金太少，不敷纳粮”，要求提高地租。这种无理要求自然得到这个代表剥削者利益的坏政府公开的支持和合法的批准，十二月十三日《前锋报》载省田粮处规定办法：（一）佃耕地租约缴纳实物不敷完粮者，得请求增加租额……（二）租约如系以金钱纳租，应按征实产物缴纳。这两项“法规”都是替地主说话，是鼓励地主向佃农进攻的一种办法。因为大家都知道钱租是过去地主趁粮贱的时机加重对佃户剥削的一种地租形式，农民已经因此吃了一次大亏，现在地主在粮贵时又要农民再吃一次大亏。因此许多农民因为交不起苛重的地租而放下了锄头，宁愿离乡别井逃出国门到外面流浪去，而乡村在加紧征兵劳动力缺乏之下，不少田土白白丢荒，地主也得不到好处。

这种由于三征雷厉风行，就使得整个农村社会陷于饥饿紊乱的状态，上面提过那个省府地政科科长视察东江、韩江农村经济之后说：“土地普遍集中，高利贷剥削盛行，整个农村危机四伏，民心思变！”但是该科长还没有说出，国民党当局的“催征”、“挤征”的毒辣手段下，人民是连杂粮也被抢走的，而饥饿的驱使，他们正自动自发地纷纷起来反抗这种虐政，民心不仅“思变”而已，而且正激烈地在“变”的当中了！

孙夫人说得对：“人民有权利反抗饥饿、封建主义与殖民地主义，这是无可否认的事，今天人民有这种权利也不容被否认”，中国的人民，现在正是如此进行正义的反抗，争取他们生存与温饱的权利！

（原载《正报》第29期，1947年3月15日）

人 民 不 能 征 服

——一九四六年的广东政治

(“广东的一年间”之六)

(1947年3月)

李 超

一、形势演变的轮廓

一九四六年这一年来的广东政治局面，和全国的局面一样，是爱国和平民主与卖国内战独裁两种力量尖锐冲突激烈斗争的局面。由于国民党当局立意要把广东置在它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之下，要把广东人民变做四大家族和美帝国主义者的奴隶，不惜用尽军事屠杀特务恐怖等最残酷毒辣的手段，来进攻人民屠杀人民；而顽强勇敢的广东人民，为了和平，为了民主，为了光荣的祖国，也前仆后继地进行各种方式的斗争，以维护抗战胜利的果实，反抗殖民地奴隶命运，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生活的实现。因此去年一年，人民的英勇斗争写下了悲壮的史诗，统治者的血手也铸下了无穷的罪恶。

过去一年，广东两种力量的矛盾消长和形势的演变发展可分三个时期：

头六个月，广东国民党当局依恃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疯狂地向坚持在解放区的农村爱国民主力量进攻，凭藉盗窃着政权的便利，凶暴地打击刚兴起的城市爱国民主力量，以东纵北撤为标志，广东的爱国民主运动是由上涨趋于低落和潜伏。这是第一个时期。

七月至九月，广东的反动统治以血腥手段获得了暂时的表面的

相对的稳定，积极布置向城乡爱国民主力量继续进攻，加紧掠夺人民以支持蒋介石的独裁内战。这是第二个时期。

十月以后，国民党当局的三征政策到处激起民变，其主要统治工具——军队又陆续调走（增援东北华北内战前线），各交通要道盗贼蜂起，琼崖人民武装展开胜利的自卫反击，农民抗征的行动普遍蔓延，反动统治从暂时的稳定又走向动摇，农村的群众斗争开始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来潮，这是第三个时期。

下面我们按照这个变化发展过程，把国民党当局统治广东荼毒广东人民的事实作一检阅，看看我们的苦是怎样的深，他们的罪是如何的大！

二、第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在日本投降以后就开始了的。在这个时期，我们首先看到蒋记国民党和汪记国民党汉奸伪军的合流，及其对于日寇战犯的宽容和包庇。

驻在广东的伪军伪二十师陈逆孝强（胡宗南部判国投敌的师长），伪四十三师彭逆济华，伪四十五师朱逆全，伪华南海军招逆桂章，伪警务处长郭逆卫民等部，都被国民党当局以“先遣军”、“地下军”之名加以收编，罪恶滔天的李逆朗鸡，也当起“先遣军”的纵队司令。中山的“敌人汉奸被委为合法的石岐治安负责维持者，在石岐近郊，汉奸还能够加紧征收伪票”（本报两日刊第一期“中山通讯”）。海丰“伪县长陈藩变成新贵，做了什么少校参谋长兼大队长”，“盘踞龟龄岛几年的伪海军头目凌逆炳权，转眼间变成高官厚爵”（本报两日刊第三期“海丰通讯”）。因此所谓“肃奸”，人所共知那只是中统军统特务敲榨勒索的代名词。大汉奸既已逍遥法外或做起官来，所以经过一番喧传的审奸，第一批七个，“除自投罗网的陈鸿慈和另一个李超群算是伪官外，其余一个是屨老板，一个当过飞机场泥工的少女，一个是开运输公司的，一个曾在敌报导部当杂役的，一个则是敌伪的驳脚密侦”（本报两日

刊去年一月十五日“广州通讯”）。当时的《越华报》曾对此评论说：“政府惩治汉奸，或本怜香惜玉之怀，对于女性，亦略存宽大”。其实何止对女汉奸为然，对男汉奸也何尝不是惺惺相惜？结果御用的省临参会亦有人提出责难，质问七八个月来为何只处决了六个小汉奸，平均每月不够一个！对于日寇，广东国民党当局也切实奉行蒋介石“爱敌人”的命令，“光复后的广州日俘得到特别优待，在文明路居住的日俘，可以自由出入，可以自由酗酒，三五成群，招摇过市。警察不干涉，市民徒侧目”（本报两日刊去年一月二十一日“广州通讯”）。当粮荒严重时，日俘还吃二十四两米，以致在饥饿威胁下的中大学生也要求与俘虏同等待遇（本报两日刊一月十七日“广州通讯”）。所以日俘居然骄横到在广州捣毁学校（同上去年一月二十一日通讯），在大良则封锁交通殴打行人（本报两日刊去年一月二十一日“顺德通讯”）。

对敌人如其“宽容”，对人民自然无比地残酷。跟着，我们就看到国民党当局回到沦陷区来对人民大抢大掠，其凶狠有甚于强盗。

“首先入城的‘英雄’‘接收’金铺夹万等等。他们较文明的时候是白日走入金铺取一两件金饰，或者走进酒店吃一万几千元，叫老板把零数补给他们，然后就理直气壮请老板自己向褚民谊结帐。晚上‘接收’的情形自然无人得窥其奥秘，从入黑到天亮，枪声不绝，真是风声鹤唳，叫人听而心寒。警备司令部成立后的第三个晚上，截至九点钟止，就接到五十三次不同地方的电话，报告有人恃强入屋”（本报两日刊去年一月九日“广州通讯”）。

跟着入城的正规“国军”又如何呢？还是让张发奎自己讲吧。

“敌人来了，我们没有保护他们（指人民），现在敌人投降了，老百姓由后方回来，但他们的房屋给军队占住了，给机关占住了，给军队和机关的职员占住了。新一军在街上公开抢劫的有，二方面军抢劫的也有，甚至警察宪兵维持秩序的，也都白昼抢劫”（回广州后第一个联合纪念周上演讲）。

公开强抢之外，再就是“用没收敌产的名目，将可食可用及可脱售的东西，从散开而集中保管，更由集中保管而实行变卖”（本报两日刊去年一月二十七日“广州通讯”）。于是封条满天飞，“随便一官半职的，都可以封五六处地方。一个秘书领有封条十张八张，县府一个大队长，一封就封了二十五处”（本报两日刊去年二月十一日“潮汕通讯”）。

在此情状之下，人民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们叫新一军做“新日军”，“抗战八年犹易过，胜利一日也难挨”，“搭错牌楼，烧错炮仗，迎错老张，睇错老蒋”的民谣到处传唱。

第三着，就来排挤非“中央嫡系”的地方人士。军队方面，战时利用他们担任第一线的游杂地方武装，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客气”点缴去枪械，不客气就要你人枪俱亡。例如一五六师经过阳江时，就将“挺二”一个大队缴械之后，还把该队大队长李建唐用榴榴弹轰炸分尸（见当时四邑各报）。文职的呢？一篇“广州通讯”写道：“李汉魂时代的省府职工，在不断淘汰之下，迄今苟存的不足三分之一，足够二千枚证章已被除下”。那群失业的公务员觉得自己比“照旧任用”的伪警还不如，自伤地称李任的省府为“次伪府”。市面上也替罗卓英的省府改一个代号叫做“大罗天班”（本报两日刊第十九期）。行政督察专员和县长的更动就更多了，第一批新县长的名字一发表就二十多个，跟着一批又一批，单在二月份里更调的专员县长即有十六个之多。

广东国民党当局一面接替敌伪的统治，尽情劫掠和奴役所谓“光复区”的人民，一面即扩大其在抗战时期也没有中断过的对解放区和人民革命武装的进攻，要消灭人民革命武装，摧毁建立了民主政权的解放区，恢复其封建买办的法西斯统治。

反动的国民党当局是把抗日有功的人民革命武装和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的解放区视作眼中钉的。新一军公开对民众说，他们回来的第一个任务是“清剿奸匪”，第二任务才是“解除敌人武装”。一月十三日停火命令发出后，张发奎一再厚颜无耻矢口否认广东境内

有中共部队存在，更是人所共知的包藏祸心的丑事。

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区军民的进攻，完全继承日寇那一套残酷的扫荡屠杀的手段。最初它是想用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歼灭人民武装的主力的，当它发觉人民武装生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有人山人海作依靠，于是便专向解放区人民施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封锁交通，搜山剔谷，烧村庄，杀民众，奸淫妇女，实行“宁可枉杀一千不能放过半个”的非人所为，希望以此来威吓人民屈服人民。

其次是采取“拔根政策”，捕杀民主政权的工作人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捉到就杀，捉不到就杀家属，抄家拆屋，强迫“自新”，务必弄至倾家荡产，无以为活而后已。另一方面就收卖当过汉奸虎狼的土劣地痞，恢复封建压迫的保甲制度，举办“五家联保”，建立起吸血的反动政权。

结果获得了自由民主改善了生活的解放区，又变成水深火热的地狱，例如惠阳的同和乡，自国民党军队开入之后，“日伪军的走狗和地头蛇都做起乡保甲长，乡公所的苛捐杂税立刻开征，农民从前退租退息的被迫交回双倍给地主”（去年二月十七日《华商报》）。宝安三区被侵占后，“强征暴敛，机关林立，第一任区长叶大荣，做了不满三个月区长，便刮了地皮数百万元”。国民党所要的就是这样的“和平”，它死死要建立的，就是这样的“民主”！

一月三十日广州学生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示威游行掀起了广东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浪潮。国民党当局自然也不肯放过这股爱国民主力量的，五月四日广州国民党特务冒充学生举行反苏游行捣毁《华商报》、《正报》分馆，就开始了反动势力的反攻，跟着一连串暴行接踵而至，一步紧似一步，到六月三十日，一举封闭了十三个文化机关，反动逆流就发展到高潮。

对付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广东国民党当局所采取的手段也是卑鄙而又狠毒的。

第一是所谓“以行动对行动，以组织对组织”，专门制造双

包。“行动”见之于二月二十五日的反苏示威巡行，由省党部以强制性的通令和二万个面包，制造了一次“爱国”行动。“组织”则一见于禁止学生自发组织的广州学联而代以特务制造的伪“学联”，二见于各地党部抢先挂起“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的招牌阻止真正“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的产生。此外强行顶包的有市党部和社会局导演下的广州记者公会的改选，汉奸特务杂差也拿来混充记者；六月中旬中大学治会改选，特务分子包办不逞，国民党当局便派出九十多名保安队入校武力镇压。

第二是由鬼鬼崇崇的阴谋捣乱到明目张胆的暴力摧残。起先要用伪“民主”来装点门面，破坏爱国民主运动，还想“在不引起法律争执的形式下进行”，因此主要采取流氓无赖的手法，到《华商报》、《正报》分馆打架捣乱放蜂放蛇，到处殴打报贩，恐吓承印承销民主书刊的印刷所书店，散播暗杀这个那个的恐吓流言。但是面具到底要揭穿的，到了公开抢劫书店的时候，广州行营政治部主任黄珍吾就对特务训话说：“你们放胆去干，我们不能用明令和条文去抵触蒋主席的四项诺言，但你们尽管去干，干出事情来，我可以全部负责”（本报两日刊去年六月十九日“广州通讯”）。六月五日广州警察局、社会局、保安司令部便联合出动大抢各书店，并压迫三十多种杂志停刊。

最后是制造恐怖全面镇压。到了和谈濒绝的六月，广州警局召开“治安会议”，宣布夏季“冬防”，马路设“卡位”，路人被“流动检查”，住屋要“复查户口”，“严密保甲运动”，“检查可疑住户”同时并制造“共党暴动”的谣言，宣布水陆大戒严，配合八百人黑名单的开列，大批拘捕“嫌疑犯”。六月最后一日，更干脆把十三个民主文化机关一举封闭。民主人士被迫逃亡的逃亡，潜藏的潜藏了。新兴、连县各地，也大批屠杀久囚狱中的政治犯。

东纵撤离广东北上烟台，作为广东本部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的东江解放区被侵占了，只余琼崖独立纵队因国民党当局违背协议力图消灭，被迫坚持自卫斗争，广东弥漫着黑暗，广东的爱国民

主运动，整个说来是暂时趋于低落，被迫分散潜伏了。

三、第二个时期

东纵北撤既成事实，六月尾七月初，广东国民党当局一面集中剩下来的兵力向琼崖人民进攻，张发奎、罗卓英、韦镇福、曾三省等人，一个跟一个地亲自飞琼布置。一面就起劲地进行两件工作：一件是举行全省规模的“绥靖清乡”，要用搜捕屠杀把农村的爱国民主力量“彻底肃清”；一件是极力摧残文化，举行所谓“思想清滤运动”，以焚书坑儒的惨酷手段来消灭城市的爱国民主力量。

关于前者，张发奎亲自主持三省边区及东江潮汕的绥靖会议，限七八两月完成绥靖工作。省府各厅长委员及政务视察团分巡各县，严格督促下属执行。

屠刀当然又是首先落在原日东江解放区上面，“广东当局通飭各县政府，将东江纵队人员即行逮捕，东宝一带设有检查站多处，一经发觉带有政府发给复员证之壮丁即予逮捕”（去年七月二十八日《华商报》）。保安副司令韦镇福亲到东江指挥策划“清乡”工作，后来广州行营更违背自己所作之“保障中共复员人员生命自由之安全”的诺言，公然设立起囚禁折磨中共复员人员的集中营来。

其他各个地区，统治当局“一方面是下密令，如严密注意乡中外来生面人，注意新到职的公务人员等。如教育厅长姚宝猷巡视西江时，连保校的教员履历也被抄了去”。“另一方面是由防军和各专署不断召开各县各乡联防的绥靖清乡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在于肃清‘异党分子’和‘民主分子’”。“七月初旬，云浮清乡工作开始，组织清乡联防队，为了逮捕一个做过抗日工作的青年，保安副司令亲自出马来抓。广宁也进行了四次清乡，抓去一批无辜民众，候价而赎”（本报新五号“西江通讯”）。

关于后者，广东国民党当局除了彻底禁压民主刊物的传播之外，还采取进一步的办法，实行思想禁锢。港沪出版的民主报刊本来在六月以后就被严禁入口，到了八月下旬，广州出版的第三党机

关报的“人民报”也被警局非法封闭了，该报负责人事后发表谈话指出说：“从此广州不惟再没有人民的声音，而且民主人士的生存也时刻受到危害”了（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华商报》）。封禁了民主刊物，黄色加反动的方型党刊即大量上市，据说这是“以量胜质”，要“在民众的思想上也来一下‘绥靖’”（去年八月二日《华商报》）。思想的禁锢，则以学校的教师学生为主，“各县请教师已奉到‘生人勿用’的命令以防‘复员’人物潜入”，广州方面，在发新聘书之前，也要经过一番“彻底的清查”（去年八月二十一日《华商报》）。中大有三个学生无端失踪，保安司令部后来加以证实，但诬称“他们与一大劫案有关，只因检查时检出反动书籍，因此引起外间讹传”（见同上报）。新闻统制则实行“公务人员联保制”，在联保具结书上，“规定绝对不能把职务消息向外泄露，否则给与严格处罚”（去年九月十日《华商报》）。行营政治部的第五、第七两演剧大队因唱“五块钱”那支小曲受到申斥，“一个剧本的上演，检了又检，一连换了五六次都不批准”，结果他们只有集体请求复员回家了（本报新三号“广州通讯”）。

广东国民党当局至此认为“大事定矣”，九月十日罗卓英召开“全省行政会议”，双十节成立所谓“正式省参议会”，后半个月，国民党的“全省党员大会”又开会，罗卓英认为加上不久之前开过的全省治安会议，就是“四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大集会”，靠了它们，可以“继续在小康局面上求繁荣”，“小康”指当时暂时的、表面的、相对的稳定，“繁荣”则意味着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在广东的“长治久安”了，而结论他认为四大家族统治的“新广东前途无限乐观”云云。

四大会议环绕着一个中心，就是一切为了强化法西斯统治，积极支持蒋介石的独裁内战。这四大会议所做的，也是反共反人民工作的总布置。布置了些什么呢？

第一是极力企图加强基层的统治。加强的办法一个是把治安之责推向地方官吏身上，“今后县市局长必须直接负起治安责任”

(罗卓英)，并给他们兼掌“军法”随意杀人之权；一个是厉行“联保联防连坐”的保甲制度，强迫“好人”当保甲长（这发展到后来富人被劫贫人赔赏的“匪案呈报办法”），严密调查登记户口，切实执行民枪登记，并要各乡人民出人出粮出枪组织“自卫队”，而广州则实行警管区制的“宪保联系办法”。

第二是布置遍及一切角落的特务网。中统军统的特务本已到处作恶横行，省府又以特件密令各县当局组织“防奸小组”，“搜集有关奸匪情报及各党派之重要言论”，“随时侦察奸匪情形”（本报新九号），民政厅“在该厅内设置一特工组织，随时随地作不公开活动，从事侦查”（去年十一月十日《星岛日报》）。国民党的全省代表大会也决定了在党内“组织各级党部的监察网”，实行“党员活动的监视”，党外则“以党为体以政为用”，“派员深入各民众团体”，“由点线及于全面，由城市及于乡村”（去年十二月二日《中山日报》），要做到无孔不入恐怖随处。

计全省行政会议提案四百余件，省参议会提案三百三十五件，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提案二百零五件，合计提案之多，数达一千余件，可算集统治办法之大成。但是三个月后罗卓英自己也坦白承认：一年的时间“多从事于计划及开会，可说是计划年和开会年”（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府联合纪念周上报告）。计划虽多，却始终是计划而已！是统治者执行反动政策不力么？不，它本身的矛盾困难限制了它。

矛盾困难在什么地方？矛盾困难在于：第一因为各处属地方势力的反拨，四大家族的臣仆虽然想把“中央化”特务化“化”到乡保甲级统治基层去，但是四大家族的垄断独裁统治，也危害到地方地主豪绅的切身利益的，自县级以下，这些地方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不是外来的“中央势力”所能“化”入的，一年来代表“中央势力”的县长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地方人士所控，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第二因为在四大家族的“中央”眼里，省县地方不过他们的领地封疆和外府，不惜榨干脂血以供奉他们的诛求，以财政收支

来说，六月改订财政收支系统以后，“省级财政成为中央附庸，县财政也只虚有其表”，以致“省省叫穷县县喊苦”，“只是松了中央而苦了地方”（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前锋报》社论）。第三是内战的军费军粮把人民血汗的税收田赋都打光了，连维持统治机构的经费也移挪挖空以致竭蹶不堪。九月以后，省级行政经费就不断叫穷，省级公务人员欠薪两三个月，工作陷于停顿。县级公务人员，唯一巴望公粮增发实物，但是“应付军粮紧急，不论征实部份，公粮部份，都一粒也拨清了，望穿秋水的公粮，自七月份至十一月份，还是一个空”（《前锋报》社论）。第四因为统治集团本身利益发生矛盾，因而互相掣肘互相捣蛋。省主席的肥缺，各县县长的地盘，固然是各当权派系剧烈争夺的目标，CC系的手也时时“从党的方面伸向省的各级政府机关”（去年八月九日《华商报》）。此外省市二府从争夺土地局，争夺干训团，以至争收市营税，更是彰彰著例，其他的明争暗斗也不胜枚举。这些都使他们的统治增加了困难。

统治者本身有了重重的矛盾困难，八月恢复征实征借，九月恢复征兵，统治集团与人民间的矛盾益呈尖锐，而在这个时候，主要统治工具的军队大部北调了，各江河道盗贼蜂起，广东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的暂时稳定宣布结束，而从新动摇起来了。

四、第三个时期

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之所以必然趋于动摇，是由这个政权反人民的本质决定了的。国民党恢复统治广东之后，做了些什么事情呢？罗卓英在去年十月中旬的各界联合纪念周上报告“政绩”，据其所说，计有如下六端：一、安定了社会秩序；二、打破了粮食饥荒；三、健全了行政机构；四、建立了民意机构；五、作过周密的巡回视导；六、召开过行政会议。六项当中，所谓“健全了行政机构”即是挑挤了所有非“中央”嫡系的势力，特务独揽大权；“作过周密的巡回视导”和“召开过行政会议”上面说过那是为了布置

更残酷的镇压，剩下来的三项，到底是怎么样的真相呢？

先说“打破粮食饥荒”这一项，罗卓英如果还有半点天良，该不会这样说的，因为事情的真相广东三千万人民个个都曾目击，人为的粮食恐慌所造成的惨祸，至今还是愈演愈烈。春间粮荒严重情状要详细描写是不可能的，单从当时米价上涨速度和路毙人数的急激增加，已可略窥一、二。自日本投降至三十五年一月，四个月内米价已经涨了八倍，但一月米价还不过每担七千元，中旬一起起到万六，到五月即升至十万元，五个月内涨了十四倍。三月中旬广州十天之内路毙二百七十四具，四月初旬，广州饥民五万人，五月初旬每天路毙由六十四具增至七十二具，平均每天至少六十具！各属乡村饥民连杂粮也吃不到了，只好挖些黄狗头摘些竹花米来充饥，后来竹米也卖到万元一担，他们就活活地饿死（均见当时省港各报）。在灾荒最严重时，据说它“打破了”粮食恐慌的国民党当局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一是当米价上涨得最利害时，军粮的搜购也最利害，如宝安“豁免军粮请愿团”呈文里所说：人民“刻以草根树皮、竹米充饥，饿毙日众，急待救济，而每月仍奉征购军粮一千大包”（去年五月《前锋日报》）；二是济粤荒米全数拨充军米；三是暹僑赈米部份在港卖出部份拨作军粮，所余亦混入杂质然后发放；四是省行贷出巨款购粮，却被官商拿去炒金和囤米（以上详情均见当时省港报纸）。至于联总的救济物资运到广东，也和在全国各地一样，成了贪污舞弊的大好机会，甚至造成种种悲剧，被人称之为“救济灾”。而这点，就连国民党自己的报纸和官吏，都不加以否认了。

其次，“健全了”的行政机构里，国民党官吏做了些甚么好事”呢？先看几个官方的统计：一是十一月份民政厅的统计，从三十四年九月到三十五年八月止，被控县、市、局长及乡镇长一百九十五人，罪名除贪污之外，也有聚赌抢劫强占民妻者（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建国日报》）。二是李扬敬在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的报告：去年一年内被告发贪污渎职之县、市、局长共九十六人，罪名成立的至少四十一人，查办中的四十余人。《中山日报》也惊诧道：“被控

贪污渎职者竟达全省行政单位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罪名成立者亦达百分之四十多了，真可谓洋洋大观”（今年一月十九日该报社论）！三是张发奎今年在广州各界联合纪念周上报告“本省去年绥靖与澄清吏治工作”时说，人民控告官吏的事实是“巧立名目，擅征苛捐杂税，及擅向人民摊派，包庇烟赌，抽收陋规，甚至强占民业，抢割田禾”。又再听听官方自己的批评：两广监察使刘侯武说：“广东每一县每一机构，无不布满贪污气象，层层舞弊，短报中饱，政府收入连经费在内，亦得不到人民所出百分之二十”（去年二月省港各报）。罗卓英在四月省临参会上总结其治绩时也承认“贪污得太利害，的确是十分痛心的现象。”国民党报纸也自己指摘说：“怪事处处有，莫如广东多，不仅贪污舞弊重重，并且官与官争之事迭见，官场之败坏，虽则古已有之，而似乎于今为烈”（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前锋日报》）。这样的官吏不是吸血鬼是什么？和强盗比较又有什么分别呢！

又次，建立的“民意”机构代表什么样的“民意”呢？所谓“全省最高民意机关”的“省参议会”在竞选之时，早已笑话百出。成立之后，省参议中即有赤溪黄汉源被控纵属强姦妇女，避罪不敢到案。廉江邹武被控勾结伪军惨杀乡绅，鹤山黄汉山被县参会予以罢免。广州市临参会四十个“参议员”，“现职是党官和团官的有十七位，市党部委员除了兼从政务的。有半数委员同时膺任为参议员”（本报两日刊去年二月一日“广州通讯”），此外如中山的县临参会半数以上参议员曾当汉奸，新会县省参议员的选举票价一张高至数十万，兴宁县参议会的成立因争做议长而打架，乐昌省参议员的选举由县府民政科一手经理，连县临参会也不预闻。五华竞选时双方集中武装数百准备火拼，都是载之报章，腾播人口的，而这就是国民党的“民意”！它伪造这些假“民意”的目的，无非想用来阻塞真民意的出现，好让官意继续主宰一切。

国民党当局的“治绩”既然如此，广东人民当然只有被杀死饿死冷死或奋起反抗那悲惨的遭遇，两者择其一，没有第三条路可

走。杀死的已经多到无从统计，饿死的去年一月至八月止，广州一地路毙经拾殍者就已七千二百二十六具（去年十一月二日《工商晚报》）！冷死的，十二月“寒流袭击之一周，除各乡镇不计外，仅广州及各线城市，冷死人数在一万人以上”（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广州各报）。

自然，人民是不肯束手待毙的，虽然密密地布下了网罗，他们还是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斗争，除了粮荒之时，由广州以迄四邑、两阳、韶关、潮汕等地陆续不断地爆发过各行各业的工潮之外，广州学生在四、五月间为了请求增加贷金改善生活，有过中大、文理、女师等校的“请假待命”的罢课斗争；四月上半月，广州市立中等学校教职员有过请求清发积欠的两次请愿，市小教员有过酝酿罢教的斗争；同一时间，广州省级公务员男女千余人，因尅扣薪俸而激起了大闹审计处的斗争；在各属地方，因强购强征军粮普遍地发生过请愿跪哭的行动；下级官兵因厌战譁变的，六月末尾有过欧震所部一营在粤赣边境拖枪逃去，十一月有惠阳县警一部携械“上山”，十二月有六十四师官兵北调之时相率逃亡，在粤汉沿线合股成帮四出劫掠。

在“治安”誇称稳定的夏秋之交，军警林立的广州市区，六月一个月警探处办过的抢劫案即有十三宗；盗窃案二十七宗；七月由七日至十九日，十三日里即发生白昼入屋拦途械劫案七宗之多，九月以后，东、西、北三江及珠江东海、西海、江港、江澳河道、韶兴、南韶、广增等公路，也不断发生劫船劫车的案件。八九两月恢复了征实征兵，农民抗征的自发斗争就跟着发展增加起来，八月中旬，汕尾人民反对国民党当局抢购军粮出境，全城二十万市民动员起来，“壮年人拿着粗重的木器，轮流的把守着各个街道要口，不让走漏一粒粮。老弱妇孺就帮着监视和侦探。知识分子就积极的进行宣传，墙头贴着标语：“运走一粒粮，我们就跟他拼掉一条命”（《群众》十三卷一期“记汕尾民众反抢购斗争”）！规模如是之大，动员如是之广，斗争如是之带组织性，都是不容忽视的。反

抗征实的也见之于南海的九江，乡民在屡次哀求减免得不到允许之后，就把县府派去的征收员全部干掉（今年一月十四日《大光报》）。番禺沙湾指南沙的沙农，因抗缴抽收自卫谷，实行武装抵抗（今年一月二十五日《西南日报》）。新历元旦那晚，惠阳人民集合了三百余人，把坪山谷仓赋谷三百余石搬掉，他们理直气壮的说：“这是我们的谷，应该还给我们”（本报新二十一号“惠阳通讯”）！

反抗征兵的行动则更加普遍，个别的反抗行动是纷向异地逃亡避征，如“从汕头搭船出洋的壮丁每星期都有三四千人”（本报新二十号“逃港壮丁访问记”）。至于集体抗征的，十一月广宁某乡六堡，曾因反抗征兵集合了一百多人包围联保办事处示威。“惠阳有些人被迫上梁山落草，三区、五区有些围村实行起来抗征，他们日间放哨，夜里就走到野外露宿”（见同上文）。南海小塘乡鸣锣集众数百，架起机关枪包围催兵人员（今年一月二十日广州“天下社”讯）。广州市区民众不愿抽签应征，几度集会请愿，结果市府软硬兼施，“折衷办理”全数准许凑钱买兵顶替才算公事上有得“交代”。

盗贼的蜂起，表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动摇，农村反三征的群众斗争，表示了农村爱国民主运动的重新兴起。去年年尾的反三征行动发展到今年二月就进一步提升到开粮仓抢赋谷的自救运动，火头愈烧愈旺，首先由农村开始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上涨，就已经迫到我们的眼前来。

五、简单的总结

以上一年来的事实和事变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一，一年来的事实和事变告诉我们：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是广东全体人民的灾难。罗卓英等辈国民党当局是直接代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来统治广东的，这个所谓“中央嫡系势力”在日本投降之后君临广东，其贪婪吸血是空前的，看那一批比一批凶的贪官上任，仅仅年把时间，就把广东弄得饥寒交迫尸横遍野；其横暴专制

也是空前的，所有非其嫡亲近宠之人，都被排挤的排挤，迫害的迫害了。操实权的大都是一丘之貉的法西斯特务分子。这一个小集团的虎狼，是彻底反对人民与全体广东人民为敌的。

第二，一年来的事实和事变告诉我们：这个最反动的统治是建立在武装镇压和特务制度上面的。反动的军队和万恶的特务是维持这个统治的主要工具。靠了军队和特务，它疯狂地进攻民主镇压人民。可是在内战继续扩大当中，国民党军队不断为人民解放军歼灭削弱的情况下，这个统治要想稳定是不可能的，随着军队的调走，它那暂时的稳定马上就宣告结束而趋于动摇，并且这动摇将日趋激烈，为了挽救垂危的命运，它只有乞灵于特务的恐怖活动来从事镇压。这就出现了目前这样的连统治者本身也没有了信心但其统治人民的措施又最为疯狂恐怖的黑暗的局面。

（原载《正报》30期，1947年3月22日）

征 兵 在 广 东

（1947年4月）

思健 龙达

跟着去年七月的大打开始，国民党在九月三日宣布恢复征兵，要在三十五年度征集大兵六十万，以补充在内战战场上的严重损失。于是，战时的军、师、团管区及国民兵团等兵役机构立即恢复起来，在广东，当然是奉令唯谨，雷厉风行了。据国防部规定，广东三十五年度临时兵额为三万九千六百名，除琼崖方面“情形特殊”暂不配征外，余均按照人口比例由各县征足。以全省三千万人口平均，就是每七百五十余人中要出适龄壮丁一个。所谓琼崖方面

情形特殊，据省保安副司令韦镇福的解释，是因为琼崖有“匪患”，要根绝“匪患”，“百分(之)九十九是政治，军事仅属百分之一而已”。表面上似乎是他们为了“拢络人心”，其实则因为琼崖方面确实实在进行着不断的内战，当地内战军队兵员损失就非就地抽丁补充不可，所谓例外，就不过是“就地抽丁，就地补充”的这种“例外”。

据国防部的“新兵役法”，其中可圈可点的是“聚众持械反抗兵役者处死刑”。广东军管区又有“漏丁处罚办法”，“每甲漏丁二人以上者甲长提充兵役，每乡镇漏丁二十五人以上者乡镇保长撤职，乡队附提充兵役”，律令不可谓不严。那也就是他们早已知道这种酷政必定遭到人民消极的或积极的反抗，除了“以死畏之”就不会有结果。

对于没有组织的力量的人民，这种“要命”的征兵，只能极力设法规避，拿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宗旨，宁愿出钱不出命，他们绝不踊跃“应征”，却很踊跃于申请免役、缓役和缓召。这就替乡保甲长开了一条财路了。按规定，领取免役或缓役的申请书每份缴印刷费五十元，但实际上到乡公所拿一份表格起码是三千元，保长代填申请表一份收费千余元，填好之后要保长盖章担保，那么非缴数万元不可。有些地方，乡长接到县府命令之后，就立即召集保甲长秘密开会，布置敲榨办法和分肥比例，之后，由各保召开“保民大会”他们夸大配征数目，造成人人自危的空气，然后使用假仁假义猫哭老鼠的办法，又当众公布了缓役申请，独子申请，侨胞回国申请等等条例，于是按照申请人的肥瘦，分别敲一顿竹杆，要一份申请书索价高至三四万元，盖一个章担保多至十多万元，弄好这套手续竟有花二、三十万元的，可是申请还没得批准，花了钱还得照样抽筭。

在广州，壮丁申请免缓役的当然更多，甚至集团的请求。例如省商业协进会认为各同业公会理监事及各店号负责人，都有重要职守，请求政府缓召，市总工会呈政府请求对各工会理监事准予申请缓

役。市牙医公会亦请求全市牙医缓役一年，因为按人口比例，每一牙医要负责七千市民的健康。据广州中山报载：“广州各区壮丁申请免役缓役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原因多为独负家庭责任”。当“中央”兵役局长徐思平到广东巡视的时候(二月)，就这样对记者说：“据报广州适龄壮丁仅五万人，而申请免役者竟至五万人，在役政上简直是一大笑话”。然而，在稍有良心的人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大笑话”，而是一个大悲剧，看到百万市民在国民党政府的强抢人命的征兵法令之下，不知是如何颤慄、徬徨、辛酸的况味！

然而这次征兵要比抗战时更严，因为抗战可以消极，而“剿共”呢，是“不消灭中共死不瞑目的”！据规定，独子也须入营受训，“期满始能退役缓召”，华侨回国半年以上者也要被召，抗战时荐任以上的公务员和新闻记者可申请缓役，现在此例亦已取消，中上学校毕业生曾受军事训练考试及格者可申请缓役，否则仍须征集。因此，免缓役的申请就不容易批准。广州申请的市民为五万二千余人，据说有半数以上“条件不合”不能照准，所谓“条件”那当然是“财”和“势”。

纵然如此，当局对于人民抗征(消极的或积极的)是早有预见的，所以也预留下一步，使人民还有一条缝可钻，就是“志愿兵”。根据“临时征兵实施纲要”规定：“各地区难民及失业壮丁如有志愿从军者，得尽先募集，以补征集之不足”，“现在一般执行征兵机关，自应先行募集有志愿从军之难民及失业壮丁，然后办理服役壮丁之抽签”。国民党这个“恶政府”的确已制造了一大批“难民”和失业壮丁”，其中也有不少可以用钱去买他的“志愿”，广州市内的征兵就完全在这方面想办法了，一个名叫“广州市兵役协进会”的机关成立了，用摊派方式集了一笔“新兵慰劳金”，规定每名“志愿兵”发慰劳金二十二万元，换句话说拿二十二万元换一条生命。不过，广州失业游民虽多，但人谁不欲生畏死呢？费了好大力气“志愿兵”依然买不够，便跑到香港来设法了，甚至企图一手把疏

散归乡的难侨接收过去。结果仍然缺额一百多名。其他各县区乡也同样兼采这个招募“志愿兵”的办法，他们派出人员到广州去，搜集“志愿兵”，凡欲参加者除包办食宿旅费外，合格后也发一笔慰劳金。在本年初催征开始加紧的时候，广州的人命买卖是盛极一时了。

用“志愿兵”作合法的顶替，可以使人有办法去达到“留得青山在”的意愿，中了签的壮丁为了保存生命，便卖田卖地倾家荡产买了顶替，筹不出赎命钱的就更不堪设想了。在悲剧重重当中，乡保长这一类吸血虫却笑了。在乡间往往是这样：假设这个乡要丁五名，他们抽签就抽上十名，五名作预备丁，扩大了勒索的门路，然后就奔走在中签者之门，恐吓他，胁迫他，逼出高价来请求除名或顶替。揭阳棉湖区一个乡民，就被敲了一百万元。梅县龙虎圩一个农民，卖尽了祖父遗下的十担种田，才把名字除掉。在宝安，每名中签壮丁顶替费是七十万元。高要、四会等县每名价高至一百三十万。真不知吮吸了多少人的血汗，不知流尽了多少人的眼泪！拿不出赎命钱的，怎么办呢？南海四区就有一个中签壮丁上了吊，高要西康乡有一个姓陈的壮丁跳河自杀，饶平县有一个农民因此把全家三口（妻子儿女）杀死最后自己上吊。这悲剧，已经成为平常了。

抓丁，勒索的惨事是数不胜数的，看吧：

有一个退伍军人李德光投函广州《建国日报》诉冤说：“我是头一天由韶关搭混合慢车来穗城的，车子到站时已经十点多钟了，但是下车之后，必要到我们广西会馆去住的，行到×××时，正遇着某区长带警围捕壮丁，叫我不跑，命警士将我拿回公所去，一共捉得六十四人……于是把我拨入××团管区××大队第×中队充当新兵”。这是在堂堂省会所发生的事情。

在海丰县东山乡，征兵令一下，乡长即通知全乡壮丁抽签，但等到人齐了，一声拿下，拘捕了二十多名，乡长说他们是中了签的，谁肯交三十万元就可以放人。

平远县马坝圩有一壮丁，连他自己也不晓得是中了签，可是区

署派来一班区丁，黑夜把他抓去了，后来花了八十万赎了出来。

在梅县县城有一个从新加坡回来省亲的华侨，还没有住上半个月，也被区署黑夜抓去了，说是逃避兵役的壮丁，几经交涉，托人说情，花足二百万元才放出来。

蕉岭县属的一个镇，当农民赶集的时候，忽然宣布戒严，堵住路口，将所有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壮丁都抓起来了。以后，由各家属一个一个用钱赎回，没钱的就做顶替去了。

还有，在旅店抓人，在路上拦截，都是抓丁的方法。梅县一个乡，一次拦劫过路人就发了几百万洋财。

陆丰的一个镇上，因为敲榨不遂，乡长把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杀了，说他是“不稳健分子”。大埔县的峰市，一个农民因征兵和保长争论，给活活打死。梅县的松源圩，因控告保长虐待壮丁，一个青年农民遭到暗害。……

然而人民的血泪悲剧远未完结，今年一月底征集额数仅达二万二千人，还只及原定额三万四千人的六成，相距尚远。而兵役局长徐思平来粤巡视的消息又到来了，于是本年一月，行辕和省府合组兵役视察组出发各地坐催。于是军管区严飭各师团管区限二月底征足，各师团管区又严飭各县市府限期于二月十日前征起八成，月底征足。于是各县政府更忙碌了，惠阳县长亲往各区乡镇出巡，县府军事科长到各乡坐催，梅县县府派员四出抓丁；南海县长特别召开会议商采紧急办法，军事科长下乡坐催，夏教乡保长以“玩忽役政”之罪被扣留后限期清送；开平军事科长沈民被免职，一年内不准任用，惠来一带采用封屋抄家的镇压办法，企图弄足兵额交差；中山方面由地方团队亲自下乡像“剿匪”一样把壮丁包围逮捕。……

这样的“紧急措施”，又不知吮吸多少人的血汗，流尽多少人的眼泪，迫死多少人的生命！

截至三月份，三十五年度的临时征兵还未应付得了，报章上就已接连登出三十六年度征兵的消息了。国防部规定，三十六年度征

兵原定六月开始，现在因前线垮得快，就提前由四月开始举办。广东奉到命令后，又因“依据以往经验，随时均有提前配征可能”，为免临时周章，决于三月一日开始举行壮丁调查，整理户籍，发身份证，做好准备。三月中旬，省军管区又一连接到国防部两个命令：一个是“年满二十岁至二十三岁各年次之壮丁，即日起暂不准出国”一个是中签壮丁逃避兵役，所遗留的动产将其拍卖，房屋田地由乡镇公所“代管”，这就是抄家。这一类的“法令”真令人读了毛骨悚然，本年度征兵的苛酷又加重几重了！被迫到倾家荡产和死亡绝境的广东人民难道还肯俯首下去吗？现在，反抗的运动已在半个广东的土地上展开了。

（原载《正报》32期，1947年4月5日）

关于蒋管区 游击战争一些问题研究大纲

（1947年4月10日）^①

（一）条 件

抗日时期，关于蒋管区游击战争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采取否定态度，认为是以妨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错误的，不懂得蒋管区人民自卫的游击战争和发展人民力量的游击战争，是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投降以后，和平民主未能真正实现以前，蒋管区的游击战

^①原件未署作者。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争，是必要和可能的，东纵北撤后广东武装斗争的经验，就达到这个结论。

蒋管区游击战争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一）蒋介石破坏和平民主的协议，坚持内战独裁，强迫征兵征实，对人民施行恐怖的掠夺政策，激起民变，又对民变采取残酷屠杀的镇压政策。为了反对掠夺，保护人民利益；为了反对屠杀，领导人民作自卫斗争，开展游击战争是迫切需要的。（二）蒋介石之所以能够进行内战，继续独裁，是由于他无耻卖国，投靠美帝国主义，取得支持，为了破坏他的后方补给，牵制他的后备兵力，增强他的困难，促成他的失败崩溃，争取战争的胜利和联合政府的实现，开展游击战争，也是非常需要的。

蒋管区游击战争之所以是可能的，因为：（一）内战独裁的统治，迫使人民起来反抗，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人民的反抗斗争，已经发展起来，将来就要形成革命高潮。（二）广大的农村，广大的山地，边境毗邻，统治力量薄弱，二十余年来断断续续的革命传统，反动派不能消灭我们，群众的斗争信心提高。（三）四大家族的独占统治，排除异己，打击地方势力，造成统治阶级本身很严重的矛盾，革命的间接后备军逐渐扩大和积极，独裁统治者处于孤立的地位。（四）蒋介石在内战中严重的损失，消耗浩大，兵力不足，后方空虚，力量逐渐削弱，困难逐渐增加，军事、政治、经济的危机日益深刻，崩溃的趋势日益加紧。（五）我们的武装工作和群众工作有了基础，有了经验，有了中央正确政策的领导，有了一批经过武装斗争锻炼和联系群众的干部。

因此，只要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而又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照顾各阶层利益，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和困难，善于掌握时机，正确执行，各方面的政策和战术，坚持游击战争与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蒋管区游击战争的取消主义和失败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一）革命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强大。（二）人

民群众的落后散漫、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够。（三）中国领土广大，社会发展不平衡。（四）革命力量还不够和发展不平衡。由于这四个条件，就产生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又由此而产生了革命的长期性和斗争的复杂性，这就决定了游击战争与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所必经的道路，特别是要能够达到最后消灭独裁统治，彻底解放人民，是迂迴曲折和长远的。蒋管区游击战争的盲动急性和冒险主义，也是错误的。

（二）方针

要一方面反对取消主义和失败主义（日本投降后至政协会议时期曾成为主要危险）；另一方面反对盲动急性和冒险主义（目前是主要的危险）就要坚持长期积蓄力量的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

长期积蓄力量的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是战略意义的方针，是发展原则与巩固原则，进攻原则与退守原则统一结合的方针。形势有利时以增长力量为目的，以发展原则进攻原则为主，但不忽视巩固的必要与退守准备；形势不利时，以保存力量为目的，以巩固原则退守原则为主，但不忽视发展的可能与进攻准备，在这个基本方针指导之下，游击战争是积极向前的，步步发展、步步巩固的、一起一伏、波浪式的过程。任何片面死板的，消极等待或直线发展的指导，都是离开这个基本方针，都是错误的。

战略意义的方针，是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针，是指导着今后第四阶段全部蒋管区游击战争的方针，但时局向前发展情况发生变化，仅仅有了一般的战略方针，仍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能够适合于当前时局的情况，有利时机或不利时机，高涨形势或低落形势，还要依据战略方针，提出具体灵活的策略意义的方针。

当前蒋管区情况的一般特点，是斗争的有利时机已经开始，革命高涨的形势行将到来，在广东的具体表现是：一方面独裁政府的军队调赴内战，省内空虚，力量薄弱，横征暴敛的掠夺，激起民变，人民的反抗斗争发展起来了，这是主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独裁政府的

军队虽然空虚,力量虽然削弱,但正在加紧组织地方武装,调整统治机构,在局部地区集中兵力,还是很凶恶强大的,人民的反抗斗争虽然发展起来,但主要是自发的、散漫的,缺乏领导和组织,这两方面情况结合着构成广东当前基本上有利但仍有困难存在的形势,看不见基本有利的方面,不敢放手发展,保守等待,固步自封,就会失去时机,不能增长力量,忽视困难方面,盲目乐观,骄矜浮躁疏懈轻敌,就会招致损失,不能保存力量,而两者又都是脱离基本方针的。

要合适于指导广东当前情况,又要适合于基本方针,就要坚持大胆放手,乘机发展,小心布置,随时巩固的具体方针。

具体方针是指导行动的,不是死板的教条,而是灵活的原则,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敌情和群众条件不同,应再加以补充修正,具体运用。

行将到来的这个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高潮,从我们本身各种条件来说,是可以给予我们以建立许多边界的农村根据地以配合全国斗争,争取更接近于全国人民彻底解放的道路,但这并不是说,这个高潮就可以完成全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达到最后胜利还要若干曲折,我们希望能够打下争取彻底解放的基础,以便在这些基础上再待时机配合全国彻底解放。

(三) 山地与平原

要坚持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广大的山岳地区,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能够维持经常的补充给养,就能够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特别对于若干已有基础的边界山地,平原地区,群众条件对于游击战争更加重要,平原游击战争的意义和作用,是推动和支持群众斗争,而又主要地以群众斗争来配合山岳游击战争,平原游击战争,一般地以小组隐蔽小股分散秘密活动群众形式出现为适合。

(四) 形式、名义与活动方式

名义就是我们的旗帜,我们打起什么旗帜,是鲜明的还是灰色

的，是旗鼓喧扬还是偃旗息鼓，这要看当时情况，如敌情友军人民觉悟程度，组织程度和主观力量如何而定，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南路解放军，中区解放军，以及群众所称的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就是我们过去的旗帜，东纵北撤后，除琼纵外，我们曾一时偃旗息鼓，强调江湖豪侠形式，但群众熟悉我们面目与打家劫舍的土匪面目，清辨分明。因此，我们仍然是人民的队伍，联系群众，为群众所亲爱。过去一年的经验，证明曾经打起旗帜的队伍，是不能转变为江湖豪侠形式的，勉强转变只有失败，根据今天的各种条件必须否定土匪及江湖豪侠形式。

广东当前的情况是基本上有利，但仍有困难存在，所以需要鲜明的旗帜，但不一定旗鼓喧扬，可以打起人民的、民主的旗帜，不一定要打起党的旗帜，旧时名义可以采取，但不一定采用（东纵复员人员名义可以采用，但不一定采用），总以适合于当地情况而又为群众所喜欢的与我们行动内容相结合的形式出现。

如果我的活动突出，力量暴露，就会吸引敌人的力量集中来向我打击。因此，活动的秘密性和求得掩蔽，就需要分散活动。扩大活动范围，开拓新地区，发展队伍，开展群众工作，解决经济给养，都需要分散活动，但没有中心的、绝对的、长期的分散是错误的，因为没有集中，就没有战斗的力量，就不能挫折敌人，消灭敌人，打败敌人的进攻，保护群众的利益，也就难以保存自己。

（五）战术原则

分散与集中的统一结合，灵活运用，是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是掌握主动权的基本条件。游击队应该迅速分散和迅速集中，才能避免打击，和打击敌人；敌人的强大地方，我分散撤退，向敌人薄弱的地方进攻；敌人集中的时候我分散，敌人分散的时候我集中，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对于数路来攻之敌，必须集中打击一路，然后迅速调动，打击其他一路，集中打击敌人，取得胜利之后，就要分散，开展工作。要有经常较集中的主力以策应各方面分散部队

打击敌人，平均使用兵力是不对的，完全集中也不对。

（六）扩军与练兵

扩军必须根据人力物力的条件，竭泽而渔和不顾人民负担是错误的。先找给养后再扩军也是机械，解决的方法是估计可能条件即按计划从行动中找人力物力的补充。武器来源主要应取自敌人手中，外围的民枪可以适当取给，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民枪，应大部份保留给民兵和游击小组。建军之初，武器自有部分取自民间，自己区域之内，以后有可能应发还，对于自己区域内民枪的保留，是为了保存人民自卫的力量，为了建立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游击小组，既可以配合作战又可以减轻负担。

练兵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建军的经常工作和重要工作之一。每个战斗员，必须训练和善于射击爬山、利用地形地物三种基本战术，机枪法和爆炸术的研究训练，培养特别人材，也是非常重要的。干部应经常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研究情况，学习军事理论，提高指挥能力。

（七）政治工作与建党

东纵北撤以后，部队停止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决定是错误的，人民的（农民的）游击战争没有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是不能胜利也不能生存的，游击队因为有党的领导，才能够有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游击队因为有政治工作，才能够巩固自觉的纪律，巩固群众关系和有效的瓦解敌军，时机越不利，形势越恶劣，情况越困难，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就越应该加强，决不应该削弱或停止。

由于党的组织发展不平衡，山岳地区党的组织薄弱，所以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应该成为游击队经常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游击队就必须特别加强地方群众工作和特别注重发动和领导地方群众斗争，对于在斗争中出现的前进和积极的地方群众，游击队

中的党应该指定可靠和有经验的干部党员，去进行经常的教育和考查，然后吸收入党，也可以派出可靠和有经验的干部，在选定的村落常川居住，专门负责做群众工作和建立党的任务，这种干部，更尽可能取得掩护，采取群众的生活方式，参加群众的劳动生产，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发生敌情时与群众同进退。

（八）防奸与肃反

防奸和肃反的斗争是巩固部队、发展群众、开展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游击队应该经常提高政治警惕性，不仅注意敌人由外而来的进攻，还要注意奸细由内部而来的破坏，并且要认识提防内部的奸细，比之提防外部的敌人，更加困难，更加细腻，因此防奸斗争应更加精明勤谨，绝不能粗疏懈怠。党内党外及各种干部要经常认真审查，发展部队要吸收当地来历分明而经过考查的群众。复员人员重新入队，要严格审查，以防叛变分子乘机混入作奸，自首分子不准重新入队，对于地方上反动分子，应采取争取多数镇压少数的肃反方针，不可从事宽大，也不可从事杀戮。

（九）财政经济政策

游击队的财政政策，首先是建立在正确的经济政策上面，正确的经济政策其目的在改善群众生活，减轻群众负担，财政政策不能违背这个目的，要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和计划制度，才能够防止贪污和浪费，才能够节省开支以支持长期的斗争，自由放任和朝谋夕食，随地取食的作风，都是错误和危险的，节省开支，除为了支持长期战争之外，并且是为了减轻群众负担，为了减轻财政负担，财政来源，应采取多样办法，除了群众负担一部分之外，主要应自独裁政府手中，取得物资。其次直接或间接，公开（适当）或秘密（非法）取自地主手中，以及社会人士的乐捐援助，自己部队的可能生产自给等等，必须尽可能开辟其余的来源，以减轻群众负担的部分，为了使群众减轻和乐意负担游击队的财政，就要改善群众

生活，根据地方情况，适当的实行减租减息，某种程度上解决土地问题，如有可能，也应实行。群众的生活一经改善，原来的负担就等于减轻了。

（十）后方医药

每个参加游击队的人，不论担任什么工作，都是参加了中国革命这个光荣伟大的斗争，他们的伤病是应该得到照顾的，不恤伤病，就不能巩固部队，因此后方医药的设备，无论如何困难，都应该布置，专责专款以求有效，未有巩固根据地时，要分散掩蔽，依靠群众。首长对伤病人员，应经常亲临慰问，对后方医药工作，应经常亲自检查布置。

（十一）政权形式

政权问题，是革命问题的中心，因此，它在一定条件之下，不是必要与否的问题，而是可能与否的问题。由于游击战争本身是流动的战争，由于蒋管区游击战争的过程是迂迴曲折的，又由于广东当前的情况，是基本有利而有困难存在，发展起来的力量取得掩护仍是必要的。所以当游击战争虽然开展，但尚未形成巩固的根据地的时候，建立政权的条件总是具备，保持政权的条件还是欠缺，这种情形，就不适合建立形式鲜明的民主政权，而适合造成掩蔽形式的两面政权，因为在游击队需要分散或撤退的时候，或者即使暂时受挫折的时候，两面政权仍可以保持存在。至于将来巩固的根据地，已经形成，保持鲜明的民主形式的政权，条件已经具备，我们应即毫不犹豫地建立地方民主政权。

（十二）友军与土匪

当我在蒋管区的游击战争可能打开新局面的时候，民主人士和地方人士，可能组织友军，而与我构成复杂的关系，他们反蒋与我一致，但阶级立场则不同；对于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的民主势力，我应坚持政治路线，争取对他领导，军事互相协助；对于代表封建阶级的地方势力，我应利用他，争取合作军事共同作战。但无论对于任何友军，要坚定独立自主的立场，壮大自己的力量，提高警惕性，对于任何友军的依赖幻想，都是严重的错误。土匪与我性质不同，但与统治者对立是一致的，对土匪应采取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态度，不必拒绝，也不必看成自己的部，应认识他的投机性，预防他在紧急关头，受敌利诱，倒戈叛变。因此不可使他与自己的队伍混杂，不可使他靠近中心，不可向他宣泄机密。

四月十日

广 州 的 工 潮

(1947年4月)

崔 嵬

大家一定还没有忘记国民党“民死主义”的财经政策所造成的“二月恐慌”，更没有忘记国民党当时采取所谓“紧急措施”而更进一步置人民于死地，其中关系人民大众最大者，莫如不准增加工资又不准怠工罢工的疯狂规定。要广大的薪工阶级既只能由饥饿走向死亡，又且必须做工不许做任何挣扎，这真不知残凶已到若何程度！

然而，人民要活！这个要活下去的要求，是谁也压阻不住的！受到压迫，人们就要斗争，那斗争是用不着谁来唆摆和煽动的！因此，国民党的经济既爆发了如二月间那场大风浪，法币崩溃，物价陡涨，广大人民生活的恶化已至不能生存的地步，故薪工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求生斗争（这个斗争只能说是求生救死，如果称做

改善生活也未免太讽刺了)是谁也压阻不住的,是“紧急措施”不了的。在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指数解冻运动”,曾在二月下旬发动,他们以一致性的广泛行动,获得了部分的调整工资的胜利。而在华南工商业中心的广州,职工们曾因商号工厂的倒闭(在年关开始,到二月恐慌又更严重化),引起失业狂潮(市警察局公布数字,市内失业人数为二十万,其实不只此数,当在全市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一间),而在业的职工也只能在半饥饿状态中生活,因而也在二月下旬开始发生了各行各业职工的求生斗争,要求增薪及罢工行动,有如后浪推前浪,至为澎湃,这个浪涛的波澜,直至最近还未平静。大多数的斗争都胜利了,这种胜利虽然是很微小的,因为争到的工资还远落在生活必需品的涨价的后头,但这却说明了国民党的“紧急措施”在群众行动之前是破产了。

二月十三日,广州河南东亚烟厂全体男工人,以原日工资由二千二百元至三千六百元,不敷生活,向厂方请求照原薪加百分之百,另米二斤,因未为资方接受,实行罢工。这一个别行动,遂成为各行各业职工联合行动的前奏曲。而被“紧急措施”所直接牺牲的金业工人,亦曾于二月二十八日向市府请愿,那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全市三百余家金饰业工人只有挤入失业群中去。不过,这也唆示着工人阶级决不被“紧急措施”所吓倒。斗争波涛是一定要来的。

斗争波涛是一定要来的,国民党统治者也预料到了。于是,工贼大本营的市总工会首先出来了,市总工会派员向各职业工会“劝导”,叫他们压阻工人的要求,“暂勿提出加工加薪”。于是,市社会局也出来了,二月十四日下午,该局派出课长郑超球到市总工会召集全市各工团代表举行谈话会,进行骗和压。他首先“假仁假义”地宣告当局决定每一工人散发赈米五斤,次则宣告市议会中工人可分得七至九个名额,叫各工会选出名册,准备将来参加选举,拿“参议员”这官衔作饵,引诱各工团负责人,最后则表示工人应“共体时艰”,“万勿轻妄要求,致使工商业崩溃,整个社会

陷于不安”。把工人为了求生的合理要求指做“轻妄”，并要负工商业崩溃和社会不安之责，这的确够横蛮了！言外之意是准备暴力绞杀工运，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这些做法没有收效，因为人要活，工人痛苦最大，而又必须活下去，于是首先爆发了全市靴鞋业工人的联合斗争。当这个斗争展开时，反动统治者们便立即生长着恐惧感觉，隧由市党部主委高信亲自出马于三月八日召开“劳资协调座谈会”，在这会上刻划出他们的感伤和绝望的疯狂。高信劈头便说，目前对中共只有军事解决”，中共的策略“是以经济破坏配合军事进攻，在各省市鼓动风潮，希望工商领袖提神警惕”，对中共的诬赖是谁也不能相信的，然而他们用的就是大行其道的“红帽子”政策，“提神警惕”什么？那就是谁揽“风潮”，谁就得提神杀头！可是他又不能不承认，国民党区已象“一个破寮，零乱破烂不堪”，社会局长在会上则说广州的经济不景气是患了“肺癆病”。官家的说法自然只有老一套，高信说：“劳资双方要体念国家之困难，同舟共济，共存共荣，劳资协调，以充分的感情，最高的理智，饮茶食烟的态度。解决劳资纠纷，以免中央有后顾之忧”。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能够有兴趣听得进这番话吗？！四大家族的“国家”确实在困难重重，四大家族的“中央”确实处处有“后顾之忧”，那关人民个屁事！如果照他的说话，工人们要那样去“体念国家”使“中央”无后顾之忧时，那不过使四大家族可以“共存共荣”，而自己却死光了！因此在会上的劳方代表满腔悲愤地说：“现在有些人吃饱参翅还要加上汤，要另外一些人吃白粥还要捱饿，这怎么成？”

首先发动罢工斗争的是三千余革履业工人，他们为了生活程度急剧高涨，工资微薄，西鞋每对工值八千元，两天才能完成一对，平均每日工资仅四千元，无法过活，二月底通过市靴鞋业职业工会向资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九十。广州的靴鞋业原分两种，一种是自设工场的，一种由“山寨”承接制造，资方初期仅答应照原价加五，旋改为加六，双方争持不决。三月二日，劳方即宣布罢

工，通知各“山寨”工人须到工会领得开工证方得开工，并组织纠察队四十人，制止各山寨和工厂强迫长工和学徒私自开工的破坏行动，此时资方靴鞋业同业公会决议于七日起停止向山寨购货以为对抗。劳方呈请市总工会、市党部及社会局进行调处，资方也由市商会出头请政府仲裁。资方以成本过高为词，拒绝劳方要求，但经市总工会派员调查结果，照市面价格皮鞋一双标价十六万，除去原料成本，则照劳方加九计工值，每双还可溢利五万三千元，资方的拒抗显然无理。由于工人们的坚决，罢工坚持十余日，结果资方有二百余家已被迫接受工人的加九增薪要求。在罢工期内，清理粪溺、酸枝花梨、木炭等几个工会曾对他们作热情的慰问。

第二宗较大的斗争接着爆发的，是拥有一千五百余工人的丝织业工会向资方同业会提出加薪百分之一百的要求。丝织业工人虽然于去年年底也曾发动增资，经调整为每尺工值三百八十元，从前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至十二小时，可以得到三千八百到四千的代价，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但现在侧每天做足十六小时才能得五六千元，只足个人消费，这就没法捱抵下去了。而按资方情形，则丝绸销场广阔，畅销得很，照市面批发价每疋二十四万元，除去工料，每疋可获纯利六万八千元以上。因此工人的增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但资方集议结果，只允加三增薪，许多厂家并立即解雇工人以为威胁，遂致五百余工人失业。三月十八日，劳资双方集会商谈，资方又提出按级增资办法，企图分化工人团结。二十日又再度集议，双方争执达五小时，结果取消按级增资之议，同意照原日每尺三百八十元加五计值，至此坚持一个星期之久的丝织业工人的斗争以获得部分胜利而告结束。

此时广州又爆发了震动全市的报纸排印工人的罢工。排印工人的工资虽经一度调整，从每月七万元增至十二万元，但金融风潮发生后，这个工资标准已不能应付生活，遂于三月十五日向资方提出增资百分之一百的要求，并由二月份起补发。当时资方以报馆收入也远赶不上物价的高涨，也已岌岌可危，故对工人要求坚持反对，经

双方几度磋商及市党部和社会局的调处，迄无结果。后来资方让步，答允从三月份起增资，劳方不能接受，遂于当夜实行罢工，于是十六日全市各报一律停版。这可骇倒了当局诸公，连忙于十六日由党政军长官亲自出马调解，光复路一带报馆林立的地区，加派宪警维持秩序。结果决定采折衷办法，加薪百分之百但由二月十六日起计。闹得满城风雨的报纸排印工人的罢工斗争遂告胜利。经此一次，国民党军政当局是又怕又恼了，故在他们召集双方调处时，就凶狠狠地责成劳方不得怠工罢工。接着，他们就重申蒋介石“紧急措施”的法西斯法令，准备暴力绞杀工运。然而此时的工人斗争已到了最高潮，要压迫也压迫不了的。据广州天下社的消息，三月上旬卷入增资工潮的工人统计已达十万人。故国民党当局亦不能不知难让步，同于此时规定一个工人增资以百分之六十为最高的标准。

广州公共汽车从业员要求提高待遇，曾酝酿罢工，双方争持甚久，直至三月二十七日方告解决，资方答允从三月十三日起照原薪加倍支給，每月补给工资（星期例假四天、事病假三天）共七天。广州善救分署汽车司机三百余人，和广花公路合群汽车公司机工，亦接着提出增资要求。

制香业工人要求增资，结果获得计件工资加百分之六十五的胜利。钟表业工人于三月十日向资方提增薪要求。棚业工人的要求经社会局调处，结果薪额提高至九千元，并由东主供给伙食。木屐业工人获得每百对工金增至一万五千元及伙食费一千元胜利。夹万业工人增加工资百分之八十。锤铁业工人增资百分之一百。杉槩界料业工人照去年九月所订工资加倍支給，长工则以今年一月为标准增加百分之四十。石印业工人获得增资百分之七十。洗染业工人照原薪加倍。木炭业工人照原薪加倍。此外餐室职工、女理发职工、毛刷业、弹棉业、屠牛业、制造衡器磅秤业、铁闸业、玻璃业、海味凉果业、清粪工人及水厂电话所职工，均发动过或在发动着增资的斗争。

综观广州的增资工潮，从二月底开始，到三月中而达最高峰，

一直绵延至最近还没有停止下来。据不完整统计，卷入运动中的近三十个行业，参加人数虽未能确实统计，但在三月上旬已达十万人，那么全部人数当在二十万以上，足以证明斗争范围和动员群众的广泛。这个广泛性的群众运动，它的斗争目标虽然是经济要求，但由于那是根源于国民党卖国内战独裁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崩溃的大灾难，广大的工人群众为了生存不能不进行此一经济斗争，而结果当是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这个运动的本身是具有它的政治意义的，那正是接着援沈抗暴运动被打杀政策镇压下来之后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继续，在某方面说，它比之援沈运动的意义也许还要深刻，因为动员了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

另一点重要意义是，这个工人求生救死的增资斗争，起初是非常困难取得胜利的，靴鞋业工人的斗争拖延半个月才获解决，是其显例。那是因为国民党既然确定了禁压工人斗争的“紧急措施”，整个国民党政府及一切统治工具都是用在支持资方那一面，故此资方恃为护符。然而结果怎样呢？工人坚持下去，结果就胜利了，接着就是更广泛的同群涌上来了，迫着国民党当局自己修改了他的“紧急措施”，宣告破产了！谁说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是可怕的呢？他们在内战前线用美式飞机大炮去进攻，在其统治区内用特务，用手枪，用监牢，来支持着那些象“紧急措施”、“三征政策”等法西斯政策，但，只要有群众的力量，只要人民广泛起来斗争，那么，他们在内战前线要“放下武器”，但在国民党地区里，也何尝不会和在前线一样要“放下武器”呢！？

我们钦佩广州的工人阶级能够在法西斯鬼魔面前英勇地起来斗争，我们同声称道和庆祝他们的胜利！但，只要有四大家族的统治一天还存在，那么生活的痛苦和灾难绝对不会解除的。

因此，要活，还得再斗争！

（原载《正报》33期，1947年4月12日）

叶罗致周恩来并中央电

——对香港工委在工作布署上的意见

(1947年4月24日)

周并中央：

粤闽敌人空虚，农村我有基础，便利展开游击战争（惟据承志说，广东方面，除粤汉路西外，较强干部均曾撤走，并一般没有两面政策经验）。另方面，蒋美正争取与英在华南妥协反共，香港环境有逆转可能，因此香港工委在工作布署上，似应：

甲、加强对广东及闽西南农村武装斗争与游击战争的领导，为此，帮助广东区党委，研究发展游击战争的计划与农村策略问题。

将广东内地及闽西南流亡党员干部，加以审查训练，派回去工作。

建立曾生纵队干部回粤路线与办法。

建立闽西南领导中心，准备广东区党委或若干领导干部回内地，直接指挥。

越南支队之全部或一部，相机回粤活动。

加强武装统一战线工作。

设法与曾镜水取得联络。

乙、从发展南洋工作的号召起，有计划、有布置，疏散一批由京沪等地挤入香港的内外活动分子，到南洋去工作。

丙、紧缩与精简我在港之公开机关，与秘密绝对分开，准备环境逆转时，仍能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工作。

丁、对香港当局的态度，可从侧面加以试探，并暗示其之不要

上蒋美的当。

叶罗

卯週

关于形势和工作问题报告

(1947年4月)

目前是中国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的到来，但仍在发展中（略——编者）

一切准备大反攻，长期打算，反对速胜（略——编者）

华南及广东的工作问题

广东目前特点：

A. 人民反抗的加强，人民反抗斗争的开始高涨，城市斗争继续，市民蠢蠢欲动，日以增加。农村反三征、反贪污斗争继续发展，人民武装的活跃和发展，几个月来发展十倍，平均五倍，范围全省性，山岳地区已成战略地带，平原也建立起来，结合起来，而且斗争还刚在开展。

B. K力量空虚，去年八A，今年则61R，205师，69D有99，92二旅66旅驻佛、清，99粤北，92广州外围，有二营驻南路，十个省保安队（20D），二个宪兵团及各县反动力量，兵力空虚，影响攻势动摇，统治动摇，去年六月——九月稳定，九月开始动摇，现在更动摇，加上三征迫害，北方军事的失利。

C. 经济崩溃，财政困难，物价飞涨，工厂关门，除四大家族之外，国民经济破产，所以工商业破产。今年省府赤字四百多亿，中央补充百亿，不足三百亿，以后未算。因为财政困难，省市府都

困难，各县打粮仓，地方税收不到，海关收入不够本身支出，所以经济财政困难，仍向前发展，仍无想救特征。

D. 政权上中央化，而另一面又孤立，与地方孤立，与人民对立，使中央化政权孤立，威信降低。

E. 出卖广东，助蒋建筑广州湾至兰州的铁路，今年准备筑到梧州，修筑粤汉路；琼崖改省，运用美资来建设琼崖，出卖与美国。管宜公司成立，陈纳德航空公司成立，黄埔港美已测量，广州到梧州线美已测量，已建立美国的广州、梧州的货仓，美在华北、东北争取不了，因而争取华南，K亦重视华南，因此勾结起来，一边殖民地化广东，一面出卖广东，虽然英与蒋美间谈判，未有结果，三方面妥协未有结果。

广东两方面斗争，日益激烈，而且是全省性的，成了华南斗争最中心的地方，从这方面看，华南是有条件建立根据地的：

1. K的困难，做成无数矛盾，弱点多，空隙中找机会来发展。

2. 今天无法调兵，回来无可能。

3. 广东组织反动地方势力，可能组织一部分有枪土匪流氓可能，钱可以剥削一部分，地方流氓又多少不满，恐怕蒋缴枪，兵源不易解决，钱也有困难，但可能组织补充一部分。

强调地方武装，又不信任人民及地方，不敢彻底，但某些县分可能加强，但不能增加大量。

4. 夏季可以收粮，但比去年一定减少，征兵也一样，人民负担不起来，群众斗争有初步基础，武装队伍也出现，结合起来，对征兵、征粮及税收大破坏，经济困难更多。

5. 主观上，有华北自卫斗争的胜利，目前的基础，干部配备。

广东工业的危机

(1947年5月)

许涤新

一、昙花一现的景气

在抗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广东的工业，曾经有过一个活跃而兴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散布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工厂——像卷烟、火柴、橡胶、土布等，都在拼命地开着夜工，争取出品快一点应市。但，这种兴旺的时期并没有延长得多久！这个桃红色的“景气”，象昙花一般地一下子就退色了！

到最近半年，情况越来越险恶——停工、减工、关门的悲剧一幕一幕地在表演着。以织造业和卷烟业为例，穗市的毛巾、衫袜及土布业织造厂，在三月间，陷于停工或入半睡眠状态的，已达五、六十家，失业之男女织工，达三万五千名之多，卷烟厂亦倒闭了五分之四，现在只存二十余家。不仅广州一带如此；汕头方面的火柴及细纱业亦在倾泻直下的残景中！

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里，工业是没法发展的，这是整个中国一般情形，广东当然不能例外，但在广东除了一般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将概括地来检视这些问题。

二、广东工业的特点

广东工业的本身，包含着一些比较上海方面更脆弱的弱点，这就是：

第一，轻工业，特别是手工业，占着优势。在现在开工的省营

企业中，我们看不见冶炼业，亦看不到机器业，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一些制糖、纺织、饮料、酿造和制冰厂。民营工业呢，据去年十一月底的统计，曾经向建设厅办理过登记手续的工厂，广州市共九百八十七家，其中只有机器厂六十四家，修理厂八十九家，其余八百九十四家是属于织布、印刷、酿造、化装、烟丝、火柴等类的轻工业；顺德有四十五家是制糖厂；汕头、东莞、罗定、高要、饶平及潮安等六县，只有七家火柴厂。在广州虽有几十家机器厂和修船厂，但这些厂除了协同和、大生、捷和之外，都带有作坊性质，他们的规模，有的恐怕连制糖厂或罐头厂都比不上，在粤北、岭东以至南路，虽有一些开采业，但这都是手工开采的。用一句话来说，广东的民营工业中，手工业占很大的数量，还有不少是属于家庭工业式的！

第二，从生产规模来说，广东的工业大多是属于中小型的，以资金比较雄厚的公营工业而论，纺织厂在去年年底还只有七八千锭；饮料厂只有员工百余人；最大的顺德糖厂亦只有员工一千三百人而已，广东的公营企业（官僚资本的）可分为二个系统：一个是省建设厅辖下的工厂；一个是广东实业公司辖下的工厂。后者的资本只有十一亿元；前者的资本亦与后者相若（刚才所说的什么顺德糖厂，就是属于广东实业公司的）。两者合并起来总资本还不到二十亿元，这二十亿元（纵然以去年年底的币值计算），能够建设些什么呢？谈到民营工厂，亦是很可怜的，以广州较大的六十二家民营工厂为例（在经济部有登记的，资本在一亿元以上的只有两家；一为东莞宏业制糖厂资本十二亿元；一为广州黄植生机器制食品厂，资本一亿元；在一千万元以上的仅有七家，其中“大益火柴厂”一千五百万元，合成电气厂二千万元，其余的皆为一千万元；在一百万元以上有二十三家；其余三十家都是一百万元以下的，其中以三数十万元为最多，亦有少至一、二万元的。这么大一点的资本，自然没法有大的生产规模，自然没有大的生产量了。以糖厂为例，除宏业制糖厂每年产糖二万五千担之外，普通都是年产二、三千担

的。统计二十五家糖厂每年的总产量，也不过九万担左右，尚不及省营顺德糖厂一家之多。以火柴为例，普通年产只有二、三百箱。以卷烟为例，普通年产只有三数百箱，只有“万国”、“国华”两家超过千箱以上。前者年产七千二百箱，后者年产三千一百箱，但较之国营的东亚烟厂月产二千二百箱，又不免黯然失色了！

第三，广东工业的落后性，不但表现在轻工业手工业占优势，不但表现在中小型生产占着优势，而更重要的，尚且表现在它的剥削关系上。

（一）省营工业，不管属于建设厅的系统也好，不管属于广东实业公司的系统也好，在外表上纵然装璜得很好看，但他们有不少是兼营着商业活动的。对于工人们待遇，则极尽其刻薄的能事。像赚钱最多的顺德糖厂（据说去年可获利二十余亿元）。它们利润几乎绝大部分是由蔗农的血汗所制成的。该厂的蔗，是用糖与蔗农换来的。敌伪时代，每担蔗可换七斤糖，而该厂成立之初，每担蔗只换农民五斤糖，一担蔗可制砂糖十斤。该厂就用它的特权从蔗糖掠取得一倍的“利润”，而蔗农呢，还要在这五斤糖之中，负担糖税，又要备受验蔗，过磅种种留难阻滞及其他不应有的损失。有一位绅士说道：“糖厂不特榨了顺德的蔗枝而且榨了顺德的蔗农！”

（二）因为广东的工业是手工业占了优势，因此，在生产关系上，亦是大多属于前资本主义的，潮汕一带的抽纱甚且行着包工制，工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她们往往是赚不到吃饭的；并且经常尝不到米的味道，火柴、卷烟、丝织、棉织等亦极多使用女工、童工，用极低下的工资，用极恶劣的条件去剥削女工、童工，是广东工业落后性的又一特点。

广东的工业是脆弱的，是落后的，因为脆弱和落后，所以，它就无力抵制外力的袭击了！

三、摧毁广东工业的因素

摧毁广东工业的因素是很多的。归纳起来可以看见：

(一) 国民党当局的苛捐杂税是一个致命伤。别的不说，单用直接税和营业税就够了，据本年二月十日广东区直接税局长李应兆对记者说，本年全省要四百五十二亿，占全国第四位，比去年度增加五倍强，而这个五倍的专税，广州市就要负担三百多亿元，营业税呢，据《星岛日报》五月十一日载，说广州市库款收入每月三十余亿中，营业税占三分〔之〕二有奇。在这种情形之下，商店吃不消，工厂亦吃不消了！以火柴业为例，去年每罐火柴之原料成本仅二万余元，而税额就要七千余元，这怎能使工业生存下去呢？

(二) 由于国民党政府之恶性通货膨胀，游资充斥，但因为物价上涨的关系，市面上反形成银根紧，利息高的现象，广州汕头一带的拆息，虽然不及上海，但百分之十五左右是很普遍的，利息高，各厂可得之利润，多为它吃去，有的时候，竟至不足偿付利息的！

(三) 由于法币跌价，由于外汇率（特别是黑市外汇）暴涨，同时，更由于国民党当局之独占入口贸易，限制民营工厂原料之进口或转口，造成各厂原料的涨价；广东纺织业是因为上海曾经限制棉纱南下而增加其成本的；卷烟或橡胶等业则因外汇之飞涨而提高其成本的，以二十支双马为例，去年八月间每扎纱不过四万余元，而每疋布价连织染人工可售五万余元，当时纱价与布价相差万元左右，厂家赚利颇可观，九月禁纱南运，二十支纱在十月初就涨至九万大关成九万二、三千元了，但土织爽纱每疋仅售八万二、三千元，以后纱价更涨，厂家更没法经营了。

(四) 广东与香港一水之隔，美货经香港而走私至广州、汕头或湛江等处，美货独占了市场，本地工业也就无法生存了。除了美货之外，广东工业还要与上海产品竞争，因为广东的工业，规模小，成本高，品质与质地又没有上海产品之优良，所以，在竞争中，本地工业常占下风！

(五) 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这就是广东经过敌人八年的括削，战时经过几次的饥荒，战后又遭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征实征借和征兵的深刻掠夺，人民实在穷到无可言状了，人民穷，

社会购买力就低。社会购买力低，工业品的销路就要受到影响，大家救死纳税之不暇，谁还有钱去购买工业日用品呢？南洋吗？日本投降以后，它空出的地位，本来是可以作为中国工业的市场的，但一方面因为国内生产成本低；一方面则因为美国及澳洲等处之货大量而至，去路亦就塞住了。

这些因素，促使广东工业急激地衰败下来，促使广东的工业家，感觉到过去经济的美景，好像黄粱一梦了！

四、五年建设就是“美化”广东

广东的工业正在走向崩溃的深渊！可是，广东的当局却又在大吹大擂宣传其五年建设计划。甚且详细地向三千万广东人民，开出一张五年计划成功后的衣食住的预算表来！连每人每日所分配得的米、鱼肉、蔬菜、豆类、脂肪、水果、鸡蛋、牛奶、白糖、布疋，住屋都写得明明白白。这实在是周到得很的？！

如果把广东的五年计划和南京的五年计划联系起来看，那末，我们很可看出这是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出卖中国，出卖广东的阴谋。如果他们阴谋得逞，中国和广东的建设不但搞不起来，反而会破坏得更凶的。

据建设厅谢文龙晋京的结束，南京政府准拨支二十亿元，并准在广州向各银行筹借二十亿元，合共四十亿元，这就是所谓五年建设的第一批本钱。四十余亿元等于战前二十万元，用这二十万元就要来开发全省，这难道不是在向人民开玩笑！这笔本钱能盖几座工厂呢？能建设多少水利工程呢？可是，对于开辟公路，却很认真。为什么如此？因为开辟公路可以便利于镇压农民的起义，便利于他们在广东进行内战；其次，开辟公路又可便利于美国大叔来推销商品。这是美国在粤汉铁路投资后必有文章！

就这样，广东的官僚资本就和美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结合起来了，美国不但要独占东北、华北、华中，并且要独占华南。广东的军阀官僚——罗卓英之流，便秉承南京政府的意旨，开门揖盗，把

美国资本请进来。三月间美国的潘宜企业公司的主持人潘宜氏就在广东备受广东的军阀官僚的优渥招待，潘宜公司投资于广东是决定了的，原来广东的五年建设计划就是美国殖民地化广东的政治准备，蒋政府的无耻，超过汪精卫，美帝国主义的凶恶，超过日本鬼，而罗卓英之流则是可以与褚氏谊等并驾齐驱的！

对于粤汉铁路的投资，对于黄埔的开辟，对于广州、汕头、汕尾、湛江等市之扩展堤岸兴建大码头，和直接在广东开办卷烟厂、造船厂、机械炼气厂等等，就是美帝国主义将要逐步实行的计划，象这样，广东将要变成什么一个样子呢？读者们，当可一想就明白吧！

国民党政府使民族工业不断破产，而又开了大门，把美国资本请进来！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人民，难道你们就让他们把广东变成菲律宾第二，把自己变成美国的奴隶吗？

（原载《正报》38期，1947年5月17日）

广东各地我武装人数武器统计

（1947华5月）^①

（一）人数（五月中旬知道为止）

南路4800（中有700是四属）	五岭330
中区140	九连350（黄村200 连、和150）
中山56	翁江550（翁 235 英 200 新 115）

^①原件未署作者。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西江500 (原400余, 近是增加)

江南420

江北200

潮汕60—70

上合: 5976—5986

上合: 1430

两者合5976 + 1430 = 7406—7416人

(二) 轻× (五月中旬为止)

南路 31

中区 5—6

中山 3

江南 10 (失风工, 是否在内待查)

潮汕 6—7

西江 19 (原有18, 但中东李朗鸡式7, 不大用得, 近又缴获1)

五岭 4 (原有6, 去年底及今年春失去2, 下可能另复入3)

翁江 7—8 (新丰2, 翁2—3, 英3)

九连 8

江北 10 (新近缴获2)

合共 103—106

(三) 其他重×

五岭 (重1, 航空机1) 2

九连 (重2迫1) 3

中区 ×?

江南 ×?

(五月统计)

(五月统计)

(一) 五月中旬止, 知道各地现有部队人数:

西江：500左右	中区：140余
中山：56	江南：400
潮汕：60—70	五岭：330
九连：350（黄村200，和平150）	翁江：550（翁230余， 英东200，新丰110余）
江北：200	
2586—2596（五岭、九连、翁江、江北合有1430人）	
加上南路	4800（中1700是钦防四属的）
合计：	7486

（二）轻×现有数目（亦五月中旬知道为止）

南路	31
中区	5—6（17—18）有些是未取用
西江	19（中有17条是李朗鸡式，不打得）
中山	3
江南	10（失二条，是否在内未明）
潮汕	6—7
五岭	4（原有六，旧年底及今年初失去2）
翁江	7—8
九连	8
江北	10（中三、四月间缴获两）
共	103—106

（三）其他

五岭	重1，航空1	九连	重2，迫1
中区	×？	江南	×？
中区现有180	翁现有350		

广东各区敌我部队实力概况

(1947年5月)①

目前广东各区我队实力概况

广东本部各区我队实在人数，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以前计有一千六百二十八人，到本年（一九四七年）五月，扩展为七千六百六十一至七千七百九十六人，半年间增加人数六千零二十三人至六千一百五十八人，总计平均每月增加一千零二十七人。

兹将各区我队人数分别统计如下

区 名	去年十一月前人数	本年五月份人数	增加人数	附注
南 路	700	4850	4150	
中 区	140	180	40	
西 江 区	300	500	200	
江 北 区	50	200	150	
翁 江 区 (新、翁、 佛、英东)	120	575—700	455—580	
五 岭	150	330	180	
九 连	90	450	360	
江 南 区	20	420	400	
潮汕(陆丰在内)	20	100—110	80—90	
中 山	38	56	18	
合 计	1628	7661—7796	6023—6158	

①原件未署作者。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根据文意编者对文件内容顺序作了部分调整。